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近代地理学创建人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本书目的是根据德、法两国主要学者的著作来追溯作为一门有系统的知识——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

地理学在两千年以前就已经是一个范围明确的知识领域了。托勒密（Ptolemy）和斯特拉波（Strabo）的著作就包含着清晰的地理学基本概念，虽然我们应该经常地记住（因为古典派学者们常常忘记）：他们的理论观点，就象迄今为止的他们那些后继者的观点那样，都遇到缺少有关地球上陆地、海洋、居民，即缺少有关他们写作主题的确切资料和地图的困难。

可是我并不直接关心那些早期学者们的著作。我们的目的是追溯最近一百年或稍长一些时期内地理学的发展状况。在此期间，它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发展。整个文明世界各大学对它的充分承认，以及专业团体和国际组织的各种活动，都能证明这一点。

本书的目的既已说明，我就可以简要地介绍它的内容了。国际颂扬的近代地理学奠基人是十九世纪前半期的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和卡尔·李特尔（CarlRitter）。在此以后几十年内（主要是该世纪的第三季纪[1]），德、法两国都把李特尔的地理学当作历史学的附庸。这门学科在探险界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且在该世纪的最后一个季纪内赢得大学里的讲座——这一发展既由于知识的增进，也由于当时两国正处于积极的殖民扩张时期。

第一批讲座创设于十九世纪最后一季纪内，它们的主讲人因而也就是大学地理学家的第一代。领袖人物是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和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Ratzel）。

第二代是第一代的学生或追随者。他们的学术活动时期是和他们的老师及自己的第一批学生互相交叉的。这一群人包括法国的维达尔·德·拉·布拉什（VidaldelaBlache），德国的阿尔布雷希特·彭克（AlbrechtPenck）、阿尔夫雷德·赫特纳（AlfredHettner）、奥托·施吕特尔（OttoSchlüter）和约瑟夫·帕奇（JosephPartsch），英国的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Mackinder），美国的威廉·莫里斯·戴维斯（WilliamMorrisDavis）和瑞典的斯滕·德·耶尔（StendeGeer）。他们的职业活动时期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到二十世纪第一季纪末。所有这些人，在其活动早期都是其前辈大师的同时代人，但离开岗位的时间要比他们晚约二十年。

第三代中有的是第二代的学生，有的是受他们强烈影响的学者，还有少数是德国人所说的以“自学的地理学家”而进入地理领域的，他们当中有许多杰出的人物。这一代所处的时代大致是本世纪的第二季纪，而他们最活跃的时期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说实在的，从许多方面来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中断时期作为划分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时间根据是适当的。

第四代包括这类学者：他们在两次大战之间开始其学术生涯，在过去二、三十年内是领袖人物，现在则已进入晚年，已经或者就要退休了。

第五代包括那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已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并在今后二、三十年内还将继续领导这项活动的学者。我不打算从他们中间挑选几位进行个别述评，我只想去考查一下战后年代研究和出版的一般趋向。

---

[1] 一季纪等于四分之一世纪，即二十五年。——译者

这种逐年成长的过程决定了本书章节的顺序。本书在定稿时只分别述评德、法两国的地理学家。

几点一般性说明是必要的。在大学讲授地理学已有一百年之久，但在英、美两国仍然有很多人不明白地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我的目的是向讲英语的学者们介绍一份长期的、受到尊重的学术遗产的要义。如果说地理学就是地理学家所创建的，那就让我们看看它的那些伟大创建者的著作吧。这样的写法必然要带来一些重复。在这方面我用不着道歉。事实肯定能揭示出它的主要创建者的观念和目的的一致性。再有，我要在这里一开始就指出：近代地理学所有杰出的创建者——欧、美的都是一样，更不要说托勒密和斯特拉波了——所一贯关切的目标是区域概念，即地球表面各个特定和一般地段内各种地理现象的结合方式。我有意识地略去那些附属研究领域（不管是地形学还是地缘政治学）发展的资料，我只根据与对区域概念的问题和研究方法有关这一点来选用这类作者的著述。

前在里尔大学、从 1965 年起在巴黎大学的 P.潘什梅尔（Pinchemel）教授和基尔大学的 F.威廉（Wilhelm）教授欣然提供关于战后趋势的短篇报告。卡尔·特罗尔（CarlTroll）教授提供有关阿尔布雷希特·彭克学术活动的非常珍贵的资料。让·戈特芒（JeanGottman）及安德烈·肖莱（AndréCholley）两教授在法国地理学问题上对我的帮助很大。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Harts-horne）博士仔细审阅了第三稿，他在文章细节及内容斟酌方面的大部分意见，已被采纳在另一部重点由近代地理学领域彻底转向列传的文稿之内。我要向所有这几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可是，本书每一个字的责任都由我负责。最后，本书各个阶段的大量准备工作都是我妻子做的，对她长期的坚忍和同情的支持，我以这最终成果表示感激。

罗伯特·迪金森

基本参考文献

有关地理学研究领域的基本参考文献如下：

1.阿·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DieGeo-graphie，IhreGeschichte，IhrWesenundIhreMethoden），布累斯劳，1927。

2.理·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TheNatureofGeogra-phy），两卷，载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AnnalsoftheAssoc.Amer.Geogrs.），卷 29，1939，9 与 1939，12，第 173—658 页。1946 年由该协会重印为一卷。还有《地理学性质的透视》（PerspectiveontheNatureofGeography），芝加哥与伦敦出版，1959 年。这两部著作是用英文（也许是用任何文字）写的对地理学领域的学术性最强的分析。对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著作的周密精微的全面审察，是这两部书的主要基础。

3.G.德·琼：《生物分布学的差异是地理学的根本原理》（G.deJong，ChorologicalDifferentiationastheFundamentalPrincipleofGeography），格罗宁根出版，1962 年。

4.G.泰勒：《二十世纪的地理学》（G.Taylor，GeographyintheTwentiethCentury），1951 年，是许多国家十多个人写的有关“地理学的发展”、“作为一个因素的环境”和“专门的领域”等方面的论文集。

5.T.W.弗里曼：《地理学一百年》（T.W.Freeman，AHun-dredYearsofGeography）。主要是一份在英国的发展记录，非常零散地提到

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著作。

近代地理学创建人

第一编　奠基人

第一章　从斯特拉波到康德

托勒密与斯特拉波

在古希腊的口头传说里已有关于风土人情的描述，荷马的著作也反映了这类传说。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在科学领域内前进了一大步。他不仅对地球的大小作出了著名的、非常精确的计算，而且写成一本叫《地理学》（Geographica）的书。这本书虽已失传，据信是在文字记载中第一次使用了“地理学”这个名词。这个名词（Geographica）来源于希腊文的两个字：ge 和 grapho，它们的字义分别是地球和我写。因此，从字面上看，地理学的意思是关于地球的描述。自荷马时代以来，地理学著作者们就一直在描述有人居住的世界（即希腊文的人世〈ecumene〉）的土地和居民，并且推测遥远的未知世界的土地和居民情况。

托勒密和斯特拉波的著作中含有现存的、地理学范围和目的的最完全的定义[①]。我们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地理学是研究整个地球上各地方的位置和相互关系。地方地理学（chorography）全面研究一个既定整体的各个部分（类似四肢和人体的关系），而小地区地理学（topography）则研究各别的单元、系列或一组单元。这些名词的基础是希腊文的字根 ge、chora、和 topos，它们的意思分别是地球、地区、和（小）地方。这些字根在十七世纪贝·瓦伦纽斯（BernhardVarenius）和十八世纪康德（Kant）的著作中又被重新下了定义。这一概念体系的实质就是斯特拉波所说的一个单元在和地表其它地方的关系中所具有的“天然地方属性”。不管现代的概念和问题是如何的复杂，斯特拉波的概念仍然是所有地理学概念中一个基本的、独特的概念；而且就在今天，它依然牢固地凝结在大众的语言里。

在古代，位置这个词有两种含义——天文的位置和地理的位置。地球是被大洋环绕的一个圆形地块，这一观念得到米利都城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和赫卡泰（Hecataeus）这些人的支持。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斥之为神话，因为它没有观察或经验的根据。位置只涉及已知的世界——人世。人世的外面还有一个未知的世界。他们不沉迷于推测，当然也就不试图画出未知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地图。

另一方面，宇宙学考虑的是地球作为太空的一个实体而得来的各种性质。因此，地球的形状、大小和区划都是宇宙学的内容；虽然斯特拉波曾经指出，有关地球的宇宙学观念，是对地球的表面、性质和各地相互关系作地理学描述的基础。把地球划分为可居住和不可居住的两部分（不管根据是冷还是热），是宇宙学的事情。同样，把地球划分为五个平行的带，也是宇宙学的事情。这一观念出现的时间，在希腊可能要上溯到公元前五世纪；而且很明显，它的基础必然是地球是球形这个在当时只是基于哲学论辩、而不是基于观察的观念。这个球体，直到公元前四世纪才由亚里士多德根据观察和推论来予以证明，后来又由另一些人来算出它的大小。远在地球被环航以前，寒、温、热各带就已被人们根据天体特征在地球表面的投影，而用极圈和回归线划分出来了。

[①] F.勒克曼：《古典地理学中的位置概念》，《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51（1961），第 194—210 页

阿皮安与明斯特尔

我们现在从托勒密和斯特拉波一下子跳过了一千五百多年。地理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知识，在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的观念都复活了；就地理知识而论，那些古典的观念只是逐渐地被抛弃和得到改正。例如，托勒密的地图和他对各地经纬度的计算，直到十八世纪还在影响着地图的作者和歪曲海岸线的描绘。十九世纪的探险家们确实还在寻找月山（theMountainsoftheMoon）；而且在十八世纪库克（Cook）船长的航行以前，托勒密的关于南方大陆的想法仍然支配着人们对南大洋内水陆分布的观念。

必须简略地提一提彼得·阿皮安（PetrusApianus）和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SebastianMünster）。他们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初期写了两部地理学著作。这两部书在十六世纪出版以后的一百年中是理论著作的主要典范：一部是它对天文学及数理地理学的通俗的阐释，另一部是按照斯特拉波的模式的描述地理学。

彼得·阿皮安于1495年生于萨克森，是一位天文学家和制图学家。他除制作地图和地球仪外，还出版了两本书：《天文学专论》（Astronomiconcaesareum），和模仿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的《宇宙学导论》（MartinWaldseemüller，Cosmographiaeintroductio）而写的《宇宙学》（Cosmographicusliber）。《宇宙学》初版于1524年。该书初版几乎专门讨论几何学及天文学中对地理学至关重要的那些方面。书中包含许多地点的经、纬度；它的描述地理学部分则是后来由盖马·弗里齐乌斯（GemmaFrisius）严格按照托勒密的写法增补上去的。

该书清晰地阐明托勒密提出的地理学不同于地方地理学的观点。地球被说成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和行星都绕着它旋转。地球被划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为五个带：热、温（位于回归线与极圈之间）和寒带。地带（climata）被规定为两条纬线之间的地区。它们白昼最长日的时间长度相差半小时；每一地带都根据其主要特点，如市镇、河流及山脉来命名。陆地有四种形式，即岛屿、半岛、地峡和大洲，每一形式都用简图来说明。然后又附上比例尺和方位，用作直线量算的基础。每一大洲都有简短说明。最后是每一国家的一长串市镇的名录，附上从约翰·舍内（JohannesSoh■ner）及托勒密著作中引用来的它们的经、纬度数。

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是十六世纪德国地理学家的最杰出的代表。1489年，他生于美因兹附近的英格尔海姆，后来在海德尔堡和维也纳学习。1536年，他被任命为巴塞尔的希伯来语教授，直至1552年逝世为止。明斯特尔对制图学有重要贡献。他试图用一架小罗盘仪（即棱镜罗盘仪的前身）在海德尔堡附近一个小区域进行简单三角测量，以便改进制图方法。

明斯特尔于1540年在巴塞尔出版由他审订的托勒密著作，并在以后十二年内再版四次。1544年他又出版《宇宙通志》（Cosmo-graphiauniversalis）。这是当代权威著作的汇编，而不是他精心撰写的一部专论。历史和世系表占有该书大量篇幅，而数理及自然地理学则几乎没有提到。

明斯特尔认为地球是球状的，并且宣称：地壳经受洪水及河流的作用而发生变化。他在荷兰洪水方面的知识使他断言：自诺亚时代的大洪水以来，许多陆地被淹没了；高山和河谷是河流在原先平坦的土地上造出来的。他也

提到地震（“中央之火”）、岩石的特性、金属的性质及其分布，以及采矿的方法。该书主要是在地方地理学的基础上讨论德国的人文及政治地理。它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亚洲、非洲和新世界。这部分全是第二手材料，描述的技巧也逊于欧洲部分。

明斯特尔是敏锐的观察者和优秀的作家。他的书在一百多年内是标准的教科书。“这部由明斯特尔的洞察力、学力和精力熔铸成的著作是如此圆满地切合时代的需要，和如此牢固地确立自己的地位，以致它的增订版一直被使用到 1650 年以后；用 6 种文字，印行 46 版”。[①]

瓦伦纽斯、克卢费尔与康德

《宇宙通志》的后继者是贝恩哈德·瓦伦纽斯于 1650 年出版的《普通地理学》（Geographiageneralis）。这是第一部企图把普通、数理及自然地理学与地方地理学结合在一起的著作。[②]

贝恩哈德·瓦伦纽斯在 1622 年生于汉堡附近易北河上一个小镇希察克尔。1640 年他入汉堡大学预科学习哲学、数学和物理学。三年以后他到柯尼斯堡大学研究医学；但因不满意那里的教法，他转到莱登继续学医。1649 年他出版第一卷论述日本地理和历史的书。从他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这是一部优秀的描述性编著。紧接着他又出版论述日本宗教的第二卷。1650 年 8 月他发表了《普通地理学》，这是在 1649 年秋至 1650 年春写成的。毫无疑问，本书还应有第二卷，但因他于 1650 年 28 岁时不幸早逝，第二卷未能完稿。

瓦伦纽斯的地理学的早期译本的全名是：《普通地理学的完整体系：解释地球的本性和性质……原由医学博士贝恩哈德·瓦伦纽斯用拉丁文写成，后经艾萨克·牛顿爵士与朱林博士审订并增绘插图；现由德格代尔先生译成英文。全书业经彼得·肖审订和改正》，一个长长的副标题描述“地球的本性和性质”如下：

“它的形状、大小、运动、位置、内容、水陆的划分、山地、树林、沙漠、湖泊和河流等。

不同国家的不同天象的详细解释，全球各地每年的季节、海水的潮汐、海湾、岬角、岛屿、岩礁、沙洲和大陆架。大气的状态、蒸发的性质、暴风雨、龙卷风等。

泉水的起源、矿质水、火山、矿藏等。

地图、地球仪及海图的使用和制作。

[①] 阿兰·吉尔伯特：《皮埃尔·达维蒂：他的地理学和米尔顿对它的使用》，《地理学评论》7（1919），第 322—38 页；引文在第 325 页。

[②] 贝克于 1955 年在《英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发表一篇评价瓦伦纽斯的文章。1963 年在牛津和纽约出版的《地理学史》转载了该文（第 105—118 页）。瓦伦纽斯的《日本王国与暹罗王国记述》于 1649 年和 1673 年先后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出版。《普通地理学》初版于 1605 年。艾萨克·牛顿爵士审订的两个拉丁文版本于 1672 年和 1681 年先后在剑桥出版。布洛姆评的第一个英文本出版于 1693 年。朱林审订的另一个版本出版于 1712 年。该版又经德格代尔和肖两人进一步审订，并于 1736 年出版。它对前版作了若干改正，并增加一些脚注。第四版也即最后一个英文版出版于 1765 年。这里引述来说明十八世纪中叶地理知识水平的，就是这个最后的版本。

制作日晷的基础、测量高度和距离的方法、造船的方法、航行和在海上测定纬度的方法。”

虽然瓦伦纽斯受到资料不足的妨碍，他的观念却远远走在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的前面。他给地理学下的定义是：“地理学是混合数学的那一部分，它依靠数量，即形状、位置、大小、运动和天体现象等来解释地球及其各部分的状态。有些人把它理解得太狭窄了，认为它仅是对一些国家的单纯的描述；另一些人又理解得太宽，他们想把政治组织也描述一番。”

地理学分为两类：普通的或一般的和专门的或特殊的。

“我们所称的普通地理学是研究整个地球的总的情况，并解释其各种性质，它不考虑各别的国家。但专门的或特殊地理学则单独地描述每一个国家的结构和位置；它也有两种：即描述范围广大地区的地方地理学，或说明地球的某个地方或一小片地段的小地区地理学。”

普通地理学分为三部分。绝对的部分：它研究地球的形状、大小和位置，以及水陆分布、山地、树林、沙漠、水文和大气；相对的部分：它研究“天文原因（在地球上）引起的现象和事件”，即纬度、气候带、经度等。比较的部分：它“解释那些由于对地球各部分进行比较而发现的各种特性”。

特殊地理学虽未经详细说明，大致包括三“项”内容。“天文特征是由于太阳和星的视运动而影响我们的那些特征”。地文特征是“在每个区域内观察到的”那些特征，其中包括位置、形状、大小、地形、水文、植被、肥沃性、矿物与土壤、动物、经度。人文特征涉及“地方的居民”，它又分为10类：

“1.他们的身长、体型、肤色及寿命长短；他们的起源、食用肉和饮料。2.他们的技艺和技艺所提供的利益；他们用以互相交换的商品。3.他们的道德和恶行、学习、能力和学校。4.他们的出生和婚丧的礼仪。5.居民使用的语言。6.他们的政治管理。7.他们的宗教和教会组织。8.他们的城市和名胜。9.他们的引人注意的历史。10.本地人中的著名人物、能工巧匠和他们的创造发明。”

瓦伦纽斯抱怨人们总是牺牲普通地理学而去讲授特殊地理学，并因此而声称地理学几乎不配享有科学的尊严。在特殊地理学中，各种特点应该用一般的规律来解释，才能使局部地区的地理学合乎逻辑和可以理解。所以，在他写的日本这部特殊地理学中，主题和普通地理学紧密适应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在瓦伦纽斯的书出版前几年，另有两本书已经问世，一本是德国人菲力普·克卢费尔[①]写的，另一本是英国人纳撒尼尔·卡彭特[②]写的。我只谈谈前一本。

在欧洲广泛旅行过的克卢费尔（1580—1622）是通过古典文学和历史学而进入地理学的。他所著的《普通地理学导论》于其身后的1624年出版。该书保持着地理学与地方地理学的传统上的区别。在全书六卷中，只有一卷概

[①] 菲·克卢费尔：《普通地理学导论》。此书主要部分承伦敦大学学院已故拉丁及希腊文教授M.T.斯米莱于1932年从大英博物馆所藏拉丁文版为我译成英文。这里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用书面向一位年长的受尊敬的同事表示一个青年人的感谢。

[②] 贝克：《纳撒尼尔·卡彭特与十七世纪英国地理学》，《地理杂志》71（1928），第261—71页，转载于1963年牛津版《地理学史》一书中

括地讨论了地球，其余五卷则简略地描述各个国家，其内容又着重于人文及历史方面。它的普通地理学部分的水平，肯定低于瓦伦纽斯的著作。克卢费尔不知道哥白尼的观点，仍然把地球当作宇宙的中心。他的数理地理学及天文学与一世纪以前阿皮安的著作相比，没有什么进步；而自然地理学也仅限于水陆的分布。因此，克卢费尔专注于各别国家的描述。描述的内容一般是它们的名称、范围、土地的性质及其产品、古代和现代的政治区划、种族和地形。

该书首先介绍托勒密对地理学、地方地理学及小地区地理学所下的定义，接着就叙述天文带、大圆、黄道带、经线、小圆、纬线及地理带、方向基点、360°的划分、距离的量测、大洋及其划分、大洋的大海湾、内海（即地中海）航行，以及全世界的简略的区域划分。

描述区域的方法可用不列颠群岛为例。先简要说明其位置和面积，再描述其种族、国家和居民（主要涉及罗马人的占领），然后对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作简短说明。关于爱尔兰的那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最先定居在这里的是什么民族，还不能肯定。现在只能说，他们和其他不列颠人一样，都属于凯尔特族。托勒密提到的住在这里的布里甘特人、考锡人和梅纳皮人很有可能是从高卢、不列颠及德国渡海过来的。现在这个国家主要分为四个地区。整个王国共有三十三个郡。如果说爱尔兰人住在小市镇，而不是在大城市里，也许更确切些。

它的养料多而又适口的牧草是如此丰茂，以致牛群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吃饱；如果不使它们离开饲料，它们就要吃到胀破肚子。它的居民是粗野的，比别的种族更加不讲道德。”

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克卢费尔和瓦伦纽斯的著作一直是标准的著作，并且把我们带入作为一门学科的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初期。

哲学家伊马努埃尔·康德（1724—1804）从1765年起在柯尼斯堡大学讲授自然地理学，并在以后出版了他的讲稿[①]。在他看来，人文要素是地理学主题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康德把人的经验交流分为两类：叙述的或历史的，和描述的或地理的。他把历史和地理都看成是描述；前者是时间方面的，后者是空间方面的。他说自然地理学是“自然的概括”，不仅是历史学的基础，而且是“所有其他可能的地理学”的基础。他指明为自然地理学组成部分的其他五种地理学是：数理（地球的形状、大小及其在太阳系中的位置）、精神（人类与环境有关的风俗习惯和性格）、政治、贸易（商业）及神学（宗教的分布）地理学。因此，自然地理学的内容包括外部的自然世界，即地球表面及其上覆的有生命的植物、动物、人和人的工作成果。

康德基本上是遵从托勒密的地理学定义。可是在他和古典学者们的著作中间有着一项重大的差异。后者的重点，主要放在地球的区域划分和系统描述其独特内容的工作上。康德则不然，他不那么多地关心那些不同等级的复合的地域单元，他考虑的是对个别的地域差异现象进行有顺序的调查。两者都是地表区域差异的整体的一部份。但从反映在以托勒密和斯特拉波为一方、以康德和瓦伦纽斯为另一方的两类著作中着重点的差异，产生了在现代地理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的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这些不同的方法，近来被人们分别叫做理论的（推论的）和经验的（描

[①] 林克：《康德的自然地理学》的论文，第38—42页。

述的）方法。理论的方法是，寻求建立涉及到各地方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寻求建立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推论。经验的或会意的方法是，特别着重于通过陆地、海洋、区域及地方来描述那些国家和民族的特定的组合。它不寻求建立规律，但要找出现象在地方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地方的相互关系上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所有地理研究中两种基本的方法和传统；而且随着人们对地表知识的增加，它们的差异和冲突已变得越来越显著，越来越难于消弭和调和。

自然对人：比丰的著作

十九世纪的开头，人们在思索地理学——一门系统的知识——研究中的独特的概念和方法问题。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整理和解释有关地表及地表上生命形态的资料的方法，比丰（Buffon）伯爵的巨著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第二，在划分作为区域描述基础的区域单元方面的理论上和应用上的问题；第三，当时出版的那些标准地理学著作的内容，不仅揭示了地理著作的范围和方法，而且表明人们对地表及其各个不同部分的知识水平。

十八世纪的末期就已逐渐出现一种理论，它赞同自然规律的缓慢作用，反对那种通过神的干预而发生剧变事件的看法。当时这两种信念大部分还是理论上的。可是在十九世纪早期已经收集到有利于自然规律缓慢作用的证据，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种理论已占有压倒的优势。

在十八世纪晚期，发展科学方法以研究生命形态的问题也受到注意。在探险航行中为科学而采集标本的热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伴随库克去作发现航行的植物学家就带回大量的这类植物标本。对动植物进行分类和描述的工作也在着手。莱布尼茨（G.W.Leibnitz）和比丰试图按等级区分所有的生命形态——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有机体，而卡·林奈（CarolusLinnaeus）则按形态对生物进行分类。

文明的本质和发展问题引起许多思想家的注意。有关人类进步的理论，包含着某些对自然环境的促进或阻滞作用的思索。比丰和另一些人研究人种统一的理论和人类在全世界的扩散方式。对人种统一的这一信念，要求对人的多样性及其在地球上的不均匀分布作出解释，并且提出人口密度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有这些研究趋向，在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即比丰伯爵的《自然史，一般的及特殊的》（Histoirenaturelle，généraleetpar-ticulière）这部巨著中都有清楚的反映。《自然史》共有 44 卷，出版于 1749—1804 年之间，在比丰去世以后，由拉塞佩德（LaCépède）继续完成。

克拉伦斯·格拉肯[1]对比丰的著作作了如下的评价："《自然史》满足了人们对那种具体而详尽的知识的渴望，这种知识不从属于数学或笛卡儿演绎推理，而是基于研究、旅行、观察和描述。"它对了解这个非凡的科学发展时代的哲学观点提供了背景材料。这个时代的标记是，对探险、旅行和采集地球及其动植物和原始社会的有关资料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热情。

在研究整个自然界的同时，比丰多次提到人和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他

---

[1] 克·格拉肯：《比丰伯爵论自然环境的文化变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50（1960），第 1—21 页

提到人给他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变化，特别是伴随着文明的成长和扩展、人类及其驯化的动植物在地球上可居住部分的迁移和散布的那些变化。这是《自然的时代》（Desépoquesdelanature）的主题。该书名称所指的是地球历史的七个时期：“地球和行星的形成，地球内部岩石的凝固，海洋对大陆的侵进，海退和火山活动的开始，北方成为象和其他南方动物的栖息地，大陆的分离，人力协助自然力。”比丰叫人们注意的就是这个最后时期内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他想象 40°—55°之间的中亚是最早的文明发生地。这个文明是 3000 年前在一种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没有洪水和地震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开化的人在那里首先获得知识、科学和权力。但这种文明被来自北方的、由于人口过剩而离乡背井的民族毁灭掉了。这个早期文明虽已大部丧失，但农业和建筑技术残存下来了，并且传播到中国、大西洲、埃及、罗马和欧洲等地。在以后的世代中人类继续进步，比丰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今天，全地球表面都有人的力量的烙印。人，虽然从属于自然的力量，但常常比自然做的更多，或者至少是如此令人惊异地协助了自然。正是在我们人的双手帮助下，自然才得到其充分的发展，才逐渐达到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种完美壮丽的境界。”[①]

比丰完全相信人的创造力。作为一位农学家，他写了许多关于清除森林和需要保护森林的著作。他发展了这个论点：由于景观的改变——特别是清除森林和排水——气候变暖了。他思索过气候变迁问题，而且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伐除森林和排干沼泽可能导致气温的升高。另一方面，他又呼吁保护森林。格拉肯在总结比丰的立场时说：“不利于人的大面积森林需要伐除……但社会一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森林就是资源，就需要慎重而有远见地对待它了。”

比丰是早期土壤研究者之一。他把土壤分为粘土、石灰质土和植物性土三类；后者又分为泥炭土（由树叶腐烂而成）和烂泥。烂泥是泥炭土分解后的残余部分。

他也详细地论述过驯养的动物和栽培的植物。他对景观、特别是在可居住和不可居住地区的差别方面，常有精辟的见解。格拉肯介绍比丰的观点[②]如下：

“在长期有人定居的地区，很少有树林、湖泊或沼泽，但有许多荒地和灌木（这无疑意味着荒地和灌木占据了已伐尽的林地和光秃的山顶）。人们破坏，排水，到了一定时候就给地面换上一种完全不同的外貌。”

1800 年前后的区域概念：纯地理学

十八世纪中期以前，地理学是功利主义的百科全书式资料汇编，没有区域分布的系统介绍或一般原理；而且所谓区域也只是当时的政治单元。那时候，世界上人们了解得最多、描述得最充分的欧洲，被分成许多离奇古怪、互相穿插的政治区域，它们的边界时常改变，不可能作为描述的合理基础。

地理描述的新观念是德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这肯定是因为当时欧洲的

[①] 见前引克·格拉肯的著作，第 10 页。

[②] 同上，第 19 页。

[③] 关于 1800 年前后英文的主要参考资料是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第 211—24（35—48）页。埃恩斯特·普莱韦写过一篇论文讨论 A.F.布申

德语区域约有四百个政治单元。就在这个时期，这些德国学者们企图确定：把德国这个历史名词作为地理名词来说，它在政治、文化及语言方面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从政治区划所造成的描述上的困难中，就产生一种对纯地理学的兴趣。这意味着不用政治单元、而用自然单元来作为描述土地和居民的基础。这两门学科分别称作地理学和政治学。

安东·弗里德里希·布申写了一部《新地理学》（AntonFriedrichBusching，NeueErdbeschreibung）（11 部分；1754—92）。他企图在这部书里“描述地球表面的已知部分”，但用政治单元作为区域的基础；因此，他的描述，和许多仿效斯特拉波写法的著作没有什么不同。

可是，陆地和海洋的一种新的自然区划，却由法国学者菲力普·比阿什在 1756 年他的《论自然地理学 egéographiephysique）一书中提出来了。他根据 1737 年对英吉利海峡的深度测量，认为地球被山脉划分成许多流域盆地。这一推测的基础，是他对欧洲的有限的知识；另外，他对陆面和洋底的形态也显得无知。比阿什把山脉分成三类：东西向或南北向延 sching）的生活和著作，载于《黑尔曼·劳滕萨赫纪念集》（HermannLautensachFestschrift），《斯图加特地理研究》（StuttgarterGeog.Studien）卷 69，H.威廉密（H.Wilhelmy）编，1957。德文的一份主要资料是 E.维索茨基（Wisotski）的《地理学的时代潮流》（Zeitstr■mungeninderGeographie），莱比锡，1897。还有一份短而有用的讨论和文献目录，K.比格尔：《景观概念：对地理学的管见》，《德累斯顿地理研究》第 7 册（1935）（K.Bürger，DerLandschaftsbegriff ： EinBeitragzurgeographischenAuffassung ，DresdnerGeog.Studien，Heft7〈1935*伸的最高山脉；中等山脉是最高山脉的分支，它们把主要河流盆地分隔开来；由中等山脉分支形成的低山，它们是短小河流的发源地。他以同样的方式把海洋分成三大洋和两个极地海（南极地海纯粹是想象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每一大洋（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又被海底山岭分成许多盆地。

这种对地球进行自然区划的观念，在长期内得到人们的赞同。一位德国人约翰·克里斯托夫·加特雷在他 1775 年的《地理学纲要》（JohannChristophGatterer，AbrissderErdbeschreibung）一书中就运用这个观念。然而该书的大部分描述仍然根据政治单元。加特雷的地理学包括区域及其边界（地理学）、国家（政治学）与人种集团（种族学）。他把欧洲分成东西两部。西欧被称为日耳曼欧洲，又按照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波罗的海和不列颠海把它分成四个区域。它们是：比利牛斯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阿尔卑斯诸国（西阿尔卑斯山与法国，南阿尔卑斯山与意大利，北阿尔卑斯山与瑞士、德国、荷兰），不列颠群岛，和包括全部斯堪的纳维亚和普鲁士在内的波罗的海诸国。他把欧洲的其余国家都放在东欧之内——俄国、匈牙利和土耳其。加特雷说这些国家集团的基础是自然基础，但边界仍然是国家的边界。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指出，加特雷对地理学所下的定义是“地球的描述，地球表面的画像；它说明地球是什么，人企图把它做成什么；它描写天空、地球及其相互关系”。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和人类之家——地球——有关的、实用的和历史的描述。”

在此期间，另一些人也发展了地表自然区划的观念。H.G.霍迈尔（Hommeyer）于 1805 年写成一本讨论欧洲国家军事地理学的书——《试论欧

洲国家军事地理学》（Beitr■geZurMilit■rgeo-graphiedereurop■ischenStaaten）。他抱怨他的同代人在政治单元的基础上来描述地形。他分辨说，政治单元仅仅是军官进行训练时需要的次要部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作为战场的地球的自然条件。

从这些学者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自然区划概念，而且是在主要单元内部逐级分区概念的开始。例如霍迈尔就设想出四级地理单元。小区（Ort）是最小的地理单元；地区（Gegend）是在高处可以望得见的地域；区域（Landschaft）是“在很高的地点可以望得见的地域”，是“许多毗连地区的组合。它和相邻的地区组合界限分明，作为它们界限的主要是山地和森林”。第四个也是最大的地理单元是大区域（Land），它是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它的边界也就是大的排水区域的边界。它的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致“小区、地区以及伴随它们的一些有限的变化，对大区域的位置和排列的方向几乎没有影响”。

这一时期的其他德国作者，也相信地理研究应该不以政治单元、而以自然单元为基础。我们应该特别指出在李特尔之前主持柏林大学地理学讲座的约翰·奥古斯特·措伊内（JohannAugustZeune）的著作。措伊内在其 1808 年出版的《格阿：科学地理学的尝试》（Gea：Versucheinerwissenschaftlichen Erdbeschreibung)一书中摒弃时常改变的“国家碎块”，而采用历久不变的自然区划作基础。他提到加特雷的著作，但他的观点明显地排除了人的作为。他把欧洲分成几个主要的区域。南欧由三个单元组成——比利牛斯、阿尔卑斯及巴尔干半岛。中欧包括喀尔巴阡地区、海西地区及塞旺纳。喀尔巴阡地区包括匈牙利和“其他斯拉夫地区”，它的南界是巴尔干山脉，北界是喀尔巴阡山和德涅斯特河。海西地区包括德国、丹麦以及瑞士和荷兰的一部分。它北以大海，南以阿尔卑斯山，西以莱茵河，东以奥得河为它的天然边界。实际上这就是历史上的德国。塞旺纳包括法国，加上瑞士和荷兰的一部分，而以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到圣哥达山口为止）和直到河口的莱茵河为它的边界。北欧也分为三部分——北海诸岛（大不列颠）、东海半岛（瑞典、芬兰与挪威）和俄国；它的范围东到乌拉尔山，西南至德涅斯特河、喀尔巴阡山和奥得河，西北抵波罗的海、芬兰湾、拉多加湖和白海。他说这些“地理单元”主要是以山脉为界的排水单元，而且“人们发现大自然有一种创造相类似的动植物生活的倾向，甚至相类似的人和民族的特征的倾向……因此，山脉是植物、动物和人的自然分界线。”这是一种毫不含糊的环境决定论，就在他的同代人中也没有获得普遍的赞同。

A.L.布黑（Bucher）表达了类似的观念。在 1812 年的一本《论地理学及其与历史学和统计学的关系》（BetrachtungenüberdieGeographieundüberihrVerh■ltniszurGeschichteundStatistik）的书中，他认为地理描述有三个方面：国家（政治学）、居民（民族学）和土地（地理学或特殊地理学）的研究。后者研究的是“地区的自然方面的内容”。布黑规定了四级“地理区域单元”。它们是大洲；大洲的较大的分区（Grossgebiete）；“自然地区”，例如北阿尔卑斯地区（它包括莱茵河、威悉河及易北河）；亚自然地区，例如东汝拉山（莱茵河上游及其支流）、西苏台德（波希米亚）和东哈尔茨兰（易北河流域）。他论述“自然和人的相互作用”，并且说：这些区域“在其总的

自然特点方面，彼此相似的程度超过了它们同最邻近的地区的相似程度，后者同别的区域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所有这些著作中，内容的顺序通常都是数理、自然和政治部分。几乎没有人把非人文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区别开来。自然地理学和人，在地区上和相互的因果关系上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也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个概念：同一地区内的各种现象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可是，布黑在1812年提出的这个合成整体的观念遭到了反对，而布黑自己也在1827年的《论改进地理学讲授中所遇到的困难》（VondenHindernissen，welchederEinführungeinesbesserenGangesbeymVortragederErdkundeaufSchulenImWegestehen）一书中反驳了它。他当时想到，区域应根据特定的目的来划分。他说，地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着眼于从每一种现象和地球的关系来单独地、系统地进行研究。哈特向对此作出正确的结论（《地理学的性质》，第222页）：“布黑用以攻击自然边界和自然区域概念的论证严密完整，现代地理学家简直不能增易一个字。”我们以后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这是地理学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而且我们应该知道，远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它就已被精辟地思考和说明过了。

在十八世纪晚期的地理学家中，应该给两位福斯特以特殊的地位。约翰·赖恩霍尔德（1729—98）和约翰·乔治·亚当（1754—95）父子两人参加了库克的第二次世界航行。J.R.福斯特（JohannReinholdForester）的《世界环航中的观察》（ObservationsMadeduringaVoyageRoundtheWorld）于1778年在英国出版，内容有六部分——地球与陆地、水和大洋、大气、地球的变化、有机体、人种。他承认人类和他的环境之间的联系性与人类的流动性。奥斯卡·佩歇尔说他是“对其所看到的世界（南大洋）作自然考察的第一个旅行者，也是完成其最高职责，即科学对比的第一位地理学家。”埃恩斯特·普莱韦最近称赞他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伟大的德国方法论地理学家。”

乔治·福斯特（JohannGeorgAdomForster）比他的父亲更著名，因为他把他父亲的书译成了德文（1778）。他于1789年在格廷根会见了洪堡，并且开始建立了对洪堡有深远影响的友谊。佩歇尔说，福斯特“是启发人们对美和风景的爱和感情的第一位作家”。普莱韦则指出，他在描述下莱茵地区（写于同洪堡旅行以后）时更稳固地奠定了他父亲的方法，并为区域地理学的系统发展开辟了

第一部世界地理学：马尔特-布伦

除了上述德国人的著作外，平克顿（Pinkerton）（英国）、马尔特-布伦（法国）和杰迪迪亚·莫尔斯（JedidiahMorse）（美国）的著作是这一时期的明确的地理学汇编。这里仅简单地评论一下布伦的作品。

孔拉·马尔特-布伦（ConradMalte－Brun）（1775—1826）生于丹麦，于1800年被放逐而定居于法国。他的《简明世界地理》（Précisdelagéographie）共有六卷，在1810—1829年间出版（虽然全书是在他去世以后由同事完成的）。这部巨著的英译本名称是《世界地理或按照大的自然区划对全世界各部分的新型的描述，附有分析性、纲要性和基础性表格》（费城，1827—32）。该书开头是“地理学的一般理论”，由“数理、自然

和政治等项原理组成”。然后转到“自然的主要特点”，再转到“动物、植物以及在其生长区域内以地球的无尽资源滋养的一切生物”。这个序论部分以“自然和政治条件下的人”作结束。政治条件的含义是种族、语言、信仰以及“标志着文明进步的法律”。第一卷的前半部分讨论“地理学的理论”。后半部分及以下五卷是对世界主要区域的一般描述。划分这些区域的基础和二千年前斯特拉波所采用的基本相同。描述是按各种划定的区域进行的。例如，亚洲被划为下列各区——高加索诸国、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及黑海沿岸、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阿拉伯、波斯、里海、阿富汗、鞑靼、西伯利亚、中亚、满洲及朝鲜、日本群岛、中国、西藏、印度斯坦、印度支那与大洋洲[1]。马尔特-布伦对他的描述方法作了如下的说明：

“当我们打算详细描述一个广大地区的时候，就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以及相应的两种不同的区划方法。可以把它划分成国家、省和县区。也可以根据居住该地区的民族来划分。前者是地方地理学的方法，后者是种族志的方法。我们通常从前者开始。”

欧洲卷首先研究“自然地理”。它包括海、湖泊、河流、山脉、气候（包括等温线）、动物和植物。接着是所谓“政治地理学”，其中包括民族、语言、宗教、政区、政府和居民。

为了了解他处理较小区域的方法，并把它与以后出版、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的邵可侣和维达尔的两部世界地理的描述方法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在这里说说他处理法国的情况。该书开头是独特而简短的“历史评介”，接着是以山脉、河流、岬角和海湾开始，以“昆虫、马、牛、猪、家禽、进口货”结束的“自然地理学”部分。为了作更详细的描述，他把全国划为五个“区域”；每一区域的内部可能都被认为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据他说，这种程序是“一种可以最方便地说明地方地理学的方法”。

马尔特-布伦的著作，尽管有其显著的不恰当的地方，却是地理描述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因为它完成了李特尔在同一时期内未能完成的工作——描述地球上的土地和居民。可是，它和李特尔的著作不同，它在概念结构和方法上比起将近二千年前的斯特拉波来，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进步。然而，传统和需要显然是强烈而持久的。所需要的是以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更可靠的资料与地图，来更合理地解释地球表面上的土地和居民。这已成为现代地理学发展上的中心课题，十九世纪第三季纪埃利兹·邵可侣（■lisèeReclus）写的同名的第二部这类著作，和由法国现代地理学奠基人维达尔·德·拉·布拉什（VidaldelaBlache）设想、他的直接追随者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似应为“前半期”——译者）写成的第三部这类著作，以及在阿尔夫雷德·赫特纳激励下出版于德国的地理科学手册都反映出这一点。这几部书是公认的对代近地理学的重要贡献。

自斯特拉波至马尔特-布伦，地理著作中古典传统的连续性是惊人的。十九世纪初的理论和编纂问题，在其所有的主要方面都还是大约二千年前古希腊学者所面临的问题。世界的大部分仍然未经探查和测绘成图（虽然海岸的轮廓已经在十八世纪末，主要由法国制图学家正确地测绘出来了）。有关个别地区的土地、资源和居民的资料惊人地缺乏，而把这类资料概括到地图上

[1] 把满洲和西藏划在中国以外，显然是错误的。——译者

的科学方法，则几乎完全没有。没有这类资料和用以处理它们的制图方法，在地理学思想上要取得进步是不可能的。1800 年前后仍然强大、并被十九世纪现代地理学奠基人延续下来的古典传统，有两位最伟大的阐发者：李特尔与洪堡。他们深受当时哲学（就象在比丰伯爵的巨著中所体现出来的）的熏陶，成为古典传统顶峰的代表人物。

尽管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所需要的资料非常缺乏，他们力求自己去收集，并创立起比通常使用的更为科学的指导方法。他们的指导方法，虽然主要建立在进化论时代以前的概念的基础上，却已经、而且仍在（这是公认的）被用作一门比较实际，而目的、方法、知识范围更明确的现代研究领域——地理学——在发展上的健全可靠的理论骨架。

古典地理学奠基人的理论走在事实的前面。从洪堡、李特尔到今天的学者们的任务是：搜集、对比土地和居民方面的事实，寻求测量它们并把它们绘制成图的方法。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在研究地球表面上土地和居民变化的理论领域内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参考书目

有许多研究古典和中世纪地理学的著作。它们大部是由语言（古典的）学者写的。这些人对原作者的目的几乎没有真正的了解。因此，两份地理学家的作品需要特别地提出来。它们是范·帕森的《地理学的古典传统》（Chr.VanPaassen，TheClassicalTraditioninGeography），格罗宁根，1957 年；和金布尔的《中世纪的地理学》（G.H.T.Kimble，GeographyintheMiddleAges），伦敦，1938 年。还要参考纽约美国地理学会研究丛书的出版物。

第二章　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

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卡尔·李特尔（第三章）这两位十九世纪前半期杰出的学者，在德国和法国都被认为是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们都在 1859 年，即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的那一年逝世。他们的观念和目的，虽然是在进化论思想的强烈冲击和该世纪后半期探险及制图工作的巨大进展之前形成的，直到今天仍然是地理学领域的指路标。这里的讨论，严格地局限在他们对区域概念的贡献上；在他们两人看来，这个概念是地理学的核心。

亚历山大·洪堡[1]于 1769 年诞生在柏林。最初，他在萨克森的弗赖堡跟随著名地质学家 A.G.韦尔内（Werner）学习地质学以后，成为一位采矿工程师。不久，他借助于一笔因母亲于 1797 年去世而获得的遗产，转向自然科学家和探险家的事业。1797 年 6 月 4 日，他得到国王的允许，并在法国植物学家埃梅·邦普朗（AiméBonpland）的伴同下，从西班牙的拉科伦纳港启航去访问南美洲的西班牙领地。在五年时间内，他穿过利亚诺斯平原，溯航奥里诺科河，访问古巴和墨西哥，漫游安第斯山北段，并登上许多山峰，其中包括当时认为是世界第一高峰的钦博拉索山。1804 年他又去法国，在巴黎住到 1827 年。在此期间，他（花费巨款）出版了这次旅行的科学成果。1827 年他受任为普鲁士国王的侍臣而定居在柏林。1829 年他在六十岁的时候，应沙皇的邀请，乘车去西伯利亚腹地探查矿产资源。这次旅行的成果，发表在他写的有关中亚地质、地形及气候等著作中。他把他一生的最后三十年用于撰写他最驰名的著作《宇宙》。该书在他逝世前两天完成。摄政王下令为他举行国葬，并令柏林全市服丧来敬悼这位传奇式的人物。

洪堡赞同黑格尔和歌德所阐明的他那个时代的哲学观点[1]。他同意这样一个概念：地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是互相依存的。这是物质世界或自然哲学领域的观点，地球和宇宙是可以感觉到的。它和人的内心世界或精神哲学领域的观点是对立的。他把这个综合体看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一个由各部分组成的活的整体。他从对地球表面事物和现象相互依存的方式所进行的科学分析中，取得美学的满足。这个相互依存的观念贯穿在《宇宙》之内，而且早在 1797 年，他就清楚地在《世界的机理》（Physiquedumonde）一书中意识到了。他的研究领域是可以进行观察的现象的世界——总的印象的世界。

洪堡的科学研究方法是经验的和归纳的。他常说，经验的知识的基础是对人们感觉到的那些现象所作的深思的观察。他采集植物、动物和岩石，对它们进行分类，并解释其起源和地理分布。他是第一个绘制地形剖面图的人。他用这种图来说明他在各处系统观察到的那些现象的高度界限，及其相应的地带。他也收集大量的高度、面积、长度等数据，以便发现各个现象的空间分布和相互关系。

他觉得，有关自然或物质世界的知识可分为三类。第一是按 E3Z5TGO'P［形态和内容作分类研究的现象，也就是根据相似的特点而分类的现象（例如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它们是系统的科学，是描述自然史或自然现

---

[1] 黑尔马特·德·泰拉：《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生活及其时代》，纽约，1955

[1] 这段评论广泛地援用了 L.德林的附有参考书目的文章：《亚历山大·冯·洪堡论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法兰克福地理杂志》1951 年第 1 期。

象志。第二是讨论现存的各现象组合的历史科学——动物、植物和岩石的发展史。它们研究的是地球的历史。第三是地球科学。他对这一类曾下过各种不同的定义，如地理学、地球的理论、自然地理学等。它研究地表各种现象的分布或排列。他说，地理学的目的是研究“现象的空间分布、空间关系和相互依存”。

洪堡没有被公认为对任何一门知识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可是他对许多领域都有丰硕的贡献。他经常关切的是自然及有机现象的地域结合。他在研究选定的自然现象的时候，他总是要探讨它们的分布和它们对其他现象的空间排列的影响。他对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山文学、海洋学、制图学、地质学、火山学及磁学都有很大的贡献。他通过对火山活动过程的研究，同意火成论者的见解，认为许多岩石都是地球内部熔融物质喷溢的产物。但是他也阐明了火山形态的特点：它们因起源和在地表分布不同而有所不同。他指出，火山活动对确定地壳软弱带的位置是有重要意义，而且火山是与地壳运动及造山运动地区连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火山，存在于地球上相距遥远的各个角落”，但它们的分布是有秩序、有意义的。气候学[1]是洪堡使用的一个名词；实际上，这个名词可能就是他创立的。他写道，“气候这个名词的一般含义是指大气的一切变化——温度、湿度、气压、风、电荷、大气纯度和能见度”。他认为实测的温度数据是基础资料；根据它们，就能描绘出“大气暖热的分布情况”。“在作这种描绘以前，事实必须分门别类，数据必须测取并进行评价……以便将暖热的现象纳入经验的规律”。洪堡能够根据大量的等温线分布状况，指出它们在靠近赤道的地方和赤道平行；在靠近两极的地方，在海上的向北偏斜，在陆上的向南偏斜；在大陆西岸，达到最北的位置。他还认为有必要绘制季节等温线。“岛屿及海岸的气候与大陆中心的不同之点在于，前者冬季比后者温和、夏季比后者凉爽”。他提到“太阳气候”，说它是均质地球上的标准气候；在这种气候下，等温线将和赤道平行。但这种气候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对这些因素必须逐一分析和测定。

植物地理学[1]是洪堡根据他大量采集的南美洲植物群而坚实地建立起来的。这项研究，“把一种由大自然铺展在地球表面的这里疏、那里密的植被显现在我们的眼前”。他把个别植物种的分布，和在特定区域内植物的数量结合区别开来。他谴责人们按大洲列举植物名录；因为这样作，就遮掩了植被的分布情况及其与气候带的关系。与此相反，他去考查、研究不同气候带内植物的数量分布。他还指出，气候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影响着植物的分布。

他论证说，虽然某些植物种属能提供了解其存在地区植被的组合性质的线索，但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植物的分布加在一起，就得出植被的类型及其分布情况。他举出十六种指示植物，其中包括棕榈、针叶树、芦荟和仙人掌。形态是植物分类的要素。“系统植物学家区分出许多植物群，而形态学家不得不把它们归并到一起”。但这项研究不仅是外貌的，“它必须找出能确定一般的自然面貌，能确定整个地球表面植被的区域特点的规律……能找出解释在不同纬度、高度地区的不同形态组合的那些规律。它必须追寻在固定的、总是重复出现的类型中，所有的动植物也重复出现的原因。”这是植物地理

---

[1] 见上引书，第 78—83 页。

[1] 同上引书，第 83—88 页，并特别注意洪堡的《关于植物地理学的观念，附热带国家的自然景观》，提宾根，和《自然的面貌》的文章，卷 2，第 13 页和以后各页。

学，特别是植物生态学的基础的基础。

洪堡就这样清楚地强调对自然外貌的研究。他的全部工作都涉及对可测量现象的观察。他试图辨认出同质的区域，不管它们是怎样确定的。他在论植物的文章（在《自然的面貌》＜AspectsofNature＞一书中）里有下面一段话：

“由于我们明确承认每一个有机物都有其确定的外貌，以及从狭义的意义上说，描述的植物学和动物学在于详细分析动植物的形态，所以地球上每一个区域都有其特有的自然外貌。”

这是以看得见的总印象为基础的景观概念。

“天空的蓝色，光和影，远处的烟雾，动物的形态，植物和草类的肉质性，叶的光泽，山的轮廓，所有这些，都是决定每一地区或区域所特有的总印象的要素……但是，如果说地球表面不同部分所特有的面貌，取决于所有外部现象的联合作用的话……那我们还是不能否认，装饰地球表面的植物覆盖是这个印象的主要要素。”

洪堡把人及其工作成果包括在自然和自然区域这个概念之中，但他没有把人看成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可能因为人是在自然占有如此压倒优势的一个地区内工作的。他把市镇、村落、田地和作物描绘为景观的要素。

他把景观想象、并且常常描绘为一个整体。他相信，人们只有透过现象的相互联系，才能对任何一个现象作出评价。他对加那利群岛中的特纳里夫岛和委内瑞拉的利亚诺斯的描绘，被人们如此经常地引用，以致可以被看作经典文献了。他多次把世界各处具有相似景观的地区进行对比。他把利亚诺斯的高草描绘为大草原，因为它是一片无树的、被草覆盖的平原。草原是一种植被类型；它的种类成分、地理位置、范围以及对人类的意义虽有很大的差别，但却普遍地存在于全世界。他指出阿根廷大草原、旧大陆的沙漠、俄罗斯的无树大草原、热带的稀树干草原、北美的大草原、极地苔原和西北欧的石南荒原，并把它们与利亚诺斯进行对比。我们必须记住：在 1800 年，人们对大陆内部的了解很模糊，伟大的植物考察工作刚刚开始，实际上没有精确的大陆地图，尤其没有洪堡企图去确定、比较其范围和地理位置的那些研究资料的分布图。所有这一切都不得不凭借想象力来做。主要的一点在于：他不仅辨认出各个独特的景观，而且了解到它们和地球上别处类似地区之间，有着普遍的联系和共同的生成原因。这是一切地理工作的核心。

洪堡在野外记录和描述的这种方法，其本身就很重要。当他对热带美洲的土地和生命随高度而变化的现象所作的前所未有的观察结果，试图作出总结的时候，就最清楚地显示了他的这一概念——景观中的各种现象之间是有地域上的相互联系的。在几天之内，他从赤道森林走到苔原，相当于从赤道经过五千英里而走到极圈。他用前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去记录地形、植物、作物、树和雪线的变化，并把它们绘成地图。为了概括这些特点，他使用了剖面图（特别重要，因为没有现成的地图可用）。他用一条分段的线来说明这些结合在一起的特点，以及它们的性质和结合状况随着高度增加而变化的方式。这是他用来描述墨西哥的大部分文字内容的图解。例如他在这本书中就用这种图解来说明当地使用的下列几个名词的区别：热带（tierracaliente），低于 1，200 米，生长甘蔗、靛青、棉花、香蕉，还有黄热病流行；温带（tierratemplada），1，200—2，500 米，占有波状高高原的大部分面积，土壤最肥沃，适于人定居，生长中纬度作物；寒带

（tierrafria），在 2，000 米以上。洪堡后来又采取措施，试图去描绘他已经观察到的高度变化。1804 年，他在巴黎有一位维也纳风景画家为他画剖面图。洪堡试图在这幅《热带国家的自然景观》里画出他已经概括了的处于南、北纬 10°之间的高度带。他对这幅图作了如下的说明[①]：

“我把出现在我们行星表面的所有现象和包围这个星球的大气，一起放在这幅《自然景观》图上……这项工作的目的是把所有由高度引起的变化都包括在内：大气温度、电荷、湿度、氧的含量、空气颜色（蓝的程度）、地质学、耕作、动物……所有这一切都根据我自己的观察……经验主义者计算、测定所有由现象直接显示出来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他重述他野外观察的目的：“我的眼睛将盯在力的相互作用，即无机的创造物对有生命的动植物的影响上；将盯在这种和谐上。”这是他早在 1796 年（前面说是在“1797 年”——译者）写的《世界的机理》一书所要说明的内容。

他在旅行时随身携带四十种不同的仪器，其中包括三脚望远镜、六分仪、四分仪、天蓝计（用以测定天空蓝色的程度）和气压计。他声称，他能给出他取得数据和采集标本的所有那些地点的经、纬度。这就是他集中在概括图上的那些资料。他的目的不是单纯地测定某一种现象，而是要说明景观中大量可观察的现象在不同地区的相互结合和相互联系的方式。这是他的概念的精髓。上面提到的那幅图解，清楚地表明他运用的方法及其目的[②]。

洪堡被普遍地和公正地奉为自然地理学和植物地理学的奠基人。但是，就他认识到各种地域现象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在解释任何一组空间分布现象时都必须联系其空间关系这一点来说，他首先是区域学家。这一认识贯串着他的全部工作，但在他的经典论著《墨西哥》一书中尤其值得注意。在这本书内，他的调查研究集中在居民与国家的状况和前途上。他第一次用该国各个政区的人口和其他资料，来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样，他就简要地说明了组成墨西哥的那十二个监督管辖区和另外三个行政区。他认为温带可分为三个区域——北部内陆、面向太平洋的西北部和面向墨西哥湾的东北部。热带包括中部区和西南区。按照它们的商业关系——即与海岸的位置关系来考虑，这些行政单位又可分为三组：范围不到海边的内陆各省，沿东海岸各省，沿西海岸各省。他说，“将来有一天，当墨西哥的耕作业集中在中部高原及科迪勒拉山的程度有所减弱、海岸地区人口有所增加的时候，这些区划就会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关于墨西哥的这部著作是地理描述的一个里程碑。它利用行政区划的人口调查资料。它强调地形、气候及生产的差别，并说明它们与人口分布（人数、种族特性、疾病）及耕作业产品的关系。作者有一种极其贴切的方法和目的，这是在李特尔的冗长描述中所常常缺少的。这一部最早的系统的地理学描述的著作，和自斯特拉波时代至十九世纪小地区地理学家们的百科全书式汇编，形成鲜明的对照。

最后，应该评论一下洪堡的巨著《宇宙》，因为它是为广大读者而写的。德文版头两卷出版于 1845 及 1847 年，第三及第四卷出版于 1850 及 1858 年，未完成的第五卷于 1862 年出版。本书被译成八种文字。早在 1834 年，洪堡

[①] 亚历山大·冯·洪堡：《关于植物地理学的观念，附热带国家的自然景观》，提宾根，1807。

[②] R.比特林：《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美洲旅行记新诠》，《彼得曼通报》98（1954），第 161—71 页

就向一位友人介绍过它的内容梗概。

“我有一种狂热的意图：在一部书内，而且用生动的、能刺激和诱发感情的语言来描绘整个的物质世界……从螺旋状星云到苔藓和花岗岩地理……十五年前我已经开始用法文写它了，并且把它叫作《论世界的机理》（EssaisurlaPhysiquedumonde）。在德国，我原想沿用中世纪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AlbertusMagnus）写的那本书的名称，把它叫作《论自然》。

但这一切都没有确定。现在我的书名是：宇宙，世界的自然描述概略，据经过增补的1827—1828年的讲稿。”

在宇宙的导言中我们看到：

“一切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在差异性中找出一致性，了解过去各个时代的发现所揭示出来的全部的个别外貌，分别判断个别的现象而不屈从于它们的大多数，抓住被表象掩盖的自然的实质……导言这一章的目的是指出自然科学能够怎样地被赋予一项较高的目的：通过它，所有现象和能，都被揭示为具有内部生命的一个实体。大自然不是死的东西。正如舍林（Schelling）所说的那样，它是神圣的、基本的力量。”

《宇宙》的哲学包括四个主题。第一是作为一门专门和独立学科的世界自然描述的定义和范围。第二是目的和内容，它是自然实体在科学形式的自然画像中的真实和经验的面貌。第三是：自然在想象和感情上的作用，通过诸如旅行记、诗歌、风景画及各种不同的外来植物的展览等这些媒介，成为研究自然的一种刺激。最后一个是探讨自然哲学的历史和有关宇宙这一有机单元的各种概念逐渐出现的过程。

洪堡的《宇宙》是一部不朽的汇编，其中含有从他一生的旅行和辛勤研究中得出的一些结论。他的描述手法，包含着“收集和整理大量孤立的事实，再经过归纳而上升为一般观念的艺术”。由于首卷和末卷出版的时间相距过长，洪堡没有能够把科学的新发展结合进去。例如：黑尔姆霍尔茨的力守恒、朱尔的热力学理论，以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光谱分析，在该书内或被忽视，或仅部份地体现，或受到批判。这些科学成就在某些方面损伤了洪堡的一些理论。

对这位非凡人物的著作应该给予几点总结性评论。第一，洪堡把人看成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构成自然这个平衡统一体的一个项目，他的能力允许他怀着美学的满足来凝视、思考自然。因此，洪堡在《宇宙》中强调艺术的历史是人对自然的阐释。这一经验体现了“永远扎根在统一的人类平等权利之中的个人及政治自由的原则”。

第二点涉及洪堡对地球本身及人在地球上的地位方面的观念。

“如果我提出了自然，而又不试图就体格的差异、当代各类型的地理分布、地球力对人的影响，以及在较弱的程度上人对地球力的反影响等方面用几个特征去勾画一幅相应的人的素描像的话，那么我力图说明的这个自然的总的观念，就将是不完全的。这个屈从（虽然在程度上比动植物弱一些）于土壤环境和气象条件，而又能借心灵的活动、智力的逐渐增高，以及使自己能适应各种气候的那一肌体组织的不可思议的韧性而逃脱自然力控制的人，到处都构成使地球生气勃勃的那个生命的一个主要部分。”[①]

[①] 洪堡：《宇宙，世界的自然描述概略》，爱德华·萨拜因译，四卷本，伦敦1846—1858，卷1，第350页。

第三，洪堡和李特尔一样，相信这个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统一体的概念。不过李特尔的概念是宗教学的。按照他的概念，地球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那个伟大设计的一部分；而洪堡则相信自然的平衡，认为人是自然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他们两人都和他们所属的那个浪漫主义者的一代（其中包括洪堡的同代人和朋友歌德）那样，相信所有的现象都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相信地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李特尔来说，这个统一体赋有造福人类的神圣目的，而洪堡则客观地把人看作物质世界平衡中的一个要素，并且用审美的和价值的观点来解释这个统一体。

伟大的法国地理学家埃马纽埃尔·德·马东男，在他于 1909 年第一次出版的杰作《自然地理学》中写了下列一段话[①]。

“洪堡不管研究什么现象，如地形、温度、植被等等，他都不是象地质学家、气象学家或植物学家那样仅仅孤立地逐个研究它们。他的哲学观点使他走得更远。它立即引导他去观察别的现象。他探索原因和遥远的结果，其中甚至包括政治和历史的事实。没有人曾经比他更精确地说明：人是如何依赖土壤、气候、植被，植被是如何受自然现象制约，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依存的。”

马东男声称[②]，洪堡是第一位这样的学者：清楚地阐明，并且应用他（马东男）认为是使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科学”的那两条基本原理，从而使地理科学不成为物质和生物科学事实的拼凑。他说，洪堡探索的不是个别的空间现象，而是空间分布的各种现象的得合体。洪堡观察这些现象，然后试图去解释它们：“他上升到原因，又下降到结果……”。这就是德·马东男所说的因果关系原理。第二个原理是他所说的普通地理学原理。他这样说的意思是，洪堡试图比较地球表面各种地理现象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专家们已经承认洪堡在他们各自领域内的重要贡献。在讲英语的学者中间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的，是洪堡对“各种自然和人文现象的地域结合”这一论点的坚持。这是他对地理知识和地理学这门学科的贡献。在这个方面，他是一位先驱者，而且远远走在他的时代和资料的前面。

参考书目

关于洪堡生活的一部虽旧而优秀的著作是卡尔·布鲁恩的《亚历山大·冯·洪堡，一部科学传记》（KarlBruhn，AlexandervonHumboldt，EinewissenschaftlicheBiographie），1872，共三卷。我也曾随意摘引下列各资料：德林：《洪堡论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法兰克福地理杂志》，1951（附大量从洪堡著作摘引的原文和一份文献目录）；黑尔马特·德·泰拉：《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生活及其时代》，纽约，1955；卡尔·特罗尔：《亚历山大·冯·洪堡与卡尔·李特尔的著作：百周年纪念演说》，《科学进展》（TheworkofAlexandervonHumboldtandCarlRitter：Acentenaryaddress，AdvancementofScience），16，第 64 期（1960），第 441—52 页；卡尔·辛胡贝：《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苏

---

① 德·马东男：《自然地理学通论》卷一，1948 年

② 同上引书，第 15—16 页。

格兰地理杂志》（KarlA.Sinnhuber，AlexandervonHumboldt，1769—1859，ScottishGeog.Maga-zine），75（1953），第83—101页。为洪堡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而出版的著作有舒尔茨（编）：《亚历山大·冯·洪堡：对他的全面精神的研究》（J.H.Schultze〈ed.〉，AlexandervonHumboldt：Studienzuseineruniversellen Geisteshaltung），柏林，1959（西德纪念集）；德国科学院委员会（编）：《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9.14—1859，5.6》，柏林，1959（东德纪念集）。一部权威性著作是H.贝克的《亚历山大·冯·洪堡》，两卷，威斯巴登，1959及1961年，权威的传记，着重于洪堡著作的地理学意义：《从教育旅行到研究旅行，1769—1894》（VonderBildungsreisezurForschungsreise，1769—1894），1959；与《从旅行著作到宇宙，1804—59》（VonReisewerkzumKosmos，1804—59），1961。两部较小的著作是L·凯尔纳：《亚历山大·冯·洪堡》，伦敦，1963；与斯泰阿因：《亚历山大·冯·洪堡与植物地理学》，《新科学家》（W.T.Stearn，AlexandervonHumboldtandPlantgeography，NewScientist），5（1959），第128期，第957—9页。洪堡著作的详尽目录见J.洛文堡：《亚历山大·冯·洪堡，他的著作目录一览表》（J.Lowen-berg，AlexanderVonHumboldt，BibliographischeUbersichtseinerWerke），斯图加特，1960，此表共收639条。

可以得到的洪堡著作英译本如下：

《宇宙：世界的自然描述概略》，E.萨拜因译，四卷，伦敦，1846—58。

《宇宙》，E.C.奥特（Ottē）等译，伦敦，1849—58，第二版，1871—83。

《1799—1804年新大陆热带区旅行自述》，H.M.威廉斯译（Personalnarrativeoftravelstotheequinoctialregionsoftheneweontinentduringtheyears1799—1804，Trans.byH.M.Williams），七卷，伦敦，1818—23。

《旅行自述等》，T.罗莎译（Personalnarrativeoftravelsetc.，Trans.byT.Rosa），三卷，伦敦，1852—69。

《自然的观念》（ViewsofNature），E.C.奥特与H.G.博恩译，伦敦，1847。

《自然的面貌》，E.萨拜因译，两卷，伦敦，1849。

《论两半球岩石的重迭》（Ageognosticalessayonthesuper-positionofrocksinbothhemispheres），译自法文本，伦敦，1823。

《论新西班牙王国》（PoliticalessayonthekingdomofNewSpain），布拉克（J.Black）译，四卷，伦敦，1811—22。

《对美洲古代居民习俗和遗址的研究》（Researchesconcerningtheinstitutionsandmonumentsoftheancientinhabitantsofamerica），H.M.威廉斯译，两卷，伦敦，1814。

德文杂志近期登出的前辈地理学家两篇文章值得特别注意。O.施米德：《亚历山大·冯·洪堡，个性、科学著作和在现代地理学上的成就》，《地理杂志》（O.Schmieder，AlexandervonHumboldt，Pers■nlickheit，wissenshaftichesWerkandAuswir-kungaufdiemoderneL■nderkunde，GeographischeZeitschrift），52（1964），第81—95页。G.普法费尔：《亚历山大·冯·洪堡（1859—1959）：1959年在中、南美洲举行的各纪念会对

其个人评论集》，《物理学-医学促进会会刊》（G.Pfeifer，AlexandervonHumboldt〈1859—1959〉：Beitr■gezurWürdigungseinerPers■-nlichkeitanl■sslichderGedenkfeierninSüdundMittelamerikaimJahre1959，SitzungsberichtederPhysikalische-MedizinischenSoziet■tzuErlangen），80（1959）。

第三章　卡尔·李特尔（1779—1859）

卡尔·李特尔[1]对德国地理学成长的直接影响，要比洪堡的大得多。他1779年生于奎德林堡，在哈勒大学开始他的学术研究（该大学至今还以此为荣）。1798年10月，他成为法兰克福一位有钱的银行家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他在一种豪华、悠闲的气氛中结识许多有意思的人，同时舒适地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1807年，他和瑞士伟大的教育家H.佩斯塔洛齐（Pestalozzi）的会见，使他对人类历史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从那以后，他转而研究“普通地理学”的问题。1813年他伴随他的一个学生去格廷根大学，并在那里继续进行他自己的研究。研究成果就是1817年出版的第一卷《地球学》（Erdkunde）。非常奇怪的是该书探讨了地球上被人了解最少的那一部分——非洲黑暗大陆。由于这本书引起的巨大哄动，他被聘为该大学与柏林王家军事学院的地理学教授。后一职位，他一直保持到1859年逝世为止。在这将近四十年内，他对各界人士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就在高级军官中也是如此。到1832年，他才又着手写他的《地球学》，在逝世前已写成十九卷，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亚洲的。他甚至还没有开始去写欧洲——地球上被人了解最多的一个地区。

李特尔的著作

李特尔的第一部地理著作是于1804及1807年出版的两卷欧洲地理。该书在1806年增补进一套六幅全洲地图。书的内容按传统方式安排。但这个图册是一项真正的贡献，它在简明的图上表明了山脉、植被（树和灌丛）、农作物与气候、野生和驯养动物的分布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

1810年，李特尔写成一份他称之为新地理学的稿子。该稿虽然从未出版，但它的观点却是他以后大部分著作的基础。稿的名称是《普通地球学手册或地球，科学地理学的基础》（HandbuchderallgemeinenErdkundeoderdieErde，einBeitragzurBegründungderGeographiealsWissenschaft）。辛胡贝[1]概括其内容如下：

“地理学之所以有教育价值，并不是因为它有用，而是因为它研究地球表面这一自然现象。无论就整体或其各个组成部分来看，这一现象都显示一种内在的结构，因此它的每一细节都是重要的。要了解这一结构的设计，就要进行大量的辛勤研究；而且只有在不持偏见、不从外部引进先验体系的情况下进行研究，才能取得成功。”

这一段文字清楚地说明李特尔用的是归纳方法，同时也说明他拒不接受先验的理论。他认为地理学是一门经验的和描述的科学。

他说，地理学研究地方的条件，它包括一个地方在地域、形态、物质等特点方面的属性。第一个属性指的是地球表面的自然区划；研究它，是为了按佩斯塔洛齐的原则去进行讲授。第二个属性包括水、海、大气的分布和运动；它们是人类生活的基础。第三个属性是物质条件，是自然历史的地理外

---

[1] 卡尔·辛胡贝：《卡尔·李特尔，1779—1859》

[1] 同前页注。

貌，它包括矿藏、植物、动物的分布[2]。

李特尔是在他旅居格廷根的两年期间开始写《地球学》第一卷的。他说他的研究方法已经完全改变；他声称，他研究的是一个独特的比较的主题，其目的在于说明历史与有机自然、无机自然之间的联系。他写道：“我已经说明地理学有权被认为是一门界限明确的科学，它和其它科学享有同样的尊严。”[1]他用八年时间才写成第一卷，出版于 1817 年。他把本书题献给佩斯塔洛齐和他早年的老师 J.C.F.古茨穆特斯（Gutsmuths）。应该指出，李特尔在法兰克福写下的第二本书，基本上是讨论希罗多德时代以前高加索和黑海地区居民转移的小册子。他本来打算把它作为《地球学》的亚洲卷和下面欧洲卷之间连接部分，不过，如上所述，他始终没有来得及去写欧洲。

《地球学》第一卷（非洲）的修订版问世于 1822 年。从 1832 年起，到他逝世时为止，他陆续出版新写的各卷。全书共十九卷，合计两万页；但作为一部研究全世界的著作来说，它是不完全的。它的全名是：《关于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地球科学：普通比较地理学，研究和讲授物质及历史科学的可靠基础》（DieErdkundeinVer-b■ltniszurNaturundzurGeschichtedesMenschenoderall-gemeinevergleichendeGeographiealssichereGrundlagedesStudiumsundUnterrichtsinphysikalischenundhistorischenWissenschaften）。关于巴勒斯坦和西奈半岛的十四卷，已由威廉·盖奇翻译、简写成四卷；它的名称是《巴勒斯坦及西奈半岛的比较地理学》（TheComparativeGeographyofPalestineandtheSinai-ticPeninsula）（四卷，爱丁堡，1866）。

“比较地理学”这一名词的含义引起了许多争论，因为李特尔自己也对它说不清楚[2]。李特尔自己声称[1]：

“地理学这一名词的意思是对地球的描述。不幸，他已经出了毛病，而且使人们误解了。对我们来说，它所指的，仅仅是真正地理科学的那些要素。这门科学的目的完全在于抓住一种最完全、最广泛的对地球的观念；总结我们全部的对地球的知识，并把它们组织成一个美丽的统一体……地理学是科学的一个部门，它把地球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研究它所有的特征、现象和关系，并说明这个统一的整体与人及人的创造者的联系。”

他声称，地理学的中心原理是：“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形态对人类的关系”，一种被我们在地球表面和人的独特的地理结合这一体系内进行考查并予以系统化的关系。为了这个目的，地理学必须利用所有有关系的地学和人文科学的成果。接着是每一个地理学者都应该记住的一段话。

“要利用所有的科学来说明它自己的个性（即地理区域在人-地关系方面的独特性），而又不显示它们的特点。必须使它们都给出一部分，而不是全

---

[2] 海因里希·施米特黑纳：《卡尔·李特尔》，《法兰克福地理杂志》第 4 期，1951，第 48 及以下各页，特别是第 51—52 页。

[1] 转引自盖奇的《李特尔的生活》，爱丁堡，1867 年，第 141 页。

[2] 辛胡贝，见前引著作。

[1] 卡尔·李特尔：《比较地理学》，W.L.盖奇译，辛辛那提与纽约，1864，第 19—20 页；伦敦，爱丁堡，1865，第 16—17 页。

部，同时又必须保持它自己鲜明的单一性”。[②]

虽然李特尔在这里已上升到目的论解释的领域，但作为一个有才能的人，他也设想了地理学家的工作。他认识到地理学在科学领域里的特殊地位：吸收有关的资料来达到自己的独特的目标。

李特尔为地理学——（在自然哲学或宇宙哲学意义上的）“地球的科学”——提出一项浮夸的主张。这个主张远远超出他的真实目标（即对人类之家地球的描述）的范围。作为一种哲学和技巧，这一研究方法是那部凝聚着李特尔绝大部分心血的《地球学》的永恒目的。他断言，《地球学》这部书肯定要把地理学建成一门系统的知识。他的著作胜过前人的地方是[①]：

“我的目的已经是不仅要比前人收集、处理更多的资料，而且要找出作为自然的一切差异的基础的那些一般规律，说明它们和每个单一事实的联系，并在纯历史领域内，指出存在于那些在地球上盛行、在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似乎最显著的表面上的差异和变化无常之中的完美统一与和谐。从这一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自然地理这门科学。这门科学的任务是找出产生那些制约着事物、民族、个人多样性的和随后变化的所有的规律和条件。”

李特尔相信地球是一个有机体；它是为最完全地满足人类需要这一神圣目的而创造的，甚至它的最细小的部分也是如此：“正如肉体是为灵魂而创造的那样，物质的地球也是为人类而创造的。”他想象会有这么一天，那时“人类将有可能回顾过去和展望将来，根据整个的国家环境来决定其发展的道路，并指出在历史进展中为保持上帝赐予每一个管理正确、守法不变的国家的幸福，而必须采取的方法”。[②]

这类含糊的目的论哲学的语言不应该转移我们对李特尔的专业工作的注意。他阅读、选择、解释和组织大量可用的资料，以毕生时间用于撰写《地球学》。上述的哲学空论包含在他的一般演讲和书信之中。我们必须从他的最伟大的实质性著作《地球学》中了解他的工作概念。

我并不自称已全部读完十九卷《地球学》。施米特黑纳说，这是一部权威著作，它在许多方面可以和后来爱德华·休斯讨论地球面貌的地质学著作媲美。书的内容很广泛，而叙述的程序又常含糊不清。因此，我就依靠那些能自称为作出权威性判断的德国地理学家。在这方面，我觉得一位前辈和受到高度尊敬的德国地理学家海因里希·施米特黑纳的专著对我特别有帮助。另外为纪念李特尔逝世一百周年而出版的文集也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埃恩斯特·普莱韦的那篇文章。

李特尔承认洪堡在描述利亚诺斯和大草原时所体现出来的“区域单元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一观念的正确性。他试图发展空间统一体的概念。我在这里只想提出两点说明。李特尔主要是根据传统的和宗教的理由，把地球有机体划分为大的陆地或大洲的单元——自然的单元（如欧洲）和人为的单元（如旧世界和新世界）。每一个大洲又各分为一些大的自然区域。但是，为了用归纳法来概括地球表面镶嵌式分布的大小区域，就要对地球表面物质体现的最细小的单元进行分析。第二点是：对地球上不同特征的结合所作的这种研究，本质上是地理的。它是地理学。要对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现象进行概括（据

[②] 同上，第 27 页。

[①] 盖奇援引的信，《李特尔的生活》，第 144 页。

[②] 卡尔·李特尔：《比较地理学》。

李特尔），就要找出造成地表差异的那些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施米特黑纳所说的地球因素）在区域表现上的典型。这是普通地球学的领域；而在李特尔的那个时代，却既无资料、也无地图来供他作那怕是最初步的、尝试性的这类概括。这就使他陷入目的论玄想之中。但他总是要使人们相信，通过收集和概括关于各个地方的资料，这项研究必然会取得进展。可是他最终追求的目标是要发展世界对比的领域；这使他受到批评。他论述普通地理学方面的问题；在他的一般演讲中，他清楚地指出普通地球学应该如何发展——自然地理学、经济生产的地域分布和影响、人类社会的扩展与文化。他设想那些研究“运动形态”（他的第二类资料）的海洋学、气候学、火山学、植物地理学及动物地理学的发展情况（施米特黑纳，前引著作，第 66 页）。这些运动的和固定的形态，是有待我们去评价的人类及其工作成果所处的“总环境”的各个要素。

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这类一般的研究，或如我们现在所说的系统的研究，是要确定区域的各种类型及其确切分布，而相同的地球因素在赋予现象的区域结合以特征方面仍然起着作用。李特尔的一些优异论述为我们清楚地指出前进的道路。这些论述可在英文本《比较地理学》及《地理研究》（GeographicalStudies）中查到（虽然盖奇的译文有时不可靠）。他在地表的固定形态、地理科学的历史要素（1833）、地球的资源（1836）等方面的文章，都是他最重要、最有远见的著作；直到今天，它们对了解地理学的观点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施米特黑纳在其《卡尔·李特尔研究》一书的第五章（从第 63 页起）内，讨论了《地球学》的一般内容。他说，李特尔在 1806 和 1809—10 年的著作中就已把这一点说清楚了。《地球学》将包括三个主要论题——地域的、形态的和物质的。第一个讨论大陆的固定的形态，即地球表面的各个区域。第二组地理事实包括每一大洲的以主要要素水、空气、火为基础的那些“运动的形态”。第三组事实包括自然的三个领域：只说到它们与地表其他现象有联系的局部分布。他通过自然区域的区域类型、在地球上的局限和扩展、在区域内的支配程度、自然或人的力量的成果等方面，对它们进行阐释。李特尔试图在第二和第三论题的领域内发展海洋学、气候学、火山学、植物及动物地理学，作为他走向地理学目标的第一步，也是主要的一步。每一个现象，都需要联系其他空间分布的现象来解释其地域分布，以便说明地表现象的各别的结合。

李特尔所发展的区域概念，对今天的地理学家非常重要。主要的地理单元是大洲。在这一点上他只是接受传统的定义。每个大洲又根据山文情况而分为一个被阶地环绕、通过大河来排水的高地核心与周围沿海低地。他显然相信各大洲都具有相似的结构。因此，这些第二级区域是演绎出来的。划分较小的、可称为第三级的单元的根据，是各个区域详细的外形和内容（物质体现）。它们是地表镶嵌结构的砖头或构成单位，是概括的必要基础，因而也是归纳得来的。因此，李特尔似乎曾把每个大洲想象为个别单元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的全部构造和范围，可以从有关现象的最小的区域归纳出来。他从来不用景观这个名词。海因里希·施米特黑纳说，李特尔寻求“区域的位置，并且尽可能准确地对准这些位置。他按照各个现象以及在该处同时起作用的各种力，把这些区域合并成组。然后他又用各种组合的复合体，去找出

有关每一地方的物质和其他因素与这个有机体的关系的一般概念”。[1]

李特尔的整个体系的基础是他最初研究的非洲和亚洲。他根据它们的外形来进行地形分类，并想象每个大洲都有类似的结构。第一是高地和高原；它们又分为两级：平均海拔在 4，000—5，000 英尺之间，和平均海拔低于前者的。第二是山地；它们又分为 5 类：（a）平行山脉，如汝拉山和喜马拉雅山；（b）分歧或聚合山脉，如东阿尔卑斯山及北落基山（分歧）与安第斯山结（聚合）；（c）自中央核心向外辐散的山脉，如奥弗涅的西南阿尔卑斯山；（d）环状山系，如特兰西瓦尼亚山地与波希米亚山地；（e）交搭山脉，如兴都库什山与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与帕米尔山地。第三是低于 400 英尺的低地，它的一个例子是东欧大平原。第四是介于高地与低地之间的过渡区域，它被称为阶地。

在《地球学》序论中总结出来的这种分类，是李特尔描述大洲的基础。分类系统虽然可能显得肤浅，它却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描述政治单元常用方法的、新的区域描述法。在每个区域内先说明地形的主要特征和水系，接着是气候、主要物产和人口。此外也包括一些历史事件和探险旅行报告。最后是一般性的总结。

评论一下《地球学》的书名和副题是适当的，因为其中包含着该世纪后半期地理学发展中许多概念上的困难。第一，地理学不等于作为地球科学的地球学。地球科学的内容包括地球的形状、大小和构造。它们是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的问题。按照李特尔的见解，地理学是通过地表上面空间结合现象的区域差异来研究地球表面的。对某一现象的世界范围分布的研究，可能已落入一门附属的、也有分布问题的学科的领域。地理学的独特性在于，指出并解释自小至大、逐级区域单元内地面现象的区域结合的特点。

第二点涉及它的副题——《关于自然和人类的历史，或普通比较地理学》（imVerh■ltniszurNaturundzurGeschichtedesMenschen，oderallgemeinevergleichendeGeographie）。这个副题提出一个地理学自十八世纪以来就已试图解决的问题。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这门学科的结构和它对自然及社会科学关系的关键。如果把地球作为人类之家来研究，那么土地、水、大气以及动植物界就要作为人类的居处、并严格联系人类占有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把所有这些领域的本身作为研究目的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无视人类的占有而单纯研究地形学、气候学、海洋学和生物地理学。不错，人对物质过程的了解越多，他越能够对人类占有物质特征的意义进行评价；但这不是要争论的问题。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需要关于涉及到人类的物质地球的资料。这指的是土壤类型、土壤侵蚀规模与水土保持、地下水位深度、排水等问题。今天，随着现代知识的极大增长，这种显然包含在李特尔概念体系之内的、撇开人的因素的对物质地球的研究，意味着是对地形和动植物生态的起源和发展的独立研究。这类研究都已远远离开那种对物质地球及其关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了。

人们已经指责李特尔使地理学成为“历史学的侍婢”。在他死后的几十年内，有些地理学家想要把人完全抛出地理学，并把他们的研究局限于地、水和大气的物质方面。后来，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职业地理学家们在形成区域概念中找到了妥协。

---

[1] 见前引海·施米特黑纳著作第五章，第 58 页。

概念

现在让我们扼要地讲讲李特尔的主要地理学概念。

第一，李特尔认为地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而不是根据从理性原则或先验理论推论的科学。他认为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是从观察到观察。虽然他相信存在着规律，但他不急于建立这些规律；巨著《地球学》就表明了这一点[①]。

第二，在地表现象的空间排列中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李特尔与洪堡都把它描绘为内聚性（Zusammenhang）。区域的现象是如此地互相联系着，以致形成各个区域单元的独特性。因此，李特尔认为对区域的综合和描述必须先于对个别现象作世界范围的分析。

“地球和它的居民有着最密切的相互联系；不了解其他要素，就不能了解任何一个要素。因此，历史学和地理学必须携手前进。区域影响人，人影响区域”。[②]

地理学必须摆脱单纯的描述。要避免“材料来源的庞杂”，它就必须有一条独特的、指导性的中心原则。“要利用所有的科学来说明它自己的个性，而又不显示它们的特点。必须使它们都给出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同时又必须保持它自己鲜明的单一性”。[③]他探索同一区域内各组现象之间和两个地方之间的关系或联系。地理学的任务是“摆脱单纯描述而去探求被描述事物的规律；不是说明单纯的事实和数字，而是说明地方与地方的联系，以及把地表的局部和一般现象结合在一起的规律”；还有，“一项强加于地理学分析的任务是说出存在于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或者，换句话说，是抓住存在于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和什么东西主宰着这种关系”。[①]地理学家探索（空间分布）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以及每一现象与提供其存在条件的区域之间的关系”。[②]这些话道出了李特尔研究方法的主要内容。

第三，李特尔坚持边界（不论是湿的还是干的，如河流或山脉）是“达到地理学真正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了解区域的内容”。[③]他主张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布满了人的地表空间。

第四，根据洪堡和李特尔两人的看法，地理学是研究地球上同时存在于区域之内的事物。哈特向说，李特尔认为“正如年代学提供一个安排大量历史事实的框架那样，区域（空间）也为地理学提供一个框架；这两门科学都在自己的框架里把各种不同的现象统合成一个整体。”为了追求这一目的，洪堡系统地研究个别现象与其他现象的区域关系。李特尔则综合地、也就是总体地研究区域。他故意把总结规律的工作留到以后去做。[④]

第五，李特尔对地理研究的内容和目的持有机能整体性的观点；人是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顶点。他写道，《地球学》的目的是“说明地球表面在

[①] 见前引哈特向的著作，第 230 页。

[②] 《欧洲》的《前言》，1804 年版，转引自前引盖奇的书，第 113 页。

[③] 李特尔：《比较地理学》，第 28 页。

[①] 参看《地理科学中的历史要素》一文，载《地理研究》，盖奇译，纽约，1861 年，第 245—247 页。

[②] 同上，第 22 页。

[③] 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第 233 页。

[④] 同上，第 233 页。

天然的内在的相互联系中，通常是最重要的地理-物质条件；并且通过它的最基本特征和主要轮廓，尤其是从它作为人类之家而对身、心发展的人类施加最多样的影响，来说明地球表面”[1]。但是，李特尔在《地球学》的《序论》中说，这门科学不是专门研究人的。“离开人、没有人、在人类出现以前，地球也是自然现象的舞台；它的形成规律不能从人开始。在一门地球的科学里，必须向地球本身去要规律”[2]。这种由双重观点提出来的两端论法前面已经提过了。

第六，我们再来谈谈李特尔的关于独特的、明确的地理单元的概念。李特尔早年信奉比阿什和加特雷的观念，认为河流的流域及其周围的山脉是自然的单元。后来，他发现这类单元是研究的目标。1806 年他发表了地理单元有机统一体的见解。“每一个具有自然边界的区域，在气候、生产、文化、人口和历史方面，都是一个统一体”。[3]这种决定论的见解后来又改为另一个观念：这些现象的结合程度是研究的目标。最后他终于看到地理单元不是自然边界规定的某种东西，而是要人们在地球外貌中去发现的某种东西[4]。

把地理单元作为空间概念进行研究，是李特尔地理学的主要目的。这在他的讨论非洲那部书中表现得最明显。他在演绎的基础上把每个大洲都划成一些大的自然区域。他把地球看作一个有机实体。他又根据物质分界的主要特点，进一步划出各个不同的单元。大洲不是一个普通的复合体。它是各个独立单元的复合体。他写道，地理学家是根据区域特点，而不是根据区划和分类的片面的逻辑体系来考查每一个地理区域的。他考虑的是区域的全部内容。这个内容，从地理学的观点来看，包括他所说的固定的形态、运动的形态（大气、水圈、火山活动）和物质的形态。这就清楚地说明这个区域研究的概念是与系统研究相对立的。实际上他认为系统研究不是地理学（尽管他也常常提到人-地关系的一般规律）。李特尔试图用归纳的方法来建立区域的体系。但他从来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些不同的现象（例如植物群落和气候）在空间上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如何相互依存的[1]。

最后，李特尔的哲学观点是目的论的。虽然他坚持地理学是研究地理区域全部内容的空间变化，可是他又相信地球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作为人类之家而设计的。这个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表明的观点，其基础是他的宗教信仰以及他最初对人类历史所感到的兴趣。这是他对他所不能理解的事物的哲学解释。它对他工作的方法和实质——如他的地理杰作《地球学》[2]所体现的那样——没有影响，但它是支配他后继者的地理观点、并使地理学名誉不好的一种研究方法。

现在我们援引 1860 年皇家地理学会主席所致悼词中的下列一段话来作为总结。

“卡尔·李特尔工作的特点是非常勤奋。他急切地去收集并系统整理每一件与他所研究的区域有关的事实，他不愿漏掉任何一份有用的资料。在他

---

[1] 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第 238 页。

[2] 同上，第 239 页。

[3] 见前引施米特黑纳的著作，第 53 页。

[4] 同上。整个第五节全讨论这个问题。

[1] 见前引施米特黑纳的书，第 57 页。

[2] 同上，第六章；又前引哈特向的书，第 3 页。

的伟大著作中不仅包含着经过严格思考的每一个区域的地理，而且还有历史、考古、政治、种族、自然史等方面的内容，以及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些区域的情况的任何旅行报告”[③]。

这段悼词是为了赞颂李特尔的学术成就的，但它显然表明这位主席没有真正懂得李特尔试图发展的地理学概念。它强调了李特尔的折衷主义研究方法和他对历史学的过分偏重。我们以后将会从当时的反应，以及下一代地-人地理学的科学发展中看到那是一个弱点。

李特尔对人类知识的主要贡献，是他所持的地球表面地理现象的不同等级的区域结合的概念。他从没有认识到区域地理学——各别区域的地理研究——与普通地理学之间的任何根本区别。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普通地理学是研究各种自然（包括野生动植物）和人文地理现象的特性、类型、位置和范围。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概念：一个是生物分布学的，另一个是关于人的生态学的。自李特尔时代以来，人类知识的进展已经加深了这种一直是许多争论之源的分歧。

总之，李特尔的全部著作中贯串着两个基本概念。第一：地理研究是试图确认和解释地球表面在自然（地、水、空气、动植物）及人（通过他的存在和工作成果）两方面的区域变化情况。这种研究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各个地理区域物质内容的不同特点上。它不是孤立地研究某一种事实，而是试图找出并解释这种事实和其他事实的结合，以便去描绘并解释这些区域复合体。第二个概念是把人放在注意力的焦点上。这是在整个十九世纪内吸引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一种研究方法和哲学观点。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含意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在和自然的其他领域平等的地位上来研究人的区域变化；在第二种情况下，联系人来评价自然所提供的空间复合体。这两种方法——一种主要是生物分布学的，另一种是生态学的——一直在不断地激烈争论。两者的差异，确实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它是某些地理学家，也是某些自然和社会科学家思想混乱的根源。后两类人试图弄清楚——常常是嫉妒地和善辩地——地理学家正在干些什么，哪里是他们能够申明只有他们才配去研究的领域。

还有第二种二元论。它一直是地理学家所关切的问题，也是在后来的研究和讲授活动中不断出现的问题。这是区域地理学（L■nderkunde）和普通地理学（AllgemeineGeographie 或李特尔常说的 Erdkunde）之间的关系。后者研究的是地球表面有关区域差异的事实和因素的各种特殊资料在全世界的分布。李特尔试图既发展区域地理学，也发展普通（系统）地理学。他的《地球学》确实是研究各别区域的，但他在讲学和著述时也发表过无数次声明，呼吁发展一门比较的、世界范围的区域地理学。在哈特向的说明中已可看出这一点，盖奇译的他的演讲和著述显示得更清楚，至于他的德文原著就更不用说了。它阐述区域地理学和世界（范围的）地理学两者的概念体系。虽然他呼吁说世界范围的概括，应该是地理学家的最终目标，但在他那个时代，他缺少可以进行这样概括的资料。在他的时代，缺少有关地球上广大区域的知识，缺少有关土地、空气和水的资料，因而也缺少可靠的地图，人们无法进行类型的概括。但他总是鼓励这种研究方法的进步，鼓励把它结合到地理

[③] 德·格雷伯爵和里蓬：《卡尔·李特尔》，《皇家地理学报》，第 4 期（1860），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在 1860 年 5 月 28 日所致的悼词。

学家的概念体系中去。

参考文献

这篇简评的依据是近来用英文发表的下列几份严谨的论著：R.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第 48—84 页；卡尔·辛胡贝：《卡尔·李特尔，1779—1859》，《苏格兰地理杂志》，75（1959），第 152—63 页；卡尔·特罗尔：《亚历山大·冯·洪堡与卡尔·李特尔的著作》（TheWorkofAlexandervonHumboldtandCarlRitter），《科学进展》（AdvancementofScience），16 卷第 64 期（1960），第 441—52 页。G.塔桑：《十九世纪地理学》（G.Tatham，Geogra-phyintheNineteenthCentury）和 G.泰勒编《二十世纪的地理学》，1951 年，也有很大价值。还应参考 J.莱伊利的《十九世纪德国地理学的方法论论战》（J.Leighly，MethodologicalContro-versyinNineteenthCenturyGermanGeography），《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28（1938），第 238—53 页；和卡尔·索尔（CarlSauer）论李特尔的文章，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纽约，1934，13 卷，第 395 页。

在近期德国地理学家著作中，我们大量摘引了海因里希·施米特黑纳的《卡尔·李特尔研究》（StudienüberCarlRitter），《法兰克福地理杂志》，4 期（1951），和 E.普莱韦及 J.H.舒尔策（Schu-ltze）的《纪念卡尔·李特尔》（CarlRitter，zumGed■chtnis），《地球》（DieErde），90（1959），第二部分。这是该杂志纪念李特尔逝世一百周年的专刊，共包括 9 篇附有英文摘要的德文文章。还有 H.贝克（Beck）的《卡尔·李特尔研究》（CarlRitterForschun-gen），载《地球学》（Erdkunde），（1956）第 227—33 页，附大量参考文献目录。《地球》94（1963），第 13—36 页，载有卡尔·李特尔著作的目录。

可以得到的李特尔著作英译本有以下一些：《比较地理学》，W.L.盖奇译，纽约，1864；伦敦、爱丁堡，1865，内容包括 1862 年以《普通地球学》（AllgemeineErdkunde）名称发表的、在柏林大学关于普通地理学的讲演。另一部名为《地理研究》（GeographicalStudies）的书，也由 W.L.盖奇翻译，内容包括一系列公开讲演，其中有些是在柏林地理学会上讲的。他是这个学会的创始人，担任多年的主席。该书还收有《地球学》第一卷的《导论》。该文于 1852 年在柏林第一次发表，盖奇的译文在 1861 年发表于纽约。原文题目是《普通比较地理学导论》（EinleitungzurallgemeinenvergleichendenGeographie），柏林，1852，内容包括《地理科学中的历史要素》（theHistoricalElementinGeographicalScience，1833）和《论地球资源》（RemarksontheResourcesoftheEarth，1836）两文中的重要论点。正如哈特向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盖奇的译文是“不可靠的”，因为翻译时拘泥于字句，而且常常不能表达作者的原意。比较不甚著名的有：《新西兰的殖民》（TheColonisa-tionofNewZealand），伦敦，1842（1842 年 1 月 22 日在柏林科学协会上演说的译文）；《巴勒斯坦及西奈半岛的比较地理学》，W.L.盖奇翻译和改写，供圣经研究者使用，4 卷，爱丁堡，1866（德文原著 14 卷《地球学》的简写本）。

第二编　德国

第四章　李特尔以后的地理学

地理学的二元论

德国地理学在李特尔晚年及其身后约二十年的时期内，一直处于这位大师的影响之下。李特尔的一些学生写成了各个具体地区的描述地理学；但照赫特纳的看法，地理学却深受这位忽视物质方面、过分强调人的大师遗传下来的“片面性的毒害”[①]。因此，“地理学失去了它内部的平衡和独立的意义，从而降为历史学的附庸”[②]。

一些不是不杰出的学者继续运用李特尔的研究方法。他们都抱着相同的目标，即清楚透辟地描述地球和人的关系，明确作为人类活动的舞台和决定因素的地球，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个人及民族命运的影响。

李特尔的追随者包括（在地理学家内的）海因里希·基佩特（HeinrichKiepert）、J.G.科尔（Kohl）、埃尔恩斯特·卡普（ErnstKapp）、黑尔曼·古特（HermannGuthe）、卡尔·诺伊曼（KarlNeumann）、J.E.瓦帕奥伊斯及 G.B.门德尔佐恩（Mendelssohn）。科尔最出名的著作是他早年用演绎法写的论聚落和地表的关系（1841）和后来写的论主要城市的地理位置（1874）。古特写了一本普通地理学的教科书。该书以后的版本已经由 H.瓦格纳（Wagner）全部修订过了。瓦帕奥伊斯本来是统计学家，但从 1838—1879 年在格廷根讲授地理学；他把他一生最好的时间用于（仿照李特尔的方法）写一部地理学与统计学百科全书。1845 年卡普探讨了普通地理学与特殊地理学的区别（《比较普通地球学》，VergleichendeAllgemeineErdkunde，1845），并且概略地描述了世界主要地理区的自然和人。门德尔佐恩在一部被赫特纳誉为优秀的历史地理学（《日耳曼的欧洲》，GermanischesEuropa，1836）著作中描述了德国的自然结构和居民。这是这样写法的第一次尝试。古特和诺伊曼更细致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去写下萨克森（前者）和希腊（后者）；他们的著作都于 1867 年出版。

地理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也在探讨作为地球科学的普通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所以李特尔所想象的那种特殊的普通地理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地质学，特别是经过查尔斯·莱伊尔（CharlesLyell）的努力，已经崛起为一门系统的知识。气象学和海洋学也已独立发展。地球科学，或不久前人们才称之为地球物理的这门科学，已开始同物理学分家。同样，对动植物分布的研究也落入植物学家同动物学家的手中；这些人的兴趣只有一小部分转向生态群落的地理结合。种族学家也对原始民族进行实地调查；并对这门知识进行阐释和使其系统化。因此，地理学就暂时地被忽略，而它的研究领域也无人问津了。研究地表形态的这一本来是完整的领域，于是被分割而属于许多不同的科学部门，每一部门都试图单独地研究某一（固着于地球上的）现象的过程。福斯特与帕拉斯（Pallas）所想象的、并为洪堡与李特尔发展了的这个包括其居民在内的自然单元（区域）概念，被科学家们忽视了。最好的描述地理学著作都是探险家们写的，因为那时正是到远方作科学探险的高潮时期。有一些这类探险家，凭借他们的经验，成为独立于李特尔传统之外的地理学思

[①] 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1927，第 88 页。

[②] 同上书，第 88 页。

想的新领袖。

实际上，十九世纪晚期许多地理学家都抱住地理学的二元论概念不放——一方面把地球当作自然体来研究，另一方面又把它当作人的住所来研究[①]。尽管一门科学不能有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且只能有一个单独的目标这一观念的势头正在增强，但处于两个不同学科（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的地理学的二元性，仍将是始终缠住我们的一个根本问题[②]。

人们在作为地理学特殊核心的区域概念中寻找走出二元论困境的道路。这一研究途径虽已有一百年的发展历史，但直到前一世纪末才以现代的含义出现。它是由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阿尔夫雷德·赫特纳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系统地阐明，并由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于二十世纪头十年内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李希霍芬于 1883 年发表他的最重要的说明（参看第 6 章）。就是这一说明（有许多正当的主张）成为 1883 年格尔兰的根本性批评的目标，被他斥为不可逾越的鸿沟。阿尔夫雷德·赫特纳（第 9 章）于 1905 年[③]明确划定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干脆地把地球物理学的领域（如格尔兰所规定的）放弃给地球科学。这不是地理学地位和状态的逻辑学定义，而是李特尔和李希霍芬传统的继续。李希霍芬和赫特纳宣称地理学基本上是“分布的”或“区域的”地球科学的用意，是试图用“回到李特尔”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领域的二元论问题。系统地理学部门的成长，和特定区域背景中环境和生命的结合方式，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地理学研究的实质内容。

李特尔的追随者

1870 年德国只有三个大学开设地理学课程——H.基佩特在柏林讲授，J.E.瓦帕奥伊斯在格廷根，卡尔·诺伊曼在布累斯劳。波恩在 1829 年也曾有过一位地理学讲师，后来这个讲席提升为教授级，由 G.B.门德尔佐恩（李特尔的学生）任教授；但在 1857 年他逝世以后，这个职位一直空着，直到 1877 年才由李希霍芬来接任（至 1883 年）。普鲁士大学内的巨大进展发生在七十年代，我们现在以这三位学者学术成就的简短说明作为开始；他们当时在学术上都已明显地达到成熟阶段，不过，让我们补充一句：他们的观念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对后来的发展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

海因里希·基佩特（1819—1899）是柏林大学李特尔和李希霍芬两个时代中间的桥梁。他在李特尔影响下，从 1836—1840 年在柏林研究古典历史、语言和地理，于 1841 年出版一本 48 幅的《希腊与希腊殖民地》（HellasandtheHelleniccolonies）的地图集（第二版，1871）。他自费去小亚细亚旅行，于 1844 年出版两幅土耳其帝国的地图，1845 年又出版六幅小亚细亚的地图。他从 1845—1852 年在魏玛地理学系讲学，但在这以后他回

[①] 用英文写的对这一时期德国人著作的书评有：H.J.麦金德的《现代地理学，德国的和英国的》，《地理杂志》，5（1895），第 367—79。德文写的最好的评价是海尔曼·瓦格纳的文章，载于《地理学年鉴》卷 7（1878），8，9，10，12，及 14（1890）。

[②] 对尤利乌斯·弗勒贝尔

[③] 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的性质和方法》，《地理杂志》2（1905）第 545—64、615—29 及 671—86 页。后来收入他的《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1927（参看第 9 章）。

[①] 《海因里希·基佩特》，《德国评论》，20（1889），第 569—71；《卡尔·诺伊曼》，《德国评论》，3（1881），第 42—5页；《J.E.瓦帕奥伊斯》，《彼德曼通报》，26（1880），第 110—15 页。

到柏林去接替李特尔,担任地理学讲师。这个职位于 1874 年提升至教授级(可能是因为当时普鲁士其他国立大学都已认可地理学了）。他后来又出版另一些古典时期的地图和地图集，并写成一本古典地理学教科书（1879 年）。和当时德、法两国流行的风气一样，他只把讲授地理学当作讲授古典历史学的一项附带的工作。

卡尔·诺伊曼（1823—1880）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1846 年只学完低年级课程就退学了。他开始时担任家庭教师，但受政治问题的吸引而积极参加 1848 年的革命运动。1850 年他到柏林，并作过一段时期的报纸编辑；但在 1852 年他怀着进入大学生涯的坚定意图而再度从事学术研究。他从 1856—1860 年编辑《普通地球学杂志》(Zeitschriftf■rallgemeineErdkunde)，受到李特尔与洪堡两人的高度尊重。1860 年他受任为布累斯劳大学讲师；但为了完成内阁支付的一项任务，在柏林一直逗留到 1863 年。1865 年他升任地理学和古代史的正教授。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讲稿在其身后出版于八十年代早期，一部由他继任人 J.帕奇编纂的希腊自然地理（特别着重古典时期）出版于 1885 年。

虽然诺伊曼和基佩特的情况一样，主要的训练和能力都在古典历史学方面，但在后来他对地理学的兴趣超过了历史学。他没有接受邀请去斯特拉斯堡担任新设的教授职务（最后由格尔兰接受这一职务），他也拒绝了要他去莱比锡接替佩歇尔任地理学教授的建议。他宁愿留在布累斯劳，1880 年他在那里逝世。接替他的是他杰出的学生约瑟夫·帕奇。

约翰·爱德华·瓦帕奥伊斯（JohannEduardWappaeus）（1812—1879）生于汉堡。他由于身体不好，最初想学做农民。1831 年他到格廷根大学学习矿物学。他因身体还是不好，就到佛得角群岛和巴西去作一次长途热带航行。1834 年 7 月，他回到柏林大学重新开始学术研究。他对李特尔的观念印象很深。1836 年他取得格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在汉堡、波恩和巴黎等地继续研究。1838 年他回到格廷根任地理学教员，1845 年升任讲师，1854 年晋升正教授。他在该大学任教共四十一年。

瓦帕奥伊斯享有地理学及统计学双重教授的学衔。那时在大学和地理学会里这两项职务常常是兼着的。他研究航海家亨利（Henry）的地理著作（1842），而且继续保持他对南美洲的、由三十年代早期他那次访问所引起的兴趣。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出版关于德国向新世界移民的著作。1847 年他着手重写一部标准的《地理学与统计学手册》（HandbookofGeographyandStatistics）。这个手册的第 6 版已于 1834 年出版。这部书本来打算分成两卷，于两年后写成。但和他老师的《地球学》情况一样，它变成一项大大拖长了的事业。二册变成了十册，而且在合作者的帮助下，用去二十二年的时间才全部完成。瓦帕奥伊斯也发表一些统计学的编著，特别是从新公布的普查资料中搜集来的人口统计。他终生坚持李特尔的观念，坚决反对批评家佩歇尔的观念（参看下文）；后者企图把对地球表面的比较形态学研究，局限在它的物质特征上。

虽然瓦帕奥伊斯的观念对后来的地理学家几乎没有影响，但有两件事应该说说。第一,他创建了格廷根大学悠久而从未中断的地理学传统。他在 1880 年为 H.瓦格纳所接替，1920 年 W.迈纳杜斯（Meinardus）又接替瓦格纳，再后就是莫滕森（Mortensen）和现在的波塞尔（Poser）先后相继来这个大学主讲地理学。第二，他和他的继任人 W.瓦格纳的活动，显示了地理学与统计

学在它们发展初期的密切结合。这两门科学的发展都和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科学探险与全国人口普查有联系。

奥斯卡·佩歇尔

在一段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内，奥斯卡·佩歇尔（1826—1875）曾经是德国的头号地理学家。他基本上反对洪堡和李特尔的观念；他的后半生都贡献给发展地理学思想。他是达尔文主义充分显示其影响以前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虽然他的研究时期是在达尔文进化论发表（1859）以后，但那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理论在解释地球特征和人类社会上的含义。

他最初是新闻记者，但在仍然很年轻的时候就献身于地理著述了[1]。从1849—1854年他是奥格斯堡《普通报》（AllgemeineZeitung）的助理编辑，从1854—1870年是讨论外国问题的著名周刊《外国》（Ausland）的编辑。在此期间，他发表了有关大发现时代（1858）及地理学史（1865）方面的著作。就在这后一著作中，他批评了洪堡与李特尔。他在其一生的最后五年中，主持了莱比锡大学新设的一个地理学讲座。

他在试图对地表特征进行解释和分类而仔细推敲李特尔所阐明的比较法过程中，奠定了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基础。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发表在他的《作为地表形态学探索的比较地球学的新问题》（NeueProblemedervergleichendenErdkundealsVersucheinerMorphologiederErdoberfl■che）（1869）和另外两卷叫做《自然地球学》（PhysischeErdkunde)(1879)的论文集中。后者在他逝世以后经古斯塔夫·莱波尔特（GustavLeipoldt）编纂出版。

佩歇尔在不同的时间批评过洪堡与李特尔两个人。他说洪堡给人们以“普通地理学”等于全部“自然科学”的印象。而李特尔则由于他运用目的论的研究方法和使地理学从属于历史学而受到谴责。佩歇尔承认地理学的二元论。他把对人的研究排除于地理学之外，但他对两者都进行研究和讲授。他在地表自然特征的科学研究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自然地球学），对人类的种族和文化也作过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他和他的同代人一样，把后一种研究叫做《民族学》（V■lkerkunde）[1]。在这些著作以前，他对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地理学观念的历史作了宏博的分析。

佩歇尔在《新问题》（NeueProbleme）中批评李特尔提倡一种他不能应用的自然地理学方法。佩歇尔主张比较地理学应该象比较形态学那样，有一个明确的方法和目的。地理学家应该借助于大比例尺地图，寻求地球各部分的相似的自然面貌，比较它们的特点和起源，努力象比较解剖学所作的那样找出它们所有的发生学上的联系。他反对李特尔的目的论的处理方法。他说这种方法超出了比较地理学的领域，而且取代了对地形的比较研究法。他认为对地形的比较法是不考虑那种对人类进步的影响的，因为它不在问题的范围之内。

这种比较法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并为将来的研究奠定基础。但佩歇尔

---

[1] 在R.拉策尔的《短篇论文集》中有一篇评传，1（1906），第429—47页。

[1] 奥斯卡·佩歇尔：《人种及其地理分布》，伦敦，1876，在德国初版于1874年。有意思的是，这是佩歇尔著作的唯一可用的英译本。

的主要困难是缺乏有关侵蚀营力，特别是流水作用的知识和资料，以及区域地质和构造的详细情况。他用研究地形图的方法来寻找形态的“相同性”或洪堡所谓的“相似性”，然后再去探索它们的起源。这个方法有时是成功的，但也常有许多偶然性的比较。

在《新问题》中论述峡湾的部分可以找到佩歇尔方法的最好例证。通过对地形图的研究，他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峡湾的主要特征是在大陆和岛屿沿海的深而陡的峡谷；它们常是垂直地或呈高角度地向内陆延伸。”他注意到这些海岸特征的分布，并且指出“使峡湾明显不同于其他沿海区域的特点是它们的局部的而又成群的出现”。他总结说，峡湾是“以前冰川消融后残留下来的空谷”，而这些空谷又是冰川刻削、扩大构造裂隙的成果。佩歇尔把这个方法成功地运用到其他的自然特征，特别是湖泊和岛屿上。他也驳斥广泛持有的山脉呈直线排列的观念。在论述山地起源时，他指出，所有的年轻褶皱山地都是一边靠着陆地，一边濒临深海；这些陆地通常都是高地，这些深海有的地区已被沉积物充填。这是从达纳（Dana）的研究中得来的观念。

在论《地理的同一性》（GeographicalHomologies）一文中也有佩歇尔方法失败的例子。佩歇尔注意到婆罗洲的山地骨架与西里伯斯（苏拉威西）及哈尔马黑拉两岛的轮廓在形状上非常相似，但他说不出令人满意的、有关它们起源的原因。虽然他相信西里伯斯岛可能是一个古陆块的骨架，但他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三个岛屿究竟是三种不同的形态，还是处于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一种形态？再有，他注意到太平洋的岛屿呈现一系列串珠状的排列；亚丁和阿曼两个海湾的沿岸都呈现直角的转折。他注意到大陆北面的半岛和岛屿指向北方，东西海岸的都呈南北走向，南面的则向南尖细。他探讨了形状的相似性，也发现了地形和水系的差异性。他在这个基础上总结说，大陆比它们的山脉年老。可是根据后来的知识，我们知道这种论断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事实上大陆是许多构造碎片的集合体。

佩歇尔把德国的自然地理学建成一门科学。李特尔忽视自然地理学，洪堡不想为地形分类。他们两人仅从整体上来研究陆地。而李特尔的分类也仅是根据地势的起伏。佩歇尔不是这样，他试图发现地形的分布，对它们进行分类，然后再去解释各个特定地形的起源。同一性方法之所以屡遭失败，是因为佩歇尔缺少有关侵蚀营力的知识。如果佩歇尔获得该世纪末美国地质学家的研究成果、“挑战者”号（Challenger）及其他海洋探险所取得的资料，以及后来气象学进展所提供的知识来装备自己的话，他就能解决得了地形的成因问题，因而也能避免那些偶然性比较。可是，这样的情况还要再等二十年才能出现。

佩歇尔不仅推动对地形的科学研究。他在那本《民族学》中也对人类的地理研究做出决定性的贡献。《民族学》这本书，现在仍然被广泛地认为是人类学家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讨论人类的体格特征（脑、脸的结构、身材、皮肤和头发），语言特征（历史、结构、分类），产业、社会及宗教等方面的发展，以及人类的种族。后两项构成全书的大部分内容。发展的部分包括下列问题：原始情况、食物、衣着、居室、武器、航行、“商业对民族的地区分布的影响”、婚姻和父权、族仇、财产、奴役等社会问题、城堡、宗教的激情与每一主要宗教内部的教派。人类种族被分为下列各集团：澳大利亚人与巴布亚人、“蒙古族”（通古斯人、真正蒙古人、土耳其人、芬兰人、萨摩亚人）、“印度西部的德拉维人”、霍屯督人与布什曼人、黑人、地中

海种（含族人、闪族人、地位不易确定的某些欧洲种族）、印欧人（亚洲的与欧洲的）。

佩歇尔在本书中研究新世界的前哥伦布文化时，回到了“自然对人”这个论题。[1]

“人们很容易认识到热带地区的高原对文明进程的有利影响，对逃避炎热地区而住在温带的我们来说，尤其如此。我们是说他们的居民避开低地的损害健康的空气；他们不得不准备衣着和房屋来防御天气的危害；为了避免饥饿，他们不得不种田和储备食物；为了获得更舒适的住所，他们甚至很快就被迫聚到一起并组成社会。所有这一切也许听起来不错，但不能说明这一奇怪的事实：人们必须去寻求生活困难较大的地区。此外，在旧世界里，文明是得到低地的助力的。那里的文明都出现在稍高于海平面的大河旁边，如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中国人也认为他们在下到黄河流域低地以后，他们的文明才得到发展。”

德国地理学的谱系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大学地理学的发展，表明现代地理学第一代学者的出现。李特尔传统得到前面刚提到的三位学者的继承，但他们的根柢是古典历史学，对新的趋向无能为力。当 O.佩歇尔（莱比锡，1871）、A.基尔希霍夫（Kirchhoff，哈勒，1873）、H.瓦格纳（柯尼斯堡，1875；格廷根，1880）、F.冯·李希霍芬（波恩，1877）及 G.格尔兰（斯特拉斯堡，1875）分别被聘到上述各地的时候，情况就迅速改善了。瓦格纳和基尔希霍夫倡议把地理学列入大学课程；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普鲁士政府才于 1874 年决定在所有国立大学里设立地理学讲座。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两位大师登上了学术舞台：李希霍芬在 1877 年到波恩，拉策尔在 1875 年到慕尼黑。1875 年逝世的 O.佩歇尔是近代地理学的第三位奠基人。上一世纪末叶的其他学者是 T.菲舍（Fischer）、J.帕奇、G.格尔兰和 A.苏潘（Supan）。

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季纪内出现很多较年轻的地理学家，他们都做过长期的野外工作。这就是范·法尔肯堡（VanValkenburg）想描绘为“德国地理学黄金时代”[1]的那个时期。

要在这个第二代的所有地理学家中指出谁是他们的领袖，就会引起许多人的不高兴。可是，阿尔布雷希特·彭克、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奥托·施吕特尔和阿尔夫雷德·菲利普松（AlfredPhilippson）是特出的。象他们这样的还有：1946 年从慕尼黑退休的弗里茨·马哈舍克（FritzMachachek）（1876—1957），1945 年从格拉茨退休的奥托·毛尔（OttoMaull）（1887—1957），他们两人都是阿尔布雷希特·彭克的学生，都基本上是地形学家；1935 年退休的 S.帕萨格（Passarge）（1867—1958），他是李希霍芬的学生；W.福尔茨（Volz）（1870—1958），他是拉策尔、帕奇和李希霍芬的学生，于 1935 年退休。他们还有另外两位重要的同代人。这两位都是李希霍芬的学生，都基本上是自然科学家：W.迈纳杜斯（1867—1952，气象学家），从 1906—1920 年是明斯特大学教授；从 1920 年起到格廷根接替黑尔曼·瓦格纳、1935 年

---

[1] 见前引书《人种及其地理分布》，第 444 页。

[1] G.泰勒（编）：《二十世纪的地理学》，1951，第 91—115 页。

退休的埃里希·冯·德里加尔斯基（ErichvonDrygalski）（1865—1949），这位南极探险家，从 1906—1934 年是慕尼黑大学地理学教授。

第三代成熟于三十年代。他们的大部分活动时期，是在纳粹统治下度过的。在这些活跃于两次大战间隔期间的比较年轻的人中，最杰出的是 莱奥 魏贝尔（LeoWaibel）、罗伯特·格拉德曼（RobertGradmann）、H.施米特黑纳、N.克雷布斯（Krebs）、E.奥布斯特（Obst）与 H.莫滕森。很有希望的 H.施雷普费（Schrep-fer）和 H.德里斯（D■rries）两人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了。

第四代是在战后年代成长起来的。卡尔·特罗尔在这些人中是特出的。但另外还有半打左右优秀的人物：G.普法费尔、W.哈特克（Hartke）、H.博贝克（Bobek）、J.布德尔（Budel）、H.莱曼（Lehmann）、C.朔特（Schott）、E.迈南（Meynen）和 H.施伦格（Schlenger）。特罗尔和迈南两人都在私人通信中，对阿尔布雷希特·彭特的观念和给他们的指导表示感激。哈特克强调他和柏林的 A.吕尔（Rühl）的关系。第五代包括一大批年在三十多岁至四十多岁的比较年轻的人。今后三十年——在 2000 年以前，地理学的进步将要依靠他们了。我在这里不提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著作将在以后各章和他们法国同事的著作一起讨论。这个名单决不能说是完全的，但它确实排出了德国和奥地利近代地理学的特出创建者的年代顺序。

德国不象法国那样，只有一个思想和训练上的派别，它有好几个。从他们培养的人数来看，第二代中最有影响的是柏林的彭克和海德堡的赫特纳。第一代的两位大师李希霍芬和拉策尔是寿命相差不多的同代人。阿尔布雷希特·彭克（1858—1945，于 1926 年退休）和阿尔夫雷德·赫特纳（1859—1941，于 1928 年退休）支配着本世纪第一季纪的地理学舞台。我们还可以提出奥托·施吕特尔和阿尔夫雷德·菲利普松，他们都是李希霍芬的学生，在三十年代退休，但活到进入五十年代的高龄。他们在职业上是同代人。可是，他们四位只不过是十九世纪第一季纪中数量很大、而且越来越多的职业地理学家中最知名的权威人物罢了。

柏林给予德国近代地理学成长的刺激，与巴黎给予法国的一样多。但其他大学在十九世纪也已有了地理学讲座。波恩、格廷根和布累斯劳都有一百年左右的悠久历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李希霍芬培养了那么多年轻的学者，他们都成为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内设立的地理学讲座的首席教授。李希霍芬于 1904 年在柏林逝世，接替他的是阿尔布雷希特·彭克。

第五章　第一代大师：弗里德里希·拉策尔（1844—1904）

对人的研究

对人的研究，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有了迅速的、长足的进步；必须体会到这些进步，才能真正理解地理学发展的背景。

环绕着人类种族只有一个起源还是有许多起源的问题，有过大量的讨论。一位人类学家在回顾这一学术领域时写道：在这个时期，人种学家所关心的是对人类种族集团的分类和描述。“真正出色的著作有O.佩歇尔的《民族学》（1873）和弗里德里希·米莱（M■ller）的《普通人种志》（AllgemeineEthnographic）。而这类著作中最伟大的一部则是F.拉策尔的《民族学》（V■lkerkunde）（1885—1888）”[1]。这些经典著作中有两部是由德国大学地理学教授写的。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提一下，几年以后在英国也出现两部优秀的著作：A.H.基恩（Keane）的《人：过去和现在》（Man：PastandPresent）（1899）和A.C.哈东（Haddon）的《对人的研究》（TheStudyofMan）（1898）。这两位人种学家都是地理学的朋友；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四十年前，要在某些英国大学里攻读地理学优等学位，他们的著作是必读的。

阿瑟·德·戈比诺（ArthurdeGobineau）在1854年提出这样一种论调：不管环境如何有利，大部分的种族是不能有文明的成就的。H.S.张伯伦（Chamberlain）附和戈比诺的论调，把条顿种族提高到文明发展的领导地位上（1899）。乔治·瓦歇·德·拉普日（GeorgesVacherdeLapouge）也在1899年把北欧长头的新教徒挑选出来，说他们在欧洲三个种族中是最富于个人主义精神和最有进取心的，他们明显地优于服从政府、不求进步的宽头的阿尔卑斯天主教徒，优于短小、黝黑、长头的地中海类型。后者显然比前两者低劣。拉普日认为应该有意识地用同种繁殖的方法，把正在移向城市并在那里死去的、优越的北欧类型保存下去。在这种倾向导致弗朗西斯·加尔通（FrancisGalton）爵士和卡尔·皮尔松（KarlPearson）在伦敦创立优生学的同时，它也引起人们在二十世纪早期（德·图尔维尔＜DeTourville＞，麦迪孙·格兰特＜MadisonGrant＞，洛思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Stoddard＞等）去对各种族的优越性作许多流行的但也是伪科学的评价。这种倾向发展到顶点，就成了纳粹的种族教条。

对人类在地球上居住、繁殖的兴趣，引起人们对原始民族的研究。德国人种学家阿多尔夫·巴斯蒂昂（AdolfBastian）在这方面的著作是特出的。他曾广泛地旅行，到僻远的地区作实地调查，写出长篇的人种学论述。他的主要论题是人类心灵的统一；和随着人类集团间的观念传播，在不同环境内独特的“民间观念”的发展。巴斯蒂昂的理论发表在《地理区域论》（ZurLehrevondengeographischenProvinzen）（1888）这本书中。他认为，民间观念通过边界上的运动和接触而从各个中心向外传播，而文明则通过各种文化的交流而开始。他把人类学研究的进化理论和扩散理论结合到一起。

从巴斯蒂昂担任柏林地理学会1871—1873年的主席，以及他积极参加世界各地的旅行和探险这些事实来看，那时地理学与人种学的密切关系是非常

---

[1] T.K.彭尼曼：《人类学一百年》，伦敦，1935年

明显的。李特尔在五十年代提出地理学会应该有一个人种学部门。后来巴斯蒂昂在他担任地理学会主席的时候，为这个部门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创办并管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两方面兴趣密切结合的情况，也可从佩歇尔和拉策尔的著作中看出来。人类学家承认他们两人的著作是经典的著作。再有，德国其他地理学家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种学的兴趣，以及从 1882 年由拉策尔创始的一部研究论丛的名称，也清楚地说明这一事实。这个论丛的名称是：《德国地理学与民族学研究》（ForschungenzurdeutschenLandeskundeundV■lkerkunde）。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名称的后一部分民族学才被去掉。

前一世纪末人种学的发展这一背景，对了解那个时代地理学的进步是极其重要的。地理学家都在寻求那些独特的——象李特尔只约略谈到而未实际探讨的目标。自 1890—1920 年这一时期，拉策尔、李希霍芬、维达尔·德·拉·布拉什、让·布吕纳（JeanBrunhes）及施吕特尔等人的著作尤其能够说明这种情况。

弗里德里希·拉策尔

毫无疑问，弗里德里希·拉策尔是所有对人文地理学有贡献的人中最伟大的一位。他对人种学也有卓越的贡献，现代的文化人类学家仍然非常尊重他的成就。不幸，他的观点在德国受到许多歪曲，而在英美两国又被粗俗地误解了。后一情况之出现，主要是由于操英语的学者对德文原著的无知和对埃伦·邱吉尔·森普尔（EllenChurchillSemple）著作的依赖。要正确估量拉策尔的成就，就必须读一读罗伯特·洛威（RobertH.Lowie）和 T.K.彭尼曼两位人类学家新近发表的对他的评价。他们非常明确地说，拉策尔的著作和他的通过迁移与模仿来扩散的观点是极其重要的。在系统地试图找出并确定自然环境与人两者关系的同时，他作为一位地理学家，首先关心的是“人类分布的共变因子”。拉策尔主要人种学著作的英译本名称是《人类的历史》（HistoryofMankind），书前有 E.B.泰勒（Tylor）爵士作的序言。泰勒是人类学家，他肯定没有和天真的环境决定论打过交道。再有，拉策尔对原始民族所作的研究，和他所画的有关他们和他们文化用具的分布图，都是通过历史的考查来揭示迁移和模仿在他（它）们扩散中的作用。

拉策尔用的是形态的标准。彭尼曼说[1]，“如果他发现两个形态有一致性——不是机械地由他所研究的那些东西的性质、物质和目的产生的一致性，即使它们相距很远，分布也不连续，他也假定它们之间有历史的联系，或者说是有过模仿的过程。”

因此，拉策尔的学生莱奥·弗罗贝尼乌斯（LeoFrobenius）就根据他所认定的美拉尼西亚和西非两地文化内容上的相似性，发展了文化区域的理论。他从两种文化相似项目的多少，来阐明“数量标准”的概念。从那以后，这一套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浸透了许多人种学家，尤其是美国人克拉克·威斯勒（ClarkWissler）的著作。这一方法也促进了德国地理学家爱德华·哈恩（EduardHahn）对挤奶的起源和扩散问题的研究。

我们需要从这方面来评价拉策尔的著作，不必去重复那种有关环境决定

[1] 见前引彭尼曼的著作，第 238 页。

论的不断的叫嚣。大部分学者，特别是象拉策尔那样多产的学者，在他们的一生中总要定时地热情奔放地去过分宣扬他们的观点。在这一方面，拉策尔是有过错的。但他极力主张：的确存在着协调的人-地关系，而且人们应该精确地估量这些关系。生理气候学家们正在精确地测定温度、湿度对人类身、心的影响。他们所做的，也正是拉策尔极力主张人们应该去做的。这既不是环境决定论，也不是天真，即使做的结果可能不精确，或者被歪曲，也不能那样看。人-地关系需要测定，不应使其神秘化或不许人家说。

“一种自然现象总是通过某种隐晦的控制体系而具有相应的人类反应”这一学说，在威廉·莫理斯·戴维斯的著作里表现得最清楚。戴维斯虽然探索人-地关系，但他基本上是地质学家；而拉策尔则基本上是生物学家，他认识到由于有人类因素，环境控制是有限度的。一清二楚的事实是：戴维斯 1903 年的那篇文章[①]是人-地关系的、也是环境决定论的地理学，而拉策尔的著作则是人类分布共变因子的地理学。在《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第二卷里到处都有这方面的证据。他许多著作的中心论题是：文化分布是历史上的迁移和模仿的反映。

弗里德里希·拉策尔[②]是一个四口之家的成员。他的父亲是巴登大公在卡尔斯鲁厄的宫廷总管。他离开学校后当过四年药剂师学徒。后来他又先在海德堡大学，后在耶拿大学研究动物学。1869 年他发表一篇评论达尔文著作的文章。那篇文章强烈地表明耶拿的著名动物学家埃尔恩斯特·海因里希·哈克尔（ErnstHeinrichHaeckel）对他的影响。在为一位法国博物学家工作的同时，他还应约为《科隆报》撰写有关他工作和旅行的通俗报导。他参加了普法战争，而且受了几处伤。战后，他又到慕尼黑大学作短期研究。他在那里结识了杰出的博物学家和人种学家、人种博物馆馆长莫里茨·瓦格纳（MoritzWagner），而且第一次接触到他的有关物种迁移的重要性的理论。然后他又回到《科隆报》作记者。该报使他能在欧洲（特别是奥地利和匈牙利）广泛旅行。他的许多文章后来汇集成书出版，书名是《一位博物学家的旅行》（TravelsofaNaturalist）。

1874 和 1875 年他到北美洲和中美洲作长途旅行。美洲的这次经验，给予他一种深刻的、终生难忘的印象，也是他许多观念的源泉。他对黑人问题感到棘手；对德国人在美国中西部发展中的作用印象深刻。他写了一本论中国人外移的书（1876）；用的资料虽然大部分是根据英国的殖民经验，写书的动机却是他个人在加利福尼亚的观察引起来的。后来在 1878 和 1880 年，他写了两卷关于美国的书（自然与文化地理学，特别着重经济状况）。他在 1893 年出版的、特别着重自然和经济情况的那本书中，又回到美国政治地理这个论题上面。哈莉特·万克琳高度赞扬他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写的那些生动的描述论著，并且认为它们可和洪堡关于墨西哥和古巴的著作媲美。

拉策尔从美洲回国后，于 1875 年他三十一岁的那年辞去《科隆报》的职务。他到慕尼黑技术专科学校当讲师，不久就被提升为教授。他在该校一直任职到 1886 年，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地理学家。他脱离他所说的洪堡的综合形态研究法。他认为洪堡关心的是事物的相互依存，而不是地球上事物和观念的起源和扩散。根据他研究生物学的经验，他也和李特尔的大受批评的方

[①] W.M.戴维斯：《地理学纲要》，《地理杂志》，22（1903），第 413—23 页。

[②] H.万克琳：《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传记与著作目录》，剑桥，1961，这是用英文写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法分手；不过他对它同情的程度还是要超过佩歇尔这类的同代人。拉策尔对达尔文和哈克尔两人的机械进化论方法都持批评的态度。再有，他在晚年受到哲学、而不是生物学思想的越来越大的影响。

拉策尔在慕尼黑讲学的内容非常广泛。他对雪线高度、阿尔卑斯山石灰岩地表这类自然现象，以及人文地理学的问题感到兴趣。他在慕尼黑写成他的《民族学》（3卷，1885，1886，1888，英译本名叫《人类的历史》，1896—8）、两卷《北美洲》(1878与1880)，及《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或《地理学在历史学上的应用导论》（AnIntroductiontotheApplicationofGeo-graphytoHistory）（1882）——第一卷。他也常为《外国》写文章。

1886年李希霍芬受聘去柏林时，拉策尔就到莱比锡接替他的职位。他在那里一直逗留到1904年逝世为止。菲舍、埃克尔特（Ec-kert）、弗里德里希（Friedrich）、赫特纳都做过他的助教。他每年指导八至十个研究生。在他的领导下，莱比锡地理学会赢得了国际声誉。在这些年内，他写成他的《人类地理学》第二卷（副题是《人类的地理分布》＜TheGeographicalDistributionofMankind＞）（1891），和另一部可和邵可侣的《世界地理学》媲美的巨著《地球与生命：比较地理学》（DieErdeunddasLeben：Eineverglei-chendeErdkunde）（1901—2）。万克琳说，从这部书里可以看出："他认为地理学要有自然科学为基础；他对当代的哲学有广泛的研究"；并且预言他"最后将会集中精力去研究生物地理学"。后来生存空间的概念就是从生物地理学中孕育出来的。拉策尔的最后的不朽著作是政治地理学。书名是《政治地理学，或国家、贸易和战争地理学》(PolitischeGeographieoderdieGeographiederSta-aten,desVerkehrs,unddesKrieges）（1903）。他还写了许多别的文章，其中有不少被收在《短篇论文集》（KleineSchriften）里（2卷，1906）。一本关于德国的小册子——《德国：乡土地理导论》(Deu-tschland：Einf■hrungindieHeimatkunde)——是地理文献中的杰作，曾长期被用作学校的标准教科书。它从1898年初版以后，又再版过许多次；其中第6（1932）及第7（1943）版分别由埃里希·冯·德里加尔斯基和汉斯·博贝克两人作了增删。

拉策尔远远不是一个宣扬纯粹侵略性的泛德意志主义的人，虽然他的许多粗率的言论，会使人们认为他是这样的。万克琳在她新近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是这样写的：

"他的有关当代政治的大量著述，有时显示那种好斗的风格和玄想的倾向，这使它们后来很容易被曲解滥用。它们也表明他有丰富的实际知识和一种粗率的独到的见解。他和二十世纪那些神秘的地缘政治学家是不一样的。"

拉策尔在其寓居莱比锡的十八年中，对地理学的发展有过巨大的影响。他和哈勒的基尔希霍夫一起领导着"德国地理学研究中央委员会"。该会是研究论丛《德国地理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先驱者。这个论丛今天还在继续出版，而且是一份出色的地理研究刊物。他还创办和主编《地理手册丛书》（LibraryofGeogra-phicalManuals）。它包括下列一些第一流著作：尤利乌斯·哈恩的气候学、奥托·克吕梅尔（OttoKrümmel）的海洋学、卡尔·萨佩尔（KarlSapper）的火山学及H.海姆（Heim）的冰川。这些书名表明拉策尔地理知识面广泛，和他对深入研究本国以及把各种自然、人文地理组织起来这两方面工作给予鼓励的程度。

上面是对拉策尔著作的一般性评论。现在让我们来更具体地评价它们的内容和目的。

两卷的《人类地理学》，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1）地球表面居民的分布和集团（这方面需要有居民集团和聚落的各种地图，尤其是种族、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地图）；（2）作为人类迁移结果的这些分布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3）自然环境对个人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气候对民族特性的影响（这些方面被认为是处于地理学边缘的问题）。

第一卷（1882）讨论人类分布的原因，即地理学的动态方面；十年以后出版的第二卷讨论分布的事实，即地理学的静态方面。第一卷是地理学在历史学上的应用，第二卷是人的地理分布。

拉策尔确定人世及其内部的无人居住区的界限，并试图对它们的边界作出解释。在人世的边缘居住着边缘民族，他们处于文明前哨的位置：爱斯基摩人、霍屯督人、布什曼人、澳大利亚人和塔斯马尼亚人。他对南、北半球这些民族的各自位置进行了对比。他联系自然的道路和障碍，来讨论在人世以内的人类迁移；他也对支配人类分布和发展的那些地理事实进行研究。气候被用来解释温带内主要文明中心位置的原因。山脉虽然很少是绝对的障碍，却起到避难所及边境的作用。水体是原始民族迁移的最大障碍之一；但在航行艺术被人类掌握以后，它们就成为交通的大道。大西洋对欧洲、美洲来说，就象古代地中海对亚洲、欧洲那样，曾经长期地是一个障碍。接着他分析了海岸线的人文地理。河流和沼泽可以防止扩张；后者还可用作避难所。森林起到类似的作用；林间空地可供落后民族藏身之用。

拉策尔特别注意迁移、迁移的种类和原因。他相信每一次迁移都有一个开始的区域、一个原因、一条迁移路线和一个目的地。他说有三组“地理因素”在支配着人类及其发展，即位置，它包括对其他民族的相对位置；空间，指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有跨越原有居住范围而到达其自然界限的趋势的那一片地区，它可以是中心区，也可以是边缘区；界限，它们是相邻民族扩张的结果。

路易·拉弗诺[①]于 1892 年总结拉策尔对地理学的贡献如下：

“拉策尔立足于有时是占优势或排他的自然地理学与如此容易忽视人类移动范围、生活空间的人文科学之间。他坚持要有全局的和（支配人类在地球上分布的）规律的广阔眼界。他的主要功绩是把人的因素重新纳入地理学。这样，他就为地理学指出了新的方向，并给它一次新的刺激。”

拉策尔于 1897 年第一次出版的《政治地理学》，是他《人类地理学》的分支。基本的观念是：国家是地球表面上的特殊的空间组合。拉策尔通过一种恰当的生物学类比，把国家看成是“附着在地球上的一种有机物”——我们今天肯定地比较喜欢称之为“组织”。拉策尔认为国家是地球表面上具有确定的组织和生命分布的人类集团。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是人类的一部分，地球的一部分”。从这一观念中产生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概念。

拉策尔相信，作为空间有机物的国家总是想要达到它的自然界限。如果没有强大的邻国给以有效的反对，它就要越过这些界限。根据拉策尔的看法，“地理的扩张，更加如此的是政治的扩张，是运动中的物体的所有特性：交

[①] 路易·拉弗诺：《地理学的人文要素：拉策尔先生的人类地理学》，《地理年刊》，1（1891—2），第 331—47 页。

替地前进扩张和倒退收缩。这种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国家而征服空间，不管这种征服是由流动的牧人还是由定居的农民干的”[1]。人类集团和社会总是在一个自然框架的界限以内发展；总是从一个小的核心向这些界限扩张，而且可能越过它们；总是要在地球上占有一个确定的位置；总是需要维持生活。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和一个确定的区域结合起来。随着人口的增加，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向外扩张，直到碰上自然的或人的障碍为止。这些是支配国家的特性和进展的三个基本地理要素。

全书分作九部分，分别讨论下列各个论题：土地和国家的相互依存，国家的迁移和成长，国家的空间增大，国家分类上的地理位置概念，区域（空间）概念，界限，国家空间发展中的海陆间的过渡，水在国家空间发展中的作用，山地和平原在国家空间发展中的作用。

关于位置，拉策尔提到自然的位置和政治-地理的位置。空间，包含着与实际居住面积相对立的总面积的观念，以及人口密度在国家发展上的意义。他研究了作为创造政治区域的动力的城市和作为国家动脉与内聚力的商业与道路的作用。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内聚的地理实体。拉策尔还发展了港口腹地的观念，他认为它有五种不同的区域结合：自然腹地、政治腹地、市场腹地、产品腹地与运输腹地[1]。

拉策尔是第一个系统地说明文化景观概念的人。他较多地称之为历史景观，因为它是人类占有的历史面貌的写本。他力主对田地、农庄、村落、市镇及道路进行分类，以便了解其分布、现有的相互联系和历史的起源（如他在第一流的小册子《德国》一书中所显示的）。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人种学家，他也从事种族、语言和宗教等方面的地理研究。他认为种族集团是互相联系的现象的地理集结，并试图找出各种分布形式的特征。在对它们进行解释时，他偏重于解释其由于历史上的迁移而导致观念和现象的扩散和分裂，而不是把它们仅仅作为地球各部分类似现象的就地发展来解释。他系统地阐明文化地理区域的概念，说它是能反映一个独特集团的、各种文化特征的复合体。文化传播或文化扩散的观念是由拉策尔阐明的。他力主人种学家采用绘制分布图的地理学办法。这部著作直到今天还得到文化人类学家的支持和尊重。拉策尔认为（这是对的）土地和气候、面积和位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人。可是，这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天真的“地理决定论者”，虽然他的许多言论可能使人相信他是这样的人。他研究地理学的方法完全证明对他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前一代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生存空间，是由拉策尔最先提出来的[2]。他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活的有机物在其范围内发展的地理区域”。他说到一般的生存空间，和作为生物学上居住地的那个人类集团的自然的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后来被卡尔·豪斯霍费(KarlHaushofer)加进了更广泛的含义。海因里希·施米特黑纳提过一种“现实的”和一种“潜在的”生存空间。他所说的是指“各

---

[1] F.拉策尔：《政治地理学》，柏林，1897。

[1] F.拉策尔：《大城市的地理位置》，见《大城市，德累斯顿的兼并》，9（1902—3），第 33 页。

[2] F.拉策尔：《生存空间：生物地理学研究》，载于《祝贺阿尔伯特·沙夫莱文集》，提宾根，1901，第 101—89 页。还有 W.J.卡恩曼：《空间的概念与区域主义的理论》，《美国社会学杂志》，9（1944），第 455—562 页。

个民族在其范围明确的居住区域以外的经济和文化活动”[1]。

我要在这里毫不含糊地说：生存空间这个名词虽然被纳粹歪曲了，它却是近代地理学所有概念中最独特最富于成果的一个。它的创造者并没有打算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或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指导；虽然他也强调过，国家总是倾向于按照其利益和能力的大小而扩张或收缩其政治领域。作为生物学家，拉策尔认为人类地理学的单元是一种地域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的空间联系，对一个独特的人类集团——不管是村、镇或国家——的机能和组织是必需的。生存空间概念所涉及的是作为一种空间（地理）组织的人类社会与其物质背景之间的关系。村社面积、贸易范围、牛奶棚、工棚、历史的省区、商品、相邻工业区之间穿过国界的贸易网，所有这些，都是“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带来的变化因素。拉策尔是在他的晚年把生存空间作为生物地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提出来的。虽然这个概念，被纳粹及其地缘政治学头子们以瑞典政治科学家 R.切伦（Kjellen）的著作为跳板而妄用了，它却为地理学家所接受，并在科学的意义上得到发展。从它受到各种各样解释的情况来看，它是有关人类社会生活和需要方面的一个富有成果的概念。

因为英美地理学家出于对拉策尔著作的无知，对他已怀有五十年的偏见，我们现在摘引一位博学的杰出的美国人类学家 R.H.洛威[1]对他的公平的评价。

“和一些人的说法相反，拉策尔没有夸大过自然环境的力量。实际上他曾反复地告诫人们要提防这个陷阱。他更不象一些地理学家把气候看成是阴暗的支配者。他之所以能不致如此天真，是因为他认识到时间的因素……还有另外两个条件排除人们对环境作出机械的反应：人类意志的不可估量的效力和人的无限的创造能力……没有人曾比拉策尔更多地强调历史的力量。”

这篇评价的文章现在可以概述如下。拉策尔的地理学概念包含着两个方法：第一，测定环境与人的协调的关系；第二，测定地表同一区域内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前一方法研究的中心是关系。后一方法研究的中心，和一些人们常常作出的解释相反，不是在地球上分布的本身，而是各种分布的共存、对比和相互关系。因此，它们要用能说明地理学家所谓具有区域性的这类地区相互关系的那些自然和文化要素来进行解释。拉策尔还注意一个第三方面，即可以看见的人为的景观或文化景观。对景观的玩味，是他大部分科学著作和风雅文章的中心内容。

拉策尔著作中的各种地理学观点，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但它们又大都提出不同的问题。因此，在他同代人的思想中，反映出他的各种概念体系是不足惊异的。在威廉·莫里斯·戴维斯和胡格·米尔（HughR.Mill）这些人的《地理学纲要》中，自然对人的影响仍然是经常、反复提到的论题。他们（和洪堡一样）扩大地文学的观念，把人的地理学也包括进去（虽然后者只限于和自然环境有协调关系，并且是由自然环境衍生出来的那些部分）。这个论题也是其他许多地理学家——尤其是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概念的核心。

人类文化的景观

---

[1] 参看，例如：《欧洲民族的生存空间问题》，卷 1，《欧洲》，K.T.迪策尔、O.施米德与 H.施米特黑纳编，莱比锡，1941；还可参看 H.施米特黑纳：《文化斗争中的生存空间》，莱比锡，1938。

[1] R.H.洛威：《人种学理论史》，纽约，1937，第 120 页。

既然评价环境对人的影响，当然也要相应地评价作为征服和改变者的人对自然的影响。实际上，人在景观中留下烙印的性质和过程，已经更加强烈地集中为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了。远的不说了，我们再来读读比丰伯爵的《自然的时代》（Epoquesdelanature）。他在那本书里评论过人造成的景观。“人毁坏森林，排干沼泽和湖泊，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将给予地球表面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无人居住或新近才有人居住地区的新的面貌”。比丰也提过一些清除森林带来气候变化的例子，他还指出人类怎样用驯养的动物和驯化的植物来改造地球。虽然比丰有时责备人破坏自然，但总的来说，他是乐观的。他的自然的时代观念，把地球历史分成七个时代，在最后的这个时代内，“人的力量帮助自然工作”。

对阿尔卑斯山的洪水和阿尔卑斯山区湖泊水位变化的研究，引起了更多的保护环境的兴趣。N.T.德·索絮（Saussure）认为上述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在河流源头地区砍伐树木。洪堡也作过类似的观察。它们连同十九世纪早期其他许多人的观察使人们相信：毁坏森林与扩大耕地，造成了气候的改变。文明导致干旱，这就是那时的理论。这类观念出现的时间早于彼得·克鲁泡特金（PetrKropotkin）、拉费尔·庞佩利（RaphaelPumpelly）、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Huntington）后来发表的著作。出色的著作是维克托·黑恩（VictorHehn）的论《植物与动物的游历》（TheWanderingsofPlantsandAnimals）（1885）。他在该书内说，“一个区域的整个生活、工作和景观的面貌，可以经过几个世纪而为人的双手所改变”。黑恩举出人类在地中海沿岸各国扩大自西南亚引进的动植物分布区，从而引起景观变化的例子，但他又坚决认为“山羊啃食、森林被伐以及土壤被侵蚀所造成的变化都不一定是不可恢复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莱伊尔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他把人看作改造地球表面的“有机自然力量之一”，人的作用是改不均衡为均衡。

乔治·珀金斯·马什（GeorgePerkinsMarsh）把这种看法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个美国人根据他自己的观察（主要是在欧洲）和读到的文献（他曾在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做外交工作），于 1864 年写成一本有关这个问题的长书《人和自然：或被人类行动改变了的自然地理学》（ManandNature：or，PhysicalGeographyasModifiedbyHumanAction）。他说该书目的是“指出人类行动所造成的变化的性质及其大致的程度……举动轻率的危险，和在采取大规模改变有机或无机世界的天然安排时行动谨慎的必要性。”

格拉肯说，十九世纪学者的技术观念，与“十七世纪自然是神圣设计的平衡与和谐的观念”在这本书里会合了。持这些观念的人都想要“恢复被破坏的和谐”。马什研究了人对动植物、林地、水域和沙荒，从而也是对地球所施加的影响，但砍伐森林的后果是他主要的探讨内容。他的人的调整是一种改良这一观念，包括着下列的内容：国际的移民、自然的平衡、栽培植物与驯养动物引起的巨大变化的扩散（如山羊、骆驼对景观的改变）、战争与社会风尚对土地的影响、由砍伐森林引起的气候变化、排水、开垦、灌溉、沙丘的固定和地下水的保存。

马什有很高的声誉，他的一些有关开垦移民的意见也获得采纳。但他的警告，在维多利亚时代被赫伯特·斯彭塞（HerbertSpencer）这类人的乐观语调掩盖了。他们说，“在新土地上的殖民活动是文明的进军，平衡将会在

那里建立起来，世界将被开垦、改建为象一个乐园”。马什的维护景观的呼吁，直到二十世纪才真正得到实际的响应。但是格拉肯认为，“他对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他研究了欧洲森林工作者、气象学家、农学家、排水工程师与水文学家、植物学家与植物地理学家、科学旅行家的技术著作，并且第一次把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放到应该放的地方——人类历史的最前面”。

别的研究者也观察、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强调这类现象。埃利兹·邵可侣就是其中之一，他从事实上和哲学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德国地理学家埃尔恩斯特·弗里德里希也研究欧洲人向外殖民时所施行的各种开发土地的方式。在 1904 年的《彼得曼通报》上他创造了掠夺经济这个名词。这种经济要经过三个阶段：对土地进行长期的、强烈的开发，使土地贫瘠化，意识到有保持土地肥沃的必要。弗里德里希说，这一套经验导致了土壤肥料在欧洲的使用，而且人们也“看到新土地上正在进行着在老欧洲可以观察其全部结果的那些过程”。毁灭动植物和破坏土壤是进步的方法。这种掠夺经济是殖民行动的一个阶段，而且将会在欧洲人的领导下采取合理的措施。这些有意思的观念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内曾被广泛地应用，而且在估价人地关系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我们应该在这里谈谈亚历山大·沃埃科夫（AlexanderWoei-kof）在 1901 年写的一篇文章。他对城市的增长感到吃惊。“这种在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条件下在城市内的聚集，这种人和土地的分离，是一种病态的证据”。他针对森林、草地的毁坏，使得土壤遭受风雨侵蚀而解体的情况，力劝人们要小心地控制地表植被，以便恢复和保持自然的和谐，并使土壤留在原地不动。他指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毁灭文明的道路上向前猛冲。他以为，如果人们采取维护的措施，就会出现一片广阔的进步的前景，其中包括热带土地的巨大潜力。据他的想法，热带地区能够供养一百亿人口。

在一个还没有积极地觉察到土壤保持的必要性和它可能带来的利益的世界里，土壤侵蚀问题专家们近来的语调同样也是悲观的。在十九世纪内，人在改变地球面貌上的作用几乎没有得到注意。通过达尔文进化论所起的作用，环境决定论取得了优势，虽然它与在一个技术进步和无情地开发地球上新垦土地的时代里正在发生的情况，是直接矛盾的。人是地理变化作用者的观念，和需要保持或重建自然的平衡，与维持或提高生产力的观念，这些都是重要的维护自然的观念，都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开始为学者和行家们所接受。

作为地球表面变化作用者的人，已成为二十世纪地理学家调查研究的中心论题。自然资源的保持已成为人们日益关切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垦的土地上；虽然在理论家和实行家之间还存在一条宽广的鸿沟。

参考书目

除文中列举的拉策尔著作外，还请注意两份新近发表的研究：J.斯泰因梅茨莱的《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及其思想历史根源》，《波恩地理学会会报》（J.Steinmetzler，DieAnthropo-geographieFriedrichRatzel’sundihreIdeengeschichtlichenWü-rzeln，BonnerGeog.Abhandlungen），19 期，1956；哈莉特·万克琳：《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传记与著作目录》，剑桥，1961。

黑尔曼·奥费贝克有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952及1957年，转载于他的《文化景观研究与地理学》，《海得堡地理文献》（Her-mannOverbeck，KulturlandschaftsforschungundLandeskunde，HeidelbergerGeog.Arbeiten），14期（1965），第60—130页。

奇怪的是，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一书，几乎没有提到拉策尔的著作。

第六章　第一代大师：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33—1905）

弗雷黑尔·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33年5月5日出生在西里西亚省卡尔斯鲁厄的一个贵族家庭内。他受到地质学的强烈吸引，开始时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研究，后来在奥地利政府资助下又去喀尔巴阡山。他在南提罗尔研究花岗岩与白云岩，认为后者是珊瑚形成物。这是一个新观念，后来阿尔布雷希特·彭克就运用这个观点去研究阿尔卑斯山地质。

1860年他随普鲁士一个探险队去东亚，然后去加利福尼亚，并在那里住了六年。他一直对火山岩和金矿两者关系的性质感到有兴趣。他曾在匈牙利研究过金矿。但是他也有实用方面的兴趣。他当了新闻记者，通过他为报纸写的通讯，向德国公众报导加利福尼亚的黄金财富。他警告德国人不要投资去开采金矿，但又劝他们投资去办冶炼工厂。他从旧金山报导著名的康姆斯托克脉金矿的情况。1868年他获得施展他伟大抱负的机会——到中国去作研究工作，那时还没有人了解中国的地质情况。为了进行这项研究，他最初获得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后来上海西商会向他提供在中国全国旅行四年的经费，以便他能用英文（他已完全掌握这种语文）报告中国的经济，特别是煤矿资源的情况。他是第一个要人们注意这项巨大资源的人。他在科学领域内的活动是研究地质构造和地形。由于承担着职业上的义务，他向上海西商会提供了详细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表明他在搜集中国经济地理资料时的确花了极大的功夫；报告的本身可以说是同类著作的典范[①]。

他想写一本比较大部头的关于中国的书，在书内介绍他科学调查的成果。他的国家提供了这个机会。1872年，他在离开十二年后回到德国。那时新帝国刚刚成立，政府在资助研究方面是不吝惜的。李希霍芬获得了政府给他的补助而着手有关中国的著述。这项工作差不多断续地占用他以后一生的时间。该书在他逝世时没有完全写成，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德国的新的学术活动过于繁重[②]。我现在来谈谈这部杰作的内容。

李希霍芬在第一卷内谈中亚山脉的构造，及其对居民移动的影响。他详细讨论了他的有关中国的知识的逐渐增长。他认为华北的“黄土”沉积物是风从草原吹来的尘埃。他说这项研究的整个过程就是一次地理学试验。他这部著作为近代地理学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第二卷研究华北，主要的根据是他自己的观察。地质和地形是主要内容，因为他认为，对内部和外部构造的研究，是任何、也是每一地区知识的基础。但他也考虑居民及其活动；书内也包括他写给上海西商会信内的经济资料。

第三卷本拟按类似方法研究华南，但他在完稿前逝世了。本书后来由埃尔恩斯特·蒂森（ErnstTiessen）根据李希霍芬的资料撰写完成。本书还附有一大册中国地图集，但李希霍芬没有编绘齐全，华南地图是他逝世后由马克斯·克罗尔（MaxCroll）绘成的。这部著作由普鲁士教育部出资印行。

柏林城对一位游踪如此广远、学识如此渊博、判断如此敏锐的人提出了许多要求。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地理学会的领导人。他把这个学会提高到第一流的地位。1875年普鲁士政府想请他去柏林大学工作，又立即准许他暂不到

---

① 《李希霍芬书信集》，上海，1870—2年。

②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中国：个人旅行的成果和在这个基础上的研究》，柏林，1877—1912，5卷和地图集。

任而继续写他的书。1877 年他受聘去波恩大学任地理学教授，所以他的全部精力这时都用于讲学，有关中国的著述就暂时停顿了。时隔不久，他就在 1883 年被聘去莱比锡，致力于发展一门体系明确的地理学。这对德国的地理学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莱比锡有悠久的地理学传统。1871 年奥斯卡·佩歇尔被任为该校地理学首席教授。这位伟大的学者那时已经临近他著述生涯的尽头了。佩歇尔于 1875 年逝世，这个大学面临着选择他的继任人问题。这个职位悬空了将近十年，直到 1883 年才由李希霍芬来填补。1885 年，李希霍芬谢绝维也纳的邀请，但阿尔布雷希特·彭克接受了。1886 年李希霍芬去柏林主持新设的自然地理讲座。他在离开莱比锡时，建议彭克来接替他。可是彭克谢绝了，因为他那时宁愿留在维也纳。最后，一位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有贡献的专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同意去接替李希霍芬，并在莱比锡住到 1904 年。有趣的是，二十年后，彭克决定接受邀请去柏林接替李希霍芬。

1886 年，李希霍芬被普鲁士政府再次召回柏林大学，主持一个新设的地理学讲座。这个讲座的目的是研究和历史地理学齐头并进的真正的地理学。那时该大学已有第二教授 H.基佩特在讲授历史地理学了。

当时李希霍芬的学术地位在柏林还没有获得普遍的承认。许多人仍然把他看成主要是地质学家，但那些只考虑自己领域的地质学家又认为他研究的范围太广。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才在柏林科学院里取得他应有的地位。但他的品格和能力逐渐赢得别人的尊重。他在讲课中提出一些在大学里从来没有人接触过的问题。他的关于殖民和运输地理的讲稿在其身后出版（由奥托·施吕特尔审订）。他的学术讨论会吸引来许多成熟的学者，其中有些人成了旅行家——象瑞典的斯文·海定（SvenHedin），有些人则成为教师。

当 1872 年李希霍芬第一次来到柏林的时候，德国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的伟大时期刚要开始。在 1886 年他回到首都的时候，德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已经有了殖民地，因此又开始了另一个等待探查的领域。李希霍芬对中国是忠诚的[①]。他梦寐以求的目的是要德国在远东得到一个立脚点。很久以前，他就在他研究中国的那部书里，要人们注意华北门户胶州湾的战略重要性。后来德国终于在那里取得一个立脚点，主要是由于他的缘故。他经常鼓吹中、德两国应有更密切的联系，因为他非常赞赏中国的文明。可是他未能筹得经费去中国作进一步的探查工作，因为非洲那时是德国人选中的地域。十九世纪末，德国越来越重视海洋和扩充海军，因此逐渐出现了在柏林建立海洋博物馆的想法。李希霍芬被说服承担这个任务。他不想要一个为海军作宣传的机构；他想建立一个启发广大群众的科学机构和博物馆。他把晚年的时间用在这个计划上；作为大学校长，他发表有关这个问题的特别讲话，但他未能在生前看到这项任务的完成，因为他在这个海洋学博物馆即将开放的时候逝世了。

李希霍芬具有研究精神，他看问题很敏锐。他的《研究旅行指南》（1886）[②]主张人们作更深入的研究，要人们注意许多公开提出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当然就象他那部论中国的书里所表明的那样，地质构造与地形的关系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这本科学探险指南实际上是地球表面的形态学。

[①] 原文为“true”。他对侵略中国献策称为“忠诚”，不伦不类。——译者。

[②] 《研究旅行指南》，柏林，1886。

它第一部分谈的是野外观察的技术，特别适用于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它包括对路线、地图、文献等的预先选择，其次是测量、制图和气象记录的收集。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它是对地表形成过程的第一次系统的阐述。它包括：对机械风化过程的观察，地下水与泉、流水的机械作用、陆上水体、海上航行时观察到的海岸和岛屿。流水的作用包括河流的消融、运搬、磨蚀和沉积作用，影响河床及河谷形态正常发育的岩性、结构、构造与气候的变化。地形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按过程分类。

第三部分讨论对土壤、岩石和山地构造的观察。它分成下列各章：土壤的观察（土壤形成的因素、土壤类型分布）、岩石的观察（结晶的、沉积的、喷出的）、火山的观察、山地的构造、地形的主要种类、有用矿物的观察。

地形在各种不同过程的标题下按类型分类（也常按区域分布）。因此，例如对一条河流的发育，利用剖面图而就水量、坡降以及由于其他因素（构造、岩性、地壳运动、植被、坡向与气候区域）引起的、离开这种正常的发育过程等方面进行描述。

一条河系的不同发育及与其相伴生的地形种类，则按松散地层、水平地层及磨蚀面的分布区来进行研究。另外，也联系到有关的过程（地壳运动、地表侵蚀、沉积），在适当的章节里对湖泊、海岸与岛屿进行分类[①]。

“如果我们……认为山脉与低地是两种基本的地表形态，那就可能有好几种方法，在这两大类的内部作进一步的划分，或……某些类型。特别是对山脉来说，这种方法已经作过尝试。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把具有明确长轴的山脉和不具有这种形态的山块区别开来了。较好的作法似乎是利用发生学的因素，根据在外部形态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营力，来对山脉作进一步分类。但是，和前述其他划分的情况一样，由于在每一条山系的发展过程中都有许多种力在起作用，我们就以形成外部形态的主要营力作为划分的基础……然后，次一级的划分就可以次要的力为基础。但是，和自然地理学大多数其他部门一样，我们不能用这种方法获得明确的分布情况；因为形态能互相穿插，而且有时两种不同的力可在一起起同等的作用。作为最后的手段，人们可用外部形态作划分亚类的基础”[①]。

社会的联系使李希霍芬能对学术界和外交界施加广泛的影响。他利用这些联系来促进科学探险。他的这一目的得到地理学会的支持。因此，他积极地发起和组织在德里加尔斯基领导下的南极探险。后者得到他的高度器重，后来成为德国的第一流地理学家。就在公布这个计划的时候，他突然逝世了。这是 1905 年的事，他终年 72 岁。

李希霍芬在地理学界的重要性可以非常公正地和李特尔及洪堡相提并论。他和后者一样地进行过长期的实地探查工作。但洪堡的方法是探索整个的宇宙，他晚年过的是一种悠闲幸福的隐居生活。李希霍芬则不是这样，他只研究地球的表面，晚年成为一位积极的教师。他的地理学和他的前辈李特尔的地理学非常不同。李特尔主要依靠别人的著作和观察，而李希霍芬则和洪堡一样，所有著作都是根据他多年旅行中自己所作的观察。李特尔在公开

[①] 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对河流作用的说明是根据 W.M.戴维斯研究成果发表以前的德国、法国和美国的著作。

[①] 《研究旅行指南》第 640—641 页。

讲学时，吸引来拥挤的听众；而李希霍芬则仅在更亲切的气氛中，影响他讨论会上的少数几个人。因此，他培养出许多能继续他事业的年轻学者，而李特尔则没有造就一个出色的、能继续他事业的人。李希霍芬认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他把地质学和地理学沟通起来。但这不是他唯一的长处。他写给上海西商会的信中，含有出色的经济地理学内容；他在 1895 年赫特纳的新杂志中发表的对《马关条约》的说明，是政治地理学的杰作[①]。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李希霍芬对地理学问题和方法的看法了。李希霍芬于 1883 年在莱比锡大学的就职演说题目是《当前地理学的任务和方法》（AufgabenundMethodenderHeutigenGeographie）。以下几段是它的内容概要。他说，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以及与其有成因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的科学[②]。它不是对地球进行全面研究的“地球科学”。他比较喜欢用地表科学（Erdo-berfl■chenkunde）这个名词。它的方法是对现象进行实地的测定和观察。地理学可以通过对最小的区域作最详细的调查来进行研究，也可以通过对较大区域的互相比较来进行研究。因此，根据主要目的究竟是区域还是事物和现象，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第一种是特殊地理学，它主要是描述的。第二种是普通地理学。一个是综合的，另一个是分析的。把这两种方法合并起来用，就得到第三种研究方法。这个方法研究特殊区域内经过选择的事物和现象类群，并试图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起因。这是生物分布学的研究方法。

他为描述的、综合或特殊的地理学所下的定义如下：

“地球上的每一个区域，不论它多大或多小，也不论它是大洲、小岛、有自然边界的内陆区域、人为划定边界的国家、一条山脉、一条河流的流域或一个海，都是作为较小区域单元的集合体，并根据其可见的外貌（其中包括人类的文化成就）来进行研究的。”

它有两种研究方法。第一，地球表面是由许多区域组成的，把这些区域并到一起就构成了整体。第二，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区域都是自然的六类要素（事物和现象）的集合体，对它们只能全面考虑地来进行描述。“这样规定的地方地理学的范围是全面的、折衷主义的和无穷尽的”。它是百科全书式的，是知识的汇报（Repor-tiumdesWissens）。

因此，描述地理学有两个标准，他分别称之为地方地理学和生物分布学。地方地理学没有越出各个地理区域所有外貌的系统集结的范围。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被迫在实践中遵从“折衷主义的程序”。在地方地理学的路线上，对一个小区域人文方面的描述将包括：人口分布、种族、语言、边界、聚落、产业、宗教、贸易中心、道路和产品。地方地理学可以研究的项目，其数量是无限的；如果再考虑人的话，还要扩大而包括历史的方面。因此，综合是关键，虽然在把整个区域分解为其构成部分时，首先需要的是分析方法。由于各种可借助的科学的发展，生物分布学的方法现在可以运用了。它不仅要记录下存在的区域事实，而且要通过介绍区域内每一单独部分各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和动态的相互关系，来解释这些现象的区域分布。斯特拉波是使用这一方法的先驱者。这也是李特尔与洪堡的处理方式。可是李希

[①] 《移民与贸易地理学》，柏林，1908，身后出版，奥托·施吕特尔审订。

[②]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Die Geographie gestaltet sich dadurch zu der Wissenschaft von der Erdoberfl■che und den mit ihr in urs■chlichen Zussa-mmenhang stehenden Dingen und Erscheinungen”。

霍芬指出，李特尔只是片断地处理洪堡所如此极力强调的那些自然现象在区域上的相互关系；因为他（李特尔）认为，评价物质形态（自然资源、水供应和植被）对人的影响是生物分布学方法的最高目的。自李特尔的时代以来，由于解释各类特殊现象空间分布的特殊学科的成长，这种生物分布学方法的使用已经很方便了。这就把人们引向普通地理学的领域。（对过程而不是对分布）研究的越深，在对一个特殊区域作生物分布学探讨的用处就越少。

李希霍芬接着转向抽象的或分析的方法。这就是所谓普通地理学。地方地理学的描述方式是说教的方式，它的进行程序是从事实和状况的区域分布到它们的相互关系和起因。综合法占有统治的地位，虽然在把整个区域分成各个部分时也探讨分析的过程。另一方面，普通地理学不是前进的；毋宁说它是倒退的，因为它从个别到一般，从条件到原因。

普通地理学在四重基础上研究固定在地球上的现象——形态、物质、变化的力和原因、运动。这四个观点导致形态的、物质的、动态的和发生学的四种研究方式。第四个方式决定了科学的形式，因为它回过头去研究以前的力量对以前的现象的影响，也就是它们从前一阶段开始的发展情况。因此，人们可以按照这四个原则把普通地理学分为四个不同的方面；或者说，人们可以用最后（发生学）的一个方法作为说明另外三个方法的基础。李希霍芬比较喜欢在前四个原则的标题下，研究自然的六个部门中每一个部门。

地理学的主要目的是确立区域内各现象的相互关系。洪堡采用这种方法。李特尔由于他的哲学倾向而使它受到挫折，以致普通地理学分裂为各个独立的阵营，如地质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李希霍芬说：

“只有那些和人种学有关的，如风俗、法律和人的衣着等仍然属于地理学。因为人是李特尔地理研究的目标和目的，对区域的自然的研究，只好让给其他特殊的科学，而地理学则仅是达到一个目的的一种手段。”

因此，历史学和地理学本来是被看作姊妹科学的。但不久，后者就降为前者的女仆；人种学仅在历史学中找到一个卑微的位置。

在这些条件下，分析地理学和地方地理学都已不可能得到发展。十九世纪早期自然地理学综合研究的许多成果（物质的、生物学的和人种学的）都丧失了。李希霍芬说，这可能是因为作为一门科学的地理学缺少明确的定义；而在这方面，李特尔要负主要责任。在李特尔的时代，他的地方地理学描述是鼓舞人的。它们的基础是夸大的、不能提出切实研究方法的哲学构想。李希霍芬试图复活地球表面统一体的概念，并使分析研究法与生物分布学研究之间有一个更密切的关系。十九世纪中期各门科学的发展及它们的研究方法，现在允许李特尔的观念得到应用，和去描述地理统一体的事实。在李希霍芬的时代，各个分支又再一次被纳入地理学领域之内；这在奥斯卡·佩歇尔和埃利兹·邵可侣这类人的著作中是显然可见的。地理学（李希霍芬说）现在把各种科学的问题联结成一个统一体，它的基础是地球表面，以及在它上面呈区域排列的事物和现象。

在讨论普通自然地理学的内容和方法以后，李希霍芬又转而考虑人的地理学。这门科学研究的是种族和部落、居民和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分布；分布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决不是仅仅从属于生物学规律的。在这个领域里也有四种研究方式，即外形或外貌、相互关系、因果关系或动力、发生学上的发展。第一个方式的基础是形态学的。第二个包括种族、宗教及语言、种族的类聚原则。“所有这些现象与整个地球表面及其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

是经常改变和发展的”。因此，就需要李希霍芬所谓的“动力人类地理学”去“理解土地的性质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土地性质改变的影响”。这是拉策尔已经作出贡献的领域（李希霍芬说），而且李希霍芬希望看到从这里出现一套因果关系的规律。

他继续说，发生学的方法是接近历史学的。它研究的是人对自然环境的关系。农业、灌溉、采矿、工业和殖民，构成地理学的静态要素，而贸易与商业则形成它的动态要素。所有这些都和人的物质文化有联系。另一方面，在它们局部的出现和发展中，以及在它们从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从它们的起源地向更广阔地区的传播中，也有人的精神文化的证据。

总之（仍然根据李希霍芬），地理学研究的是自然（地球表面的固定形态）的六个部门：土地，水圈和大气，动、植物界，人及其物质的与精神的文化。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被从四个观点进行研究：形态、物质内容、空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贯彻始终的指导原则是后三个部门彼此之间，以及它们和地球表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原则。

对李希霍芬著名演说的概述，就谈到这里。

李希霍芬也许是近代地理学发展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功臣。他培养出许多年轻人；其中有些后来成为出色的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如瑞典探险家斯文·海定就是一个。他和李希霍芬曾经长期通信。西格夫里德·帕萨格在这位大师指导下从事研究。奥托·施吕特尔也是如此，他还负责搜集、审订李希霍芬关于殖民和贸易地理的讲稿。阿尔夫雷德·菲利普松在莱比锡跟从李希霍芬学习，是他最老的学生之一，而阿尔夫雷德·吕尔（AlfredRühl）（参看第十一章）则是他在柏林的最后一个博士候选人。

遵从李希霍芬指导的地理学家，在本世纪第一季纪分成两个集团，他们都有有关地球表面的自然方面，尤其是地质学的坚实基础知识。第一个也是较早的集团，他们的研究或以区域为基础、或以全世界为基础的各种现象的分布。第二个也是较晚的集团，研究特别的区域，并在区域自然（地质的）环境的基础上说明各种现象的有秩序的排列。

第一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占支配地位，而且主要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他们关切的是寻求分布的一般规律。各个不同的种类——地、空气、水、植物和人，在它（他）们和物质地球的关系上受到分别的考虑。著名的著作家是A.彭克和F.拉策尔。属于这个集团的还有另一些同代人——A.基尔希霍夫、A.苏潘、T.菲舍和A.菲利普松。在彭克于1887年出版的关于《德意志帝国》（DeutscheRejch）那本书中，这个方法表现得最清楚。这一时期的另外两部著作是苏潘于1889年出版的奥匈帝国，和特奥巴尔德·菲舍于1893年出版的南欧。

第二个也是比较年轻的集团，试图在自然单元范围内确立空间排列现象的相互关系。这是李希霍芬在他自己那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使用的方法。这个集团特出的著作家是约瑟夫·帕奇和阿尔夫雷德·赫特纳。1913年出版的诺尔伯特·克雷布斯的主要著作《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地理学》（L■nderkundederOsterreichi-schenAlpen），遵循着同一个程序，也是同类著作中的典范。象他们这样的特出学者还有弗·马哈舍克、罗·格拉德曼、埃里希·冯·德里加尔斯基、M.弗里德里希森（M.Friedrichsen）、奥托·毛尔与G.布劳恩（Braun）。在这个集团的著作中，对特殊区域内地理分布的特殊问题的探讨是显而易见的；所有他们这些人都遵循李希霍芬的传统，都

有坚实的地质学和地形学基础。

李希霍芬的地理学体系是空间分布的集合体。这个体系可以就全世界一般分布的特性和原则、也可就存在于一个特殊区域内的各类现象来进行研究。在后一情况下，主要基础和决定因素是“地质地形的基础”，而其他的空间分布现象则被描绘为混合的三明治或一座有楼的建筑物，或如胡格·米尔所想象的一座以自然为基础、以经济碎石堆为顶的金字塔。要对任何一个特殊区域作出研究成绩，都需要有特殊的野外考察和查阅文献的技能，以便去搜集、对比、绘图和解释有关的资料。有些人（象格拉德曼）能够用精通某些特殊领域来克服这个问题，但这些专门技术的困难被李希霍芬加大了，因为他主张他的学生（象菲利普松）到无人知道、无人绘过图的区域去工作。让我们强调一下，世界上仍然有广大地区迫切需要这样分门别类、系统描述的踏勘式研究。但是，不管人们对这些层列的内容能如何彻底地掌握和透辟地说明，如果把它们凑到一起，仍然提供不出什么新的或独特的东西；因为这里缺少一种带着自己的问题到这个三明治或金字塔的各层去选用合适资料的专题性研究。在以后二十世纪内发表的著作中，将会看到对这一批评的反响。

参考书目

本章内容主要根据下列著作：

A.赫特纳：《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和地理学的关系》，《地理杂志》（FerdinandvonRichthofen’sBedeutungfürdieGeogra-phie，GeogrgphischeZeitschift），卷12，（1906），第1—11页。

E.冯·德里加尔斯基：《冯·李希霍芬与德国地理学》，《柏林地理学会杂志》（VonRichthofenunddiedeutscheGeographie，Zeit.Ges.f.ErdkundeBerlin），1933，第88—97页。

G.韦格纳与H.冯·维斯曼（G.WegenerandH.vonWis-smann）：《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大德意志》（FerdinandvonRichthofen，inDieGrossenDeutschen），柏林，1935—6，卷5，第390—8页。

F.冯·李希霍芬：《当前地理学的任务和方法，大学就职演说》，莱比锡，1883。

第七章　第一代其他地理学家

约瑟夫·帕奇

按照近年德国人的评价，在德国近代地理学的成长过程中，约瑟夫·帕奇（1851—1925）的地位是和赫特纳、彭克两人并列的[1]。他的职业活动时期几乎和他们完全相同，因为都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他肯定是第一代的一位大师；他的活动和影响，在二十世纪第一季纪内一直没有间断。

帕奇和彭克、赫特纳不同：他们两人和李希霍芬一样，都是从自然科学入手来开始其学术活动，而帕奇则是在坚实的语言学和古典历史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通过他和布累斯劳的卡尔·诺伊曼以及柏林大学地理学教授 H.基佩特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就和他们两人的老师李特尔的研究方法有了直接的联系。可是帕奇却通过他对故乡、野外工作、文献、地图、最后还有出版的兴趣，不断地扩大他研究地理学的方法。他是一位热心的旅行者，自然和景观的敏锐观察者，热情的运动员和登山者。他逐渐成为一位对区域地理、主要是西里西亚和中欧区域地理的进展有巨大贡献的地理学家。他在五十多年内出版了三十六种书和文章，一百六十多份其他著作，几百篇书评。

他在 1851 年生于西里西亚的里森山（Riesengebirge），全家七口人，父亲是相当有名的一个玻璃工厂经理。1860 年他去布累斯劳，住在他父亲的朋友家内，同时到大学预科学校读书；1869 年他进入布累斯劳大学研究古典语言学。在那里所有的老师中，他对卡尔·诺伊曼的印象最深刻。诺伊曼是卡尔·李特尔的学生和崇拜者，在柏林学习几年后，于 1860 年成为布累斯劳大学的“古代史和地理学”教授，在该校任教一直到 1880 年逝世为止。他于 1863 年开始讲授地理学，从而继续了在李特尔逝世后趋于衰微的一门科学的发展。帕奇于 1869 年秋选读诺伊曼讲授的“普通水文学”，此后就在老师的系统指导下转而研究地理学。1871 年他以《古代非洲的地方地理学、小地区地理学和行政史》（Chorography，Topography，andAdministrativeHistoryofAncientAfrica）赢得诺伊曼设置的论文奖金。这篇论文反映出诺伊曼和基佩特琢磨出来的地理学研究法。他又对论文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充实，从而在 1874 年获得博士学位。1875 年帕奇对阿格里帕（Agrippa）著作中欧洲概念的研究，使他取得在大学讲授“地理学和古代史”的资格。不久，他又通过国家考试而取得讲授拉丁文、希腊文、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五门课的资格。1876 年 11 月，他被任命为该大学的副教授。现在他可以自立生活了，而在前几年，他只靠家庭补助或去当家庭教师，赚一点钱来过日子。早先几年，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古典历史和语言学方面。但

---

[1] H.奥费贝克：《约瑟夫·帕奇对地理学研究的贡献》，《德国地理学报告》，（1953 年 1 月）第 34—56 页。还有 A.彭克在《柏林地理学会杂志》上发表的评价文章，1928，第 81—98。最充份的论述是 H.瓦尔德鲍厄尔，布累斯劳，1927。此书包括一篇传记（第 7—34 页）和他在 1899 年任布累斯劳大学校长时所作关于十九世纪德国地理学发展的一篇演讲。关于西里西亚的著作名称是《西里西亚：在科学基础上的德意志民族地理学》，2 卷，Ⅰ，《全区总论》，1896；Ⅱ，《景观与殖民》，第一分册，《上西里西亚》；第二分册，《中西里西亚》，1907；第三分册，《下西里西亚》，1911

不久他就对自然科学，尤其是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感兴趣；他提请参加大学教师检定考试的著作就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在 1875 年 10 月作的就职演说，讨论了西里西亚对普鲁士和德国的重要意义。这篇演说标志着他开始研究地理学了。可是他对语言学的兴趣依然到老不衰。这可以从他为基佩特的《古地理学教科书》（LehrbuchderAltenGeographie）作书评，和在莫姆森（Mommsen）支持下将一位东罗马诗人的作品付印这两件事上看得出来。他也曾在 1891 年研究过十七世纪菲利普·克卢费尔对历史区域地理学的贡献。研究成果发表在彭克主编的一套丛书内。

帕奇是一位热情献身于野外观察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常到里森山里去。他在那里越来越对冰川和冰川地形发生兴趣，并且把他观察的范围扩大到高塔特拉山和阿尔卑斯山。七十年代晚期，他曾到阿尔卑斯山考查过几次。他在 1878 年特别留心地观察里森山的冰川,还观察那些说明过去冰川活动范围较现代更广的冰碛物和砾石。他又到高塔特拉山去进行这样的观察，并于 1882 年出版一本书，书名是《喀尔巴阡山与德国中部山地的古代冰川》（DieGletscherderVorzeitindenCarpathenundindenMittelgebirgenDeutschlands）。这书几乎是和彭克的《德国阿尔卑斯山的冰川作用》（DieVergletscherungderDeutschenAlpen）一书同时出版的。

1880 年，帕奇决定放弃古典历史学而集中精力去研究地理学。诺伊曼在那年逝世了，于是帕奇着手审订和增补他没有写完的《希腊自然地理》（PhysicalgeographyofGreece）。该书是按李特尔的观念写的，于 1885 年出版。帕奇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希腊。可是在随后几年内，他在柏林科学院的赞助和柏林大学 H.基佩特的支持下，既访问了希腊本土，也访问了爱琴海的岛屿。根据这些访问，他写成几篇专论文章，主要是关于科孚岛与柳卡斯岛的。它们分别发表在《彼得曼通报》的各卷中。

帕奇总是对西里西亚的土地和居民以及区域地理的研究法深感兴趣。1887 年他成为“德国科学区域地理学”中央委员会（几年前由拉策尔创立）的一个成员，专门负责西里西亚与波森，1905 年又加上了萨克森王国。1889 年他专心致志于出版有关西里西亚的文献目录。这份目录在 1892—1900 年间分成七部份付印，名称是《西里西亚省地理学与民族学》（LandesundVolkskundederProvinzSchlesiens）。1889 年他出版一本学校教科书《西里西亚小地理学》（EineKleineLandeskundederProvinzSchlesien）；这是他后来一部大书的谦逊的先驱者。该书共出了八版，最后一版的时间是 1918 年。关于里森山的冰川作用（1894）与西里西亚及其邻接地区的雨量（1895）两篇专论文章，列在《德国地理学与民族学研究》丛刊内出版。我们已经指出，而且必须强调的是，他为研究第一个问题花去了十年以上的时间。研究第二个问题的基础，是根据 527 个测站记录绘成的地图。

在九十年代晚期，H.J.麦金德建议帕奇写一部中欧区域地理，作为他（麦金德）设想的一套十二部《世界的区域》（RegionsoftheWorld）丛书的一部。帕奇在迟疑一段时间以后，同意了麦金德划定的中欧范围，因为它似乎就是那个长期受德国文化支配的地区，而且还有阿尔卑斯山、中部山地和北部低地三者结合的这一突出特点。帕奇在 1897—1899 年间写成了这部书，但到 1903 年才几乎和他的西里西亚第一卷同时出版。英译本已被删节，以便和丛书其他各部分互相配称。1904 年帕奇重写以后，将原稿全文在德国出版，书名是《中欧：自西阿尔卑斯山及巴尔干至运河及库里舍湾的国家和民族》

（Mitteleuropa：DieL■nderundV■lkervondenWestalpenunddemBalkanbisaudenKanalunddasKurischeHaff）。

帕奇所写的中欧和西里西亚的第一卷，为他带来德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声誉。他被请去莱比锡接替拉策尔；虽然他以前曾拒绝去柯尼斯堡（1885）、维也纳（1902）和哈勒（1904）的邀请，这一次他却接受了，并因此而痛苦地断绝了他和布累斯劳城长达四十四年的联系。他接受了诺伊曼在三十年前所拒绝的邀请（1875 年诺伊曼曾被聘去那里接替奥斯卡·佩歇尔）。

帕奇于 1905 年到莱比锡以后，立即撰写完成他的西里西亚；第二卷《中西里西亚》与第三卷《下西里西亚》分别于 1907 年及 1911 年出版。帕奇对古典时期所怀有的从未中断过的兴趣，在他论埃及在地理学上的重要性那篇就职演说，和他在 1909 年出版的、对亚里士多德讨论尼罗河河源一书的研究报告里，仍然清晰可见。

帕奇在他在莱比锡的那个时期，曾两次出国作广泛的旅行。他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地质学大会，并且游历了北欧。他于 1912 年被美国地理学会邀请去美国，参加了横断大陆的旅行。

他于 1914 年被请去柏林接替基佩特的讲座，但他拒绝了；可是他还是当了许多年柏林地理学会的主席，一直到 1921 年为止。他受到萨克森政府的高度尊重，并在 1909 年在伦敦、1913 年在巴黎举行的讨论国际地图的会议上充当它的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帕奇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有关战争的问题上面去。他在莱比锡的一个大厅内对五千名听众发表关于德国东部边界的演说；他讲解各个战场上的战争历程。在紧接着战争结束的几年内，他也注意政治地理学的问题。

1921 年，德国地理学家第二十次会议在莱比锡举行；这是战争以后，也是 1914 年斯特拉斯堡会议以后的第一次（在 1901 年布累斯劳会议上，帕奇是主要人物）。1922 年他在为教学服务将近五十年以后退休了。但不久以后，他就出版了一本关于高塔特拉山的书。书名是《冰川时期的高塔特拉山》（HoheTatrazurEiszeit），书内包括一幅比例尺为 1：75，000 的冰川形态地图、剖面图、略图和许多照片。该书也谈到以前冰川作用所造成的地形。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内，帕奇从事撰写一部世界贸易地理学。该书后由 R.莱因哈德（Reinhard）完成，在帕奇逝世后于 1927 年出版。约瑟夫·帕奇逝世于 1925 年 6 月。

帕奇不论在布累斯劳还是在莱比锡，都没有培养出很多取得博士学位的追随者。他喜欢用外校毕业的人，不愿用自己的学生当助教。在他的助教当中有下列几位：E.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Merz）、J.瑟尔希（S■lch）、W.贝尔曼（Behrmann）、O.莱曼（Lehmann）、E.朔伊（Scheu）、H.诺伊贝特（Neubert）和 H.鲁多尔菲（Rudolphi）；他们在别的大学里几乎全取得很突出的学术地位。在约瑟夫·帕奇的同事中也感觉到他在地理学识上的间接影响。诺尔贝特·克雷布斯这样写过：“我骄傲地认为我在这方面是帕奇的学生，虽然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听他讲课的幸福”。帕奇在向他的在柏林的杰出地理学家和密友基佩特表示感激的时候，也曾说过几乎是同样的话：“很多从未听过他讲课的人都承认他是他们的老师，并且意识到他们从他那里学到许多知识，从而使自己在学术上有了更多的进步”。这就肯定了自奠基人李特尔，经过基佩特和诺伊曼，再经过帕奇而至克雷布斯的那个地

理学传统。这门学科从过分强调古典地理学到新近设想、并得到应用的区域地理学这一发展过程，在这一个人——他那个时代的一位伟大学者的学术成就中，是看得很清楚的。

黑尔曼·瓦格纳

黑尔曼·瓦格纳（1840—1920）[1]是鲁多尔夫·瓦格纳（Ru-dolphWagner）的儿子。鲁多尔夫是著名的生理学家，埃尔兰根大学的教授；他在1840年去格廷根接替著名人类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FriedrichBlumenbach）的职位。这个年轻的儿子就在他的家乡城市格廷根长大成人。他在这个大学里学习数学和物理学；这些是他学术活动的最初目标。他从1864—1876年在戈塔大学预科学校讲授地理学、数学和自然史。他在促进学校讲授地理学方面越来越感兴趣。1868年他成为佩尔特斯公司著名的《哥塔年鉴》（AlmanachdeGotha）统计部分的编辑。1866年（与E.贝姆〈Behm〉合作）出版了作为《彼得曼通报》一卷的《世界人口》（DieBev■lkerungderErde）。这主要是一份统计资料汇编，而他在这方面是特别擅长的。1876年他被聘去主持柯尼斯堡国立大学新设的一个讲座，在那里自己亲手从无到有地办起一个地理学系。他出版了经他修订的、古特以前所写的《地理学教科书》（LehrbuchderGeographie）（第四版1877—9，第五版1882—3）。该书第五版已经由瓦格纳全部重写，并增进了由他新写的两部分：欧洲以外地区的普通地理学和欧洲的区域地理学。该书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和再版，最后的第十版印行于1920年。瓦格纳于1879年担任《地理年鉴》（GeographischesJahrbuch）编辑，到他逝世时保持这个职位达四十年之久。在经过他手的三十六卷中，记载下了地理学所有方面的发展情况，他自己也在那里面撰写有关地理研究与地理教学的范围和方法的长篇而重要的文章。他也是组织职业地理学家会议的主要倡议人；第一次这样的会议举行于1881年，以后每两年举行一次。1879年，E.瓦帕奥伊斯逝世后，瓦格纳接受了格廷根大学教授的职位，在那里一直执教到1920年。

在他身居格廷根的四十年中，许多年轻的地理学家在不同的时期，在他指导下从事学习研究。其中有学术成就的是：W.锡费尔斯（Sievers）、W.贝尔曼、F.马格尔（Mager）和H.德里斯。在他手下工作的同事有：O.克鲁梅尔（Krummel）、M.弗里德里希森、L.梅金（Mecking）和F.克卢特（Klute）。

乔治·格尔兰

乔治·格尔兰（1833—1919）[1]从1875年起到1910年退休，是斯特拉斯堡大学地理学教授。他的观点在德国地理学的发展上几乎没有什么反响；但奇怪的是：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却是在格尔兰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的。这不

---

[1] W.迈纳杜斯：《黑尔曼·瓦格纳》，《格廷根科学学会情报，学会通报》，，1919—30，第60—5页。W.迈纳尔杜斯，《黑尔曼·瓦格纳》，《彼得曼通报》，75（1929）第225—9页；《目录》，1864—1920，《彼得曼通报》，66（1920），第118—22页。

[1] 参看R.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第89—90页；及106—20页，与阿尔夫雷德·赫特纳的自传注释，《海得堡地理文献》，6期（1960），第41—81页。

是因为赫特纳同意格尔兰的观点，而是因为赫特纳觉得斯特拉斯堡的社会人士和他意气相投，使他受到鼓舞。格尔兰本来是古典语言学家，是杰出的人类学家特奥多尔·魏茨（TheodorWaitz）的学生。格尔兰当过多年的中学教师；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建立以后的 1875 年，被聘为该大学的教授，主讲新设置的课程地理学。他那时是四十二岁，而且以前没有受过地理学的训练。他曾尽最大的努力，想把这个讲座改变为民族学的讲座，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就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位地理学家，并试图运用康德和 O.佩歇尔的观点，来把地理学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他把他的全部活动用在自然的方面，并且主张把人完全排除出地理学领域。他创办了一种新的地球物理学杂志，这在它的同类中是第一份。就在 1887 年它的第一期内，他支持这一观点：作为地球科学的地理学，应该专门研究物质的地球。格尔兰似乎确实难以把他的态度和地理学的传统协调起来。他的过激的观点，似乎对他自己在斯特拉斯堡的多年研究和讲学的实践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哈特向说，他的观点即使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试图在逻辑原则的基础上去发展一门科学的地理学，不管地理学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在《地理学的性质》一书中可以看到有关格尔兰的立场，特别是有关 H.瓦格纳在 1888 年《地理学年鉴》上对它的彻底驳斥的长篇讨论[①]。哈特向总结说：

“即使有必要去研究地球的物理学，我们也至少应该认识到这样的一门科学，与几百年来科学家及外行人所谓的地理学是多么不同。格尔兰的论点，虽然经过自那时以来的许多讨论的补充，很可能是使地理学成为‘真正的’或‘基本上’是自然科学的各种尝试中最荒唐的一个。”

赫特纳根据他自己对格尔兰的了解，告诉我们说[②]：格尔兰认为地理学和民族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赫特纳说：格尔兰是一位伟大的博学者，但从来没有成为地理学家；他的讲学是资料的罗列，他的旅行是“折衷主义的”。赫特纳同他前辈的关系是真诚的，虽然不能同意他对地理学的态度，尤其不能同意他对人的地理学的观点。赫特纳的讨论智利气候的文章，是在格尔兰指导下写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成为伟大地理学家的赫特纳却曾经在格尔兰那里接受专业的训练。他的这位老师引起同事们抗议的风暴；所提出的观点，对后来人也没有影响。

特奥巴尔德·菲舍

H.瓦格纳说，特奥巴尔德·菲舍（1846—1910）是第一位地理学讲师。因为他在 1876 年取得在波恩大学讲授地理学的资格，1879 年去基尔，1883 年到马尔堡，在马尔堡一直住留到逝世为止。菲舍最初研究历史，后来才转向地理。他在年轻时身体不好，曾到地中海海滨疗养过一段很长的时期。也正因如此，他才用毕生精力去研究那一地区的地理学。

菲舍后来成为公认的地中海区域的权威。他的第一部著作是这个区域、特别是西西里的自然地理学（1877）；顶峰著作则是有关摩洛哥阿特拉斯山前地带实地调查的专论（《彼得曼通报》，1900，《补辑》133 期）。他在 1902 年出版的意大利半岛地理学的意大利文译本，被说成是一本“科学的地

[①] 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第 115 页。

[②] 同上书，第 94 页脚注①。

方地理学著作”。他还负责对枣椰（1881）和橄榄（1904）进行深入的研究；瓦格纳认为这两项著作可以列为模仿李特尔的典范。菲舍由于他的不朽著作《南欧半岛区域地理》（L■nderkundedersüdeurop■ischenHalbinseln）而大享盛名。该书于 1893 年列入基尔希霍夫的《欧洲地理学》（L■nder-kundevonEuropa）丛书内出版。他还想再写一本与地中海区域相联系的北非的地理学。他在一生的学术活动中，无论是在马尔堡的家里，还是在地中海区域作实地的科学考查途上，都受到心脏病和肺病的困扰。他还想作更多的研究和著述，可是壮志未遂，他就逝世了。

阿尔夫雷德·基尔希霍夫

阿尔夫雷德·基尔希霍夫（1838—1907）[1]是普鲁士大学里最老的、也是第一位地理学正教授。他担任这个职务三十多年，培养出几千名中学教师。他对培养师资特别感兴趣，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开始他的事业的。他特别强调区域地理学，而且只是浅近地谈谈一般概况。他博览群书，是一位巧妙熟练的演说者和教师，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他的著作也主要是给学校用的，他写的《学校适用地理学》（ErdkundefürSchulen）就是一个例子。他还有在大学以外讲学的习惯。他曾长期担任《德国地理学和民族学研究》的编辑，一共编了十四卷。他在柏林军事学院当过两年（1871—3）讲师，但在 1873 年被召去主持哈勒大学新设的地理学系。他在这里一直任职到 1904 年退休，因此他的职业活动时期和李希霍芬及拉策尔的几乎完全相同。

基尔希霍夫影响过几个先听他讲课、后来成为杰出地理学家的人。我们已提过赫特纳和施吕特尔。他们两个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的。施吕特尔从日耳曼语言学转向地理学。赫特纳受到基尔希霍夫方法学的吸引，虽然他批评他老师是一位“普及者”而不是“学者”。基尔希霍夫的学生中还有 R.克雷德纳（Credner）和 A.苏潘，他们两人大概也是在他指导下完成学业的。应该郑重地提一下，十八世纪末卡尔·李特尔曾在哈勒大学学习，所以哈勒和地理学有着很久的、受到尊重的联系。

基尔希霍夫也是《欧洲区域地理学》（L■nderkundevonEuro-pa）这一巨著的编者。该书出版于 1886 年，参加编辑的有特·菲舍、F.哈恩、A.彭克和亚·苏潘。他紧紧跟随李希霍芬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概念体系。

亚历山大·苏潘

亚历山大·苏潘（1847—1920）[1]被 H.瓦格纳认为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伟大的自学地理学家之一。换句话说，他是德国第一代地理学家之一，虽然他自以为是基尔希霍夫的学生。他出生在普斯特塔尔，到莱巴赫上学，在格拉茨大学学文学和历史。1870 年他取得博士学位，然后到莱巴赫的一所小学里去教书。七十年代早期，他开始对地理学感兴趣，并在 1873 年写出一本供学校用的地理书。1876 年，他为维也纳地理学会会报写了一篇讨论地理学内

---

[1] H.斯特芬：《阿尔夫雷德·基尔希霍夫》，《地理杂志》25（1919），第 289—302 页。

[1] H.瓦格纳：《亚历山大·苏潘》，《彼得曼通报》，66（1920），第 140—6页，与 B.迪特里希在《地理杂志》中发表的同一标题的文章，17（1911），第 193—8页。

容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内表明他反对李特尔学派，并且试图创立“纯自然科学”的地理学。他得到学校的允许，离职去哈勒在基尔希霍夫指导下进行学习，同时继续研究地质学。他于 1877 年回到莱巴赫，但主要由于基尔希霍夫的支持而再次获准离职。这次他到莱比锡去学习，但时常访问哈勒。他在 1877 年又去策尔诺维茨的大学预科学校；不久以后，于 1881 年取得在大学讲授地理学的资格。

他由于他的《教科书》（Lehrbuch）而在德国出了名。该书在 1878 年印行的第三版已经大部分重写了。他在八十年代转向研究测定地形和气象现象的问题。他讨论世界热量带的著作，出版于 1879 及 1880 年。他赞同一个出版商的意见去写一本《自然地理学》（PhysischeErdkunde），1884 年印行了第一版。

1884 年《彼得曼通报》的共同创建人 E.贝姆逝世；主要由于 H.瓦格纳的最后建议，苏潘作了他的继任者。在以后的将近二十五年内，他管理这个出色的期刊，并为它树立了声誉；这个时期，大致也就是李希霍芬和拉策尔学术活动的主要时期。苏潘在取得这个职位的时候，就明白地宣布了自己的目标。他说，“探险的时代，基本上是过去了，我们将把《通报》及其专论增刊用于收集资料和促进地理学的发展，使其成为一门科学的知识”。他还担任戈塔《统计年鉴》的编辑。他大大扩充了书评的篇幅，其中大部分是他自己写的。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写成一些讨论气候问题的文章。大量的增刊专论都经过他的手，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地理学的。

除担任《通报》的编辑职务外，他还继续写自己的学术著作。他为基尔希霍夫的《欧洲区域地理学》提供一部分量很大的奥-匈帝国地理。瓦格纳说，这部书使他站到德国地理学家的前列。他还收集统计资料。他写成一篇专论来探讨美国各州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1886），又重新出版由 E.贝姆和 H.瓦格纳创始的人口统计。他也关心“殖民地区”的发展，并在 1906 年写成一本论欧洲殖民地领土扩张的书。他在 1896 年彻底重写了他的《自然地理学》。该书曾多次再版，最后一版印行于 1916 年，并且长期地被认为是一本标准的著作。

他被聘为布累斯劳大学教授；1910 年他六十二岁时接受了这个职务[1]。他长期患病，但仍力疾著述，于 1918 年出版一本《论政治地理学》（LeitlinienderallgemeinenpolitischenGeographie）的新著。在这本书内，他呼吁发展一门不受自然科学摆布的政治地理学。他认为这部书是他最独特的著作。他逝世于 1920 年。

[1] 这里，年代和年龄数字不符，有误。——译者

第八章　阿尔布雷希特·彭克（1858—1945）

第二代地理学家一直活跃到 1930 年前后（当然是在纳粹时代开始以前）。他们大多数是李希霍芬的学生，或者至少是在他指导下进行研究的；这些人中间有莱比锡的彭克，波恩的赫特纳，和柏林的施吕特尔。此外还有埃里希·冯·德里加尔斯基（1865—1949）（他于 1934 年退休）；K.哈塞特（Hassert）（1868—1947），拉策尔与李希霍芬的学生，从 1917 年起（在莱比锡、提宾根及科隆作短期逗留以后）是德累斯顿的教授，于 1935 年退休；西格夫里德·帕萨格（1867—1958），1936 年从汉堡退休；阿尔夫雷德·菲利普松（1864—1953），1929 年从波恩退休；威廉·福尔茨（1870—1958），得到拉策尔、帕奇和李希霍芬的指导，1912 年在埃尔兰根、1918 年在布累斯劳、1922 年在莱比锡任教授，1935 年退休；威廉·迈纳杜斯（1867—1952），一位自然地理学家，而且主要是气候气象学家，1920 年接替瓦格纳任格廷根教授（他从 1909 起在该校任教），至 1935 年退休。卡尔·萨佩尔及罗伯特·格拉德曼也属于第二代。他们两人不属于那一个特殊的学派，都是凭借自己的学术成就而进入地理学界的。前者是在中美洲广泛旅行过的专家，有坚实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的基础；后者是德国南部地理专家，对植物学造诣很深。

第二代最特出的领袖人物是阿尔布雷希特·彭克、阿尔夫雷德、赫特纳与奥托·施吕特尔。我们将首先谈谈他们的生平和著作。

毫无疑问，阿尔布雷希特·彭克是上一代的学术巨人之一，他对人类知识的最大贡献是他对冰期及其变动的研究；但他终身是一位职业地理学家。除去那部讨论阿尔卑斯山冰川时代的不朽著作外，他还在八十年代写成一部重要的德国地理学，并于 1894 年发表一部极其出色的讨论地球表面形态的巨著。他的著述时期长达六十年以上。

彭克在 1858 年出生于莱比锡，从 1875 年开始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自然科学。他于 1880 年去慕尼黑，在地质学家卡尔·齐泰尔（karlZittel）手下工作；在 1883 年二十五岁时任慕尼黑大学的讲师。两年以后，他受聘为维也纳大学自然地理学教授。他在那里任教将近二十年，并建成一个设备齐全的地理学系。在此期间，他根据他对阿尔卑斯山谷地沉积物的观察，写成了他的最伟大的有关冰期变动的著作。1906 年，他接受柏林大学的邀请，继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为地理学教授。这一年他四十八岁。他保持这个领导职位共二十年（在 1917—1918 年还担任过大学校长）。他于 1926 年退休，继任人是他的杰出的奥地利学生之一诺尔贝特·克雷布斯。彭克退休后，仍然住在柏林；我在 1936 年曾有幸见过他几次。战争期间，他为逃避轰炸而移居到布拉格，于 1945 年 3 月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阿尔布雷希特·彭克在不到二十周岁的时候，被地质学家黑尔曼·克雷德纳（HermanCredner）选派去萨克森进行地质普查，并且绘成莱比锡东南一个区域的 1：25000 地质图。通过这一工作，他不仅提高了观察的能力，也提高了解释那些记载着地表特征的地图的能力。“他的第一源泉，不是地图而是自然”。

他在自传里说，他在他学术活动的早期，就已对冰期问题发生兴趣，后来把它作为主要问题而研究了六十年。他的出生地莱比锡靠近冰盖的南部边缘。1879 年，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讨论德国低地区的泥砾

（Geschiebeformation）的。那时，解释欧洲低地区的地形与地表沉积物的特点及分布的学说很多，岩石在冰山背上从斯堪的纳维亚移来的“漂移理论”，仍在广泛地流行。不过，它正在逐渐地为“冰盖理论”所代替。彭克现在搜集到许多支持冰盖理论的证据。他在莱比锡附近发现泥砾下面有一块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磨光的岩石（Rundh■cker）。他到北欧广泛地寻找更多的证据，后来就写出了上面提到的那篇 1879 年的论文。他在 1882 年的一本书内（《德国阿尔卑斯山的冰川》，VergletscherungderdeutschenAlpen）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部著作使他取得在慕尼黑大学讲授地理学的资格。

冰期内气候变化的理论并不是新的理论。彭克的贡献，在于他从实地观察中收集到大量的证据来支持和发展这个理论。泥砾和砾石这两种沉积物的交替出现，使他认定斯堪的纳维亚的冰盖至少三次进入德国北部。他在 1879 年那篇论文里说，“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冰期和间冰期。冰川时代内每一个冰期的代表是泥砾，每一个间冰期的代表则是薄层的砂和粘土”。这是从德国北部低地区的证据推论出来的基本观念。下一个问题是要弄清楚是否在欧洲其他部分也能取得支持它的证据。于是他就到苏格兰高地、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里去寻找，他的主要野外工作是以维也纳为基地而在阿尔卑斯山里进行的；他的伟大著作《冰川时代的阿尔卑斯山》（DieAlpenimEiszeitalter）则是和爱德华·布吕克纳（EduardBrückner）合作，用二十年时间写成的，该书从 1901—1909 年分三卷出版。这是他个人实地调查研究的顶点。他把阿尔卑斯山第四纪冰川时代划分为三个间冰期和四个冰期（根据阿尔卑斯山区河流的名称，分别命名为贡兹〈Günz〉、民德〈Mindel〉、里斯〈Riss〉和武木〈Würm〉）的理论，已经成为第四纪地质学的基础，也是解释人类史前史的起点，这是彭克对冰川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的巨大贡献。

洪堡在进行野外研究时所用的比较法，是彭克对某一特殊问题进行野外研究的基础（观察、明确其位置，再进行对比）。对于被观察的现象——沉积物、岩屑、层序等等，都必须精确说明其所在的位置，并且按照它们在物质性质、深度、厚度及范围方面的空间存在，将它们画在地图上。

他的目的完全是地理学的，他用以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则是地质学的。人们时常能够通过外成过程的作用和形态，推断出地壳运动发展的证据（这个方法和 W.M.戴维斯的方法一样，都受到 S.帕萨格的攻击）。在他于 1894 年发表的两卷《地表形态学》那部著作中，有关于这项研究目标和方法的说明。

《地表形态学》（MorphologiederErdoberfl■che）是研究地表形态的；它是一部基础的、也是同类中最先出版的著作。彭克在讨论其研究范围时，指出它不同于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因此他使用了地形学（Geomorphology）这个名词。就其研究形态这一点来说，它是地理学的。虽然十九世纪德国学者们经常说到它是研究“地表形态的科学”，而就我们所知，最先提出地形学这个名词的，却是彭克。

彭克的著作分为两卷。第一卷讨论地球形态的数量测定和有关地表形成的过程。第二卷的内容包括各个由一些相似的、有联系的形态所组成，并被按发展方式来进行分类和研究的地理复合体。这就要求人们对各种类型的地表作细致的、经验的描述。彭克指出，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是 O.佩歇尔在他那本副题为《地表形态学》（1869）的比较地理学中首先采用的，而对侵蚀营

力及其在解释地形上的作用的研究，则是由法国地质学家德·拉·诺埃（delaNoe）和 E.德·马尔日里（deMargerie）于 1888 年共同提出来的。当彭克写书的时候，诺埃的工作正在迅速进行中。戴维斯在巴黎和柏林的演说，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的头十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彭克著作的最后一版在内容上有了许多重要改变。可是基本结构仍保持不变。

他在第一卷中详细讨论了侵蚀和沉积的营力——风化、块体移动、河流作用、风的作用、冰川作用和地球的内力。在第二卷内，他详细描述了地形的各主要类型——平原、丘陵区域（沙丘、冰碛丘、火山丘与泉华丘）、谷地及其与各种复合地形（切割的与开阔的、蚀余山地、台地、残丘）的关系、盆地与湖泊（在沙漠区、冰川作用区、透水岩石区即喀斯特区）、沉积区、火山山地（单面山、断层山、褶皱山与火山）、洼地（Senken）、凹地。海区的形态则分为海岸线、海底及岛屿三类来进行研究。

人们可以看到，彭克特别着重于描述地表的形态——地形志（morphometry 或 morphography）——形成的过程（kr■ftelehre），以及各个区域内各相似形态的地理位置与组合情况。他的分类系统的基础是形态而不是过程。例如，盆地区域（Wannenlandscha-ften）就包括由各类过程所形成的多种形态——冰川的、喀斯特的、火山的、沉积的等等。如果说作为一位地质学家的彭克低估了过程在地形发育中的作用，那将是荒谬的。他合乎逻辑地坚持：在对地形所作的地理学研究中，首要的一点应该是，描述从最小的地形单元，到由相邻单元并成的各级地形区内各种地形的数量特征及其分类系统。他举出六种地形形态或形态要素：

1.平原或缓斜的均一的地面；

2.悬崖或倾斜陡急的坡地；

3.谷地，由两个侧坡和一个狭带状平原组成，侧坡向平原倾斜，而平原本身又沿长轴方向倾斜；

4.山地，向各方倾落的地面，它可能是一个点，也可能是一条线（山脊）；

5.凹地，和山地相反的地形；

6.洞穴，或完全被地面包围的空间。

地形的形态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合并组成不同等级的区域——小区、区域和大区域。地形的特点主要来源于构造的特点。六个主要构造形态是：平原，具有水平的地层；轻微褶皱的地层（Ver-biegungsland）；断层形成的地块（Schollenland）;强烈褶皱区域（Faltungsland）;熔岩流（Ergussland）和侵入岩体（Intrusivland）。通过侵蚀营力，特别是流水对构造形态的作用，就产生了地形。彭克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他的分类法。

就像解剖学家研究有机物那样，地形学家彭克也通过时间上的发生学过程，来探讨地形的起源。近来的形态学分析法，已经像生理学家研究有机物那样，把它的重点移到作用的过程上。因此，在解释现存的地形特点的时候，比较年轻的学者们认为气候的作用大于彭克与戴维斯所强调过的地质构造的作用。他们两人都致力于了解现存的地形。

当彭克早年在维也纳的期间，在他手下工作的著名学者是非常多的。他们当中有：R.锡格尔（Sieger）、N.克雷布斯、F.马哈舍克、H.哈辛格（Hassinger）、A.梅尔茨、J.瑟尔希这几位奥地利人；J.斯维伊斯（Cvijic）与 E.德·马东男则是他的外国学生。在德语国家里，彭克与柏林的李希霍芬是最杰出的地理学家。

彭克学术活动的后半期是他在柏林度过的二十年。在此期间他也培养了或者强烈地感染了许多地理学家。在这里提一下他们的名字，也是必要的：古斯塔夫·布劳恩（GustavBraun）、诺贝特·克雷布斯、埃米尔·迈南（EmilMeynen）、卡尔·特罗尔、赫伯特·路易斯（HerbertLouis）、赫伯特·莱曼、他的最早的助教和现在德国地理学家的元老黑尔曼·劳滕萨赫（HernannLautensach）。

彭克主持着地理学系和由李希霍芬所创设的海洋学博物馆。他特别关怀博物馆，并且参预了“流星”海洋探险队的活动。他也促成了E.德里加尔斯基的南极探险考察。他自己研究气候分类（1910与1913），并运用有自然地理学特定含义的干燥、潮湿和万年雪等名词，作为世界气候分类的基础。他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继续在因河河谷实地探讨地形问题，以及人类占有与冰川时代气候变迁的关系问题。后来他又通过特定地理区域供养人类的能力，来研究整个地球供养人类的能力问题。在彭克的指导下，地理系的学生曾对这个问题作了好几年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概括在1942年出版的一本书内，这是他最后的著作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这一段时间内，他转而研究政治地理，特别是德国文化在中欧地区内的领域问题；他把语言的领域、民族的领域和文化的领域区别开来。这是一些新观念，而且引起了许多批评文章，不过它们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喧嚣言论淹没了。

“对我们来说，德国是一个自然的实体（einenatürlicheEin-heit），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概念；德意志帝国（DeutschesReich）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有边界的国家；不幸，它没有把所有属于它的都包容在它的边界之内。可是德国也不是只讲德语的区域，因为它早就越出了后者的范围。几百年来德国这个名词的含义是：地球表面上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形态（Gestalt）的一个范围明确的区域。”

这段文字是在1925年写的，它是德国学者反复申述的一个问题的结晶，也是经过提炼的拉策尔的重要的和基本的生存空间概念。

彭克的这一见解得到他的继任人的响应。N.克雷布斯在1929年说了下述一段话：

“对我们来说，德国既不是一个纯物质的、也不是一个纯文化的（v■lkischer）概念[1]；它和政治地图上常变的区域，当然是不一致的。正像这个名字所表明的那样，它是这样一个区域：在它的范围内，所有物质和文化特征的基础都是日耳曼的。德国比德意志帝国大一些和更稳定一些：但它的范围也非总是不可改变的。”

克雷布斯所表明的观念和彭克的相同，而且可能就是从他那里得来的。这个观点在三十年代出版的德国人《在中欧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inMitteleuropa）那本漂亮的地图册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在这本地图册中，德国人的生存空间包括德国人居住的和德语通行的区域，再加上一些非德国人占有的区域：这些非德国人在过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曾经和德国人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这个论点在彭克另一个学生埃米尔·迈南于1935年出版的《德国与德意志帝国》（DeutschlandunddasDeutschesReich）那本书中也很清楚。它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生存空间概念，可能

[1] 此处原文为“nor a pure cultural conception”。——译者

是拉策尔所系统阐明的最重要的地理学概念，虽然它被一些纳粹地理学家们大大歪曲了。在纯学术的意义上，它不可避免地要得到地理学家们的探讨，而且在不小的程度上也得到阿尔布雷希特·彭克的探讨。

彭克一贯积极从事于制图工作。他在这方面最大的成就，是进行非常缓慢而又遇到许多阻力的 1：1，000，000 世界地图。他积极鼓励出版 1：100，000 地形图；它主要是为了军事当局，但也供研究景观的学者和其他人士使用。

彭克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内始终在研究地球表面形态的问题。他研究河谷发育的周期性（1884）、通谷（through-valley）的形成（1888），以及其他侵蚀和剥蚀的问题。这些研究的基础是在挪威（1892）、英国（1883，1884，1897）、比利牛斯（1884—1897）、加拿大（1898）、巴尔干（1900）和澳大利亚（1900）等地所作的实地调查。他于 1894 年出版的巨著《地表形态学》被 H.路易斯形容为“地理科学史上又一项伟大的成就”（EswarwiederumeineGrosstatinderGeschichtedererdkundlichenWissenschaften）。

1905 年，他讨论了“地文学”。他所谓的地文学这个名词的含义，在他 1894 年那本形态学内说的很清楚，而在 1928 年他关于“新地理学”的简短说明中就更加清楚了。他说，地理学统一性的基础，应该是地球表面上有助于表明地表独特区域特点的那些有关“自然”和“人文”过程的现象的空间排列。赫伯特·路易斯援引了彭克在逝世前一年一封信中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地图把各种现象和景观放置在一起。因此，他强调地形图的使用、解释和制作，是地理学的基础。但所有重要的东西都不在地图上。地理学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地图内。人们必须亲自去作实地观察，例如去看看农作物和建筑的风格。

“我已按照李特尔和李希霍芬就职演说的含义，从事研究地表的地理学工作。开始我研究地形的微细的情况，然后再扩大范围，归纳为形态学的概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转向地球的植物覆盖，后来又转到政治-地理问题。”在他的晚年（他在同一封信内继续地说），他转而研究“生物学问题”，关心地球上人的问题——在这里，地球是看作人类的居住地的。他说，有好几种地理学，一种是研究整个的地球，一种是研究区域和各种外貌的同时存在。

彭克事业的顶峰是地球学会（GesellschaftfürErdkunde）的一百周年庆祝会与海洋学会议，因为这两次会都是他在七十岁时主持进行的。“那时他真是德国地理学的杰出的代表。”1917—1918 年，他任大学校长。在 1918 年德国崩溃以后，他积极参加重振德国人民精神的运动。他是在柏林创建民众大学的主要发起人，他的学生 A.梅尔茨受任为该校第一任校长。不久以后，彭克成为柏林星期三交谊会及星期一俱乐部的成员。1906 年他在柏林就职演说的题目是：《观察是地理学的基础》（BeobachtungalsGrundlagederGeographie）。野外观察，是他进行科学研究和训练地理学家的主要方法。

人们发现，在彭克的四十年职业活动中，他所研究的地理学中心是有变化的。彭克的早年著作《德意志帝国》于 1887 年列入 A.基尔希霍夫的《区域地理学》（L■nderkunde）丛书内出版。它显示了李希霍芬的强烈影响。不错，奥古斯特·格里泽巴赫（AugustGrisebach）于 1871 年出版了他的论

地球植被的书,拉策尔于 1882 年出版了他的人类地理学第一卷,尤利乌斯·哈恩于 1883 年出版了他的气候学巨著，但对特定区域进行“综合”研究，也就是德国人所谓的区域地理学（L■nderkunde）的方法和目标，仍然有待于人们去制定。按照彭克的看法，各种现象都要通过发展和过程来解释。因此，他运用发生学的方法，也就是按时间的顺序来探讨人和地表形态的问题。彭克是最先使用阿尔卑斯山前地带（AlpineVorland）和德国中部山地（MitteldeutscheGebirgschwelle）这类地文学名词的。他确切地、透辟地论述德国的地质基础和自然区划；毫无疑问，这是他有关德国这本书的最重要的特点。这部早期著作清楚地显示了李希霍芬研究地理学方法的影响。

彭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重新著述“区域地理学”。他的研究方法和问题都改变了。路易斯说，彭克晚年关切的是探求空间关系的意义，确立中心区域与外围区域，和研究自然现象对经济、聚落及文化的影响。例如，他写过《中间欧洲》（Zwischeneu-ropa）（1916）——欧洲结构中一个主要的横贯大陆的变化地带；德国中部的《格罗斯高》（Grossgau）（1921）；和作为地理形态的《德国》的概念（1926 与 1928）。

因此，彭克在其职业生涯的后半期，即留住柏林期间的大部分著作，都集中探讨了社会的区域结合与社会所占有的土地及社会所创造的居住地之间的关系。他的许多思想都集中在生存空间的概念，尤其是德国的性质和范围上。国家领域（Reichboden）、语言领域（Sprachboden）、民族领域（Volksboden）和文化领域（Kultur-boden）等概念都是彭克阐发出来的；我们觉得它们是弗里德里希·拉策尔观念的直系后代。克雷布斯与迈南尤其遵奉这种思想；但这种思想侵入到更广阔的领域，在本世纪前半期的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中，它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

彭克不仅得到和他一起工作或在他手下工作的人的赞赏，而且长期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他接受许多荣誉，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的星期三交谊会成员的身份。这是一个由大学、政界和实业界最高层人士组成的很小的俱乐部。它的成员虽然从未超过十六位，但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彭克本人曾一度被选任为会长。彭克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而且是创建近代地理学的巨人之一。他是柏林大学伟大地理学家行列中，紧接卡尔·李特尔和费迪南·李希霍芬之后的第三位。这几位都是他们时代的最特出、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以上所述，都是根据他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我还能再引述一些他自己的话，这些话是他在给卡尔·特罗尔的信中说的。特罗尔在 1938 年彭克八十诞辰时，曾经评价过这位地理学家的著作。特别启发人而又适切的一点是：彭克说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接受过他所谓的李希霍芬在其有关德国一书中清楚表明的层迭建筑（Etagenbau）论，但到晚年，他就不再接受这种论点，而去寻求单一的、完整的核心了。他发现这个核心就在景观的区域单元，以及与它们成长及地理位置有关的自然和人文过程之内。毫无疑问，他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清楚阐明的这一观点，是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学家的一大刺激。

由于彭克学术活动的前半期是在维也纳大学、后半期是在柏林大学度过的，所以叙述一下这两个学术中心地理学界的人事代谢是确当的。汉斯·博贝克教授在私人通信中提供了下面的资料（参看第 194—195 页）。

柏林大学自 1906 年起，在地理学系和海洋学系中各有一个讲座。后者是由李希霍芬创设，在彭克于 1906 年到职时从地理学系分出去的。第一位主持

海洋学系这个讲座的，是彭克的学生阿尔夫雷德·梅尔茨。他逝世于 1925 年，接替他的是阿尔夫雷德·吕尔。吕尔的兴趣主要在经济地理方面。他的健康状况不好，1935 年逝世于瑞士。瓦尔特·福格尔（WalterVogel）是地理系中彭克以外的第二位教授（副教授）。在 1935 年福格尔退休以后，这个讲座改为布朗登堡历史学讲座（Lehrstuhl），由一位历史学家 B.舒尔策主讲。诺尔伯特·克雷布斯是一位奥地利人，彭克在维也纳时的学生，于 1927 年被从法兰克福召来直接接替彭克。他于 1947 年在柏林逝世。

维也纳大学也有地理学的一段出色的历史。第一个讲座创设于 1851 年，由弗里德里希·西蒙尼（FriedrichSimony）主持，他于 1885 年退休（逝世于 1896 年）。1885 年，该大学设立两个讲座，一个是自然地理学，另一个是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学讲座由阿尔布雷希特·彭克主持。1906 年彭克去柏林后，由他的阿尔卑斯山冰川时代这部巨著的年轻合作者爱德华·布吕克纳（生于 1862 年）继任。布吕克纳在 1927 年逝世以前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他的继任人是彭克的另一位学生弗里茨·马哈舍克（1876—1957）；在 1934 年转到慕尼黑以前，马哈舍克一直留在这个岗位上。下一位继任者是约翰·瑟尔希（1883—1952），他是彭克在维也纳的最后一位学生。瑟尔希由汉斯·斯普赖策尔（HansSpreitzer）接替，他是罗伯特·锡格尔在格拉茨的学生，也在维也纳跟彭克学习过，目前仍然担任这个职务。第二个即历史地理学讲座，最初由格拉茨的威廉·托马舍克（WilhelmTomascheck）（1841—1901）主持。1903 年慕尼黑的奥伊根·奥伯洪默尔（EugenOber-hummer）接替托马舍克的职务，到 1931 年为止；他逝世于 1944 年。胡戈·哈辛格于 1931 年从弗赖堡来主持这个讲座，至 1950 年退休（逝世于 1952 年）。哈辛格是彭克在维也纳培养出来的，在五十年中对地理学的发展作出显著的贡献。从 1951 年起，这个讲座由汉斯·博贝克主持；他在 1903 年生于克拉根福，他的主要老师是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约翰·瑟尔希。

因此，博贝克在专业上是彭克的直系后代。不知是一种偶然，还是他接受训练的结果，博贝克在冰川地形学和人文地理学两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他早期有关因斯布鲁克的专论和晚年对波斯的研究，都是对近代地理学的杰出贡献。

在总结时，我们应该强调指出，虽然彭克的专门贡献是在地形学，尤其是在更新世地质学方面，他的四十年主要职业活动却在地理学方面。他对地理学作出概念的和实质的贡献。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实是：经过彭克培养的上一代许多杰出的德国地理学家，开始时都是地形学家，但对人的地理学都做出不朽的贡献。这种转变，在彭克自己的专业成长中就很清楚，他从更新世地质学和人类史前史转向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景观的影响。

彭克也许是地理学的最伟大的奠基人，他对地理学贡献的特点需要最有力地加以强调。最初他写德国地理的时候，用的是他前任李希霍芬的写法。但在他后半生的科研与教学活动中，多次表明他已摒弃了那样安排的方式。他所说的“新地理学”，必须有一个独特的核心，有它自己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他在景观的单元中寻找这个核心——在 1894 年《地表形态学》一书中，他就是从地形学家的观点去那样做的；而在欧洲，这种景观单元肯定是自然要素和人为要素的结合，是自然和社会两种过程的结果。彭克后来似乎不仅想到可见的景观，而且也想到地表区域组合的变化。在研究方法上，他似乎更接近于施吕特尔（和布吕纳），而和阿尔夫雷德·赫特纳的

差异则较大。后者明显地继续运用李希霍芬所首倡的层迭法。

参考书目

要特别注意两篇演说。我在写成本篇评论的时候，为了取得和彭克关系密切的德国同事们对他的评价，除根据我自己所熟悉的彭克著作，以及我和德国同事们常常进行的讨论以外，我曾随意地援引它们的内容。赫伯特·路易斯教授在彭克诞辰一百周年（1958，9，25）纪念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评价彭克著作的演说。它由柏林地球学会刊印在《地球》杂志上，89 卷（1958），3—4 期，第 161—84 页。卡尔·特罗尔教授在 1938 年庆祝彭克八十诞辰时，曾对同一个团体发表一篇演说。它没有出版，但特罗尔教授亲切地让我利用一份原稿，和彭克本人写给他的一封表示感谢的长信。另外还请参阅下列文章：约翰·瑟尔希的，发表在《维也纳地理研究》（WienerGeographischeStudien），17（1948）；诺尔伯特·克雷布斯的，发表在《柏林德国科学院年鉴》（JahrbuchderDeutschen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zuBerlin），1946—9，第 202—12 页；埃德加尔·莱曼的，发表在《柏林德国科学院通报》（Deutsche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zuBerlin），64（1959）；G.恩格尔曼（Engelmann）：《阿尔布雷希特·彭克著作目录》（BibliographieAlbrechtPenck），《德国区域地理研究所科学通报》（Wissensch-aftlicheVer■ff.d.DeutschenInstitutfürL■nderkunde），1960，第 331—447 页。

第九章　阿尔夫雷德·赫特纳（1859—1941）

生活与著作

阿尔夫雷德·赫特纳是在德国地理学发展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是他那一代中唯一的、也许是第一位这样的地理学家：在进入大学时，就立志要成为一位地理学家。他开始时在哈勒学习一个短时期（1877—8）；他在那里第一次受到基尔希霍夫的影响，基尔希霍夫使他第一次清楚地了解地理学的领域。他转学到波恩，在特奥巴尔德·菲舍影响下，对智利的气候进行他的第一次学术研究。然后他又转学到斯特拉斯堡，在格尔兰指导下，由于继续研究智利和西巴塔哥尼亚的气候（出版于 1881 年），而于 1881 年获得博士学位。接着他又转而研究萨克森高地的地质。他在斯特拉斯堡时，也对哲学深感兴趣，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他何以能够写出有关地理学结构和方法的论文。他认为这些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他于 1881 年 11 月回到波恩，在李希霍芬指导下进行研究。1882 年，他作为英国大使的私人教师，去哥伦比亚的波哥大。这次旅行的成果，是 1888 年出版的《哥伦比亚安第斯山旅行记》（TravelsintheColumbianAndes）一书以及许多科学论文。他于 1884 年回到德国，以后的四年他住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他在莱比锡参加李希霍芬的讨论会，并且继续研究萨克森高地的地形学。他拿这份研究成果，申请在拉策尔领导下的莱比锡大学讲学的资格。这时（1887）拉策尔刚刚来接替去柏林的李希霍芬。1888 年夏，他回到南美洲作广泛的旅行（得到著名德国人种学家和民族学博物馆馆长 A.巴斯蒂昂的帮助）。他坐船、乘火车和驿站马车、骑骡子旅行，睡在野地里，忍受艰苦和疾病的折磨。他患了腿部肌肉萎缩症，以致终生行动不便。这些旅行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成果主要记在他写给李希霍芬的书信和自己的日记中，后来由他的学生们进行整理。这样他就和洪堡一样，由于在南美洲当了一段时期学徒，取得了地理学家进行实地调查的经验。在 1890—1891 年他回到莱比锡，在拉策尔手下工作，讲授南美洲；他在那里讲学到 1897 年。据他自己说，他没有受到拉策尔研究人文地理学方法的影响，他比拉策尔更多地强调地理学的自然科学基础。1894 年 5 月，他成为莱比锡大学的助教，然后又短期地转到提宾根，最后于 1899 年受聘到海德堡。他没有再回到南美洲从事任何野外工作，但在俄国（1897）、北非（1911）和亚洲（1913—14）等地作过广泛的旅行，有时还有海因里希·施米特黑纳随行作伴。他在海德堡一直工作到 1928 年退休（他的继任人依次是：J.瑟尔希、W.潘策尔＜Pantzer＞和 G·普法费尔）。

赫特纳对地理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在他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的约三十个人中，有十一位成为职业地理学家。他们当中有：弗里茨·耶格尔（FritzJaeger）（先在柏林，后到巴塞尔，任殖民地理学首席教授）、弗兰兹·托尔贝克（FranzThorbeke）（先在曼海姆，后在科隆）、莱奥·魏贝尔（波恩）、奥斯卡·施米德（科尔多巴、伯克利、哈勒、基尔）、海因里希·施米特黑纳（莱比锡、马尔堡）、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因斯布鲁克、埃尔兰根、弗赖堡）、威廉·克雷德纳（WilhelmCredner）（慕尼黑）和阿尔伯特·科尔布（AlbertKolb）（汉堡）。这些人全是地理学家，但另外几位则取得主

---

[1] 为了写这份简短的评传，我主要引用本章末尾所附的参考文献。

要是地质学的讲座。在赫特纳指导下取得在大学讲学资格的人有耶格尔、托尔贝克、施米特黑纳和施米德。

赫特纳和他的夫人没有子女，和他们的学生关系非常密切。赫特纳写道：

“我和我的许多学生发展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子女。我举出卡尔·乌利希（CarlUhlig），严格说来，他不是我自己的学生（他在诺伊曼指导下取得弗赖堡大学博士学位），但担任我编辑《地理杂志》的助手；此外还有弗兰茨·托尔贝克、弗里茨·耶格尔、莱奥·魏贝尔、海因里希·施米特黑纳、埃尔恩斯特·米歇尔（ErnstMichel）、埃尔恩斯特·瓦赫勒（ErnstWahle）、奥斯卡·施米德。较年轻的当中有威廉·克雷德纳、奥托·贝宁格尔（OttoBerninger）、约翰内斯·厄默（JohanesOehme）、马丁·鲁多夫（MartinRudoph）、保尔·高斯（PaulGauss）、施瓦尔姆（Schwalm）和阿尔伯特·科尔布。施米特黑纳是我一位好朋友的儿子，他在取得博士学位和他父亲死后不久来作我的私人助手。他伴随我作过几次广泛旅行，而且象是我儿子一样看待我。我在事实上相信他们（我的学生）与早一代的彭克在维也纳的学生，以及更早的李希霍芬的学生那样，是他们那一代的最佳的（学者）”[①]。

在以坚实的哲学和科学为基础来建立地理学这方面，赫特纳所做的工作多于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地理学家。1895 年，他自己的刊物《地理杂志》第一期出版了。赫特纳告诉我们，他在莱比锡时就想办这样一份杂志，并且和拉策尔及李希霍芬讨论过这件事。他实际是想模仿著名的刊物《外国》（Ausland）。对于后者，佩歇尔和拉策尔多年来是非常关心的。赫特纳也想用这份新杂志来专门讨论有关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地理学问题。该杂志第一期，就包含李希霍芬对《马关条约》的有影响的讨论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也发表许多有关战争形势的论文。赫特纳总想保持这些论文的科学水平，使之不同于《地缘政治杂志》（ZeitschriftfürGeopolitik）。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说明国家的政策，在三十年代豪斯霍费主持下尤其如此。他以这份杂志来宣传他有关地理学范围和方法的观念，和解释当时的政治问题，前后达四十年之久。他在 1935 年把编辑职务让给海因里希·施米特黑纳；杂志刊行到 1943 年被封闭为止。

意义非常重大的是，在 1963 年 1 月该杂志复刊了；担任主编的是戈特夫里德·普法费尔。普法费尔在这份复刊杂志的第一期上是这样写的：

“当然，过去的二十年对地理科学并不是没有影响的。现在和以前一样，不仅需要在我们的科学领域内推进细致深入的研究，而且需要系统阐明它的统一性观念。地理学的当前处境，尤其迫切地需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处在一个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在积极发展的时期。古典的地理气候学受到分裂和被气象学连根拔除的威胁。地形学遇到来自气候学和沉积岩石学两方面的危险；而且有分裂出去、离开地理学家的趋势，虽然后者需要它作为区域地理学的基础。人类地理学正在受到统计学、历史学、考古学和社会学方法和目的的入侵。象社会地理学那样的一些全新的领域，在上一次德国地理学会议上被列为中心的论题。研究边缘问题各个学科的这种相互连系性，是我们时代的特点。另一方面，地理学有必要去继续探讨其他科学的边缘领域。它所

[①] 这一段引自《阿尔夫雷德·赫特纳：一百岁诞辰纪念辞》，《海德尔堡地理学文献》，第 6 期（1960）。参看后文。

派生的许多分支科学现在都已独立，但几乎不注意与其他分支的联系。出版物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有许多极其重要的文章已经在其他学科的杂志上发表了。这份新《地理杂志》的目的，就是要补足这一缺陷。它清楚地说明五十多年来，地理学在赫特纳鼓舞下所取得的进展，而且将继续追求实现它的创建人所确定的目标。”

1891 年一位出版者（经彭克的推荐）约请赫特纳仿效 F.施拉德尔（Schrader）在法国新出的地图册编绘一本《新袖珍地图》（Han-datlas）。他接受了这一任务，但不得不放弃他有关秘鲁的实地研究的成果。后来他把路线图和记录都交给卡尔·特罗尔了。从这项工作中引出了他于 1907 年出版的欧洲区域地理巨著，以及延迟很久、到 1924 年才刊行的关于欧洲以外地区的续编。这两本书的名称是《区域地理学基础》（GrundzügederL■nderkunde）；在二十年代有修订版。后来他出版了《比较区域地理学》（VergleichendeL■nderkunde），一共有四卷（1933—5）。他写的其他重要著作是《俄国》（Russia）（1905），《英国的世界霸权与战争》（England’sWorldDominationandtheWar）（1915），《大陆的地表形态》（SurfaceFormsoftheContinents）（1921 与 1928）和《文化在地球上的传播》（TheSpreadofCultureovertheEarth）（1928 与 1929）。赫特纳倡议出版一套名叫《地理科学手册》（HandbuchderGeographischenWissenschaft）的世界区域地理丛书。这个计划后来由一位年纪较轻的同事 H.克卢特完成，虽然撰写人中有些是赫特纳原先选定的。它完成于 1940 年，共有十一卷，是不朽的地理文献之一。赫特纳的一些著作，在其身后以《人的地理学》（AGeographyofMan）名称出版。它分为三卷——《人的地理学基础》（BasisoftheGeographyofMan），由 H.施米特黑纳审订（1947）；《运输地理学》（TransportGeography），也由他审订（1952），和《经济地理学》（EconomicGeography），由普莱韦审订。赫特纳在 1895—1905 年间发表的关于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连同增补部份，于 1927 年合为单行本出版，名称是《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布累斯劳，1927）。下面的评论就是引用那里面的资料。

地理学的历史发展，表明有两个关于它的性质的概念。根据一种概念，地理学是地球的普通科学，因此，普通地理学是基本的，而特殊地理学（研究特定的区域）则是次要的。根据另一种概念，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区域特性（区域地理学）站在前列，而普通比较区域地理学则是次要的。只要科学体系的基础是被研究的资料的差异，地理学就能够自立为一门地球科学。可是赫特纳却坚持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因为年代学（或历史学）的研究法与生物分布学（或区域）的研究法，是和特殊资料系列的系统研究法并行而又截然不同的，所以地球表面的生物分布科学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所不可缺少的。

地理学常被看成是整个地球的科学——因此，它在德文里有另一个名称地球学（Erdkunde）。实际上，对整个地球的研究已分为好几门新近发展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地理学衍生了它们，而它们现在独立了。它们是：地球物理学，在十九世纪早期曾被认为是自然地理学；地球化学（矿物学、岩石学和土壤科学）；天文学和数理地理学；以及对动植物外貌的研究。历史的外貌，不是和它们在地壳上的变化、而是和历史地质学密切联系着的。

地理学是地球表面的生物分布科学。这是斯特拉波著作的特点；只是我

们应当指出，他曾把他对区域的研究叫做地方地理学。这也是李特尔的基本观念。地理科学首先是研究地球表面具有物质内容的区域的，也就是描述地方的空间关系的。它们和历史科学不同。后者研究和描述事件或事物发展的顺序。

赫特纳坚持地理学不是地球的普通科学（地球学），但他也和李希霍芬一样，把它含糊其辞地当作地球表面的科学（地表学，Erdoberfl■chenKunde）。他论证说，地理学传统的和逻辑的领域是有局部差异的地球表面——大洲、国家、区域和地方（Erdteile，L■nder，LandschaftenundOrtlichkeiten）。它试图确定和描述这些区域单元（区域地理学），并在世界范围内归纳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对比。这意味着地理学是通过空间的排列来研究地表的事物。它显然不同于以事物的各别种类为基础的系统科学，和以事物的各别种类或人类事件的次序为基础的历史科学。研究地表现象的不同结合，是赫特纳地理学观念的主要内容。

这种概念决不意味着地理学是研究分布的科学。它不需要关心个别现象的分布——例如个别植物、动物和矿物的分布，因为它们是系统科学所要考虑的内容。只有在这样一种分布是现象的区域结合的一个要素、而这一结合又能赋予地表一个区域以特点的时候，也就是当它成为李特尔所谓的地球空间的物质内容的时候，它才受到地理学的考虑。华莱士（Wallace）在谈到个别种类的分布是地理动物学，而研究特定区域内动物界结合的科学则是动物地理学的时候，他对这两者的区别是说得很清楚的。对植物、矿物、地形和大气的研究也是如此。对个别现象的分布及其原因的研究，是系统科学的范畴。地理学的研究是从能赋予各级区域以特点的各种现象的空间结合开始的。同样，一件武器或一种风俗的分布是人种学的范畴。一种特定的经济事实的分布，只能看作地理经济学，但经济地理学则研究那些区域地结合在一起、并赋予区域以特点的具有明确位置的经济现象。赫特纳说：人，不能象李特尔及其追随者所认为的那样，作为这样一种研究的中心，因为自然对人的观念，以及专门研究人-地关系的方法，和（所谓）地理学与历史学相互依存的说法，在逻辑上是和生物分布学方法不相容的。物质世界的六个部门——地、水、大气、植物、动物和人，必须按照其区域结合的情况，逐个地就其各自的作用、它们空间上的相互联系以及因果关系来加以研究。确实，作为改变地球的主要作用力的人，在这类研究中将占主要地位，但不能说他就是这种研究的目标。考虑的主要对象是地球上的现象及其在区域结合中的情况。

李特尔把人放在地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上，但赫特纳则主张：必须把人和自然的其他部门放到一起来考虑；而且李希霍芬在有关中国一书中所坚持的（W.M.戴维斯也是这样）人从属于地球表面的观点，是和考虑区域总特征的地理学传统观点相抵触的。“它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人文科学……而是两者的合并”，因为它研究的是“区域的特点”，在这种特点中，人及其劳动成果具有或大或小的突出地位。在这种意义上，对区域的研究——区域地理学（L■nderkunde）——把自然和人文两方面联合起来了，因而没有二元论。

他说，拉策尔把地理学看成是分布的科学，强调空间（space）而不强调区域（land）。1882 年创立经济地理学的格茨（G■tz），追随拉策尔，把贸易地理学看成是距离的科学，因此，它的中心论题是对距离的征服。人们

抓住空间，但不抓它的实际内容。赫特纳也攻击施吕特尔和布吕纳的“景观”观念（参看第十与十七章），说它是审美地理学。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土壤的颜色，而不谈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它不能把气候局限于观测天空颜色和云的形状。实际上，“景观学家”并不排除这些，而是把它们从后门带进来。把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截然分开是不现实的；实际上，这种研究方法将排除诸如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种地理学”等地理学的一些传统的领域。他说，施吕特尔和布吕纳两人都承认这一点（赫特纳对他们两人观点的解释过于拘泥于文字，过于狭隘了）。

他继续说，作为生物分布科学的地理学不能在景观的外貌（Bild）上，而只能在地球表面各级区域的内部特性（Wesen）上找到统一性。有两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第一是辨认出地理复合体或体系，即水系、大气环流、贸易区域等，因为没有任何空间体系可以单独地被理解，人们必须联系其他体系去理解它。第二是考虑各种空间排列现象之间的因果相互依存性（Zusammenhang）。单是个别现象的分布，在说明区域特点上是没有地理意义的，但一种分布如果和具有同样分布的其他现象同时存在于一个区域之内，也就是当它具有地理效力的时候，它在说明区域特点上就有意义了。

地理学并不总是追随时间的流逝，虽然这种方法论的规律常常被人忽略掉。它只截取某一段特定的有限的时间，而且只用时间上的发展来说明选取的那段时期内的情况。“它需要发生学的研究法，但不能成为历史学”。过去时期的地理学，好象只有历史家和考古家才有资格去研究，就象古地理学只有地质学才能研究一样。赫特纳的这个观点引起了以他和帕萨格为首的德国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 W.M.戴维斯的论战。后者是在 1900 年前后美国地理学的创建者，在本世纪初年，对欧洲学者有很大影响。

戴维斯-赫特纳论战

戴维斯在柏林讲学以后的若干年内，他的所谓“解释性描述地形”的体系，成为某些德国地理学家辛辣批评的主题。这次讲学是在 1908 年应阿尔布雷希特·彭克的邀请而作的，讲稿由彭克的同事阿尔夫雷德·吕尔译成德文，以《地形的解释性描述》（Dieerkl■rendeBeschreibungderLandformen）的名称，于 1912 年在莱比锡出版。本书迄未译成英文，虽然它所包含的观念在戴维斯以前及以后发表的许多文章中都有所阐发。阿尔夫雷德·赫特纳的批评，第一次出现在 1911 年的《地理杂志》中，但他的主要评论是在 1921 年的《大陆表面形态》中（DieOberfl■chenformendeFestlandes）（1928 年第二版）[①]。大约与此同时，瓦尔特·彭克（WalterPenck）的遗著《形态学分析》（DieMorphologischeAna-lyse）经他父亲审校后出版。W.彭克通过坡面的发育，来研究对地形发育的科学分析，他说这有助于历史地质学的研究。在 1940 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一次讨论会上，彭克的著作曾受到彻底的、与戴维斯体系作对比的分析[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得到这份由美国第一流地形学家写出的珍贵文献，它的结论也在别处扼要地谈过了。这里最好是考查一

[①] 西格夫里德·帕萨格也卷入这场论战。他在《地形发生学》一书中反驳戴维斯的演绎法。该书于 1912 年作为一篇论文发表在《彼得曼通报》中。参看本书第 159 页。

[②] 《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30（1940），第 219—79 页。

下德国地理学家对戴维斯体系的态度，因为英文的文献没有有关这方面的恰当的陈述。双方的攻击都是猛烈的；而且非常明显，都是由于对地理学的问题、目的和方法所持的观念不同，以及民族气质的不同。

人们必须回想起这一事实：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年内，德国已经有了一批成熟的地理学家，他们都是有声誉的学者；在到世界上遥远分散地区作实地调查和把地理学组成一门独立学科这两方面，他们的观念都比同时代的英、美两国人先进得多。再有，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李希霍芬与阿尔布雷希特·彭克都已出版了有关地形及其分类、起源和发展的第一批基本著作。作为地理学家，所有这些人都在研究描述地表的现象及其结合状况。在那个时候，他们不象美国的戴维斯和英国的赫伯森（Herbertson）那样受到环境决定论的束缚。他们试图把他们认为主要是描述和经验的地理学，组织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认为，对不同的地表形态以及印在地表上的人为的（文化）形态的解释，只有到不同地区内以不同方式起作用的各种力的成果中去寻找。戴维斯于 1903 年提出一种解释地形的方法或“设想”，它在理解地球表面细节的时候，略去了不适切这个体系的一切事实。戴维斯的（所谓）地理轮回概念及其在地表上的作用，是通过“构造、过程和阶段”来体现的，而地表的形态特征则和“幼年、壮年及老年”等阶段有着理论上的联系。赫特纳对此争辩说，这是一种任意的想法，它忽略、甚至无视在一个区域内起作用的其他地方性因素，如：风化、构造及岩性的变化与气候因素。这些因素不仅是侵蚀轮回中气候变化的因素，而且在世界不同环境内，侵蚀与沉积过程的结合中也是不同的。戴维斯的“常态”轮回，主要是为欧洲和美洲湿润地区而发展和运用的。德国学者那时已在地球上干燥地带，从事广泛的科学观察。他们声称，通过风、雨、风化的作用及其所造成的侵蚀和沉积过程，在不同气候下的地形发育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个区域内，由于气候的变化，它们也是不同的。土壤和植被对地表的变化有影响。戴维斯的设想，是从他自己和他的两位年长的同代人 J.W.鲍韦尔（J.W.Powell）和 G.K.吉尔伯特（G.K.Gilbert）的专题研究中归纳得来的。这些专题研究，以及六十年代欧洲其他学者的这类著作，得到赫特纳与帕萨格两人的承认和赞扬，但他们都拒绝接受一项概括的体系，不同意在这种有限的解释的基础上，演绎地运用这个体系去描述一个区域的地表形态。他们两人说，地理学的问题是指出地区性重复出现的地形特点，并通过所有对它们起作用的力来解释它们。戴维斯没有研究实际存在的地形，而是在一个理论体系的范围内演绎地说明并解释它们，而这个理论体系的本身，在他们看来，就包含着根本性的错误。正如戴维斯所痛切坚持的那样，他提出这个体系，是为了帮助记忆，为了给人们以一把能理解地形因果关系的钥匙。

可以预料，赫特纳这些反映地理学家们反对戴维斯体系的论辩，将会受到美国方面的反驳。它们特别引起戴维斯与鲍曼两人的注意。戴维斯在评论赫特纳著作的时候，作出严厉的人身攻击[1]，他说它充满了“说教、陈词滥调、踌躇犹疑、有害的误解和蓄意的抬杠”。他声称这本书是一份“出于良心的，但也是反动的抗议，抗议它的作者所认为的其他一些地理学家的过于匆促的方法”。他形容该书是“对侵蚀轮回的酷评”。戴维斯是明显地、也是可以理解地发怒了，但他没有真正（在那个时候和这件事上）明白赫特纳试图赢

[1] 《地理评论》13（1923），第 318—20 页。

得别人赞同的观点——一位地理学家而不是地质学家的观点。

戴维斯与鲍曼两人后来都作出更大的努力来消除这种隔阂，这实际上是地理学与地质学之间的隔阂。鲍曼总结说，分歧来自“不愿意接受来自外国的一个名词，另一部分原因是不可救药地、顽固地把阶段（stage）误解为年龄（age），不懂得阶段这个词是用以说明发展的程度，而不是说明时间的长短的”[②]。这可能是正确的，但不是地理学论辩的主要问题。鲍曼接着象戴维斯评论帕萨格的基础（DieGrundlagen）那样，反对那种和地理轮回（顺便提一下，这个名词是和侵蚀轮回对立的）的发生学方法相对立的过度的经验描写法。这种方法，无疑要触犯地理学家赫特纳的职业的感情，因为鲍曼说，经验的描述，特别是那种采取无穷尽地分门别类、开列景观现象的名单的形式[③]（这是帕萨格著作第一卷的主要内容），对学生提供“一种毫无意义而又僵死单调的观念”。鲍曼进一步论证说，“……令人追从的是观念，而不是略图和目录”。我们理解而且同情这句漂亮的格言，但我们现在觉得：他的反对，表明他没有真正理解作为地理学家的赫特纳（与帕萨格）所追求的东西。他的论点似乎是：经验的分类和绘图的本身，作为一种目的是极其无味的，但它们从来不是赫特纳和帕萨格的目的，而是他们用以达到目的的主要手段。

区域地理的模式

地理学家在1900年前后继续强调“自然环境对人”是中心论题。结果，人们可以读到一些特定区域的研究论著，但不能取得有关在区域基础上经过人力创建的复杂的居住地、即景观的外貌和排列的那怕是最少的观念。实际上，区域或国家地理的写法已经趋向于公文程式化，各种事实都排列成固定的顺序，逐条地按地理分布来进行研究：位置、地质、地形、气候、自然资源、史前时期、中古时期、人口分布、职业、道路与政治区划等。这种排列的基础，是认为它们先后之间有着因果的顺序。资料的大部分都取自其他学科，地理学家除绘制地图和指出这些现象和“自然基础”的关系以外，没有一点新的贡献。可是人们完全可以想见，在任何一个区域内，李希霍芬和赫特纳的六个部门（地、水、气、植物、动物、人）中的每一个，都能被单独地彻底地进行研究，虽然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是和它们与土地及位置的联系相对立的）被缩小到最低限度。这在德国已成为一种标准的处理方法，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内，法国的专论文章也是如此。在德国，它被说成是区域地理学模式[①]；从前一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许多学术著作都是按照这个体例写的。例如在菲利普松初版于1904年并题献给李希霍芬的《地中海地区》（DasMittelmeergebiet）、格拉德曼的两卷《南德国》（Süd-deutschland）（1931）、赫特纳的《欧洲》等著作中，这种写法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赫特纳的《欧洲》载于《区域地理学纲要》（GrundzügederL

[②] I.鲍曼：《地形的分析：瓦尔特·彭克论地形轮回》，《地理评论》，16（1926），第122—32页。

[③] 帕萨格著作的第一卷显然是这一批评的目标。其余三卷几乎被鲍曼不予理睬，而且显然没有评论，因为它们包含着对鲍曼批评的答复。鲍曼谴责得过早了。参看第162页。

[①] A.赫特纳，《区域地理学模式》，《地理杂志》，39（1933），第93—8页，与E.冯·德里加尔斯基在《彼得曼通报》上发表的文章，78（1932），第6—7页。

■nderkunde），它出版于 1907 年（第二版于 1925 年），内容取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写的一份地图集说明书。虽然这种模式的写法早已被斥为刻板式的老套（主要是彭克在二十年代进行这样的指责；不过他在前一世纪八十年代曾追随李希霍芬而接受这种写法），却仍然出现于英、美两国新近出版的某些所谓“区域地理学”之内。

在德国，对小区域研究的主要刺激，来自 F·拉策尔于 1882 年创立的德国区域地理学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发起出版一套叫做《德国地理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丛书。早期的出版物缺少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在那时提倡的“综合法”。它们包括比较专门的论题，例如 E.哈恩的《北德平原的市镇与地表形态的关系》（TheTownsoftheNorthGermanPlaininRelationtotheConfigurationoftheGround），R.莱普西乌斯（Lepsius）的《上莱茵平原及其邻接高地》（ThePlainoftheUpperRhineanditsNeighbouringHighlands），A.赫特纳的《萨克森瑞士的山地构造与表面形态》（MountainStructureandSurfaceConfigurationofSaxonSwitzerland），J.布尔格卡特的《埃尔茨山：高度-人类地理学研究》（Erzgebirge：anOrometric-AnthropogeographicalStudy）。这套丛书继续出版到今天，是刊行期最长的地理学研究丛书。它的名称于 1946 年改为《德国地理学研究》（ForschungenzurdeutschenLandeskunde），从而断绝了它和人种学的传统的联系。自 1946 年以来，又已出了一百多卷。几乎所有这些书，都讨论有关德国全国或一个小区域的某个专门的自然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问题。

应该提一下 1900 年以前德国出版的早期的区域地理学研究论著。它们都是根据在世界遥远地区所作观察的第一手实地资料写成的。其中有 A.苏潘的危地马拉自然地理（1895）、K.哈塞特的有关门的内哥罗的著作（1895）、J.帕奇的科孚岛研究（1887）、A.菲利普松有关伯罗奔尼撒的著作（1891），尤其是赫特纳对波哥大的科迪勒拉山的研究[①]（1892）。最后这一著作附有四幅地图，各图均根据沿途搜集的资料绘成。它们表明：地质、地形（热地、温地、冷地及高寒地）、按大小而分的地名及人口密度。密度图上标出（1）无人居住区，（2）人口稀薄区，（3）绿洲聚落区和（4）四个密度等级：每平方公里的居民数分别是 10—25 人，25—50 人，50—100 人，100—150 人。

赫特纳的杰出高足之一，即弗里德里希·梅茨不久以前写道[②]：赫特纳自己认为区域地理学是“地理研究的顶峰”；可是，“特别令人惊奇的是，在海德尔堡，在他指导下写成的三十篇博士论文中几乎没有一篇是研究这类问题的”。很多论文是研究可从海德尔堡去作实地观察的地区的地形的——如耶格尔的关于奥登林山，施米特黑纳的关于黑林山北段；克雷德纳的关于奥登林山结晶岩部分与斯佩萨特。托尔贝克研究地中海区的气候，魏贝尔研究非洲的动物生活，及其与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的关系。其他论文则研究德国西南部特定区域的聚落面貌或经济，例如梅茨，他自己有关克赖希高的著作就是其中之一。所有这些论文都提到研究班上来讨论，参加讨论的人数从未超过二十五人。据梅茨说，问题和方法是如此五花八门，以致人们可

---

① 《彼得曼通报：补篇》，第 104 期，1892。

② F.梅茨：《大学老师阿尔夫雷德·赫特纳》，《百岁诞辰纪念辞》，《海得尔堡地理文献》，第 6 期（1960），第 34—5 页。

以严肃地怀疑是否真的存在着一个赫特纳地理学派，因为赫特纳对他的学生未施加过任何具体的强制。

从这份名录上可以看出，赫特纳培养地理学家的方法是到可以去的地区作实地观察，和选择单一、独特的区域或民族的地理现象作为调查研究的中心，不管它是土地、气候、聚落、经济还是社会生活。这种割裂的研究方法，在赫特纳自己的著作中也是非常明显的。人们在他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写成的、在哥伦比亚实地调查研究的著作中，就已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二三十年以后写的教科书依然如此。这和维达尔学派是非常不同的。产生这种差异的一部分原因是，法国博士学位的学术要求比德国大学严格得多。但也由于赫特纳与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两人的观念方法不同。后者坚持要研究土地和居民的空间现象交织在一起的方式。这在将近七十年来已经出版的、作为进入法国地理专业的主要凭证的全部区域专论的变化形式中是清晰可见的。

参考文献

最权威与最新的资料是阿尔夫雷德·赫特纳的纪念集——《阿尔夫雷德·赫特纳：百岁诞辰纪念辞》，《海得尔堡地理文献》。它包括埃尔恩斯特·普莱韦和弗里德里希·梅茨写的两篇有关学者和教师赫特纳著作的论文，以及普莱韦审校的珍贵的短篇自传和一份完整的著作目录。还有海因里希·施米特黑纳在《人的普通地理学》卷一《人的地理学的创建》（施米特黑纳审校，斯图加特，1947）（AllgemeineGeographiedesMenschen，Band1，GrundlegungderGeographiedesMenschen)一书中写的一篇关于赫特纳的长文（第11—43页）。他在专业上和私人关系上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赫特纳。也应该提到R.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特别是它的第137—44页。赫特纳的著作没有可靠的英文本——因此，哈特向的评价非常重要，但要了解其方法和目的，却又必须去读它们，尤其是他的经典著作《地理学：它的历史、本质和方法》。

第十章　奥托·施吕特尔（1872—1952）

在经过一代人时间的分析法与二元论之后，赫特纳在试图运用综合法来创建地理学的过程中，力求在地理现象的区域结合中找答案，力求能辨认出地理区域的内容。在本世纪初的时候，奥托·施吕特尔提出一个与这一观点相对立，并对以后地理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意见。施吕特尔既反对当时流行的在人-地关系中强调环境的学派——拉策尔、戴维斯、米尔和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也反对赫特纳所持的地理现象区域结合的观点。在施吕特尔看来，两者都不能提供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

奥托·施吕特尔，1872 年生于威斯特法利亚，开始时在富赖堡和哈勒大学学习德国语言和历史。他对这方面的兴趣，到老不衰。他的学术活动分为三个时期。从 1895（时年二十三岁）—1910 年，他发展自己的人文地理学概念体系。从 1911—1951 年，他是哈勒大学的地理系主任，完成了他的主要研究工作——中欧聚落地理。1951 年，他以名誉教授的职称退休，并着手写他的三卷基本著作中欧聚落地理学。他为该书用去了一生中最好的五十年时光。

他在哈勒大学当青年学生的时候，对基尔希霍夫讲课的印象极深（和赫特纳一样）。基尔希霍夫是一位地理学家——该大学的第一位地理学教授。正是由于他的影响，年轻的施吕特尔才把他的兴趣由日尔曼学转向地理学。他以一篇研究翁斯特鲁特河谷聚落（SiedlungskundedesThalesderUnstrut）的论文，来结束他在哈勒接受的正规的地理学训练。这篇论文是按传统的格式写的。七年以后，他在获得大学讲学资格时对它作了锐利的自我批评。可是，这份最早的著作显示了影响他以后研究工作的两个特点——运用地名来解释人类殖民的方式和顺序，和在他后来研究中欧历史地理时，承认公元 531 年翁斯特鲁特河战役是时间与空间上的一次文化的中断。

1895 年施吕特尔转到柏林。在李希霍芬的强烈影响下，他阐明他对人文地理学范畴和方法的看法。1899 年，施吕特尔写成他《对聚落地理学的意见》（RemarksontheGeographyofSettle-ment），1903 年提出申请在大学讲学资格的关于图林吉亚东北部聚落问题的论文，1906 与 1907 年先后发表他的《人的地理学的目标》（ObjectivesoftheGeographyofMan）与《人类地理学中人和自然的关系》（TheRelationbetweenManandNatureinAnthropogeography）两份著作。在 1907 年他只有三十五岁。除在波恩停留一段很短的时间（他在那里编绘一本莱茵兰历史地图集）外，他学术活动的第一个时期（1895—1910）是在柏林度过的。

1911 年，施吕特尔接替菲利普松而任哈勒大学教授。以后他就终身住在这里。他虽然在 1938 年退休，仍然间断地留在大学里，直到 1951 年被 E.内夫（Neef）和 R.柯伊布莱（Kaubler）完全接替为止。因此，施吕特尔领导哈勒地理系达四十年之久。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他讲授的内容是人类聚落的科学研究，可是他对地形学的造诣也极精深，完全有资格来教这门课程。

在他的后半生内，他从方法论问题转到对中欧的具体研究上。他在三十年代编绘一本《中德国》（Mitteldeutschland）地图集。他认识到公元 500 年前后这段时期，对德国人在中欧殖民活动上的重要意义；他运用地名、史前文物的发现、历史上的著作（塔西陀、斯特拉波以及另外一些人的）来进一步了解那时中欧的景观（历史早期的古景观——

frühgeschichtlichenAltlandschaften）。在五十年代他晚年期间，他出了三卷论述历史早期中欧聚落区域的著作（Siedlungsr■umeMitteleuropasinfrühgeschichtlicherZeit1952，1953及1958）。

上面提到的这部主要著作的基础，是一幅出色的、绘出在中世纪清除森林时代开始时，整个中欧的森林覆盖区和无林区的地图。施吕特尔所说的这个时期，是指罗马人统治以后，中世纪清除森林开始以前的那几个世纪；这和他早年划定的确切的时段有所不同。他觉得难以在一幅图上表明几个重要的时期，因而用浓淡不同的好几种绿色，来显示清除森林的历史次序。这个办法成功地把目的和美观结合在一起；研究德国历史和地理的学者，从这幅图上获得许多有用的资料。在这幅绘成的地图上，人们体会不到他对它所依据的极其多种多样的资料来源，进行了多么辛勤的研究。第一卷包含着对方法的说明，其余两卷则研究区域的变化。这是历史和地理分析领域内的巨大学术成就之一。

奥托·施吕特尔想把地理学的中心放在对可见景观的研究上。这样，他就把对人类生活、思想和组织的研究排除在地理学之外了。它们虽然也有明显的地理位置，但属于那些显然也关心其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地理分布的其他科学的领域。这类要素及其分布必须了解，并借用来解释那个像建筑的附着物那样能反映人类集团的文化与经济的景观。因此，政治的事实，只有在它们影响到人的独特的政治-地理区域的情况下才予以研究。正像拉策尔所说的“同样的形式开始于同样的作用”那样，景观的那些在形式、作用与类群，及其不同等级的区域结合等方面被人们研究的要素，按照施吕特尔的意见，应该是地理研究的中心。这是对地球表面的科学研究，不管地球的这一部分是完全自然的，还是被人类深刻改造过的，或者只是部分地——明显地或可疑地——受到人的影响的。这里包含着对拉策尔景观概念的进一步深化，因为施吕特尔提出了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区别。在以前，施吕特尔和另一些人（尤其是在欧洲工作的），显然都觉得这两者的区别是难以说明或想像的。随着时间的前进，景观已经通过自然的过程而改变了。例如，气候的变化就影响到植被的种类。人类自己，出于偶然或是蓄意，已经通过焚烧及砍伐树木、排水、引进新的作物或动物（既有他所驯养的，也有别的由他带来的，如澳大利亚的兔子）而改变了植被和地表的形态。因此在人类占有地球的过程中，必然有过这么一段时期：人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在人类对土地施加其主要影响以前，植被在这段时期内曾有过某种占优势的特点。因此，施吕特尔谈到西欧的完全自然的景观（原始的景观，Urla-ndschaft）时，他的意思是指在公元500年前后，现代人类进行巨大改变的初期，存在着林地和林间空地的景观。可见对景观的研究，不仅是对现象分类并确定其分布和结合的问题，而且也是研究其随着时间和过程而变化的特点的问题。这样也就引起一个在人类对景观影响程度的基础上，划分地理区域并绘制其地图的问题。人们现在已经进行了这种区域的和世界范围的研究。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E.弗里德里希对“掠夺经济”及其各种影响的形式和程度的研究。它已被用作对文化景观进行评价和分类的基础。上面已经提到，施吕特尔的杰出工作是对公元500年前后中欧林地和林间空地分布的研究。那个时期是现代景观大范围改变的实际开始时期；景观的特点可从文件的记载、植物的证据、花粉的分析等资料推断出来。

施吕特尔1906年在慕尼黑写的《人的地理学的目标》一文中，说明了他

为什么把对景观的解释作为人的地理学的中心。“我们需要的是……主题的有限性和观察的客观性。”他提出，人文地理学应该以“辨认地球上可以感觉到的那些现象的形态和排列”为目标。他说，他的方法是形态学的，而步骤则和对地形的研究相似。所有非物质的人文事实——如社会、经济、种族、心理和政治状况的分布，都不能作为研究目的的本体，它们只有在有助于理解景观的发展和特性的情况下才能受到考虑。这是一种和研究地文学相类似的方法，也就是（或应该是）它不去专门研究过程——即侵蚀的力学，而仅仅研究这些过程在景观上的外部表现。按照施吕特尔那时的意见，文化景观包括可动的和不可动的两种形态。不可动的形态应该通过“每一个时期和每一种文化根据其力量大小而作用于景观的全部效果”来进行解释。可动的形态包括人及其劳动成果、他的运动和他单独的及整体的分布。因此，文化景观不仅包括道路及其型式，而且包括人及随人移动的货物。

按照施吕特尔的观念，一个小的区域结合的单元是外貌的单元；在这个单元里，所有“可以感觉到的”、具有区域意义的自然和人文现象，共同形成一种独特的结合；而且只要考虑到人，这种结合的根本就必然是作用、组织或起源上的相似性。对这一概念极关重要的一点是，研究一个区域的首要目的，应该是在严格的形态分类的基础上精确地描述景观。正如施吕特尔多次说过的那样，这一目的常在探求因果关系的过程中被丢掉了。其次，区域必须就起源、作用和景观要素的结合等方面进行研究。因此，这一方法，要求把文化景观当作从原始或自然景观演化来的现象而进行研究。现存景观（它是研究的主要目的）中景观要素的区域结合，要通过它们在一个区域的现有机能组织中的结合方式（李希霍芬把它叫作区域机能组织的动力关系），和能够解释景观中残遗要素的发生学的发展（即三重体系的确切范围及其伴随的聚落型式）来进行说明。这种形态学方法，显然在基本上偏离了达尔文主义的环境方法；后者在那时是那么深刻地影响着 W.M.戴维斯、H.R.米尔和另一些人的思想。它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内广泛流行，但 是也许出于一种偶然，对英、美两国实际上没有影响。

施吕特尔的观点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提供一个明确的行动场所；这个行动场所具有独特的问题的范围，和随着人类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及人类社会对居住地要求的不断变化而经常改变状态。

杰出的德国地理学家在二十及三十年代发表的下述言论，表明了他们意见的最低限度的共同点。阿尔布雷希特·彭克在二十年代中期声称：“地理学的本质是：它研究地面的区域”，“景观的可见内容决定着近代地理学的内容”[①]。他说，最小的区域（Landschaft）是具有形态和作用的一致性的地区。他采用 J.瑟尔希于 1924 年创造的名词，但按照它的狭义解释，把这样一个地区叫做科雷（Chore）。彭克的学生和继任人诺尔伯特·克雷布斯持有同样的意见。他进一步说，要了解景观及其要素的区域关系，就必须研究创造了它并且生活在它里面的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特点[②]。赫特纳的学生、1951 年逝世以前一直是一位权威地理学家的莱奥·魏贝尔宣称，“受到施吕特尔鼓舞的对文化景观的研究，对地理学关系重大。它是作为人类创造其居

[①] A.彭克：《新地理学》，《柏林地球学会杂志庆祝特刊》，1928，第 31—56 页。

[②] N.克雷布斯：《自然与文化景观》，《柏林地球学会杂志》，1923，第 81—95 页。

住地工作的区域表现的地理学的基石”[③]。

注意，这里谈到了居住地，重心显然是改变了。“自然环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它已经在人类创造其居住地时被剧烈地改造过了。在过去的五十年内，注意力已从研究人类之家的“自然环境”转移到了研究人类集团的创造物和工作场所的人类居住地（制约人类集团的反应的，是他们的习惯和传统）。注意的中心是卡尔·索尔所谓的居住地和习惯，或者是笔者所改称的景观和社会[①]。它所关切的是在各种各样居住地内人类集团的地理位置和相互结合。它探索区域定义和分析的体系，以及从人类集团（即詹姆斯〈James〉所谓的他们的态度、目标和技术能力）调整其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环境的过程中出现的人-地关系的确切性质。

五十年代中期，黑尔曼·劳滕萨赫概括了奥托·施吕特尔的著作，及其在德国地理学发展上的意义[②]。他写道，施吕特尔在一个可以和地形学基础相比拟的基础上，奠定了“现代文化地理学”。他的评价可以意译如下：施吕特尔和李希霍芬一样，指出了发生学的分析与原因的或动力的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形态变化的过程，后者是隐藏在变化过程之后的原因。劳滕萨赫认为有三种因果关系——力学的、生物学的和心理学的。他说，地理学著作中的这种特性是由特罗尔和博贝克辨认出来的。地理学领域包括可见的景观和居民的分布——人的劳动成果和人的分布。

施吕特尔的区域概念和赫特纳的一样，是地球表面上不同于其周围地区的一个地理区域。赫特纳着重一个区域的性质和个性；它的基础是这个区域内的相邻各地方及其现象、空间结合和各种自然部门的原因的结合等方面的相似性。施吕特尔强调外貌（Bild），景观要素的空间结合是他的景观单元的精髓。景观形态学是和景观生态学相联系的；它只解释那些与景观有关的语言、宗教、法律、艺术、工艺和国家的分布。它们只作为有贡献的原因，而不作为目的本身来研究。

赫特纳反对施吕特尔把地理研究局限在可见的景观上。他心里想的是区域的独特性，而不管这种独特性在可见的景观中是否明显。当彭克于 1928 年用这些话来说明他的“景观单元”时，赫特纳再次表示反对。他承认景观的中心地位，但拒绝把景观的研究范围局限于空间的人文事实。

劳滕萨赫写道，今天的德国地理学家普遍承认景观是他们研究领域的中心。自大战以来，有人抗议地理学研究正在离开中心而走向边缘领域。赫特纳与施吕特尔在本世纪前半期防止了这种倾向。劳滕萨赫总结说，这个中心必须保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有关区域概念及其所提出的问题的较清楚的定义。

赫特纳的研究方法，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理学提供一种折衷主义的结构。施吕特尔的文化地理概念——景观概念，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且由于概念和做法的日益明确，和有关迅速变化的社会的各种新问题的不断出现而继续发展成长。莱奥·魏贝尔在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就清楚地表明了

[③] 莱奥·魏贝尔：《我们所理解的景观学》，《地理学公报》，34（1933），第 197—207 页。

[①] 为了进一步讨论，请参看《景观与社会》，《苏格兰地理杂志》，55（1939），第 1—15 页。

[②] H.劳滕萨赫：《奥托·施吕特尔在地理学方法论发展上的重要性》，《彼得曼通报》，96（1952），第 219—31 页。

这一点。他在 1933 年写道[1]：

“施吕特尔是第一个把人的创造景观活动，提到方法论原理上来的人。他通过运用景观外貌结构的概念，赋予人的地理学以全部的、可用与自然地理学同样方法进行研究的内容——文化景观学。就像景观结构中自然界那些可见的现象那样，它可以从它的形态学、生理学和发展史的方面来研究。自然地理学和人的地理学之间不再存有隔阂，它们通过对象和方法而密切地接触。因此，在我看来，外貌研究法是地理学的一大进步，虽然它的研究领域因此而大大缩小了。”

施吕特尔著作在地理学学术性上的意义是深远的，所有的德国地理学家都同意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方法论的贡献是在六十年前作出的；他的最伟大的学术著作占用了他毕生的时间，而且在逝世以前不久才出版问世。他的重要性，不仅要从他个人的研究，而且要从他在 1906 年提出的基本观念去衡量。换句话说，对施吕特尔坚持研究作为人类集团劳动成果的人类居住地这一主张的影响，要从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的研究趋势来进行评价，这种趋势不管是对个别景观要素如耕牧制度、农庄、城市类型或道路网的研究，还是对这类可见的要素借以形成地理学家称之为景观的那种独特的、紧密的空间结合的研究。

施吕特尔及其同代人让·布吕纳的观念，已经直接地或间接地转变为地理学家的研究目标。可是地理学的景观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对英国没有影响；就在今天，那里的地理学家，一般地仍对它持怀疑的态度。H.C.达尔比（H.C.Darby）于 1936 年编的英国历史地理学[1]是一本讨论文集，包括英国地理学家写的十四篇学术论文。达尔比在前言中引用了布吕纳的话，但在实际上，这些论文既没有通过要素的分布，也没有通过决定它们形态和空间排列的那些因子，对景观的具体化作出任何贡献。直到二十年代，当卡尔·索尔[2]试图把研究中心转向景观和景观单元，要他的同事们注意德国的研究趋势，而且认识到需要制定研究目标和野外记录方法的时候，美国情况也是如此。在他离开密执安而去伯克利的时候，他留下了一批自认为地方地理学家的人。那时他们都是西格夫里德·帕萨格的热情的学生。他们的领袖之一是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E.James）。他们实际上是在继续施吕特尔和布吕纳的传统。就像赫特纳嘲笑施吕特尔并错误地把他对景观的阐释说成是“美学”一样，惠灵顿·琼斯（WellingtonJones）（根据我自 1931 年起在芝加哥和他多次接触的回忆）老是提出对通过“可见性”来研究景观这一方法的怀疑。这类批评，由于人们通过作用，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形态发生学方法来解释景观要素及其空间排列而逐渐平息了。可惜美国学者对农庄类型或城市结构、廊桥（coveredbridge）或景观结合的区域单元这类景观要素的研究，在三十年代早期狂热一个短期之后就停下来了。这是地理学研究的一种在英、美两国都需要复兴和发展的传统和目的。索尔的景观形态学专论就包含着而且体现了这个传统；这类研究的极少的例子之一是詹·布罗克（JanBroek）对圣克拉拉谷地殖民次序的研究。对景观的类型及其分布、起源、扩展以及作为正在起作用的空间组织实体的空间结合等方面的研究，现

---

[1] 莱奥·魏贝尔，见前引著作。

[1] H.C.达尔比（编）：《公元 1800 年以前的英国历史地理学，十四篇研究论文》，剑桥，1936 年。

[2] 卡尔·O.索尔：《景观形态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刊物》，2（1925），第 19—53 页。

在是法、德两国地理学家的中心研究论题。在法、德两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密切合作就是这方面的明证。在三十年代的德国地理学家及其以后的著作中，我们特别注意奥斯卡·施米德、已故的莱奥·魏贝尔和他们的追随者的著作。我们将在以后讨论它们。

哈特向在三十年代，对施吕特尔所提倡、而为赫特纳所反对的把地理学限于研究景观的“可见现象”的意见，作了长篇的苛细的评论。他的结论是：

“地理学研究领域必须限于‘一般是可见的’区域现象这一教条，只能说成是限于物质的特征。虽然热心家们宣传这个教条已有三十年之久，接受它的只有少数的地理学家，而在行动上支持它的就更少了。这是不足惊异的，因为它既不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也不建立在地理学历史发展的基础上；而且它也不提供一个范围较狭的（虽然是统一的）研究领域的基础。相反，它将使‘纯地理学’的‘核心’趋于瓦解；因为它把区域的某些方面放到地理学家的研究领域之外（除非他觉得有必要去考查它们，以便解释他所研究的内容）。虽然它不能排除从来就是研究主要是非物质特征的那些地理学领域，却要把它们扔到地理学的范围不明确的边缘领域；除了对关系的研究，就没有别的目的了。通过把相对位置这个要素降到纯粹次要的地位，它就有忽视地理学思想的精髓——空间给合中的现象的整体性——的倾向。结果，就发展一种对型式的不加批判的热情（不考虑型式的意义）和对形态（与作用相对立）的强调；这种强调势必要忽视那些在重要性上与物质对象不相称的区域特点[①]。”

我丝毫不想加入对赫特纳与施吕特尔有关地理学内容和目的的观点所进行的哲学讨论：一个着重地表地区域，另一个着重地表的景观。在五十年前发表的文章中所表明的他们的观点，已经由R.哈特向在《地理学的性质》一书中作了充分的和严格的讨论，讨论的结论也已摘引在前一段中。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在约二十至三十年的时间内，赫特纳的研究法，导致了对地球表面各种现象及其与物质环境关系的井然有序的介绍。施吕特尔研究法的中心是，阐明人类按照其传统、目的和技术而对土地所进行的开发利用。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内（哈特向的著作也在这时写成），德、法两国境内热烈的讨论和详尽的研究论文，都在探求调和这两种研究方法的途径。格拉德曼对德国南部的周密的描述是按照赫特纳的模式，但他所依据的各项研究论著（如符腾堡的植物地理学和聚落布局），则都是按照施吕特尔所倡导的方法，去探讨各种特定现象的区域变化的。其他学科的许多学者也间有这种情况。特殊的土地利用形式（如闲散土地或小片重新植林地）在景观中的分布，是一种可见的景观现象；它受社会与经济力量的制约，也要通过它们来进行解释。这方面的成就，已经成为战后年代德国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突破。类似的研究趋势，在法国的历史地理学家（如罗歇·迪翁，RogerDion）和中世纪历史学家（如马克·布洛什，MarcBloch）的著作中也是明显的。实际上，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对以后的著作的影响非常显著。当前这一代职业地理学家对他们两位的称颂，就表明了这一点。哈特向的结论，必须按照自那时以来，也就是过去三十年中已经发表的地理学著作来进行评价。

参考文献

新近有两篇评价奥托·施吕特尔著作重要性的文章。它们是：H.劳滕萨

[①] R.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1939，第235页。

赫：《奥托·施吕特尔在地理学方法论发展上的重要性》，《彼得曼通报》，96（1952），第219—31页；和R.科伊布莱：《奥托·施吕特尔与地理科学的关系》（OttoSchlüter’sBedeutungfürdiegeographischeWissenschaft），《地球》，95（1964），第一期，第5—15页。

第十一章　第二代的同时代人

西格弗里德·帕萨格

西格弗里德·帕萨格（1866—1958）[1]是赫特纳的同时代人和李希霍芬的学生，属于第二代。由于他的著作，以 1891 年出版的关于图林根新红砂岩的地质研究开始，而以 1955 年出版的关于阿斯旺周围的沙漠形态研究结束，他的专业研究工作，延续了将近六十五年。帕萨格原是一位医学博士和地质学家，后来成为地理学家。他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他的观念常常是如此复杂而又矛盾，甚至连德国人也难以解释清楚，但他仍然是近代地理学的少数创建人之一。他于 1953 年获得地球学会（GesellschaftfürErdkunde）李特尔奖章，1956 年在他九十二岁去世前不久，又接受汉堡大学名誉博士的称号。

帕萨格出生在柯尼斯堡，父亲是当地的法官；他于 1886 年进入柏林大学，在李希霍芬的劝告下，学习自然科学，准备成为地质学家。不久他转学耶拿，接着又转到弗赖堡。在后一大学里，他决定攻读医学，并为此而在耶拿花了四年时间（1888—1892）。然而，他还同时研究地质学，分别在 1891 年和 1892 年参加了这二个专业的博士学位考试。在这期间，他利用假期作徒步旅行，进行地质观察、做笔记和绘图。1893 年他受政府邀请到德属喀麦隆，在那里作土地和人民的考察，考察报告发表于 1895 年。回到柏林后，他参加了李希霍芬的讨论会，同时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他 1895 年在伦敦参加国际地理学大会之后，于 1896 年回到非洲的恩加米兰，向英国一家公司报告关于钻石和黄金的前景。他从恩加米兰转到卡拉哈里，对那里的地质、地形和动物特别感兴趣。这篇著作编入有关卡拉哈里的一本书中，于 1904 年出版，他的这篇著作经过李希霍芬的审查，使他取得了大学教员的资格。1901—1902 年，他接受资助对委内瑞拉进行考察访问，一直深入到遥远的内地。1905 年，由于帕奇到莱比锡接替拉策尔的位置，帕萨格被聘请担任帕奇离开后空出来的布累斯劳大学地理教授的职务；1906—1907 年，他在阿尔及利亚作景观考察，考察报告发表于 1909 年。这个考察导致他后来对景观地理学的研究。1908 年他在汉堡大学新成立的殖民学系内任教，一直工作到 1936 年退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服役当医生，1917 年在非洲得了重病。

现在我们来谈谈他的专门著作。他强烈反对戴维斯研究地形的方法。戴维斯于 1908—1909 年在柏林大学讲学之后，这种方法风行德国。他的这种强烈反对，表现在 1912 年出版的《地形发生学》[1]一书中；他在这本书里揭露了戴维斯体系的缺陷，特别是从关注景观实际的地理学家观点来进行揭露。在这本书中，他首次介绍了他在以后二十五年的博洽著作中不断发展的景观学观点。他掌握了赫伯森的“主要自然区域”（1905）概念的正确性及其重要意义。他指出：每一个主要自然区域是自然现象的复合体，其中气候是最重要的基本决定因素。而且每一种气候都有其独特的过程和形式。他还指出：这些过程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而且在现存的地形中留有它们的残迹。他试

---

[1] 赫尔穆特·坎特尔关于西格弗里德·帕萨格的文章：《西格弗里德·帕萨格的地理学思想》，《地球》，91（1960），第 41—45 页。

[1] 帕萨格：《地形发生学》，1912 年，以及参看同一题目的文章，《彼得曼地理通报》，58（1912），第 5—8 页。

图建立赫伯森称之为“组织和细胞”的、那些构成主要自然区域空间内容的自然单元的等级体系。这种方法和它的程序，在 1919—1920 年出版的三卷本《景观学基础》（DieGrundlagenderLandschaftskunde）和 1921—1930 年分为五个部分出版的《比较景观学》（VergleichendeLands-chaftskunde）两书中得到透辟的阐述。他说：主要的世界区域——景观带，主要是由气候决定的，在这些景观带内存在着四级景观实体。他在 1923 年出版的简短导论，清楚地概括了这个问题（《地球景观带：自然与文化》〈DieLandschaftsgürtelderErde：Naturundkultur〉，布累斯劳，1929 年第二版）。

这是他在三十年代研究文化地理和文化景观意义的开始。他发展了四种空间力量——空间、人类、文化、历史的观念，以及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及其劳动成果在创造文化景观或人为景观中的影响的观念。他极力主张，景观对人类占有者心理的影响，应该是文化景观的命题之一；他创造和发展了城市景观的观念，在 1930 年写了一本关于这个题目的小册子（《地球上的城市景观》，Stadtl-andschaftenderErde）。

他在他的晚年，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内，转而研究另外两个论题：人种志和区域地理学。他在 1934 年从地理学的观点写了一部人种志（《地理学的人种志》，Geographischev■lkerkunde），在他学术活动的早期，写过关于南非（1908）、喀麦隆和多哥（1914）的三本标准“区域地理学”。他更加孜孜不倦地探讨这个领域的概念基础；他反对李希霍芬时代的“区域地理学“只是依次描述大量的空间分布的观点。为了这一目的，他彻底地研究了大约从 1700 年以来地理学家们的观念的历史。这份手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失了，但我们听说[1]，他在那里面，讨论了环境（milieu）和生存空间的观念，认为它们包括了有助于形成区域个性的所有空间作用力，并且顺着这条思路，他设想了区域地理的独特性。这些观念与地理学思想及著作的最近发展是一致的；而且有趣的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法国和德国的观念的汇合，以及景观学和区域地理学的明显区别——维达尔·德·拉·布拉什、赫特纳、施吕特尔和彭克的观念的汇合。

景观的研究，如帕萨格早在 1912 年在《地文形态学》一书中所主张的那样，涉及到对地面重复出现的形态的辨识和描述。他在最初专谈地形的时候声称，人们不可能通过戴维斯所主张的一种发生过程来说明地形（即景观的区域变异因子）。他声称，既有地区的也有发生学的两种力量，前者是地质的，后者主要是气候的。帕萨格希望用“区域、位置和形态”，也就是区域、地区的力量和形成的地形，来代替戴维斯的“构造、过程和阶段”的公式。于是他着手对通过它们的发生学决定因子聚集起来的形态要素（Einz-elformen）进行分析和分类。如果一种发生力量占支配地位，该地区所形成的形态称为“单动力形态”，如果有两种或两种力量以上，则称为“多动力形态”。

帕萨格接着从地理角度举例说明，必须怎样研究一个地区的地形。这需要一幅好的坡地地势（地形）图作为基础，同时还必须有同样比例尺的岩石和植被地图。当这些地图重叠时，就能提供辨认形态类型的生理学基础。他指出：这种形态学研究方法与戴维斯“学说”是根本不同的；地理学研究的

---

[1] H.坎特尔，见前引著作。

基础是真正的地球表面。戴维斯的方法是以抽象概念为基础，对地形作表面的解释，因而这种解释常常是含糊和复杂的，而且引起了戴维斯理论不能回答的关于地表形态的难题。帕萨格认为：“这种方法引导人们得出匆忙肤浅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对初学者是十分危险的。”于是他总结说：“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阻止戴维斯的方法，形态学的发展无疑地就要永远脱离地理学而进入地质学的领域。对地理科学的发展来说，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帕萨格在二十年代出版的、关于景观描绘原理的巨著里，力求进一步完善对景观形态的分类和解释它们特点的方法。

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共四卷）[1]名为《景观学基础》（1919—1920），第一卷讨论景观的个别或单元要素；这是一份条顿式的详细一览表，显然会使美国的戴维斯和鲍曼两人感到厌烦[2]。可是它是第二卷的绪言，第二卷讨论景观现象的起因、海洋、大气、植物和动物；第三卷讨论地形的起源（侵蚀和沉积过程与它们在不同气候区的不同作用）；第四卷讨论在景观中看到的人的工作成果。

几年以后，帕萨格在《比较景观学》中进一步发展了单元区域和这类单元等级体系的观念。他勾划出两类不同景观要素的区别。第一类是各种个别的要素群——气候、水、土地、植物和文化现象。分布地区被称为“地球空间”（Erdraum）。作为这些要素的地区复合体，被描绘为“景观空间”（Landschaftsraum）。最小的地面是“景观要素”——如斜坡、草地、谷底、池塘、沙丘等等。一群邻接的要素组成一个小区（部分景观），而邻接的小区则组成区域（景观）。邻接的区域再组成景观区域（即德国北部平原）；这些景观区域又组成象中欧森林这样的大区。大区又组成世界的大区域地带（景观带）；它以广阔的纬度带横贯全球，实际上与气候区是一致的。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体系是对可见景观的一种研究，它包括田地、聚落和人类活动的其他印记，但人为景观的事实不作为划分景观区域的因素而加以考虑。

结合紧密的地理单元（部分景观），和施吕特尔的可见现象的景观单元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可见现象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两类，它们共同形成一个单一的结合体。然而施吕特尔把他的研究限制在景观上——它的要素的起源、传布和结合。帕萨格则走得更远些，因为他在后来的著作中，曾充分地，但往往又是模糊地探讨景观空间——包括它的城市地区（城市景观）——对人类和动物生活各方面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确切性质和范围。因此，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人们被引进了生物学、心理学和医学的领域。这正是施吕特尔所反对的那种头绪纷繁的研究方法。

帕萨格的景观概念，成为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人们感兴趣的中心。这在1924 年出版的瑟尔希的著名文章[1]中是明显的，他把任何一个具有一定均质性的地区，不管它的大小都叫做科雷（chore，这个词来自古希腊语，意思是地区）。彭克用了这个词，但改变了它的意思。他把它规定为具有形态和作用统一性的、最小的可辨认的区域单元。他在 1928 年写道：“我们将按照瑟尔希使用的那个名词的狭义解释，把这样的地区叫作科雷[2]。”彭克的学生和

---

[1] 这里说《景观学基础》共四卷，前面则说“三卷”，疑原书印刷错误。——译者

[2] 鲍曼：《地形的分析：瓦尔特·彭克论地形轮回》，《地理评论》，16 卷（1926），第 122—32 页。

[1] J.瑟尔希：《自然边界的科学解释》，因斯布鲁克，1924。

[2] A.彭克：《新地理学》，《柏林地理学会特刊》，1928，第 31—36 页。

他在柏林的继任人克雷布斯持有同样的观点，但他明确表示：必须把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它所创造及占有的居住地放到一起来评价。莱奥·魏贝尔则寻求一种能辨认农业景观统一性的生态学基础[③]。

阿尔夫雷德·菲利普松

赫伯特·莱曼在致悼词时说：阿尔夫雷德·菲利普松（1864—1955）[④]是我们这门学科在古典时期的大师。菲利普松在莱比锡接受李希霍芬的教育；他和他的导师一样，起初在地质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地理学著作，显示了李希霍芬与赫特纳所设想的对题材“分区”或“分层”处理的方法，但菲利普松著作的真正特点是他用五十多年的时间，集中研究一个地区——地中海东部地区。他积极研究和写作的时期长达六十六年，当他将近九十岁时，才出版他关于希腊地区的第一卷著作。

他的研究工作是以 1887—1904 年在希腊长期旅行开始的,那时他主要靠骑马跋涉了两万公里，沿途采集地质和地理两方面的资料。他的第一部主要的区域地理学著作是 1891—1912 年出版的《伯罗奔尼撒——地质基础上的区域地理学研究》（Peloponnes：VersucheinerLandeskundeaufgeologischerGrundlage）。该书共 647 页，并附有独特的四幅 1：200，000 的地图，全部内容都是根据个人的观察和野外绘制的。莱曼说：这位二十八岁学者的著作，具备了他的导师李希霍芬的所有特点。它是“一本古典艺术的杰作”，因为菲利普松按照李希霍芬的指示，通过自己的探查而填补了地理图上的大片空白。他所绘制的地质和地形图，现在仍然是了解这个地区的基础。他的其他著作是：1897 年的关于塞萨利和伊皮鲁斯，1901 年的关于爱琴群岛，1911—1915 年的关于小亚细亚西部地区。为了这些著作，菲利普松独自绘制了二十六幅 1：300，000 的地质和地形图。1918 年在（施泰因曼〈Steinmann〉和维尔肯斯主编的）《德国区域地质手册》（GermanHandbookofRegionalGeology）内发表了他的关于小亚细亚的地质论文（183 页）。这是一项非凡的记录，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取得的。

他在 1919 年任波恩大学教授，1929 年退休。一部三卷本的普通地理学的主要著作（《普通地理学纲要》，GrundzügederAllgemeinenGeographie）出版于 1921、1923 和 1924 年（修订版出版于 1930、1931 和 1933 年）；一部德国以外的欧洲地理的主要著作，出版于 1928 年，它是 1894 年出版的有 635 页的第一部主要著作的续编。一本关于地中海——“它的地理和文化特色”的书初版于 1904 年，第 4 版问世于 1922 年。1928 年他再次去希腊进行实地研究，继续从事地形学的调查。1934 年他接受了雅典科学院给予的荣誉。那时，他极力主张有必要对希腊地理进行权威性的研究；实际上，1929 年他已在波恩开始写希腊地理。就在那一年他退休了。以后，他写了一部不以地质学为基础，而以文化为基础的重要的地理学著作。这本书虽然不是他的名著，却是地理方面研究拜占庭帝国的重要著作（《地理学上的拜占庭帝国》，DasByzan-tinischeReichalsgeographischeErscheinung，莱登，1939

[③] 莱奥·魏贝尔：《农业地理的问题》，布累斯劳，1933，94 页，参看第 12 章。

[④] H.莱曼：《阿尔夫雷德·菲利普松诞辰一百周年纪念，1964 年 1 月 1 日》

年，214 页）。菲利普松也曾多次去意大利旅行，发表过一些很有意义的关于阿普利亚的区域地理论文（1937）。

1942 年，当菲利普松七十八岁时，和他的妻子、女儿一起被流放到特雷沙因城的集中营。他在那里度过了三个年头，写了一篇自传（《我是如何成为地理学家的》，WieichGeographwurde）；这个自传至今尚未出版，但据莱曼说，它对德国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好的说明。战后，菲利普松回到波恩；1947 年，我在卡尔·特罗尔陪同下，就是在波恩他的公寓里见到他的。

他的希腊地理的手稿，仍然安全地保存在波恩，他毕生努力的著作——《希腊景观》（DieGriechischenLandschaften），由他两个最忠诚的追随者 H.莱曼和 E.基尔斯滕（Kirsten）继续完成。菲利普松在八十多岁时还继续著述，1947 年他写了一篇关于波恩的出色论文，还有两篇登载在卡尔·特罗尔的新杂志《地球学》上的关于希腊的论文（1947），以及一篇讨论希腊气候的长文（1948）。

出版于五十年代的《希腊景观》是他的顶峰著作，这部不朽著作共四卷，正文将近三千页，大致在二十五年到三十年前写成。第一卷是希腊总论，第二卷讨论希腊西北部，第三卷讨论伯罗奔尼撒，第四卷讨论爱琴海及其岛屿。它被列为希腊国内地质学和地形学的标准著作；但以最近二十五年在该地区进行研究的情况（特别是法国地理学家的工作）来衡量，它显然是落后于时代了，在人文方面尤其如此。可是它在区域地理学的概念和写法上，都典范地体现了李希霍芬的观念和教导。这本书基本上实现了这位六十年前的青年学者，在写《伯罗奔尼撒》时所怀的观点：一部地质-形态基础上的区域地理学。菲利普松在六十年前所规定的目标是：“找出地球上有自然边界的完整区域以及有助于体现这个区域个性的、所有个别事物的特点”。在出现这句话的关于伯罗奔尼撒的这本著作中，作者承认在景观中许多现象的根源是文化，它们和“地质-形态”基础没有因果关系。意味深长的是，德国考古学会对菲利普松长期教学生涯中的所有著作，都有强烈的兴趣，而他自己后来也越来越趋向于研究现存的人为的景观。

罗伯特·格拉德曼

罗伯特·格拉德曼（1865—1950）[①]是通过研究植物学而进入地理学的；由于他对斯瓦比阿尔卑斯山植物的研究，提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学院授以博士学位。这样，他就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把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素养结合起来，沟通了对自然景观和文化史起源的研究，文化景观就是通过文化史的发展而形成和演变的。他的同事们在他八十五岁寿辰时说：“他这样做了，从而成为一位真正的地理学家。”在植物地理学、史前史和聚落研究三者不寻常的结合中，他不仅能够揭示中欧景观的发展和变化，而且能够为进一步调查聚落地理创造了新的基础。在对符腾堡城乡聚落地理的研究中，他照亮了新的研究途径。他的研究成果，对文化和经济史，特别对农业史的地理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

格拉德曼主要依靠植物学的证据，发展了在新石器时代实际定居占有时期开始时的所谓石楠荒原群系分布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以在德国南部发现的这一植物群系的植物学遗迹为基础的。他认为在这个时期，具有

[①] 罗伯特·格拉德曼的同事们在他八十五岁寿辰时的颂辞。《罗伯特·格拉德曼八十五岁寿辰》，《德国地理学报》，第 8 卷（1950），第 2 期。

石楠荒原和开阔林地的无林地区，与森林占优势地区之间有着强烈的对比。无林地区是最早发现新石器时代聚落遗迹的地点。他最初以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集团，在一个干暖的时期就定居在这些石楠荒原地区。他后来（1930年）修正了地区的范围，把钙质土壤区也包括进来；它们更适于这样一种经济体系：它需要不用施肥的牧场和耕地，用以栽培主要作物小麦和大麦。

他的最大成就是两卷关于德国南部的著作。它被认为是区域地理学的标准著作。他为这部内容浩繁的著作，预先搜集了大量描述许多行政区域和全面介绍符腾堡王国的研究资料。在我们看来，传统似乎是不能和联邦地理学会当时主持的这类研究割裂开来的。在从事这些“描述“时，他提出和探讨了许多问题：如石灰岩地形的起源，悬崖的形成问题，康斯坦次湖的冰川形成作用。他的两卷著作《德国南部》（Süd-Deutschland）出版于1931年，内容丰富，旁征博引，对许多研究领域来说，都是一部已刊行的最可靠的指南。然而它也不仅仅是一位勤奋的藏书家的著作。格拉德曼是一位伟大的野外工作者和艺术家。他反对一切形式主义者，但他常常热心于有关区域地理学目的和方法的理论性讨论，并且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一时期引起许多争论的“调和景观”概念，介绍到地理学中来。我们还记得他对植物地理学和人类聚落史的关系的讨论——他在1906—1919年写的讨论地理学概念领域内的动植物的论文。他的石楠荒原的概念，在三十年代曾引起许多研究和争论；他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并因此而去阿尔及利亚、撒哈拉边缘和东方[1]进行个人考察。

格拉德曼在卡尔·萨佩尔的特别关怀下，取得了在提宾根大学讲学的资格，他在大学图书馆任职，兼做符腾堡统计办公室的工作。1919年接受了埃尔兰根大学的邀请，就在那里写成关于德国南部的重要著作，此外，他还建立了弗兰克区域研究所。他主编德国地理学研究丛书，并在丛书中对符腾堡的城乡聚落研究作出了贡献。提宾根大学在他七十六岁寿辰时授与他名誉博士学位。慕尼黑地理学会授与他金质奖章，柏林地理学会也授与他卡尔·李特尔奖章。

卡尔·萨佩尔

卡尔·萨佩尔（1866—1945）[2]开始时在慕尼黑研究地理学，他后来的著作中反应出他在地质学方面的才能。但是有两种环境使他很早就转向地理学：对斯瓦比阿尔卑斯山家乡地区的熟悉；他完成大学学习之后，由于健康情况不好，立刻去危地马拉。1888年他二十二岁时，和他在危地马拉的兄弟，一个咖啡种植者合夥。他在雨林区经营了两年种植园，也是由于不健康而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行业。他在那里通过直接的经验学到了热带耕作的基本知识，了解了当地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他学习他们的语言，因为他们不使用西班牙语），并且完成了种植园所在地区的地形和地质勘察。他对当地人种志和考古学的发现也感兴趣。两年以后，他迁居到科万镇，由于他兄弟的支持，他才能献身于科学研究。他在中美洲各地作过广泛的旅行，而且担任墨西哥政府雇用的地质学家。他的大部分旅行都是徒步完成的，只有两三个印

---

[1] 指地中海以东各国。——译者

[2] F.特默尔：《卡尔·萨佩尔》，《彼得曼地理通报》，91（1945），第193—5页。

第安人作伴。他有规律地记日记，并且对地质、地形、气候、植被、经济和社会条件进行正规的经常的观察。他边搜集材料边出版著作，不久就成为一位公认的中美洲权威。他绘制了中美洲地质图和一幅大危地马拉地形图。

1900 年，三十四岁的萨佩尔在从事十二年实地科学研究以后回到了德国；这个长期工作的记录，在任何时期的学者中也是少有的。拉策尔和李希霍芬都鼓励他去取得能在德国大学里讲课的资格。1902 年他成为提宾根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他在那里工作到 1910 年。那一年，他应邀到斯特拉斯堡去接替格尔兰的职位。1919 年，他又转到符腾堡，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地理系，并且一直任教到 1932 年退休。

在中美洲时，萨佩尔对火山学非常感兴趣，拉策尔也鼓励他写一本关于这个一般题目的书。萨佩尔需要更多的第一手观察资料来完成他自己承担的任务，他在 1914 年以前的第二次十年旅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观察火山，特别是东印度群岛和地中海地区的火山。他在二十年中作过两次长途旅行，一次在中美洲，另一次穿过南美洲，往南直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已出版的卡尔·萨佩尔的著作是大量的。这里我们只能指出它们的概貌。他早期著作是关于自然地理学的，特别是地质学和中美洲地理学的，他对中美洲了解的第一手材料可能比其他人都多。他还对中美洲的制图学作出杰出的贡献。他的火山学著作占用了他一生的时间，直到 1927 年才出版。他对热带地理学、经济发展和动植物驯化等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这在 1923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热带的书中《热带》（DieTropen）可以看出来。他的经济地 169 理学观念系统地表现在《普通经济和运输地理学》（AllgemeineWirstschafts-undVerkehrsgeographie）一书中。这本书是在他退休前两年，即 1930 年出版的。

卡尔·萨佩尔是德国第二代地理学家中游踪最广的一个。人们在 1945 年的一篇颂词中说：“作为一个研究者和个人，德国地理学界将长久地认为他是地理学家中最优秀代表之一。”

现在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位杰出学者的学术生涯作几点总结性评价。他与英语世界的地理学家不同，他怀抱着与著名前辈亚历山大·冯·洪堡相同的目的，能够运用与他相同的方法，在同一地区，亲自进行多年的直接观察。在拉丁美洲的荒野进行广泛、刻苦和危险的旅行调查，是德国地理学家的一个坚强而长期的传统；这包括积累每日的记录、绘制地图和出版研究成果。这种做法在赫特纳、施米德、魏贝尔、威廉密、特罗尔、普法费尔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都得到证明。一位第二代的年尊者萨佩尔是这些人的杰出的前辈；他与其他德国地理学家一样，在进入祖国的大学工作之前，除了在校学习以外，还做过多年的野外调查研究。

胡戈·哈辛格

胡戈·哈辛格（1877—1945）[1]七十五岁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亡。他的著作在英语世界很少了解或引起注意，但在这里必须特别加以强调。哈辛格是本世纪前半期的伟大地理学家之一。他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授，他的全部著

---

[1] E.伦德尔：《胡戈·哈辛格和地理研究工作》，《德国区域地理学报》，13（1954），第一期，第 1—10 页。

作都是研究中欧，并且全用德文出版。在维也纳时，他和诺尔贝特·克雷布斯及罗伯特·锡格尔等同代人，都在彭克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他出生在维也纳，在大学学习地理学、地质学和历史学。他最初（1905）研究维也纳盆地的地形，但不久对这个城市的本身产生更大的兴趣。他以摩拉维亚门地区的文化地理一文，在 1915 年取得在大学讲学的资格，并因而获得维也纳大学的讲师职位。他一生致力于中欧人文地理学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迁居到巴塞尔，一直住到 1928 年。接着，他随克雷布斯到弗赖堡，在那里住了三年。然后他又回到维也纳，接替托马舍克和奥伯洪默尔，主持人类地理学讲座。

他的职务是指导区域地理的研究；他早年（1910）从事研究维也纳的位置和形态结构，1916 年以地图集的形式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他还从人类占有的观点，继续对奥地利东部地区进行研究。他重视区域地图集工作，并负责绘制布尔根兰地图集；1917 年他出版了一本优秀的《中欧》（Mitteleuropa）地理学。他的其他主要著作包括 1938 年克卢特《手册》（Handbuch）里的人类地理学部分和 1931 年历史学的地理基础，但他个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奥地利和东南欧的区域地理。

阿尔夫雷德·吕尔

阿尔夫雷德·吕尔（1882—1935）[1]在柏林大学地理系海洋研究室担任地理教授多年。因此，他是实际推荐他担任此职的阿尔布雷希特·彭克的一位同事。吕尔在经济和社会地理领域里，是一位既严肃而又多产的作家，而且正如现在所证明的那样，他是走在他那个时代的前面的。说英语的地理学家中甚至不熟悉他的名字，更不用说他的著作了。但他代表着近代地理学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趋向，这种趋向，在他死后已成为地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课题。正因为如此，我才要简略地讨论一下阿尔夫雷德·吕尔在德国地理学成长中所处的地位。

吕尔 1882 年出生在柯尼斯堡，以后在柯尼斯堡、莱比锡和柏林等地攻读地理学和自然科学。他在柏林和马尔堡继续他的正规学习，并于 1909 年被任命为马尔堡大学菲舍的助教。1912 年他到柏林大学海洋研究室，在彭克手下任职，1914 年成为次于彭克的第二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他接受柏林高等工艺学校的名誉教授职位，并于 1930 年进入柏林大学教授的行列。他身体不健康，于 1935 年 8 月在瑞士病逝，终年五十三岁。

吕尔是李希霍芬的最后一位博士候选人,他 1906 年提出的关于地中海沿岸海流对地形影响的论文，是受到李希霍芬的启发而写成的。他继续对地中海地区进行研究，主要是地形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他去马尔堡的一个原因，因为菲舍那时被认为是这个地区的权威。吕尔的地形学工作的顶峰，是把戴维斯《地形的解释性描述》讲稿，从英文翻译过来（1912 年出版）。这本书在德国引起强烈的影响，吕尔一直（和古斯塔夫·布劳恩一起）被认为是戴

---

[1] 关于阿尔夫雷德·吕尔，可参看下列著作：O.克韦勒：《阿尔夫雷德·吕尔》，《彼得曼地理通报》，81（1935），第 368—9 页；K.厄斯特赖希：《阿尔夫雷德·吕尔》，《地理杂志》，42（1936），第 143—7 页；R.施泰因梅茨 1938 年为吕尔《普通经济地理学导论》一书写的评论性序言。这本书还包括吕尔的著作目录（第 85—93 页）。

维斯学派的积极支持者。

现在他转向和他的名字有特殊联系的经济地理学领域。1912 年他在美国参加了由他的好友 W.M.戴维斯领导的横贯美洲大陆的旅行，在这次访问中，他对旧金山和纽波特纽斯进行了考察，后来又出版了这份考察报告。彭克的目的是让吕尔转向人类与海洋有关的经济方面，这也许就是他兴趣改变的原因。1920 年海洋学研究室出版了他关于德国港口外贸的论文，1926 年在同一丛书内，出版了他以澳大利亚东部为例，说明位置在农业地理中的作用的另一篇论文。在二十年代晚期，出版了他关于西班牙人、东方人和美国人的经营精神的论文专辑。他打算在这个专辑里，继续研究意大利人、丹麦人、英国人和中国人。因此，他最终目的是能写成一本《人类经济类型学》（TypologyofEconomicMan）。在这三篇已出版的论文中，他表现了惊人的博学和独特的研究方法。

吕尔反复争辩的主要论点是，人类经济地理学必须建立在牢固的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经济学的基础上。然而在他的那个时代（今天仍常常如此），按照李希霍芬和彭克的传统，地理学家接受的训练，几乎全部限于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其结果是发生经济行为的场所，往往被认为是决定于自然力量，而不决定于经济力量。他的研究方法，在其身后 1938 年出版的题为《经济地理学导论》（EinführungindieWirtschaftsgeographie）一书中阐发得最为明确；该书附有阿姆斯特丹著名人文地理学家 R.施泰因梅茨的长篇序言。作为对“地理决定论”的严厉批判，吕尔坚持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演绎推理是必要的，但还是不够的。假说必须提出来，但不可能被精确地运用，因为空间变异因子的数量大，情况错综复杂。通过归纳，即通过对大量的具体、特定地区的概括，可以使地理学达到最高度的正确性——这是李特尔所透辟阐明和坚定遵循的原则，也是吕尔“地理心理学”论著的目的。

特别需要注意吕尔的最后著作，它论述“劳动力的国际分配：根据美国进口的统计研究”。这本书在 1932 年出版，表现了吕尔提出问题和用统计资料回答问题的严肃性。他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例如：什么是决定一个国家的进口商品的因素？各种进口商品间有什么数量关系？进出口和国内生产有什么联系？他利用美国 1927 年的贸易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仅有略多于百分之十的进口商品和它自己国内的产品直接竞争。

吕尔常常反复主张：“地理学必须象物理学和植物学那样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为了这一目的，它的领域必须是有限的，它的方法必须更严密些。吕尔试图在经济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领域里都这样做。巧合的是，在 H.劳滕萨赫新近的主要著作关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区域”划分一书中，从完全不同的地理学角度也提出相同的见解。

指出这一点是有意思的：在三十年代晚期，对吕尔著作作出最突出最有眼力的评价的是两名荷兰地理学家；他们是阿姆斯特丹的人文地理学家 R.施泰因梅茨和乌得勒支的地形学家 K.厄斯特赖希。从那以后，他的著作似乎已经引退了——甚至在英文文献中，没有一处提到它的。然而，在 1960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位地理学家正确地或是错误地企图论证：吕尔的研究方法，受到一种与共产主义哲学相近，而与西方资本主义哲学疏远的社会经济观的支配。他说——我相信这是十分错误的——西方哲学家仍然认为人类经济的空间变异因子主要是受自然，而不是受社会哲学目的的支配。这是对西德当前研究趋向的一种粗暴的曲解，而且和其他那么多事情一样，似乎要比

西方的观点落后一个时代。毫无疑问，吕尔是强烈反对纳粹，但不能从这一点得出吕尔是共产主义者的结论。被这个共产主义同行直接攻击的一位著名的年轻的德国经济地理学家 E.奥特伦巴（Otremba），在一封私人信件里写道：在西德，人们高度评价阿尔夫雷德·吕尔在推进地理学思想，特别在人类经济领域内的功绩。奥特伦巴总结说：三十年前，“他是一位首倡者，他的著作将会传留下去……而他这样做可能是为时过早了”。这个评价，在三十年代初期曾与吕尔在柏林短期共事的卡尔·特罗尔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得到肯定。现在，地理学家们普遍地同意这个评价，例如 H.哈特克和 H.博贝克就持这样的观点，他们两人在柏林时都曾受到吕尔的影响；另外，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很多证据，表明战后年代有相同的发展趋向。虽然工作者们可能对吕尔的著作一无所知，但他的观念在定量分析的相同发展中是明显可见的，在德国和法国，以及英国和美国情况尤其如此。当前的危险是，这些趋向可能过分地偏向社会科学，就象五十年前过分地偏向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那样。

参考资料

从本书付排以来，已经出版了下列著作：

弗兰茨·特默尔：《卡尔·特奥多尔·萨佩尔，1866—1945；一个德国地理学家兼地质学家的生活和著作》（KarlTheodorSapper，1866—1945；LebenundWerkeneinesdeutschenGeog-raphenundGeologen），《德国人的生平》，第 12 卷《自然科学家》（LebensdarstellungenDeutscherNr.12，Naturforscher），第 89 页，1966 年，莱比锡。K.H.施罗特：《罗伯特·格拉德曼：生平的回忆：纪念他的诞辰》（RobertGradmann：Lebenserinnerungen：zurWiederkehrseinesGeburtstages），第 164 页，1965 年，斯图加特。

第十二章　第三代大师

德国第二代地理学大师在二十年代晚期相继退休。彭克、赫特纳、施吕特尔和另一些人都是如此。纳粹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哪些人是大致从 1933—1945 年间的第三代的领袖人物呢？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战争中战死：如汉斯·德里斯（明斯特）和汉斯·施雷普费（维尔茨堡），前者是格廷根大学迈纳杜斯的学生。但是，这个时期有三位学者具有强烈的影响，即奥斯卡·施米德、莱奥·魏贝尔和威廉·克雷德纳。诺·克雷布斯似乎也该放在这里，因为他是彭克在维也纳的早期学生，最后又是彭克在柏林的继任人。

诺尔贝特·克雷布斯

诺尔贝特·克雷布斯（1876—1947）[1]是奥地利人，他在维也纳大学得到当时最伟大的三位欧洲学者——彭克（地理学）、休斯（地质学）和哈恩（气候学）的指导。他在 1903 年写出第一篇论文：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1907 年他以关于伊斯特利亚半岛的一篇论文取得大学教师的资格。克雷布斯先在的里雅斯特教了几年中学，1909 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讲师。彭克离开维也纳到柏林之后，他和爱·布吕克纳和奥伊根·奥伯洪默尔一起工作。1913 年，他出版了关于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重要区域地理著作；该书后来经过增补，并以《东阿尔卑斯山和今日奥地利》（DieOstalpenunddasheutigeOsterreich）为名重新出版（1928）。

不久，克雷布斯应聘去德国，并在那里终老。1917 年他接受邀请去维尔茨堡，接着去法兰克福，不久又去弗赖堡，他在这里度过七个年头。1926 年他继彭克在柏林大学任教。他的三卷关于德国西南部的著作，反映了他曾在那个地区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在柏林，他还进行有关德国领土统一的研究（人们感到，他之所以作这项研究，不但是由于他出生于奥地利，而且是受了他老师彭克的影响）。他的《德国和德国边界》（DeutschlandundDeutschla-ndsGrenzen）一书在 1929 年问世；在三十年代，他编绘并促成《德国在中欧的生存空间》（DeutschesLebensrauminMitteleuropa）这一精美地图集的出版，这也是由彭克倡导的一项计划。1931—1932 年克雷布斯到印度游历，从而产生了常被人们认为他的最优秀著作《前印度和锡兰》（VorderindienundCeylon），该书出版于大战爆发的前夕。克雷布斯在 1943 年退休，由于躲避轰炸而离开了家乡，暂时隐居在维也纳附近的一个村庄，1946 年回到柏林，不久即逝世。

莱奥·魏贝尔

莱奥·魏贝尔（1888—1951）[1]被一位德国同事戈特夫里德·普法费尔推

---

[1] 《地球学》中关于诺尔贝特·克雷布斯的讣告；胡·哈辛格：《纪念诺尔贝特·克雷布斯》，《地球学》第 2 卷（1948 年），第 200—202 页。

[1] 关于莱奥·魏贝尔，请参看他的最年长的学生 G.普法费尔为他七十五岁寿辰写的一篇简短而重要的评价文章，《地理杂志》，第 51 卷（1963），第 4 期，第 265—267 页。

崇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魏贝尔在海德尔堡受 A.赫特纳的培育，另外，也曾在巴塞尔跟非洲专家 F.耶格尔学习过一段很短的时期。他在科隆当过托尔贝克的助手，并和他一起首次访问了德属喀麦隆（1911—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德属西南非洲，整个大战期间，他被拘留在那里。1919 年他回到科隆做了一年讲师，接着又去柏林当了一年讲师，1922 年成为基尔大学教授。1925—1926 年，他在墨西哥进行长期的野外调查，从而写成了有关恰帕斯州马德雷山脉的论著；他的经济地理学观念在这部著作里第一次得到发展。他在基尔任教七年，接着在 1927 年应聘到波恩任教授，一直到 1937 年为止。然后他离开德国到美国，战争期间他留在那里，以后去巴西住了五年（1946—1950），又转到美国住了一年（1950—51），1951 年回到波恩去。在他回到波恩的前夕去世。

魏贝尔在他成长的年代里，不仅受到赫特纳的巨大影响，而且也受到阿尔布雷希特·彭克和奥托·施吕特尔的巨大影响。他的最突出的成就是在经济地理、特别是农业地理的领域；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方法，是对空间系统而不是对作物及其他单项事物的分布进行分析。他在海德尔堡赫特纳手下工作时，逐渐熟悉了 J.H.冯·蒂南、爱德华·哈恩和 T.H.恩格尔布雷希特的著作。他很早就想调和赫特纳和施吕特尔观点之间的矛盾，后来由于遵从阿尔布雷希特·彭克的著名格言“观察是地理学的基础”（彭克在 1906 年进入柏林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提出这个论点）而达到这一目的。魏贝尔对彭克评价极高，称他是“天才之国的君主”。在科隆，魏贝尔也受到著名的经济历史学家布鲁诺·库斯克（BrunoKuske）的影响；库斯克致力于研究经济空间系统中不断变化着的空间结构，例如科隆在德国西北部地理经济结构中的作用。魏贝尔试图利用这些不同来源的促进因素来推进地理学（通过他自己和他学生的工作），寻找那些能反映人类活动和态度的空间变化的、可见景观中贴切的、重复出现的特征。这就是赫特纳、施吕特尔和彭克的观念的综合。他发展了经济结构和生存型式的观念，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戈·普法费尔所谓的魏贝尔系统。

“人类居住的每一个地区都有它特殊的经济型式。和它相适应的是一种取决于经济活动单元（企业型式）的特征及其生产目的的特殊经济景观”。因此，根据魏贝尔的意见，一种特殊耕作类型，在组成一个耕作和农业实体的区域内总有一种分布的形式。它是更大范围内耕作的一部分，这些活动共同构成了农村经济的主要型式（经济型式）。每一个这类经济型式，都和一种相应的和独特的经济景观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景观的本身则是由人们引进和控制的栽培植物的一种组合，莱奥·魏贝尔把它叫做“经济结构”[①]。

他的观念与植物生态学家的生态学目标非常相似。这些目标和方法，反映在他的学生所写的关于石勒苏益格和德国西北部的著作中。他们当中今天最著名的有：J.施米蒂森（Schmithüsen），是第一流的植物地理学权威，他对地理概念结构的理论问题有兴趣；W.米勒·维勒，一位文化地理学家和研究德国西北部的专家。魏贝尔早期（在基尔）的学生戈·普法费尔，后来成为他在波恩的同事，现在在海德尔堡，是德国第一流的地理学家之一。基尔的 H.威廉密（提宾根）也是魏贝尔（和施米特）在基尔的追随者，他早期对保加利亚农村聚落和索非亚城市的研究著作，清楚地揭示了这一事实。威廉

[①] 莱奥·魏贝尔：《农业地理问题》，布雷斯劳，1933 年。

密目前在斯图加特，主要研究地形学，但他对城市地理仍感兴趣，这一点在他关于拉丁美洲城市的一书中是很清楚的，拉丁美洲是他游历和研究的主要地区。

热带是魏贝尔野外和室内的研究领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1911—1912），他和 F.托尔贝克一起首先在非洲的喀麦隆开始工作；从南非被释放回来以后，出版了一本论热带非洲资源的书（1937）。1937 年他离开德国，把活动地区转移到巴西，对那里的地理学同事有很大影响，并根据野外工作，特别是在德国人移居的南方省份的工作，写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论著。他经常考虑想写一本热带地理通论，但他的具体的职业活动和野外工作，占去了他在 1951 年逝世以前的全部时间。因此，魏贝尔的观念和影响遍及三个大洲。

威廉·克雷德纳

威廉·克雷德纳（1892—1948）[1]是德国第三代地理学家中最多产和最有能力者之一。由于去世比较早，所以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更不用说他的著作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和瑞典的乌普萨拉作短期逗留，然后在赫特纳指导下研究地理学。和他的同学施米特黑纳及耶格尔一样，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地形学问题的——奥登瓦尔德和斯佩萨尔特结晶岩区的地形。他由于家学渊源而获得地质学方面的知识，并以被培育为采矿工程师而开始他的生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以非凡的洞察力，探讨德国西南部准平原和悬崖的起源问题。1927—1931 年，他在暹罗和中国南部工作了四年，继续他的地形学研究，衡量各种形态发生学因素在地形上的相对重要性（发表在 1931 年的《中国地质学会会刊》和 1935 年一本关于暹罗的书中）。这些观念奠定了近代气候地形学的基础。可是克雷德纳放弃了早年对地形学的贡献，转而去研究经济地理学。

他对经济地理学的兴趣，无疑是受赫特纳的另一学生莱奥·魏贝尔思想的影响。克雷德纳离开海德尔堡到基尔去作魏贝尔的助教，并以一项讨论瑞典的景观和工业的著作而取得在大学讲学的资格（1925）。他在三十岁时成为讲师。克雷德纳发展了魏贝尔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区域“的观念。有意思的是，这种共同的兴趣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魏贝尔的来自生物学（特别是动物学），克雷德纳的来自地质学（采矿）。克雷德纳从地理角度写了许多关于采矿的著作——瑞典的矿藏、世界产金地区、美国的铁矿床。但死亡中止了他打算写一本普通采矿地理学（矿床、生产和运输）的意图。他打算在这本书中，不仅评价生产的物质因素，而且要探讨对生产有联系的社会条件，如劳动力的供应和运输设备等。

他没有写过理论性文章，但他的观念在具体著作中是明显可见的。拉特延斯写道：“和魏贝尔一样，他把经济区域作为他的研究中心。他从外貌上，并且根据自然基础和经济力量，从生态上考虑经济区域的区域表现。在他看来，经济区域是具有同样经济烙印的地区。他不仅企图划出这些区域的界限，

---

[1] C.拉特延斯：《威廉·克雷德纳诞生七十周年纪念》，《地理杂志》，第 51 卷（1963），第 2 期，第 81—89 页。

而且要明确划分它们的类型。”他关于这方面的最后著作，是西印度群岛和美国的农业区域。他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来自魏贝尔的生物学模式的方法，强调不仅需要从外貌和生态方面进行研究，而且需要探讨这种空间结合的历史发展。克雷德纳强调地理学家应该研究经济学是不奇怪的，因为他是慕尼黑高等技术学校的经济地理学教授。通过发展的方法（诊断）到达他非常关心的空间计划（判症），是一条捷径。

克雷德纳是直接研究东南亚广大地区的专家，他写的关于暹罗的书，是区域地理学的一部杰作。他早年发表的关于瑞典的著作也是如此，这是在他动身去东方以前完成的。他也指出地理学家的研究方法在解决发展中地区的问题方面的价值；这些地区，在一代人以前被习惯地描绘为“殖民地”。

农业地理学从他硕果累累的学术事业中得到好处。这一事业，无疑是从他在基尔与魏贝尔的接触时开始的。1932 年克雷德纳迁居到慕尼黑，仍然继续这项工作，并且（在施米蒂森的帮助下）通过 1937 年建立的“农业地理协会”，开始绘制第一批 1∶5，000 的土地利用图。他也殷切希望绘制一套德国农田系统地图集。他的想法已经成为一项付诸实施的计划；因为当代杰出的经济地理学家 E.奥特伦巴自大战以来，就已着手编绘德国农业区域地图集[①]了。克雷德纳在 1938 年和 1942 年写的两篇文章中，说明了编制大比例尺土地利用图的目的。他的目的不仅是记载土地利用的情况，而且要表明整个农业结构的空间变化因子——开阔或围篱的田地系统、小块田地的分布、农民拥有土地面积的大小、轮种、所有制、农庄与田地的距离。魏贝尔在波恩地理系里也曾做过这类工作，许多幅地图的比例尺是 1∶25，000 的，自世界大战以来，慕尼黑的哈特克和波恩的特罗尔都在按照前辈作出的范例，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总之，克雷德纳是区域地理大师之一。他题献给赫特纳的那本关于暹罗的书，现在仍然是论述这个国家的标准著作。克雷德纳从在海德尔堡获得博士学位到 1948 年 10 月逝世，仅仅度过了二十六年，但他却是通过魏贝尔而上接赫特纳、施吕特尔和彭克的德国地理学学说锁链中坚强的一环。

奥斯卡·施米德

1961 年，人们以一卷新大陆地理论文集来祝贺奥斯卡·施米德（1891—）[②]的七十寿辰。文集供稿者包括了：“朋友、学生和同事”，其中有当代最著名的地理学家 W.劳尔、C.朔特、H.威廉密、H.施伦格和 H.布卢默（H.Blume）。1936 年，我决意访问施米德领导下的基尔大学地理系；它是德国最活跃、最有特色的地理系之一。以下资料主要取自劳尔教授在施米德《纪念集》开头所写的评价文章。

[①] 《西德农业景观地图集》的第一部分在 1962 年出版。它是由 E.奥特伦巴编辑的，但绘制工作是由许多大学的地理学家和其他人员进行的。他在财政上得到德国研究协会（德国战后最大的专业企业之一）的支持。全图包括五个部分——土地利用系统总图；表明土地利用和自然条件关系的总图；城市边缘土地利用图，以汉堡为例；与历史发展和目前形式有关的社会结构图；德国各个差异明显地区的代表性的大比例尺田地系统图。为了了解总的情况，请参看 T.克劳斯写的评论文章：关于地图集第一卷，《地球学》，19（1965 年 11 月），第 337 页。

[②] 关于奥斯卡·施米德，请参看 W.劳尔为《纪念册》写的序言，《地理研究》，20，基尔大学，1961 年。

施米德求学于柯尼斯堡、波恩和海德尔堡。1914 年，他在海德尔堡，在赫特纳指导下，以研究西班牙格雷多斯山地形的论文而取得了博士学位。他随即前往智利，对新大陆作首次访问，但大战爆发，他被迫迅速返回德国。他服军役直到战争结束，然后回到波恩，重新从事学术研究，并在菲利普松指导下取得在大学讲学的资格。他几乎立即决定回到南美洲。他受聘到阿根廷科尔多瓦大学任矿物学教授，同时进行了多次广泛的旅行。1925 年他应到任不久的卡尔·索尔的邀请，来到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他在伯克利任教几年以后，在 1932 年，受聘为基尔大学地理学教授。不久以后，关于南美（1932 年）、北美（1933 年）和中美（1934 年）的三本书分别出版。很明显，这几本书是他旅居加利福尼亚时写的。后来，他和年轻的同事 H.威廉密，到阿根廷和格兰查科去游历。1940 年他担任地理年会主席；另外，还担任了五年（整个战争时期）实际由他创立的德国地理学会这一新组织的主席；这个学会曾出版三本从地理学方面讨论当时问题的书籍（关于欧洲人民的生存空间问题，1940、1941、1943）。1944 年他在哈雷作短暂逗留。战争结束时，他失去了所有的物质资产，他在基尔的房屋和藏书。他长期定居在基尔郊区的避暑别墅里。1951 年他代表西德参加墨西哥大学成立四百周年的庆祝活动。不久，他开始重写关于新大陆的著作；由于这个原因，他在 1956 年退休以后，接受了智利圣地亚哥大学的聘请，担任客座教授（1958—1959），以便了解自从他 1914 年第一次访问以后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的这个国家的最新知识。

施米德也在旧大陆、北非和巴基斯坦进行过广泛的考察。在巴基斯坦，他被请去建立卡拉奇大学新设的地理系。他在国外总共度过了约十五年，其中有十三年是在新大陆。他通晓其他民族，特别是美洲民族的语言、文化和观点。他对英语和西班牙语造诣很深，他在中、南美各地有许多学生。

施米德和他的大多数同代人一样，开始是研究地形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但他很早就转而对人文要素作更实际的估价。人们特别指出施米德抱着这样的观念：地理学的中心论题是原始自然景观向人类居住地或文化景观的转变，这是一种显然要用历史来解释的概念过程。W.劳尔写道：“地球的发展，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的转变，地理区域发展到现代面貌的历史过程，都是他，以及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们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方法是他关于新大陆著作的特点；他在主要地理区域的一般范围内，历史地讨论景观问题，而不十分注重明确它们的界限或区划。“运用这种方法，他就超越了至今为止他所接受的各种观念，而且也部分地超越了他老师赫特纳的观念。人们认为他关于新大陆的三本书，是试图把罗伯特·格拉德曼对德国南部的历史研究法应用于整个大陆（格拉德曼早在 1901 年就已概括地阐明他的观点）”。劳尔就是这样写的。在《旧大陆》（DieAlteWelt，1965 年，第 15 页）一书中，施米德用自己的语言肯定了这一点。他探索一种能为人类感觉到的、作为人类居住地的“景观的形态学”。在他的学生的著作中，这个目的也是明显的，例如朔特早年对安大略聚落型式的研究；威廉密对保加利亚农村聚落和索非亚城市的研究，它们都发表在施米德所建立的那个大学的地理丛书内。

为了解释今日的可见景观，施米德始终是一位可见景观的机敏而又有辨别力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也是一位图书资料（英文、西班牙文和德文）的热心的使用者。习惯和居住地，社会和景观，是他研究方法的基础。他的方法和美国的索尔、法国的皮埃尔·德方丹（PierreDeffontaines）的方法十分

相似，而且很多是从赫特纳和施吕特尔那里学来的。从 1932 年起，他在基尔建立起一个思想流派，并且创办了一套研究论文集。在地理学实地观察的方法和目的方面，他是一位热心的教师；他力求尽可能早地向学生介绍地理学的历史，以及地理学伟大创建者的旅行和观察结果。

施米德著作的顶峰是那部题名《旧大陆》的巨著，它的两卷中的第一卷出版于 1965 年，内容是讨论东方的（北半球的干草原、沙漠及其边缘地带）。这部著作是由拉策尔和彭克创立、现在由劳滕萨赫和科尔布编辑的那套手册丛书的一卷，它的第一卷题献给阿尔夫雷德·赫特纳。

关于美洲的三部地理学巨著，初版于三十年代早期，后经重写成全新的两卷（中、南美洲和北美洲）分别于 1962 年和 1963 年出版。1953 年在墨西哥出版一本用西班牙文写的关于旧大陆的著作。在施米德的研究专著中，南美潘帕斯大草原的起源（1927 年），人们在巴西定居的原址（巴西文化之家）（1929 年）和东玻利维亚安第斯山（1926 年），这三种最受人们重视；它们全部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出版。他在 1955 年发表的最新的讲话，是讨论“农业制度和田地类型以及它们在形成文化景观中的影响”问题。这是他在卡拉奇巴基斯坦科学会议上以主席身份所作的演说。在施米德的著作中，人们看到施吕特尔、赫特纳和格拉德曼研究方法的一种巧妙的结合，它使得地理学在研究和文字叙述上都前进了坚实的一步。在聆听施米德的教导和研读他的著作以后，我本人才能够确切了解三十年代中期德国地理学界众说纷云的理论争论，这是施米德所完全不知道的。①

参考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详细书目，刊登在 1936—1946 年的《德国自然科学研究与医学》（NaturforschungundMedizininDeutschland）丛书中，它是德国科学的菲亚特（FIAT）评论的一部分。第 44、45、46 和 47 各卷都讨论地理学，而且全部是由提宾根的黑尔曼·冯·维斯曼编辑的。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目录汇编，它包括了这个时期德国地理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次世界大战之间一般的研究趋势。《从 1933—1945 年的德国地理科学》（Diegeographische WissenschaftinDeutschlandindenJahren1933bis1945），《地球学》，第 1 期（1947）第 3—48 页，后由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翻译出版，第 39 卷（1949），第 99—137 页。

第十三章　第四代大师

这一章和下一章的目的，是追溯近二十年来的主要研究趋向。这一章将从杰出的人物中，挑选这样三位来加以介绍：他们的观念和主要著作不仅在他们的特殊领域，而且在一般地理学界和公众兴趣方面都有影响。现在我们选择了下面几位——黑尔曼·劳滕萨赫，卡尔·特罗尔和汉斯·博贝克。其他人之所以被略去，完全是由于篇幅有限。下一章将探讨研究的趋向，而不去评价各个地理学家。这两章合在一起，将揭示地理学的重大问题和它的前景。在后面的法国部分，也将按同样的方式处理。

黑尔曼·劳滕萨赫

黑尔曼·劳滕萨赫（1886—），在1966年9月20日满八十岁，用卡尔·特罗尔的话说：他是德国“区域地理学方面无可争辩的研究大师”[①]。他生于1886年，是戈塔一位著名的学者和预科学校教员的儿子。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尤斯图斯·佩特斯绘图学院，劳滕萨赫在童年时代就常常有机会会见学院院长——A.苏潘。他还和黑尔曼·哈克（HermannHaack）保持着终身的密切友谊；哈克在佩特斯学院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制图学家之一，于1966年逝世。

苏潘劝劳滕萨赫和黑尔曼·瓦格纳同去格廷根学习。劳滕萨赫于1905年到了那里。不久，他暂时去弗赖堡，接着又到阿尔布雷希特·彭克刚刚接替李希霍芬的地方——柏林。劳滕萨赫当了彭克的助手，并在1910年以提契诺冰川地形一文而获得博士学位；他还写了一篇长文来评论彭克和布吕克纳那部关于阿尔卑斯山冰川时代的巨著。他和彭克的终身友谊，也反映在1958年彭克诞辰一百周年和德国第四纪大会（主要是地质专家的会议）的时候，他在斯图加特他老师的墓地前发表纪念辞这一事实上。

尽管在彭克指导下，他的研究生涯有了令他兴奋的开头，他还是决心去当教师，他从1911—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军役时间除外）一直在汉诺威大学预科学校任教。他和佩特斯学院的H.哈克，都是为地理教学服务的杂志《地理学通讯》（Geographi-scherAnzeiger）的积极编者。1924年他应卡尔·豪斯霍费的邀请和另外两位著名地理家奥托·毛尔及埃里希·奥布斯特共同编辑新期刊《地缘政治学》（ZeitschriftfürGeopolitik）杂志。所有这三人都不喜欢这个刊物的政治倾向，早在1933年前，就和这家期刊脱离了关系。在二十年代，他修订了苏潘的三卷《中学地理》（school-geography）标准课本；为施蒂勒《袖珍地图册》（StielerHandatlas）写了两本说明书；彻底修订了聚多-瓦格纳的《系统教学地图集》（Sydow-Wagner，MethodischeSchulatlas）。

1927年，他离开汉诺威的学校岗位，到吉森去做弗里茨·克卢特（他们几乎同岁）的助手。他用以取得在大学讲学资格的著作是关于葡萄牙的海岸地形研究（1928）。为了这部著作，他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去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同时他还出版了几种关于伊比利亚半岛气候和地形的著作；此外，他也研究文化地理学问题。最后，他写出了一本综合性的葡萄牙地理学，由于

[①] 卡尔·特罗尔论黑尔曼·劳滕萨赫的文章，载《地球学》第20卷（1966）第243—252页。这些简略的传记是根据对各个学者著作的了解和私人间的通讯写成的。

这本著作，他在 1937 年获得科英布拉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此后，他把技能和热情转向世界遥远的一角——朝鲜。他以一种“几乎不可想象的精力和毅力”（特罗尔语）远游 15，000 公里。经过这番艰苦的跋涉和研究，他写成一本大部头的标准著作（1945）和一本较短的小册子（1950）。

当他从朝鲜回来时，他已成为德国第一流的地理学家。1934 年他应邀到不伦瑞克的高等技术学校任教，但在 1935 年，他到格赖夫斯瓦尔德去接替古斯培夫·布劳恩的职务。他在那里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用十年时间写成了关于朝鲜这部巨著。1939 年劳滕萨赫的前妻（葡萄牙人）去世，他第二次结婚，他的继配是一个地理学家和合作者。战争以后（1945）他已六十岁，没有职位，自愿移居西德。他在施佩耶尔找到一个职位，但为时不久，就在 1947 年他接受斯图加特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职务，在那里一直到 1954 年退休。这个学校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轰炸破坏而成为废墟，必须全部重建和重新装备。可是他在退休以后，仍继续进行研究，到 1965 年八十岁时，还是工作得很活跃。

特罗尔说，劳滕萨赫是对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两个领域都进行研究的还活着的极少数地理学家之一；因为他是研究区域地理的，所以他才这样做。他总是坚持地理学要有清晰的概念和明确的范围；在这方面，他是追随比他大十岁的长者克雷布斯。他们都是彭克的学生。他是从克雷布斯那里接过《地理手册》（Geogra-phischenHandbücher）的编辑工作，并完成克雷布斯未完成的《比较区域地理学》（VergleichendeL■nderkunde）的著作的；这本书的第三版出版于 1966 年。劳滕萨赫的地理学理论体系是以自然科学、数学、哲学及教育学等方面的正确的知识和评价为基础的。他非常熟悉德国以外的地理学思想，因为他对葡萄牙语、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都掌握得很好。他是三个科学院的院士，得过五枚高级奖章。

劳滕萨赫在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上费了不少心血，企图弄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1933 年他在《手册》里讨论了这个问题。从那以后，他发展了一种区域地理的理论；1951 年，在波恩新建的很大的地理系开幕时所举行的纪念李希霍芬的学术讨论会上——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他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这个理论。地球表面区域变异（区域概念的精髓）之间的各种联系，受到从地方到世界范围的全面探讨，这也正是赫特纳和彭克的想法。劳滕萨赫用归纳的方法，把世界划分为包括四十个主要区域单元的体系。他最近运用这个理论在伊比利亚半岛作详细的研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再谈。形态转变学说（Formenwandel-lehre）是劳滕萨赫三十年来关心的主要问题。它正如特罗尔从教学经验中证明的那样，确实具有“巨大的启发和教育价值”。汉斯·博贝克指出：这种研究方法（下面还要讨论），虽然可以适用于自然现象领域，但在文化和社会现象领域内则有一定的限制。在后一领域内，其他问题诸如文化的和经济的组合就要包括进去；但特罗尔总结说，劳滕萨赫的方法，无疑地会在将来了解地球表面区域差异方面起着有效的跳板的作用。

劳滕萨赫，虽然本来是跟彭克学习的，但很早就转向奥托·施吕特尔的观点，把他看作自己的导师。“这反映了进入本世纪以来，施吕特尔给予地理学的巨大的促进”（特罗尔语）。1952 年劳滕萨赫在《彼得曼通报》上写了一篇评论施吕特尔著作的文章，用以纪念施吕特尔诞生八十周年。他在文

章中，试图将支配本世纪头三十年地理学思想的、施吕特尔与赫特纳的不同观点混合起来。

卡尔·特罗尔

卡尔·特罗尔（1899—）[1]从 1937 年起任波恩大学地理学教授，1960—1964 年任国际联合会主席，是战后几十年中一位世界著名的地理学家。

特罗尔生于巴伐利亚因河上的瓦萨尔堡，1919 年进入慕尼黑大学攻读包括植物学和地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他在 1921 年取得植物学博士学位。同年（二十二岁）受聘为地理学教授、北极探险者、李希霍芬的学生埃里希·冯·德里加尔斯基的私人助手，条件是特罗尔要为取得大学教师资格而研究植物地理学（把地理学和植物学结合起来）。特罗尔写信告诉我说，那时他的成长受到慕尼黑植物学教授玻利维亚植被专家赫尔措格（Herzog）和罗伯特·格拉德曼（他的学术研究已在第 166—168 页讨论过了）两人很大的影响。特罗尔取得大学教师资格的论文是关于海洋条件对中欧植被的影响（1925），这篇著作引起了一系列有成果的研究。对于阿尔卑斯山前地带冰川学的首次研究结果，出版于 1924 年；这一研究受彭克很大的影响，是从因河-希姆湖地区的他家乡附近开始的。这篇论文的副题“阿尔卑斯山前地带典型冰川的地理概况”揭示了它的基本目的是地理学的。这一著作紧跟在他老师彭克的著作之后。1926 年，他发表一篇关于德国阿尔卑斯山边缘新冰川砾石——表面特点、植被和景观的专论。特罗尔对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前地带冰川地形的研究，大约在 1930 年告一段落。这和 A.彭克对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前地带冰川地形的首创性研究，在地区和目的上都非常相似。特罗尔在私人通信中说，虽然他没有跟彭克学习过，但他认为自己是彭克的追随者之一；这一点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对冰川地形学和景观单元概念所作的第一次实地研究中得到充分证明。特罗尔学术活动的第一阶段就这样结束了。

特罗尔说，当他在他的家乡因河-希姆湖地区研究冰川阶地起源的时期（二十年代），他意识到土壤、坡地和植被是互相依存的。他说，他就这样成为一个地理学家，或者如同他喜欢说的，成为一个区域生态学家了；在区域生态学里，地形学、土壤科学、植物、气候和水文都是互相联系的。1924 年（由于德里加尔斯基的推荐，而受到德国研究协会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他在北欧进行了三个月的游历。

1926 年 5 月，特罗尔开始他的第一次国外探险研究。他到达热带的安第斯山，他选择这个地区是受了赫尔措格和彭克的影响。他在那里工作了三年，研究地形学和植物学，还作为德-奥高山协会的登山探险成员，对科迪勒拉山进行立体摄影测量（1928）。特罗尔写道：“我收集了 16，000 件标本（在战争中全部烧毁），拍摄了航空照片，研究了过去的冰川作用、土壤结构和印第安人（土著）的农业。”他受一家航空公司的邀请，飞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的上空，从而取得了判读航空照片的经验。

1929 年 9 月，他回到德国，移居柏林，任殖民地理学教授。在以后的年代里——整个三十年代，他出版了许多关于安第斯山的研究论文，讨论了地形、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问题。1930 年出版了关于热带南美洲“经济地理结构”

---

[1] 黑尔曼·劳滕萨赫论卡尔·特罗尔，《地球学》第 13 卷（1959），第 245—58 页。

的论文，这是他任柏林大学教授的就职演说。在这些已出版的实地考察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运用景观带和景观结构的观点对热带安第斯山的植被所作的研究（1931 年）。特罗尔一生深切关怀的问题是热带安第斯山的山地植被与高度、气候的关系。

特罗尔以柏林为基地，用一年时间（1933 年 9 月—1934 年 8 月）进行一次从东非厄立特里亚到开普敦地区的研究旅行，途中考察了气候、植被以及“殖民地”移民问题。1937 年他随一支探险队到柏尔巴特山，以后又回到东非。1937 年（5—7 月）他作为一名科学家，随同由 K.魏因领导的德国登山探险队第二次到柏尔巴特山；通过这次观察，他绘制了一幅 1∶50，000 比例尺的出色的植被图。同年，他从大吉岭经过喜马拉雅山南坡到达西藏边境，并绘制了一幅植被垂直剖面图。

1937 年底，特罗尔担任波恩大学教授。他继续研究气候学问题（特别是在热带地区随高度而产生的变化），创立了一套新的气候和植被分类法。1944 年他发表许多研究成果，其中有一篇关于“土壤结构、泥流和地球古气候”的专题文章。1944 年他用花粉分析的证据，来说明欧洲的冰缘景象、地质年代学和气候变化。

除了对地形学和生物地理学作出的卓越贡献外，特罗尔还长期地和积极地从事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作为三十年代柏林大学的殖民地理学教授，特罗尔为白人在东非殖民的可能性忙了一阵。他最近编辑了《大黑尔德地图集》（GrossenHerderAtlas），并对地理学方法论作出了贡献，因为他是第一个理解航空照片对地理学研究价值的人（从 1939—1943 年）。

特罗尔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在 1947 年创刊了《地球学》杂志。1947 年，他还对从 1933—1945 年间德国地理学的进展作了出色的全面研究。这是对这样一个人所作的学术评价；他在纳粹时期，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工作，拒绝与国家社会党政府发生联系。1949 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译登了他的文章。特罗尔关于地理学目的的观点，曾在 1947 年他创刊的《波恩地理论文集》（BonnerGeographischenAbhandlungen）第一卷上讨论过。

1965 年 2 月，特罗尔庆祝他献身学术活动四十周年。他获得维也纳大学六百周年校庆时授予他的荣誉学位，还有丹麦及意大利科学家协会名誉会员的称号。他在 1966 年退休。在特罗尔的一生事业中，人们时时想起另外两位地理学创建者——亚历山大·冯·洪堡，他在南美的同一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实地研究；以及特罗尔的年长的同代人和亲密同事阿尔布雷希特·彭克，他对冰川地形学和区域生态学的兴趣和研究范围（还有认识），同卡尔·特罗尔的著作有着惊人的相似。

汉斯·博贝克

汉斯·博贝克（1903—）[1]生于奥地利的克拉根福，但他的家庭在 1909 年移居到因斯布鲁克。他在那里度过了中学时代，以后进入因斯布鲁克大学。在研究因斯布鲁克的专题文章中（1928），他认为：与其说这个城市是一群具有各式风格的房屋，不如说它是城市生活各种力量的空间表现。这项研究是在地理系内进行的，那时的系主任是阿尔布雷希特·彭克早期的奥地利学

[1] 参看 W.哈特克在汉斯·博贝克诞辰纪念集中写的一篇评价文章，1963 年，第 5—22 页。

生约翰·瑟尔希。博贝克当了瑟尔希的三年助手，不过后者对他助手的观点影响极小。博贝克强调对作用的评价，认为它是从地理角度说明城市的关键，这种强调体现在他后来关于“社会地理学”理论的所有著作中，在德国社会科学学者中有广大影响。

1931 年，博贝克作为城市地理专家被 N.克雷布斯请到柏林大学。为了能在瑟尔希指导下取得大学教师资格，从而进入大学生涯，他就转而研究地形学。他在齐莱尔河和因河谷地中积极进行这项研究，受到彭克的热情接待，但很难说这是克雷布斯所预料的。1935 年 12 月，他通过这项地形学研究而取得大学教师资格，但由于政治原因，他有三年时间被禁止在柏林大学讲学。1934 年他第一次到波斯旅行考察，1936 年和 1937 年又去了一次。

波斯或伊朗成为他感兴趣的主要地区。他开始研究自然地理问题，诸如更新世和史前期的气候变化。他还绘制了一幅 1：100，000 的苏莱曼山脉地图。他本打算在这个地区进一步研究东方的城市生活方式，但由于 1939 年战争爆发，终止了这些计划。战争期间，他在东方从事情报工作以及制图和摄影测量方面的工作，他非常适当做这些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在战后对他很有用处。

从 1946—1948 年，博贝克被安置在弗赖堡 B 区。在这个短时期内，他写下了南巴登的农业地理和聚落地理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施吕特尔想请他到哈雷接替自己，但博贝克于 1949 年决定到维也纳的国际贸易高等学校。1951 年他到维也纳大学作胡戈·哈辛格的继任人。

在他祖国的首都维也纳，他的兴趣逐渐倾注在生态学上。他研究了波斯的植被，认为它是气候变化和人类破坏的表现。1955 年他发表一篇文章，主题是伊朗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和它对“景观生态学”的影响。1956 年及 1958—1959 年，他在伊朗的另外两次旅行中，主要是研究社会地理学的问题和计划写一本伊朗区域地理。

从他开始研究因斯布鲁克以来，社会地理学一直是博贝克的突出贡献。根据对两个文化领域——西德和远东所作的具体研究，他在各种场合都谈到社会地理学的目的。在目前英语文献（瓦格纳和米克泽尔：《文化地理文选》＜ReadingsinCulturalGeogra-phy＞1962 年）中，特别著名和易于得到的是他论述“从地理学观点看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那篇论文（1959）。对人类集团这种区域研究的核心，是现存的地理社会结构、它们的互相影响、生产和移民结合的方式。社会地理学不等于人文地理学，也不只是它的一个分支。它是“在整个地理图式的范围内对人类因素的探讨”。因此，它所研究的是“人类力量”的起源及其对作为空间结构的社会集团的影响。用哈特克的话说（意译博贝克的话）：这些结构是：“最基本的人文实体，所以也是最基本的地理（区域）单元。”对社会力量的这种强调，是博贝克和哈特克研究方法的基础，它和特别强调经济力量的 E.奥特伦巴学说是根本对立的。看来，奥特伦巴的想法接近于法国 P.乔治（P.George）的，而博贝克（和哈特克）对生态学方法的强调则与 M.索尔（M.Sorre）的意见有很多共同点。博贝克说：非经济力量（即社会力量）的支配地位在发展中国家内特别明显。

第十四章　战后的趋向

概况

“DieGeographieistRaumwissenschaftschlechthin”。卡尔·特罗尔这样写道[②]。它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地理学干脆就是一门地域科学，或者如我们喜欢说的是区域科学（我们相信特罗尔会同意这种说法）。由一位第一流大陆学者完全单独地发表的这个声明，道出了全部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出发点。德国地理学元老黑尔曼·劳滕萨赫则提出另一意见，他认为“地理学是用发生、因果和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地球上的地区”。[③]他规定的下述概念范围比特罗尔的更加具体：

1.调查研究地球表面的现象，以便说明整个地球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

2.调查研究作为地球上特定地区的特殊组合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并按照逻辑的顺序来说明它们。

第一条说的是分析研究法，是普通地理学的领域，它属于自然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传统范畴。如把后者按照德国的习惯叫做人类地理学，或按照法国和英国的习惯叫做人文地理学，可能更明白些。第二条说明的是综合研究法可以归入区域地理学。我愿意补充一点：所有的地理研究，不论是局部的、大洲的或整个地球的，在概念上都必须以这些根本目的为基础。这个原则已由它的创造者多次予以阐明；它使个别地方（微观的）和世界范围（宏观的）的地理研究有意义、有目的，并且明确地把“区域地理学”和“普通地理学”拉到一起来了。

W.哈特克写道：系统的或普通地理学与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及人类学是系统科学内的盟友。但作为一种综合研究的区域地理学，则几乎没有姐妹。和它联系最密切的是哲学和历史学。在十九世纪前半期，区域的综合研究占优势，它的基础是各种现象的互相依存这一哲学概念。从这里产生了对景观类型和每一地区的特性的研究。

在二十世纪，自然地理学许多较早的分支已经成为各个独立的学科，如地球物理学、大地测量学、气象学、制图学和海洋学。这些学科和地理学各自的关系，在各个国家中的发展是不同的；但一般地说，这些学科在德国仍然属于普通自然地理学的领域，虽然地球物理学、气象学、植物学和土壤学也在研究它们。

哈特克接着说：在普通文化地理学中趋向就不同了。那些分支不象在自然地理学里那样发展成为不同的学科，而是为地理学及其他学科所共有。十九世纪来，曾被地理学家积极研究过的人种志，而现在已几乎完全归入人类学了。新的经济和社会科学已经脱离地理学，独立地发展成长，虽然新问题和新技术正在使它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

哈特克把近代区域地理学的领域概述如下：它利用附属科学的贡献，来了解特殊地区的综合体。在德国，普通人文地理学集中研究景观的历史发展，

[①] 哈特克：《对地理学地位的意见，受德国研究协会的委托》，威斯巴登，1960 年。

[②] 特罗尔：《地理科学的地位和它对实际问题的重要性》，《研究与进步》，30（1956），第 9 期，第 257—262 页。参看特罗尔《1933—1945 年的德国地理科学：评论与答辩》，《地球学》，1（1947），第 3—48 页。

[③] 劳滕萨赫：《地理学的形态变化：景观系统研究》，《地理学讨论集》，《慕尼黑地理杂志》

特别是自中世纪以来，在荒弃地区进行再垦殖的农田制度和农业聚落类型的发展。同样，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同自然条件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区域组合（景观）这类问题已经受到研究。目前，人们正在特别注意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空间变化因子在改变景观结构中的作用。这是和发生学方法不同的一种作用的方法，是当前许多论著的特点。它的先驱是莱奥·魏贝尔和汉斯·施雷普费，特别是 A.吕尔的著作。这种方法，在农业和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中都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趋向中出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兴趣：把地理技术应用到自然规划和地区发展等问题上去。

自然地理学

基尔大学教授 F.威廉曾向我说明最近二十年来自然地理学研究的趋向。

自然地理学的研究，继续在高度专门化的方面和问题上积极进行，但是大学的地理系企图保持把所有的专门化的分支学科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统一性。战前，通常只有一位教授。现在至少有两位，有时有三至四位；未来的计划要增加人数，从而也增加专门化的项目。已经有了一些为特殊分支学科而设立的各个专业部门。

自然地理，特别是地形学，是德国所有地理系的主要研究领域。但是，尽管人们努力保持地理学的“统一性”，各大学在自然以及人文和区域地理学方面都有非常明显的专门化，这主要是由于教授们的特殊兴趣和才能。

威廉教授总结他的说明如下：

“这份短评清楚地说明：尽管人们努力保持地理学——至少在研究方面——的统一性，但最近十年来已经出现了区别非常明显的各种分支学科。这种趋向是要求更加狭隘的专门化的研究进程的重大结果。”

我想对这个评论谈两点看法。这两点以前已经说过了，现在需要再次加以强调。第一点是：这么多的杰出的德国地理学家（在法国也如此）已经、而且继续在自然和人文地理学两个领域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 H.莫滕森、H.施米特黑纳、H.威廉密和 H.博贝克的著作中就是这种情况。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地理学家，尽管是在进行专门化的研究，却抱着综合的希望。许多人仍然要保持矛盾的心情。第二点是：正如威廉密所指出的地形、气候或植被的研究领域，现在是如此高度专门化，以致自然地理学各方面的训练和兴趣与人文地理学领域的训练和兴趣远远不同，因此，除非在世界上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兴趣，这两类专家之间的距离就必然要越来越远。

人文地理学

施吕特尔在 1906 年提出的文化景观形态学,不久就在德国地理学中牢固地扎了根。他的观点对许多地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他们当中有 W.克雷德纳、H.哈辛格、N.克雷布斯、O.毛尔、F.梅茨、H.德里斯和 L.魏贝尔。的确，对作为“景观形态学”的人文地理学的第一次充分的阐释，是由哈辛格在《地

---

① 这一节的内容，是根据基尔大学教授威廉 1965 年 3 月 10 日一篇附有详尽目录的评论。

① 奥费贝克：《本世纪以来人类地理学的发展（特别在德国）及其对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性》，《德国国家史通报》，1954 年，第 182—244 页。

理科学手册》（HandbuchdergeographischenWissenschaft）（第二卷，1933—1936）中作出的。它依据前此二十五年发表的著作，提出那时的观点，这个观点现在得到普遍的接受。

研究原始自然景观的性质，已经是德国地理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虽然（如在法国）长期以来其他专家也早就关心它了。这种研究，在本世纪的前半期，与罗伯特·格拉德曼对新石器时代自然景观的研究和奥托·施吕特尔对基督时代早期中欧植被的研究，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最近发表的著作，似乎赞同格拉德曼所提出的关于新石器时代森林区和无林区之间的一般区别的意见，虽然不同意他对这些地区与以前及以后时期的移民聚落所作的毫不含糊的对比。此外，人们现在争辩石楠草原是否是林区和草原之间的一种植物群落。整个事情仍然是一项学术的争论，而地理学家不断卷入这一争论的事实，正好说明他们贡献的重要性。只有在开阔地的中心地区才有史前时期长期定居的现象，而在边缘地区似乎大都是来来往往。在最老的新石器时代和早期的中世纪之间，斯拉夫人定居地区林地的范围是有变更的。在铁器时代，德国中部各个森林山地有清除森林的地区，而在罗马时代以后，德国西、南部的移民区有退缩迹象。格拉德曼低估了史前人类在森林地区清除树木的能力。

由于考查了十八世纪以来农业结构和工业、商业技术巨大发展所造成的变化，景观的研究得到了促进。其他三个变化的时期是：中世纪森林的清除，中世纪城镇的兴起和十七、十八世纪领主和他们的重商经济的出现。这种方法很重视城镇和乡村的形态学，不仅要描述它们的形态，而且要说明形态的形成过程。研究内容包括城乡经济不断变化的各个方面，和作为文化形态的城乡房屋类型的发展。这些使文化形态具体表现在各个特殊的地区内，并从那里向外扩散。

近来德国人的研究工作，强调一种作用的或生态的方法。社会地理学——对作为空间集团的人类社会的研究，已经成为地理科学整体的一部分。它已经导致对那些与景观复合体虽然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作用复合体或空间实体的进一步研究。但是我们不应该误解为它是与形态学方法对立或不相容的方法。施吕特尔并不要把宗教、人种志、语言和国家排除出地理学研究之外，而是试图把这些研究限制在对景观有明显价值的那些研究范围之内。最近，在五十年代，H.博贝克和 W.哈特克强调人类地理学的力量论（Kr■flelehre）及其在地域上的表现：“人类生活区”或“作用区或作用实体”。紧跟施吕特尔的莱奥·魏贝尔告诫人们抛弃片面的形态方法，运用赫特纳的方法，后者是强调地区的内在特征和个性的（本体论）。魏贝尔写道：“文化景观的特征既有赖于它的外貌，也有赖于它的社会、经济、法律和精神结构和它在历史中的地位”（1933）。

作用（function）一词，在这里的意思是各种现象在空间上的相互联系及它们随着时间变化的安排和发展。持这种看法的主要学者是H.博贝克、W.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W.哈特克、T.克劳斯、W.米勒-维勒（W.Müller-Wille）和已故的H.施雷普费及L.魏贝尔。“社会地理学”最近在德国就是沿着这些路线发展的。各种社会的各种空间变化，以及它们引起的景观外貌的变化，受到了考察。这样景观就有了双重外貌，自然的格局和文化形成的格局，在它们背后的是社会地理体系的力量。事实上，在地理学中有两类单元，一类是外貌的或形态的，另一类是地文的或作用的。实际上，

按照德文的用法，景观一词的意思不仅是指可见景观，而且是指社会历史的单元；这种单元里存在着互相结合的景观要素。范围更广泛的作用单元是一个城镇、一个经济综合体、一个文化综合体或者一个政治综合体的附属地区。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发展的生存空间。这些就是赫特纳强调性质和施吕特尔强调印象时所追求的东西。这种研究方法已由哈辛格在 1933 年的《地理科学手册》中讲清楚了。

地理学家早就转向这种作用实体的概念，并企图利用这种方法来确定在新的政治结构内必须使用的单元。它所考虑的，主要是通过点和网、中心区和边缘区来分析空间系统。目前，特别是美国的地理学界，人们正在谈论生态系统。在法国和德国，这类研究在五十年前就开始了。这在三十年代魏贝尔对农业占有的形式所作的研究和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区及其附存领域的概念中，是显然可见的。三十年代，魏贝尔在说明农业分布时，发展了冯·蒂南提出的在中心地区周围按距离划分土地利用带的理论。在这个基础上，米勒-维勒也建立了他所谓的一种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作用的生物分布学”。政治实体也被当作有等级的生存空间来进行考察，而且这种研究方法在战后年代里变得更加明确了。E.奥特伦巴、W.哈特克和 H.博贝克强调与作用实体形成有关的那些社会和心理因素。哈特克利用报纸的销行，作为思想或观念团体的一种指示器（三十年前，芝加哥的布尔格斯学派偶尔使用过的一种方法）。这些结合常常只能通过它们随着时间的形成过程来理解；在这一点上，德国的文化历史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就有了许多共同的语言。

区域概念

区域概念[1]是用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的、生物的和人文的）在地表特定地区内结合成复合体的趋向的。这种结合在意义上说，将给予这类地区以区别于其周围地区的特点。这样一种结合，从可见景观、有关现象的相互作用，以及与其周围地区的空间关系等方面来看，就是一种空间的实体。它所考虑的中心问题不是哈特向所指责的作为“景观的现象学”，诸如桥梁的深度、长度和结构，从农场建筑上看到的一种特殊建筑形式的（不清楚的）起源，围墙和篱笆的建筑方法，或一种特殊的大气搅动的产生和运动等等；也不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分布，诸如原始民族地区的特殊植物或箭。这些资料对了解地理区域是必要的，如果不是现成可用的，地理学家还将被迫去搜集它们——这的确是他用来促使比他更有资格研究这类问题的其他学者进行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但地理学家考虑的中心是这类现象结合成复合体的趋向；这些复合体有一个场所、一个核心和在它们边缘地区的、明确程度不同的变化梯度。这就是现象的地区结合一词的含义，也是赫特纳用来合乎逻辑地衡量任何一种特殊的现象和分布，对地理学研究是否适切可用的依据[1]。

---

[1] 劳滕萨赫：《奥托·施吕特尔对地理学方法论发展的重要性：半世纪来德国区域地理学问题-地位的剖视》

[1] 实质性的研究、方法论的商讨以及对研究趋向的评价等方面的文献目录，多得可怕。我从公认的权威著作中选择了一些能表明德国研究趋向的有代表性的论述。为了获得对三十年代区域概念的发展及其状态的可靠的评价，请参看 K.比格尔：《景观概念：一份关于地理学的地区概念报告》，《德累斯顿地理研究》，7（1935）。在以下数页中，劳滕萨赫和特罗尔的观点非常接近。

几年以前，劳滕萨赫发表一篇评论这个概念的文章[②]。他总EntwicklungderGeographie：EinKritischerQuerschnittdurcheinHalbjahrhunderterdkundlicherProblem-stellunginDeutschland），《彼得曼通报》，96（1952），第219—31页。除劳滕萨赫的著作外，请参看E.内夫的综合评价：《论大尺度的景观生态学研究》（Zurgrossmasst■bigenLandschafts■kologischenForschung），《彼得曼通报》，108，（1964）第1—2号，第1—7页；和G.哈泽：《景观生态学的详细研究和自然区划》（G.Haase，Landschafts■kologischeDetailuntersuchungundnaturr■umlicheGliederung），同上杂志，第8—30页。结说：一个区域的概念有两层意思。它既是个别的或特殊的单元地区，又是类型的或一般的地区。偏巧，Landschaft（景观）和landscape（景观）是德英两种语言的基本单词；劳滕萨赫说：可惜的是瑟尔希的chore（科雷）一词没有被人们接受。在他看来，单一的和类型的、或特殊的和一般的两种区域概念的区别，是地理研究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社会的地理学与景观的地理学的关系，仍然是地理专业的中心问题。劳滕萨赫说：如果不让地理学分裂，就必须把它的中心保持在作为人类环境的景观上面。对社会的地理学研究（让它独立）只有次要的意义，完全可以把它不作为研究目的的本身。哈辛格把它叫作文化地理学，而把对人类社会的更广泛的研究叫作社会地理学。在他那本378页的《手册》里，他只给后者微不足道的48页。哈辛格在他《手册》中写道：“我们今天谈到方言、语言、文学和艺术……的地理学，这些研究与地理学的共同点仅仅是在空间方法上，而不是在研究对象上”。研究分布的那种地理学的日子，早已过去了。把这些观点与法国地理学家布吕纳及瓦洛（Vallaux）的观点（见后面第241—244页）对比一下是很有意思的。

劳滕萨赫说：社会地理领域的发展显示了施吕特尔的影响。乌得勒支的范·菲伦（VanVuuren）（1941）承认社会在它占有的地区内，有创造一种独特景观的作用[①]，这在T.克劳斯和博贝克当时的观念中得到又一次反映[②]。改变人类对土地占有的力量，是集体的力量。在先进社会的地区，个人属于各种各样的力量或观念的集团。因此，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它们中间的每一个都在其独特的“社会地区”内活动。在这类集团结构（社会结构）中，有一些是关心土地利用的。它们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居住地，这种居住地部分地适应土地的自然特征，部分地适应以前存在的文化景观。博贝克称它为社会生态学。因此，社会地理学是社会地区及其空间结构的地理学。它是以人类集团地理学各种分支的综合为基础的，并且将逐步取得这种地位。H.施米特黑纳在《文化斗争中的生存空间》

[②] 劳滕萨赫在《彼得曼通报》上发表的论施吕特尔等人的文章，是对上一代或更长一些时期内，德国区域概念的趋向的可靠评价。

[①] 范·菲伦：《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地理学》，柏林，《地球学会杂志》，1941年，第269—279页。

[②] 克劳斯：《地理学——特别着重经济和社会地理学，德国研究的任务》，科隆，1957；博贝克：《论地理学的逻辑系统》，《维也纳地理学会通报》，99（1957），第2、3、5号，第122—46页。还参看施米特黑纳《普遍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问题》，《慕尼黑地理杂志》，4（1954），和《地理形式变化的研究》，同上杂志，7号（1954）。

（LebensraümeinKampfderKulturen）[1]一书中，对这种研究方法作了独特的贡献。对这种粗具轮廓的研究方法更详细的分析，是社会地理学未来的任务。这种研究，肯定将提供一个能了解文化景观变化过程的范围。劳滕萨赫写道：

“每一种社会结构通过它对土地性质的影响，造成一种由经济、交通和聚落表现出来的特殊风格的文化景观。将来，这些景观会使文化地理学不再按正常的方法，被划分为经济、交通和聚落地理学。它们将被文化景观的类型所代替；这些类型是通过改变社会结构的那些力量的作用，从旧的景观背景中产生出来的。”

最近几十年来，区域概念发展的最好的例子（在确定和解释地球表面地域分布的协变因子这个意义上说）出现在黑尔曼·劳滕萨赫的著作中。他的理论已在前面提过了。它被应用在 1964 年出版的那本关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主要著作上，该书有 700 页和一套 75 幅的地图集。

劳滕萨赫对伊比利亚半岛研究了将近四十年，并且进行过十五项实地调查。他参考的文献目录多达七千条。

该书第一部分是对整个半岛进行分析的总论，第二部分是对区域的描述。J.帕尔松斯（J.Parsons）[1]写道：“在前半部中，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地文学家和气候学家劳滕萨赫和文化历史学家劳滕萨赫，可是当代的经济也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他是从史前时代探讨历史地理学，然后再论述自然方面和人文方面诸如房屋形式、地名、聚落、农业制度以及河流系统等。在后半部中，劳滕萨赫划分出二十七个区域，虽然划分的标准不是前后一致的。帕尔松斯说：“手套是为手做的。”同一的评论者继续说：这部著作“接近于百科全书。”

劳滕萨赫的区域地理写法，是以他阐述和运用了几十年分类法的“景观系统”的模式为基础的[2]。根据地理事实（即区域变化因子）相应的程度，把半岛划分成许多单元，并用特定的符号来表明每个单元内部的共同特征。这种精心制作的表示法，同一代人以前的格拉内（Gran■）在研究芬兰时所用的方法基本相同。

帕尔松斯说：“这种方法是对从自然史观点来研究地球的地理学的统一性和传统特点给予肯定。”他遗憾地说：还没有人试图一贯地、精确地估计作为地球的占有者和改造者的“人”的经验。此中原因是清楚的。因为劳滕萨赫的目的是找出伊比利亚半岛地表的变化，并作出相应的解释，而不是使自己局限于评价人对这个地区的占有方式。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它们是、并且从来就是地理学领域里具有不同论题和问题、不同论述方法的两条不同的途径。

对于区域概念，特别在美洲，有人持怀疑态度。可是在登载帕尔松斯书评的同一期《评论》内，有一篇评价德文的、按照赫特纳模式写的下加利福尼亚区域地理的文章[1]，该书和劳滕萨赫的著作非常类似，但它所依据的实地

---

[1] 施米特黑纳：《文化斗争中的生存空间》，莱比锡，1938 年；并参看《欧洲民族的生存空间问题》，卷 1；《欧洲》，卷 2；《欧洲的殖民地补充空间》，莱比锡，1941 年。施米德编的卷 3《北美洲的当前问题》，于 1943 年出版。

[1] 参看 J.帕尔松斯的评论，《地理评论》，56（1966 年 4 月），第 306—307 页。

[2] 参看第 196 页脚注 3。

[1] 这是一篇对下加利福尼亚区域研究的评论，载于《地理评论》，56 号（1966 年 4 月），第 303 页。

调查材料比较少。评论者说它的内容写得很严谨，但又把它贬低为一本“平凡的汇编”；可是另一方面也赞扬它是有关这个特殊地区的唯一研究著作，研究这个地区的学者必须首先阅读。这是公开承认非常需要这类的“地理描述”。人们猜想在美国文献中，这类研究惊人地缺乏，因为没有人怀着强烈集中的问题和目的感，耐心地在同一地区进行长期不懈的工作。戈特芒最近对梅格洛玻利斯和弗吉尼亚的研究是两件例外，但戈特芒是法国地理学家，并且把法国地理学家的目的和方法介绍给了英语世界。

抱怨“区域概念的不充分”或它所导向的“折衷主义泥沼”，就是谴责地理学研究中的基本目的和问题。区域概念是所有地理学著作的中心概念，而且在过去的整整七十五年中，已经改变了它的目的和方法。正如 P.E.詹姆斯中肯地提醒我们的那样，新的理解和解释是迫切需要的。“区域地理学”一般地被看成是单一地区内空间分布的系统的汇编。英、美地理学家广泛抱有的怀疑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他们是在拒绝或忽视他们与生俱来的最好礼物。已故大师的言论和著作中，有很多东西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理由。象战后年代他们许多德国同事一样，劳滕萨赫关心测绘地球表面现象的区域差异的方法。行动是战后德国一条主要出成果的研究趋向的关键。对劳滕萨赫未能选择和经常地评价人地关系感到遗憾，实际上就是要去极力探索地理学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生态学论题。然而这不是劳滕萨赫著作的目的，因为他正在探索地球表面的区域差异。这些就是近代地理学大师们留传给我们的两个主要和独特的题目与问题。

区域生态学

区域概念的某些方面，已经成为近年来德国地理学家许多研究的主题，并且构成他们著作的一个特点；我们将给予这个特点特别的重视[①]。卡尔·特罗尔对这个题目作了如下说明：

“在已经过去的最近三十年的时代精神中，地理研究强烈地趋向于（一个新的种类）综合法。综合法的目的是通过区域的整体，而不是任何一组的现象来评价地表各种形态的空间的相互联系。换句话说，地理学家所研究的不是冰川运动的机械学，或特殊植物群的分布，或国际贸易某些商品的销售范围。它是要通过区域概念来理解各种自然的和人文的空间排列-现象在地域上的联系。”

形态（Gestalt）和整体（Ganzheit）哲学已经长期地影响了区域概念。它肯定影响过卡尔·李特尔的著作，而且在本世纪内，也已由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更加详尽地阐明了。可是地理学家并不把区域实体看作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正象生物是呈群体（生活群）存在的那样，诸如家庭、民族等这些人类集团也就具有地理或空间实体的一种形态特征。

“景观地理学”这个名词是 1913 年由帕萨格所创造的，但他对它的意义，特别是它的地区概念的关系，不是说得很清楚的。德文景观一词已经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地理学家把它拿来表达一种科学概念。当单位地区具

[①] 特罗尔：《地理景观及其探讨》，《普通研究》，3 卷（1950），4—5 期，第 163—81 页；《综合研究的方法》，维尔茨堡，《欧洲地理学家会议通报》，1942—1943 年，包括在他的题为《生态学景观研究和比较高山学》的论文集中，《地学知识，研究与实践丛刊》，11 号（1966 年）。

有独特的外貌和一群独特的“空间排列事物”时，地理学家就把它叫做景观或区域。它具有外貌的（形式的）和生理的（功能）两个方面。后者被特罗尔修改为功能的或生态的。

在上述的同一著作中[1]，地理区域（景观）被特罗尔称为地球表面的实体。就它的结构、它的空间分布现象的相互作用，和它的内部和外部的空间关系等方面来说，它是自然的景观。他继续说，另一方面，地区有取决于历史上的领土划分或各个民族分布范围的行政或政治的界限。“自然的”是用来和“人工的”或人为的作对比的。为了避免混乱，魏贝尔于 1938 年建议用“地理区域”来代替上述含义的“自然区域”。这样，“自然的”这个名词就只能用于自然现象，而自然空间也就是根据自然的标准所确定的单元。文化空间也就是根据文化的（人文的）标准确定的单元了。

区域单元的结构和分级是特罗尔的下一个论题。特罗尔在这方面严格地限于讨论处理自然的标准和自然的单元的方法，它们被列为一个等级的系统。

五十年前，帕萨格把最大的世界范围（属）的单元叫做区域带（景观带）。1905 年赫伯森在讨论“自然区域”时，发展了同一的论题。这些系统的根据都是少数几种世界范围标准的世界范围的分布。它们用的都是演绎的而不是归纳的推理。再有，这种世界范围的类型学是以极不充分的材料和智力的猜测为基础的。特罗尔关心的是辨认和理解在尺度另一端的较小的地区单元。这大致类似于赫伯森的那个“组织和细胞”的模糊概念；后来英国的 J.F.翁斯特德（Unstead）曾试图用堆（stow）和片（tract）这些名词来发展这一概念，而更晚近的 D.林敦（Linton）也试图（仅从地形的角度）从方法论来加以说明。在美国的詹姆士、芬奇（Finch）、哈特森（Hudson）、普拉特（Platt）等人在三十年代注意到这种研究方法。可是在英国或法国，对这个研究领域只有很小的反应。自从大战以来，这个领域已成为许多德国地理学家热情研究的主要论题之一，而且事实上，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辨认和解释区域单元的等级已经被认为地理学核心的这种看法，在德国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十八世纪末的地理学家和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李特尔的著作都表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分级系统中，景观实体最小的范围有多大？特罗尔提出，在这个分级系统中，单元越小，作为划分指标的土壤的重要性越大，它相当于划分最高、最广的世界级单元时气候的作用。最小的景观单元面积的大小，取决于其所在地区的面积大小。特罗尔借助于地形、地质和其它地图，以及系统拍摄的照片，研究了莱因河以东莱因高地的部分地区（1945）[1]。在“进行逐级细分时，如果发现各个景观要素只有自己单独的分布区，而不与其他要素结合”时，那它就是最小的单元地区。在这最小单位地区中，存在着一种可以辨认的、形成景观单元的结合。这就是最小的地域结合。特罗尔仿效“生物型”这一生物学概念，称这种单元地区为“生态型”。德国文献中使用的类似的名词有景观细胞（Landschaftszelle）、微空间（Microraum）、小空间（Kleinraum）、自然复合体（Naturcom-plex）、自然科雷（Physiochore）、文化科雷（Kulturchore）和地理科雷（Geochore）。

---

[1] 同上页注。

[1] C.特罗尔：《综合研究的方法》。并参看最近出版的内夫和哈泽的著作，第 202 页脚注 1。

“生态学的”这一名词的这种使用，显然是专指自然和物质条件的地域共存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不包括人的工作。这样的划分，不仅对地理学家，而且对林业工作者、土壤学家、植物生态学家、水文学家，尤其是土地规划者都极其有用。

J.施米蒂森建议在名称上把自然（无机）的单元与根据植被的生活形态或人的使用而划分的地区单元区别开来。他把前者叫做片（Fliese），后者叫做“生态型”（ecotope）。特罗尔仔细地研究了他建议的这个区别，认为它与美国人（如P.E.詹姆斯）当时正在讨论的“位置”（site）和“覆盖形式”（coverforms）的概念很类似。这件事在整个五十年代引出了许多探讨的论著。

特别应该提一下对德国各地区景观单元分级法所作的详细研究，和联邦区域地理局正在编绘的一套1：200，000的自然地区图。后者是单纯地按照抽象的自然标准划定的简明的地区。“区域生态学”是研究地球表面上自然现象的这些区域组合和生活形式的联系的。英国植物学家坦斯利（A.G.Tansley）在三十年代把这种联系的系统叫做生态系统。它包括和自然复合体有地域联系的地形、土壤、排水、气候及植物。植被在生态系统中占中心地位。如果这种结合处于不受干扰的状态，就要发生一系列的更新，最后达到演替顶极。为了寻求绘制区域单元及其结合的地图所需要的指标，人们做了许多工作。特罗尔说：可是，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因子的相互联系如何造成独特的地域结合的过程。

于是，特罗尔注意到了文化和经济区域（景观）的结合。迄今为止，讨论的内容是自然单元、自然指标和过程。人类对土地的占有是以社会过程为基础的，也产生一系列的人类区域单位。特罗尔写道：

“粗略的和详细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类型的地域（空间）的互相联系，是了解地球区域结构的关键。”

绘制世界范围的文化景观图已经进行了许多次，并将继续是地理学的基本任务。耶格尔于1943年[①]在着手这种世界性分类时，用了三个因素：（1）十四个主要文化领域，（2）土地利用的形式（用犁耕作、果园、稻米、种植园、绿洲、移动的用锄耕作、游牧、定居农业、采矿和工业），（3）人口密度，它是表明土地被人类改造程度的指标。

特罗尔说：我们需要把注意力转到类似的小地区研究上来。他带着航空照片，到莱因高原的一个小区域进行实地研究。他发现每一个（自然的）“位置”都有一种相应的土地利用类型，而且这种调整的性质和过程，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这是一种协调（生态）的关系（协调文化景观），但更经常的情况是造成土地占有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并不和自然位置条件一致。这就导致区域结构的不协调。基本问题是“什么力量隐藏在人类占有和位置之间的差别的后面？”地理学的根本问题是调查人类活动和进程的地域范围，并确定其土地利用上的影响。这就需要分析作用和调查作用的地域。甚至在世界性的大经济区域内，自然和文化力量的空间相互作用，也同在生态型或小区域里一样明显。德国地理学家转而研究隐藏在土地利用的地域结合后面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他们不但正在绘制自然单元的地图，而且正在研究：城市化

[①] 耶格尔：《地球表面人类地理区划的新尝试》，《彼得曼通报》，89（1943），第313—23页。这是以前建议的续篇，前篇见《彼得曼通报》，80（1934）。

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城镇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农业占有的形式和它们类型的当前变化，人类聚落形式的分类和分布。对这种结构和对创造区域实体的那些力量的相互作用的分析，是今天科学地理学的中心论题。

读者可能会反驳说，一篇 1950 年写的文章，很难作为以后区域概念研究趋向的正确无误的代表。相反，特罗尔的论著已有意识地选作后来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概括和前驱。然而这样说也许是正确的：这项工作主要是在波恩的特罗尔的地理系和现在设立在巴德戈德斯堡的联邦区域地理局进行的。研究工作也沿着其他方向进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下述的情况。城市中工作稳定、报酬优厚的吸引，使得许多乡村居民任令他们继承所得的小块土地荒芜（社会休闲），而政府对在私人土地上种植小树提供补助的作法，也从而增加了另一种改变景观的因素。换句话说，要说明区域结合类型的变化，了解社会条件的空间范围是必要的。

本节的主要目的是谈在西德所做的工作（非常详细）。需要掌握的内容是作为下列各项研究基础的概念体系和独特目标。这些研究项目是：自然过程的空间作用，人文过程（社会的和经济的、发生学的和作用的）的空间作用，以及这些过程在地球表面的地域变化联合表现的方式。

区域地理学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这是已经说过许多次、最近施米德[①]又反复申述的一句话。他极力主张如果要保持地理学的本来面目，人们就必须承认这一点，并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探索。施米德说，当前的趋向是集中研究普通地理学；当施米德指出了德国的这种情况以后，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情况更是如此。普通地理学被认为更加科学和更容易被接受。施米德把德国当前的这种趋向，部分地归咎于缺乏对去国外工作的财政支持。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通常的这一借口：一个人不能掌握各种必需的专业知识来进行作为区域地理学精髓的综合研究法。他不接受这个借口，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职业地理学家数量增加了，但质量和献身精神没有相应的提高。他还归咎于对注意社会实际问题（特别是世界上遥远的不发达地区的问题）这一普遍要求缺乏响应，而不发达地区的人们正在大声呼吁对他们的领土作综合的估价。他提醒我们，自从彭克（1924）提出地球的供养能力是人的地理学的最迫切问题，并把这项研究纳入他最后一项计划以来，几乎已经整整五十年了。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迫切，要求地理学家把他们的努力集中到这些有意义的方向上来。

区域地理学的传统，在德国和在法国一样的强大。它包括洪堡、李特尔、格拉德曼、施吕特尔、菲舍和基尔希霍夫的早期著作。在我们的时代，它包括魏贝尔、克雷德纳、劳滕萨赫、施米德的著作。在过去五年的出版物中，有许多证据证明：德国学者献身于这个领域，并且正在做出很有意义的贡献。这个领域，用 G.普法费尔一字不改地重复赫特纳的那句话来说，是“我们科学的王冠”（《地理杂志》，1964 年，第 329—334 页）。在这些出版物中有 H.威廉密和 W.罗梅德尔合著的《拉普拉塔地区》（LaPlataL■nder），A.锡费尔斯的《锡兰》（Ceylon，1964 年），A.科尔布的《东亚》（Ostasien，1963 年），F.巴尔茨答应写的三卷本《论世界渔业区域》（F.Bartz，DieGrossenFischerr■umederWelt，头二卷出版于 1964—1965 年，第三卷在

[①] 奥斯卡·施米德：《今日世界的德国地理学》，《地理杂志》，54（1966 年），第 3 卷，第 207—222 页。

准备中），以及奥斯卡·施米德的两卷本著作论《旧大陆》（1965 年）。需要指出的是，最后两卷是由拉策尔和彭克创立的、现在由劳滕萨赫和科尔布主编的《地理学手册丛书》的一部分。此外，施米德的著作是题献给 A.赫特纳的。信息是清楚的。对各别区域的研究是地理学的核心。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寻求独特而又有价值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并使我们的水平提高到不仅仅是把辅助科学所提供的资料作简单概括而已。

第三编　法国

第十五章　引论

法国对十八世纪后期学术的蓬勃发展也有一份贡献。那时巴黎是一个著名的中心，有许多伟大的学者聚集在这里，洪堡从中美洲旅行回来以后，与他们自由交往了约二十年。这里简述一下几种趋势。在十八世纪，制图学有显著的进步，在绘制世界地图和大地测量方面尤其突出。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完成了比例尺为 1：80，000 的法国大地测量地图，从而在以后几十年中，为地理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基本地图。在十八世纪中期，国王的一位制图学家菲力普·比阿什提出可以根据河流流域及它们周围的分水线，把地球系统地分为各个自成体系的单元——这是在地理知识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推测，因为当时世界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既没有得到考察，更没有绘成地图。这种与强制性的、可以改变的政治单元不同的“自然单元”的建议，在以后一百年中，在法国与德国学者之间引起了种种讨论。今天，在有了整个地球表面的确切知识和地图的情况下，它仍然是地理学家担负的基本职责。在十八世纪，也出现了全面的科学分类（例如对各种动植物和人类）与对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哲学猜测，但它们的意义都不及比丰伯爵对“自然史”所作的巨大研究（参看第 17 页）。

在十九世纪的第三季纪中，由于受到达尔文进化思想（1859 年以后）的影响，与近代地理学发展有关的人类知识，才发生了真正有意义的进展。我说的是，研究物质地球以及对陆地、海洋和大气的物质资料的积累和制图，特别是法国的贡献，都有迅速的进展。其次，由弗雷德里克·勒·普拉（FredericlePlay）开创的对人类社会的实际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三，埃利兹·邵可侣编纂了他的巨著，他仍然主要按照李特尔的思想，系统地描述了整个地表，只受到进化论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很小的影响。正是从上面谈及的这些趋势及其背景条件下，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季纪内，法国出现了在维达尔·特·拉·布拉什领导下的近代地理学的新学派。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地理学掌握在少数几个历史学家手里，他们只是把自然环境用来说明历史的背景。1841 年，迪福莱诺瓦（Duffrenoy）和埃利·德·博蒙（■liedeBeaumont）在他们的《法国地质图说明》（ExplicationdelaCartegeologiquedelaFrance）中提出了作为地质实体的自然单元的概念。他们的观念并没有得到仅仅把地理学作为历史背景的大学教授们的推广。进一步的进展是依靠一些地质学家如德·拉帕朗（DeLapparent）和德·马尔日里等人取得的。再有，理学院与文学院是有分工的，因此文学院的地理学家不允许讲授自然地理，它是留给理学院的。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结合（rapprochement）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地理学。

我们不妨把 1900 年前后的情况概述一下。自 1809 年以后，巴黎大学有了一个地理学讲座，在 A.希姆莱（Himly）去世以后，这个讲座就空缺了。希姆莱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与他的德国同代人一样，对近代地理学的发展没有什么影响。1892 年设立了第二个讲座：殖民地理学，由 M.迪布瓦（Dubois）主讲（他和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一起创建了《地理学年鉴》〈AnnalesdeGéogra-phie《 闪17.说乩硐担　痪靡院螅　诶锇骸20.衔　屠锥鞯鹊叵嗉坛闪17.*另外一些地理系。1900 年，维达尔在索尔蓬、德·马东男在雷恩、P.卡默纳·达尔梅达（P.Camenad’Almeida）在波尔多、莱斯帕尼

奥尔（Lespagnol）在里昂、贝尔纳在阿尔及尔、布吕纳在弗里堡（瑞士），分别担任教职。但在贝桑松、克莱蒙费朗和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一些历史学家却在讲授所谓“历史地理学”——这是一种讲述历史背景、探险史、地名和领土划分的肤浅的自然地理学。这就是维达尔在高等师范学校长期执教以后，在 1899 年继任希姆莱主持地理学讲座时的情况。在 1906 年，各个大学中有二十七名教授和讲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大学都开设了地理学课程，而且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是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学生。当时有二十三名教授，到 1957 年增加到七十一名。

两个特殊的进展需要特别提一下。第一，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Siegfried）和让·昂塞尔（JeauAncel）极大地促进了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昂塞尔是德芒戎（Demangeon）的学生，他写了论述马其顿及其当前进展的博士论文（1930），并且写了一些研究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各国政治地理的文章。他反对纳粹的地缘政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纳粹的集中营里。西格弗里德（1875—1959）长期在法兰西学院主持政治和经济地理的研究讲座。他的著作使他获得世界声誉，1945 年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第二，殖民地理学从 1892 年起在巴黎设立第一个讲座以后就取得了进展。1937 年在巴黎成立了第二个讲座，由夏尔·罗贝基（CharlesRobequain）主持，直到他于 1963 年去世时为止。1946 年，在斯特拉斯堡、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和波尔多三地又新设了殖民地理学的讲座；1947 年，又在创立于 1889 年的参谋学院（法国海外学校）增设两个同类的讲座。在法兰西学院还有一个热带地理学的讲座，由 P.古鲁（P.Gourou）主持。在阿尔及尔有一个很有地位的讲座，先后由阿尔台（Hardy）、贝尔纳和戈蒂埃（Gautier）主持。《法国殖民地地图集》（AtlasdesColoniesFrancaises）是一本精美的地图集，编制者有 A.贝尔纳、E.F.戈蒂埃、夏尔·罗贝基、J.韦洛塞（Weulersse）和 P.古鲁等人，他们都是专业地理学家。这些作者以及其他一些作者，七十多年来写了大量关于北美洲、东南亚和中东的研究著作，与此同时，还写了许多关于法国各个区域的专题研究论文，在以后各章中，我们将要对这些著作进行探讨。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任务是把法国地质学界和历史学界中比他年长的同代人的著作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门系统的地理学。他通过对法国的一些小区域范围内的土地和人民进行综合描写而取得了成功；它们都是徒步可到、能够直接了解、已有精确的地图和可用的统计资料及文献的地区。

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间，经过一些杰出学者的努力，自然地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地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前面已经指出，迪福莱诺瓦和埃利·德·博蒙在 1841 年已经提出自然单元的观念：认为巴黎盆地或中央高原都是在类似地质条件的基础上形成的。

“似乎可以说，决定岩层形态的地质线规定了一个地区的轮廓，而水文线只单纯表示一个地区的外部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会在同一地表上发生变化的。再有，河谷只不过是孤立的沟渠，而地球的一般的地形型式则只带有地质的特征。”

由迪福莱诺瓦和埃利·德·博蒙在 1841 年提出的这种说法（得到加鲁瓦<Gallois>的引证），否定了比阿什的意见；而且超越了它的时代，它走在渗透于下一代著作中的发生学方法的前面。另一方面，稍晚的 G.德·拉·诺埃

和 E.德·马尔日里评价了河流活动在地形发育中的作用（1886）。这种新的发生学观点承认侵蚀和构造营力在地形发育中的作用。德·拉帕朗在他的名著《自然地理学教程》（1886，Leconedegéographiephysique）中采用了这种观点。德·马尔日里在他翻译（同时作了许多修正）维也纳地质学家爱·休斯的第一流著作《地球的面貌》（1883—1901，DerAntlitzderErde）时，采纳了构造的论点。埃·德·马东男这位地理学家，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在 1909 年写出了一本探讨整个自然地理学领域（陆地、水、大气和动植物）的杰出的著作，这本书经过几次增订，直到目前仍然是一本基本教科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W.M.戴维斯的观点在法国和德国都有广泛的影响。不过，在法国，它获得更多的同情，象德·马东男、亨·博利希（Bauling）和德芒戎等人对它都有好评，并根据实地观察作了一些修正，不象在德国那样受到赫特纳和帕萨格的严厉批评。

人文地理学得到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及其同事们的周密探讨，并且有效地顶住了以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为首的其他法国学者、特别是一批社会学家的责难。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著作，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十年出版的各年《地理学年鉴》中，受到严肃而细致的分析。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参加讨论；对于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概念中所包含的野心勃勃的主张及其含义，以及“地理”影响的作用，争论特别激烈。拉策尔的观点，不仅是地理学家、而且也是一般的社会科学家思想的出发点。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及其同事们从拉策尔的“地理决定论”发展了开始被称作“地理可能论”的学说。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教授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ebvre）在他写的一本杰出的著作中，对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所系统阐明的人文地理学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该书于 1922 年在法国出版，1924 年被译成英文，以名为《历史学的地理导论》（AGeographicalIntroductiontoHistory）出版（1966 年第四次印刷）。费弗尔告诉我们，他在 1912—1913 年间就打算写这本书，原来计划在 1915 年出版，但直到 1922 年才出书。这本书忠实地、细致地反映了维达尔的人文地理学的概念，是地理学史上的一本重要著作。这一新地理学当时得到（而且现在仍然如此）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仔细的分析和赞赏，是一件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情。

我们应该再一次指出，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著作是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出发点。因此，拉策尔的著作对法国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都比对德国大得多。在德国，彭克、赫特纳和施吕特尔对他们的继承人有着更强烈的直接影响。在英国和美国，拉策尔的著作没有象在法国那样得到真诚的直接的估价，那里的人似乎只是从埃伦·森普尔的著作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一段时期里，伪哲学论文不断在英国出版，但是它们对研究的趋势并不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谈的都是一代人以前的“可能论”这一题目。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叙述一下法国地理学界的谱系。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支配着巴黎大学的学术舞台将近四十年，他的前期生涯包括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季纪。维达尔虽然是李希霍芬、拉策尔、帕奇和瓦格纳的同代人，但比他们年轻，而且从他们的著作中学习了很多知识。他后期的生涯是在本世纪第一季纪内度过的，所以实际上他是彭克和赫特纳的同代人。这个时期也是他的学派的全盛时期，他的学生发表了大量研究法国各个地区的博士论

文。这些学生作为他的继承人，在他于 1918 年逝世以后，继续和发展了维达尔的传统。因此，尽管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有一批声望很高的同事，如埃利兹·邵可侣、德·马尔日里（地质学家）、弗朗兹·施拉德（制图学家）、吕西安·加鲁瓦（他的第一个学生和继承他主持地理系），以及历史学家希姆莱，他仍然是法国第一代地理学家的领袖。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一些杰出的学生，支配着二十世纪第二季纪法国地理学的舞台，形成法国地理学家的第二代。除掉吕西安·加鲁瓦以外，他们当中还有让·布吕纳、埃·德·马东男（维达尔的女婿）、阿尔贝·德芒戎、马克西米利安·索尔、拉乌尔·布朗夏尔（RaoulBlanchard）、朱尔·西翁（JulesSion）、亨利·博利希、卡米耶·瓦洛和勒内·米塞（RenéMusset）。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全部十六所大学中都有地理学家，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维达尔的学生。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拉乌尔·布朗夏尔在格勒诺布尔创立了一所生气勃勃的地理系，它成为吸引和输送地理学人才的第二个中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国所有大学和学校中都有从格勒诺布尔和巴黎两地来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地理学家。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同事属于第三代。

第三代的人有的现在将要退休，有的已经退休。他们包括安德烈·肖莱、乔治·夏博（GeorgesChabot，两人以前都是巴黎大学的地理系主任）、皮埃尔·乔治、罗歇·迪翁，以及皮埃尔·德方丹。在这一代中还必须提到 P.阿尔博（P.Arbos，克莱蒙费朗）、A.阿利克斯（A.Allix，里昂）、D.福歇（D.Faucher，图卢兹），以及夏尔·罗贝基（巴黎），他们都是在布朗夏尔的指导下，在格勒诺布尔写成博士论文的。在第三代的地理学家中，大该也应该列入让·戈特芒。因为尽管他在第四代地理学家的同事中有强烈的影响，但是他是德芒戎在逝世以前四年期间的最后一名助手。

第四代都是年轻的地理学家，他们现在都取得很好的成就，而且风华正茂，还可以再担任二三十年的领导工作。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让·戈特芒、雅基林·博热-加尼埃（JaquelineBeaujeu-Garnier）、E.朱利亚尔（E.Juillard）、P.潘什梅尔、M.德路（M.Derruau）、P.比罗（P.Birot），以及让·拉巴斯（JeauLa-basse）。另外还有一些人。我们提出这些名字，是为了弄清法国地理学界的谱系和他们与德国的关系。在德国，近代地理学的发端比法国早一代人的时间，而且有更多的专业地理学家，他们在全国各地形成好几个学派；这与法国的地理学家思想一致，并且在一个人的培训下发展起来的情况很不相同。

应当指出：一般地说，最近二十年来，各省大学中的地理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巴黎的影响。在布朗夏尔退休以后，格勒诺布尔的地位已经有所降低。但是由于它的考试制度和出版物，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研究中心。其他的大学，特别是克莱蒙费朗、里昂、里尔、斯特拉斯堡、波尔多和图卢兹等地的大学，情况同样如此。研究工作也有重大的进展，这将在以后各章中进行讨论。

在介绍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及其继承人的著作以前，笔者将先考察一下维达尔的同代人的贡献，首先介绍的是社会学家费雷德里克·勒·普拉。

注释

这里有必要对设在巴黎的高等学府的研究机构作一介绍。法兰西学院

（CollégedeFrance）由国家创办于十六世纪，是进行高深学术研究的独立机构。学校的教授作研究工作，不正式规定有讲课任务。高等师范学校（■coleNormaleSupérieure）在 1904 年改隶于索尔蓬[1]以前，也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它的学生在学校膳宿，也在学校中上一些课，但是他们要到索尔蓬去听课。当然，这个研究机构的目的是培训师资；维达尔曾经在那里执教多年。“索尔蓬”是巴黎文、理学院的旧名，它有许多系。地理系是其中之一，单独占有圣雅克路的一幢大楼；这幢大楼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德·马东男担任系主任时兴建起来的。高等师范学校自从 1904 年以后，就没有地理学教授（作为维达尔的继承人）。现在法兰西学院中的地理学教授是罗歇·迪翁和 P.古鲁，索尔蓬的地理系中共有十位教授。地理系附设有下列几个机构：地理制图高等学校（■coleSupérieuredeCartographieGéographique）、旅游业高级研究中心（LeCentred’■tudesSupérieuresdeTourisme）、以及制图和地理研究与文献中心（LeCentredeRecherchesetDocu-mentationCartographiquesetGéographiques）。

参考文献

除了本书中引用的著作以外，最重要的总结性的英文著作如下：

哈里森·丘奇：《法国地理学派》（R.J.HarrisonChurch，TheFrenchSchoolofGeography），载 G.泰勒主编的《二十世纪的地理学》，伦敦，1951，第 70—90 页。

A.佩尔皮龙：《战争及占领期间的地理学和地理研究》（A.Per-pillou，GeographyandGeographicalStudiesduringtheWarandtheOccupation），《地理杂志》（GeographicalJournal）107（1945），第 50—57 页。

让·戈特芒：《战争期间的法国地理学》（FrenchGeographyinWartime），《地理评论》（GeographicalReview）36（1946），第 80—91 页。

D.V.马凯：《1871—1881 年法国地理活动中的殖民主义》（D.V.McKay，ColonialismintheFrenchGeographicalMove－ment，1871—1881），《地理评论》，33（1943），第 214—232 页。

[1] 索尔蓬是巴黎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所在的地方，即系指巴黎大学。——译者

第十六章　弗雷德里克·勒·普拉（1806—1882）

我们已经着重指出：从 1859 年以后，地理学在德国有二三十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从十九世纪前半叶发展起来的、作为科学研究目标的区域概念，到十九世纪后半叶已经降到不受注意的地位,直到 1900 年前后才作为地理学的基本任务而被重新提出来。有五十年的时间，对于土地和民族的研究几乎完全是分析性的；研究人的学者们，特别是历史学家，把他们的主要兴趣集中到所谓“地理学”（指自然界）对人类性质和人类历史的影响上去了。曾经有一段时期，从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工作，都掌握在人种学家手中。弗雷德里克·勒·普拉和他在法国的信徒，以及德国和英国著名的人种学家的著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这里先对勒·普拉学派作一介绍。弗雷德里克·勒·普拉是本书中出现的近代地理学创建者中唯一的非地理学家。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方法，不管好坏都对法国和英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虽然他的影响在德国和美国是微不足道的。在英国，弗雷德里克·勒·普拉的思想和方法，通过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Geddes）和赫伯森以及他们同时代的地理学家的传布，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美国，格迪斯的第一个信徒刘易斯·穆福特（LewisMumford）和美国的某些社会学家——特别是如 P.索罗金（P.Sorokin）和 C.C.齐默尔曼（C.C.Zimmerman），都发展了勒·普拉的观念；但一般说来，对美国地理学的影响是很小的，并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如果不对勒·普拉的著作作出估价，要了解地理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在英国，那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要在下面介绍勒·普拉的生平和著作。

皮埃尔·弗雷德里克·吉约梅·勒·普拉（PierreFrédéricGuillaumeLePlay）[1]1806 年出生于诺曼底的翁弗勒，先在勒阿弗尔中学上学，1832 年在巴黎的矿业学校毕业，成为一名采矿工程师；1840 年任该校冶金学教授。勒·普拉受到 1830 年的社会动乱的深刻影响，当时他正患着重病。这一次动乱，使他相信对社会现象从事科学研究，以便采取步骤来改革社会，是十分重要的。从此以后，他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献出了他漫长一生的闲暇时间。勒·普拉凭借他职业上的身份和利用假期的时间，游历了欧洲各地，对各种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勤奋地进行直接的调查研究。他二十多年的劳动成果，最后在 1855 年写出他的经典著作《欧洲工人》（LesOuvriersEuropéens）。根据这些调查研究和从中得出的关于社会结构、社会福利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规划。这些规划是他在《法国的社会改革》（LaréformesocialeenFrance，1864）和《劳动组织》（L’organisationdutravail，1870）两书的主要内容。

勒·普拉还创立了两个国际团体，其名称表明了它们的目的。一个是社会经济实用研究国际协会（1856），另一个是社会和平联合会（1872）。1881 年，即勒·普拉去世的前一年，他开始出版定期刊物《社会改革》

---

[1] 关于勒·普拉学派的文献是很多的，但除掉在本书中提到的主要的单篇著作以外，大部分文章都载在《社会科学》杂志中。也许应该特别提到的是 F.尚波尔在 1913 年的《社会科学》中写的《勒·普拉和德·图尔维尔主张的社会科学》，以及德·居宗的《按照勒·普拉的原理》两卷本，巴黎，1897 年。下面是近年来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纪念弗雷德里克·勒·普拉的社会研究文集：1856 年勒·普拉创立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协会百周年纪念》

（LaRéformeSociale）。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P.索罗金认为：弗雷德里克·勒·普拉是“几位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大师之一”。[1]勒·普拉的著作，对法国和英国的地理学家有深远的影响。他的研究方法，被他的一群学生发展得更加完善，并在法国广泛地运用，其中最著名的是亨利·德·图尔维尔（1843—1903）和埃德蒙·德莫兰（EdmondDe-molins，1852—1907）。他们两人创立了社会科学国际协会及其刊物《社会科学》。

勒·普拉感到既缺少也没有系统地考察社会现象的计量单位和科学的归纳方法。对于这两个问题，他是采用以下办法来解决的：他把家庭预算作为受雇人员家庭生活的数量表现，并以它作为分析社会事实的基础。他还承认家庭生活和组织，是由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方法、即工作决定的；而工作的特点，又是主要由环境、即地点的性质决定的。这样，我们就得到作为勒·普拉社会学研究论著的精髓的那个著名公式——地点，工作，家庭。家庭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的单元，为了对家庭有充分的了解，必须考虑家庭与范围更广的社会集团及机构的相互关系。

在《欧洲工人》一书中，每一篇关于五十七个典型家庭的论文都分成三个部分：（1）初步观察，包括以下小节：（a）环境，（b）生存的手段，（c）方式（生活标准），以及（d）历史，组织，宗教和风俗。（2）预算：家庭的全部收入和支出，“表示家庭生活标准，特别是已经达到的道德标准的收支平衡状况”，都列入本项和进行比较。预算包括：（a）固定资产，（b）流动资产，（c）工资，以及（d）从各种实业和生产获得的利润。分类帐开支的另一方面包括：（a）食物，（b）住房，（c）衣服，（d）精神上的需要和娱乐，以及（e）添置产业，债务，税收和保险。（3）社会组织的各种成分，包括影响家庭生活的更广泛的社会机构。第三部分是论文中最不系统的部分。

勒·普拉和他的追随者，按照继承法和儿童所受教育的性质来区分家庭类型。这样，勒·普拉承认有三种主要类型，每一种类型在最初都与某些自然环境条件有关。家长制的家庭是欧亚干草原的特征。不稳固的家庭与森林有关系，它表现出缺乏传统，不尊重家庭权威，以及对国家的依赖。法国的家庭是这一方面的例子。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峡湾里的是独立性的家庭。在这种类型家庭中的各个成员，从小就受到主动精神的训练，在达到成年以后，能够独立生活和负责任。

德·图尔维尔、德莫兰和另一些人使勒·普拉的社会分析法进一步完善，形成一套社会科学的命名法。这是一种“社会解剖的工具”，它以家庭作为研究的起点，然后扩大到考察社会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作为研究的最后阶段。这个社会事实的专门名词目录分为二十五部分（有许多小标题），构成地点、经济因素（劳动）和家庭组织等几组。接着分析以家庭为基本单元而构成的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并对社会在世界上的作用和未来作出结论。

按照这个模式，许多社会团体以命名法为骨架，在《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许多专题论文。特别是埃·德莫兰，他用这个模式来研究世界上“比较简单的”社会。这里，几乎所有事先规定的论述的基调是地理条件（指地点）对社会结构的“决定论”，这是一种现在被认为是强调得太过分的观点。这

---

[1] P.索罗金：《当代的社会学理论》，纽约，1928 年

三种家庭类型，以及它们分别代表的社会的发展和优缺点，都得到彻底的研究。独立性的家庭被认为是促进社会进步的理想化的家庭，人们作了巨大努力来推广这种家庭制度和理想，特别是在法国。

索罗金对上面提到的命名法十分推重，认为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法的极大贡献”。[①]

勒·普拉对人类社会的社会-地理结构的概括描述，是以他所调查的典型家庭的详细预算为基础的。它发表在六卷本的《欧洲工人》第一卷内，该卷于 1879 年第一次出版。这是对人类社会进行地理研究的重要一步。勒·普拉的论点在书内有简要的阐述。[②]

勒·普拉认为，欧洲各民族是在三个十分不同的“地理环境”，即草原、沿海地区和林地中发展起来的。亚洲草原是在家长控制下的稳定的游牧民族的故乡。欧洲沿海地区拥有渔业资源、船只和住宅，是财产世袭的家庭，家庭组织包括父母、所有未婚嫁的儿女，以及结婚的大儿子及其一家。这是世系家庭（famille－souche）的故乡。林地包括开阔草地、灌丛荒地和各种土壤的很不相同的广大地区，是不稳定的家庭（Lafamilleinstable）的发源地，这些家庭也发展在欧洲的都市环境内，而且已扩展到了美洲。

勒·普拉看到产业革命创造了两种社会。一种社会以传统的格局为基础，另一种社会受到在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发展起来的新思想的冲击的影响。他相信只有信仰上帝、奉行宗教，接受十诫和父母的权威，以及有一个主权政府、私有财产和互助制度，才能有一个繁荣和幸福的社会。

勒·普拉设法按照八大职能类型来评价社会。这些根据生存手段来划分的职能类型如下：野蛮人、牧民、沿海渔民、樵夫、矿工和冶金工人、农民、工厂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

勒·普拉在这里提出的划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根据对采样家庭的研究，第一次试图把社会分成一系列类型，同时把它们同相应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他同时主张，在这种社会里，有一种在社会共同特征的变化和家庭风俗习惯里表现出生活方式的趋势。这一概念一直是地理研究的基本目的，正如我们以后要看到的那样，在下一代中，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在发展他的生活方式（gen－redevie）这一观念时曾经特别予以强调。

在 1901 年和 1903 年分别出版的、德莫兰的《各民族的伟大道路》[①]，是遵循勒·普拉的方向进行研究的最好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德莫兰根据他所称呼的“地理环境”、工作效果的类型，和社会组织（以家庭单位为基础）效果的类型，对全世界各民族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法。历史的解释贯穿全书。各个部族是在特定的地理（自然的）环境中发展起来或形成他们明显的特点的；接着他们向别的地方迁移，在新的不同的环境下，他们的社会制度经历着各种变化。环境严格地控制着各民族的结构和发展。这是地理

[①] 同第 226 页的注。

[②] 《欧洲工人》第一卷的节略本于 1879 年出版，编选入 C.C.齐默尔曼和 M.E.弗兰普顿的《家庭和社会：重建的社会学的研究》，纽约，1935 年，第 361—595 页。这是从一本巨著压缩但完全忠实原文的译著。这是一种使人不安的思想，即认为数以千计的社会学者所能从地理学了解到的，就是这一重要的、但已完全陈旧的、早在一百年前就已提出来的研究方法。

[①] 埃·德莫兰：《各民族的伟大道路：社会地理学论文，道路如何创造社会类型》，两卷集，巴黎，1901 和 1903 年

（环境）决定论最极端的例子。

德莫兰的基本观念，在他上述著作第一卷的前言中有如下说明：

“使民族和种族多样化的基本的决定性原因，是各民族遵循的道路。正是道路（环境）创造了种族和社会类型……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他们遵循的道路，无论是亚洲大草原，西伯利亚苔原，美洲热带稀树干草原或者非洲森林，都并不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这些道路不知不觉地和命定地要塑造成鞑靼-蒙古型、爱斯基摩-拉普（Lapps）型、印第安型或尼格罗型。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型、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西人、日耳曼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都是道路造成的结果；他们的祖先出入这些道路，然后到达现在的居住地……变更这条或那条道路……而且通过这种变更，你就可以改变社会类型和种族。”

我们可以概述一下德莫兰怎样看待（连同他的所有缺点）旧大陆草原的游牧社会，来说明他的这种方法。无所不在的草地“决定了一律的劳动方式和牧歌艺术”。马是主要的牲畜，它“最适于草原，而且正是马，使草原也适合人类”。马通常用于运输和挤奶。食物、棚舍、卫生和娱乐都取决于草原的特性，劳动几乎全部依靠双手。草原也给游牧社会的财产性质和家庭特性打上烙印。除掉开垦的土地以外，全部财产都为公共所有，特有的家长制家庭服从于家长的统治，家庭中一切财产大家都有所有权。家庭是自给自足的，每个成员都依赖家庭，因而明显地缺少创造性，也是保守的。唯一的组织形式是队商，它可以轻易地转入军事用途。由于使用马，具有很大的机动性（阿提拉[①]，成吉思汗和帖木儿[②]）；但是这种社会组织很松弛，这就说明为什么这些帝国很快分裂的原因。

这些民族分布在世界上多数地区，在他们的社会制度中最固定的一个特征是家长制。一个移民浪潮扩迁到草原带，在新的环境下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产生了爱斯基摩人和拉普人社会。另一支移民越过白令海峡在北美洲定居。在新的条件下，虽然家长制家庭仍然保持着，但在北美大草原和森林里出现了猎人。在北美洲的第二条移民路线进入落基山脉山区，第三条路线进入大湖地区的林地。第四支，也是最不幸的一群移民被向南驱赶，进入南美洲的森林和山区。在森林的环境条件下，不稳定家庭发展起来，例如猎人及其妻子，在他们的孩子一旦自立以后，就立刻被遗弃了。

对最特殊的家庭及其社会，以及关于它的起源和传布，都给予特别注意。这是亨利·德·图尔维尔专门研究的领域。这种家庭类型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峡湾里发展起来。峡湾里的渔民有一小块耕地。随着家庭人口的增长，是不能依靠这块受限制的粮食基地来维持生活的。结婚的孩子就离开家庭，到别的地方去打鱼和耕种；由于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独立和首创精神就发展起来。这种情况也导致产生土地的私有制、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和在自愿的基础上缔约的团体。这种社会从斯堪的纳维亚基地出发，向两个方向扩展开去。一支从这里出发发展成为日耳曼各民族，而且产生封建主义；第二支越过海峡到英国，此后，这一基本社会结构在几个世纪以后，移入海外的殖民地区。这一观念以后又与所谓北欧人种类型的某种特殊的性质结合，导致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特别是美国的麦迪孙·格兰特和洛思罗普·斯托达德的著作）和

[①] 阿提拉

[②] 帖木儿

在纳粹政权下流行的北欧人种的优越论。

索罗金对勒·普拉学派总结如下：

“除掉中国的孔子和儒家以外，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社会学学派象勒·普拉学派那样清楚地说明家庭的职能、分类及其社会意义的……首先，这个学派的体系和纲领并没有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整个领域。第二，这个学派过低估计了遗传和种族的因素，过高估计了地理环境的因素。第三，这个学派所分析的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对各种家庭类型的起源，以及这些类型与社会制度及相应社会的历史命运的相互关系，都没有作充分的解释。最后，这个学派实施的纲领是没有用的。”①

然而，这些批评不应当认为是降低了勒·普拉及其继承人，特别是亨利·德·图尔维尔对解释人类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的巨大意义。勒·普拉及其继承人的观点，在本世纪初对英国在人类社会的研究方面有过深刻的影响；不过，这一思想流派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期里，受到美国社会学家如齐默尔曼和索罗金的重视和应用，但是对于美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却丝毫没有影响。正是根据这一点，我才在这里冒昧地简单谈谈它在英国的影响。

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前，曾经对社会的研究者有巨大影响的帕特克里·迪格斯[1]深受勒·普拉思想的影响。迪格斯反过来对英国的地理学奠基人又产生影响；他和他们的交往很密切。这些人有：A.J.赫伯森（他起初是迪格斯在敦提的助手）和 H.J.麦金德，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如韦布斯（Webbs），格雷厄姆·华莱士（GrahamWallas）和查尔斯·布思（CharleeBooth，例如他用家庭预算来研究伦敦的生活和劳工状况），以及英国城市最优秀的设计师雷蒙特·昂温（RoymondUnwin）和帕特里克·艾伯克龙比（PatrickAbercrombie）。由迪格斯系统化的许多思想被英国的地理学家接受，并且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把迪格斯的思想应用到“卫星城镇”方面，得到作为现代作家的导师和领袖达二十年之久的 C.B.福西特（C.B.Fawcett）更加明确的肯定。迪格斯的《河谷剖面图》——从山区发源地到沿海河口湾的河流河谷，以图解形式包括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职业，而且多年来成为从社会学协会发展出来的勒·普拉学会的旗帜。维克多·布兰福特（VictorBranford）和亚历山大·法夸尔森（AlexanderFarquaharson）是通过勒·普拉学会与迪格斯才有往来的。野外调查的思想（野外观察和记录），是迪格斯诊断和治疗乡村与城镇中不适应环境的社会集团的学说基础。在这里，人们又一次不难发现这是接受了勒·普拉的概念。从这一思想出现了迪格斯所称呼的“区域考察”，它包括了地方、劳动和人这样一个三部曲；换句话说，就是地理、人种和经济，或者是环境、职能和组织。这一观念及其研究程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一段时期内，被用作教育，特别是地理教学的方法，和主要在伯克龙比指导下的城市与区域的设计计划的纲领。这种观念，无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和研究方面，都是实地研究的一种主要的促进力量；而且在战后的年代里，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用为一种主要的教学方法，这与在美国的趋势是不同的。

---

[1] 特别参看 J.莫吉的《英国的社会科学》，见前引纪念勒·普拉的文集，第 57—64 页。并参看菲利普·博德曼的《帕特里克·迪格斯：未来的创建者》，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44 年；和赫伯森的《弗雷德里克·勒·普拉》，莱德堡，1950 年。

从帕特里克·迪格斯的著作引起的所有这些趋势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勒·普拉基本观念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趋势可能已经对地理学的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例如继续进行“区域考察”和继续使用“地理背景”作为所研究地区的唯一自然因素），但是在英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地理学的发展中，肯定标志着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时期。

在美国，社会学家C.C.齐默尔曼使用了勒·普拉的在比较稳定的农村社会中选择典型家庭的方法，因为，象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的《家庭》(Family)一书中，有一半内容是完全按照勒·普拉的体系，在美国落后地区进行的家庭调查，大概由于缺少阐述欧洲情况的合适材料，齐默尔曼把老师勒·普拉的《欧洲工人》第一卷中大部分内容直接翻译过来，用以说明欧洲大陆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齐默尔曼的著作于1935年出版。

在美国还有第二支源流，它直接来自迪格斯，而且通过迪格斯与勒·普拉联系起来。美国的社会哲学家刘易斯·穆福特公开承认他是帕特里克·迪格斯的终生信徒；在穆福特的著作中，人们会常常发现来自迪格斯和勒·普拉的思想和名词，而且在提到他们时常常带着感激的心情。这些名词是“河谷剖面”、自然棋盘上的八个棋子（勒·普拉的社会类型），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的旧技术和新技术阶段（穆福特增加了一个始新技术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力、兽力、风力和水力制约着技术水平）。在《城市的文化》（TheCultureofCities，1938）、《技术和文明》（TechnicsandCivilisa－tion，1934）、《历史上的城市》（TheCityinHistory，1936）等书中，人们特别可以看到这些思想及其发展。美国的地理学，在其近代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特别在解释社会现象方面，既绝对不承认先后相继的三位大学者勒·普拉、迪格斯或穆福特中任何一个人的学说，也没有受到它们的影响，这是一件最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流行的穆福特的著作，按照人类在历史上的各种技术水平及其在空间上的变动，对已经过时的区域概念指出了一个清晰的哲学方向和实践方向，并对备受责难的环境决定论作出了纠正，对我自己来说，这是美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令人迷惑不解的事件之一。

我已经谈过，在英国地理学的早期发展中，勒·普拉与以后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他的著作将在下面一章讨论）的观念结合起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我有充分的理由来回忆这种情况，因为我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十多岁的时候，在学校里读到英国两位地理学奠基人写的两本名著，他们都是渗透着深受欧洲传统熏陶的学者。我指的是A.J.赫伯森和马里恩·纽比金（MarionNew－bigin）。这两本书写得简明扼要，因为写作的意图是用作学校中的教科书，但是这两本书都在学术上对推进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A.J.赫伯森和他的妻子多萝西（Dorothy）写成了英国第一部关于人文地理学的著作，书名为《人类及其劳动》（ManandhisWork），于1902年出版，这两位作者特别提到他们对帕特里克·格迪斯，以及通过他而对勒·普拉表示的感谢，“在目前，《社会科学》的主编，埃德蒙·德莫兰先生是勒·普拉观念的有才能的代表”。这些人的学说非常明显地贯穿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肯定（福西特本人多次向我证实这一点）：在牛津大学受业于赫伯森的人获得了同样的印象。在这本书里，我们读到下面这些话：“世界是人类的故乡，我们所了解的地球的所有自然特征、它的气候和动物，都有实际重要意义，因为这些事物帮助形成目前这样的人类种族——这里是具有冒险精神和进步的，那里是懒惰和落后的。”

这本书首先按照各大植被带——冻漠、温带森林、干草原、热带沙漠、赤道森林、山区、平原和沿海地区来对人类生活作概要的阐述。接着叙述职业的影响，即“同样的职业趋向于造成同样的一般社会类型”。赫伯森然后又考察了狩猎社会、渔业社会、游牧社会和农业“种族”，以及职业对住房、衣着和食物的影响。对农业，根据各种作物及其分布，和农业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研究。以后各章则分别讨论《艺术的起源》、《制造业的发展》、《贸易和运输》、贸易路线和城镇、人口的分布和移动（各个不同职业集团的人口密度、扩展和迁移），全书的结束部分对人类种族作了简短的研究。

马里恩·纽比金的小册子《人类及其对自然的征服》（ManandHisConquestofNature）在1912年出版。她在书中对法国地理学家的著作表示感谢，提到的名字有布吕纳、德·马东男、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和德芒戎。这些人的著作将在以后几章进行讨论。这本书的中心点是论述“人类集团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那时已经很少人提起这种关系了；而且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学校的“普通教科书”也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纽比金说，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在某些地方比在另一些地方容易生活下去？”

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以下各章。竞争的场所；先进公社的例子：1.自给的集团，2.依赖的集团。原始状态：采集阶段。人类的助手：1.家畜；2.机械和运输工具。种植的作物：第一类产品和那些提供奢侈品的或第二类产品。有用矿物和工业革命。煤炭区以外的某些社会。大海的资源，以及人类兴旺发达的区域。

实际上，这本书是维达尔关于生活方式的观念的表现，直接继承了勒·普拉对世界上各个社会的分类和处理的方法。虽然它是作为一本教科书来写的，但它体现了比她同时代人的理论阐述要成熟得多的研究。当时，罗克斯拜（Roxby）和弗勒（Fleure）发展了与环境位置有关系的生活方式的思想，他们两人当时是英国地理学界的领袖人物，都深受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格迪斯和勒·普拉传统的影响。人们特别注意弗勒的根据自然环境条件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而划分的世界地区的概念。他在1916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衰弱的区域、增长的区域、努力的区域和困难的区域等的概念。虽然对这些区域论述不详（其目的是提出这个概念），但自这篇论文第一次发表以后，这些地区就被各种牵强附会的方式确定下来了。运用指标和地区定义来研究经济健康水平、地区发展水平的学者，甚至可能不知道这种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先例，以及它在理解世界问题上的贡献。

纽比金与她的法国同行一样，是根据人类对衣、食、住的基本需要来写这本书的。当“人类集团在地球上扩展”时，他们必然会与大自然和其他集团及其观念发生冲突。她的结论部分告诉我们说：

“确立能最好地解决土地利用中各种特殊问题的规定，不是地理学的任务，但是尽可能清楚地提出统治地球表面各部分的条件，却是地理学的工作；因为考虑到这些条件，就能提供政治和社会调整所依据的资料。”

这些话确实是十分明智的，并且是早说了一个世代。

第十七章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1845—1918）

地理学在德国有几个不同的思想流派，但法国的地理学却并不如此，它是按照一个人、即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思想发展下来的。维达尔学派统治了一代人的时间；在今天，虽然这位奠基人的目标显然已经远远落后了，但是法国的地理学家仍然提到维达尔的传统。因此，本章将介绍维达尔和他早年的一个学生让·布吕纳的著作。后者阐明了他老师明白确定的研究领域。

保罗·维达尔·德·拉·布拉什（1845—1918），1865 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史地专业。他在雅典的法兰西学校教了一个时期的书以后，在 1872 年返回法国，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南锡大学当了五年教授，从事这个地区的研究工作，后来写出了《法国东部地区》（LaFrancedeI ’Est，在他临死前的 1917 年出版）一书。在这几年中，他也到德国旅行，会见了李希霍芬。1877 年，维达尔转到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教书。1898 年他转到索尔蓬，在那里一直工作到 1918 年去世。维达尔研究地理学有三十多年，并且启发了许多学生，他们后来都成为法国各大学的教授。W.L.G.乔尔格在 1922 年写道：“在法国担任地理学教授职位的人，几乎全部都是已经去世的维达尔的学生，或者是他的学生的学生。可以说，没有另一个国家的地理学象法国这样以一个人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①

维达尔为地理学这个领域写了一批杰出的著作。它们包括《社会事实的地理条件》（GeographicalConditionsofSocialFacts，1902）、《地理学的独特性质》（DistinctiveCharacteristicsofGeography，1913）和人文地理学里的“生活方式”（1911）等主要论文。这些文章都发表在他创办的杂志《地理学年鉴》中。很幸运，我们能够从德·马东男辑集的、于 1921 年出版的一本文集《人文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ofHumanGeography）中看到几篇这类的论文和另外一些材料。这本书讨论的内容包括全世界人口和聚落的分布、文明（我们当代的地理学家喜欢把这个术语叫做“文化”）的类型和分布，以及各种运输形式的分布及其发展。农村聚落、农村的集团和各种建筑形式，“使景观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构成说明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思想也应用于田野、道路、城市、森林和景观的其他要素。

维达尔坚持研究物质的地球——大自然，这里他指的是地理环境；他也坚持研究人类。可是，他认为地理学家的特殊任务是阐述自然和人文条件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自然（天然）环境提供了可能性的范围，而人类在创造他们的居住地的时候，又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与当时流行的、作为达尔文传统的“环境决定论”相反，维达尔建立起了“可能论”的概念体系。这个概念体系，后来得到一位精明的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1]的充分阐发。通过对土地的占有和留在土地上的痕迹，人类创造了各个不同的区域——不管是国家还是比较小的地区。人类不是作为个人、而是通过他所属的集团的传统与目的与环境建立起联系的。很明显，这一整套的研究方法要求有历史的解释，以便去估价人类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的方式和目的。这种研究方法，也要求彻底地评价自然地理环境；这既是目的的本身（真正的自然地理学），也是为了说明与人类占有的关系。

我们也要简略地介绍一下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其他著作。《法国

---

[1] 吕西安·费弗尔：《历史的地理学导论》，伦敦，1924 年英译本。

地理学的面貌》（TableaudelaGéographiedelaFrance，1903）被看作是地理学的经典文献之一。这本书集中注意力于研究地球的自然特点、人类在景观上留下的痕迹，以及组成国家的各个特殊的单元。维达尔为了编制一本地理和历史地图集（1894），耗费掉他学术活动早期的几年时间。《法国东部地区》虽然以他早年的研究为基础，但却是最后写成的一部著作（1917）。他在 1891 年与殖民地理学家 M.迪布瓦合作创办了《地理学年鉴》，几乎所有各期都有他写的文章。《世界地理》（CéographieUniverselle）是由维达尔设想和组织的。马尔特-布伦（1810—1829）和埃利兹·邵可侣（1876—1894）曾经分别写过两部《世界地理》，但是这第三部《世界地理》却是阐述世界地区和民族的不朽著作。最后，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吸引来一批热心的学生，他们在他的鼓舞之下，写出一批“区域专题论文”，其中很多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培训专业的地理工作者方面，这个传统继续保持下来；而他的学生对法国和海外（特别是以前的“殖民”领地）地区的详细研究，是对近代学术的一项重大贡献，这应归功于这位奠基人的创始和不断的鼓舞。在下面，我们将专门介绍专题论文。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尽力要把地理学创立成为一门有特色的学科[①]。它的研究领域是在“构成地球的固体、水体和气体的接触带发生的全部现象”（近年来，德国学者把这个接触带称为“陆圈”）。这些现象是从“地区、位置和分布”方面进行研究的。因此，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有两个方面——大自然和人类。为了说明地球表面的外貌，人们既需要借助于自然科学，也需要借助于人文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和历史学。对自然界来说，必须根据地质史来解释地表现象，切不可忽视“乡村的轮廓、事物的种种形态”。研究的中心是景观的外貌（laphysionomiedespaysages），这指的是真实的、可见的景观或居住地。它既是自然的、也是人类的活动的产物。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把物质环境看作是人类占有的“自然”或“地理”的环境。这个观点在当时很流行，今天也仍然有很多人坚持它，虽然它是一种错误的概念，或者肯定是用词不当。维达尔在 1902 年确实写了《社会事实的地理条件》一文，人们肯定得到如下的印象，即社会事实只有在与“地理”（即自然）环境发生关系的时候才应当予以研究。

社会条件以具有特色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在比较简单的社会中，生活方式显然是与自然环境密切适应的。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使勒·普拉的观点更为明确，在英文著作中，1902 年出版的赫伯森的《人类及其劳动》一书，同样表现出这些观念。这种研究方法很明显地注意人为的景观形态——道路、田野、农场、村庄和城镇，注意人口的分布、密度和流动，注意文化类型的特点和分布（如同瑞纪奇研究巴尔干半岛文明区一样），以及注意食物、衣服、物质装备和房屋（住宅）的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维达尔于 1913 年在《年鉴》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概要地叙述了“地理学的特征”。他宣称：地理学的研究目标是作为人类存在和劳动表现的景观的各种现象的特征和组合。在这里，维达尔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李特尔的名言。他在坚持既需要地质学、也需要历史学来解释地球表面上各个区域组合的同时，他继续说：

“地理学之所以能从其他科学获得帮助，同时又向其他科学提供共同的

[①] 阿·德芒戎：《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大学评论》，6 月号（1918）第 4—15 页

财富，就是因为它的职能是：不割裂地看待大自然所聚合在一起的事实，而是从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上去理解这些事实，无论这些事实是在把它们完全包围的全球环境里，还是在它们所处的那一区域环境中。”

维达尔把地理学这门学科的具体概念列举如下：

1.地理学承认地域现象的统一性。因此，它从全球着眼去考虑地域现象各种组合的起因和一般类型；

2.地域现象要从各类不同现象的各种组合和变化中去理解；

3.地理学力图描述、解释这些共同的变化，并确定其地理位置；

4.地理学力图估量环境、特别是气候和植物对人类的影响；

5.因此，地理学尽力探求对地域现象进行说明和分类的科学方法；

6.地理学力图估量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并确定它的位置和范围。

后来，维达尔的一位杰出学生阿·德芒戎（参看第 265—269 页）也追求同一的目的。在《人文地理学诸问题》（ProblèmesdaGéographieHumaine，1945，作者死后出版的论文集）一书中，他列举了人文地理学的四个主要研究领域。它们是：1.研究自然和人文的资源，它是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生活方式这个概念的进一步发展；2.各种文明类型的发展及其位置范围；3.人口的分布和迁移；4.人文景观——农田、房屋、乡村、道路、城镇和国家等各种事实的分类、分布和发展。

让·布吕纳

让·布吕纳（1869—1930）是法国的一位杰出学者和地理学的创建者。由于他论述人文地理学的著作被译成英文，他与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同负盛名。布吕纳和他同时代的德国奥托·施吕特尔一样，力图给予人文地理学以一个清晰的学科基础。他在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指导下进行研究，把维达尔看作导师。后者于 1911 年把他和他论述人文地理学的著作推荐给伦理和政治科学院。

让·布吕纳出生在图卢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他和许多法国地理学家一样，当初的志愿是想成为一名教师。他在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手下工作，在 1892 年取得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教师资格。他依靠奖学金继续在巴黎学习到 1896 年；他到矿校、土木工程学校以及农学系去听课。1896 年，瑞士的弗里堡大学聘请他担任地理学教授；1908 年以后，他在洛桑大学讲授人文地理学。1894 年，他在西班牙住了一段时间，根据这次旅行考察，他写了一篇关于水利灌溉的论文：《水利灌溉：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的地理条件、方式和组织》（Irrigation：sesconditionsgéographi-ques，sesmodesetsonorganizationdanslapeninsuleibèriqueetdansl’AfriquedeNord），于 1902 年发表。不过，布吕纳还有其他方面的兴趣。1891 年，他把前几年在埃及古手抄本上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论文《雅典的宪法》（LaConstitutiond’Athènes）译成法文。1898 年，他写了一篇纪念米什莱（Michelet）[1]的文章而得到法国科学院颁发的奖金；1901 年，他和妻子合写了《拉斯金和圣经》（RuskinandtheBible）一书。

布吕纳的主要著作发表于 1910 年，书名为《人文地理学：原级分类的尝

[1] 米什莱（1798—1874）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译者

试》（GéographieHumaine：EssaideClassificationposi-tive）[2]。由于这本著作，他得以进入法兰西学院。从 1912 年起，他在该校担任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教授。他应著名的历史学家 G.阿诺托（G.Hanotaux）之请，开始写《法国史》（HistoiredelaNationFrancaise）的开头两卷。这部著作的书名为《法国人文地理学》（GéographieHumainedelaFrance）[1]，是在二十年代早期与 P.吉拉尔丹（P.Girardin）和 P.德方丹合写的。布吕纳还与 C.瓦洛合写了一部《历史的地理：在陆上和海上的和平与战争地理学》（LaGéographiedel’histoire：GéographiedelaPaixetdelaGuerresurterreetsurmer，1921）。由于所有这些著作的成就，布吕纳在 1927 年被选入法国科学院。1928 年，他翻译和介绍了（在他女儿的协助下）美国地理学家鲍曼关于政治地理的最新著作，书名为《新世界》（LeMondeNouveau）。布吕纳于 1930 年去世。鲍曼的著作被译成法文，布吕纳的人文地理学著作被译成英文，这件事实是这一时期美法两国杰出地理学家的领导人之间、专业和私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又一个象征。

布吕纳的见解受到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学说的启发，但它不可避免地要把研究重点从“地理条件”和“社会集团”转移到研究地球的表面特征上去。布吕纳以人类在地球表面活动的“可见的和确实的事实”为基本材料，精心地建立了“人文地理学”的体系。它们被称作人文地理学的基本事实。同样地，如果把景观的自然事实——地表形态、植被和作为地形在地表表现的各类土壤等（地形，lesformesduterrain，这个术语也就是 1887 年诺埃和德·马尔日里使用过的那一个）加上去（人们必须如此）的话，那末我们就有了地理学的基本事实。

人文地理学的基本事实分为如下三组：

1.非生产性土地占有的事实——房屋和道路；

2.驯化动植物的事实；

3.在植物、动物和矿藏方面破坏性经济的事实。

人们在各个特殊的地区内研究这些事实（区域研究），揭示它们在对立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的相互依赖关系。

按照布吕纳的意见，地理学并非只研究这三种可观察的现象；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的。在这些基本事实以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与它们有联系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被称做“历史的地理”，它包括五个方面：人口的分布（静止状态和各种流动）；经济地理或劳动地理（生产、运输和交换）；政治社会地理（领土、道路、边疆和国家集团）；文明地理或社会地理（民族、种族、语言、宗教、学术、艺术和技术的现象，以及团体的态度＜精神状态＞，和把上列各项与基本事实联系起来的司法和社会组织机构）；与“区域地理（L■nderkunde，Corografia），它是上述各项的综合”。

捉摸不定的社会现象确实存在于各个特殊地区，因而也是地理组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只在了解景观各要素及其地区组合的形成过程时，有需要的

---

[2] 《人文地理学》，1910 年，巴黎，三卷，1934 年出版，第四版。由 I.鲍曼、R.E.道奇和 T.C.勒孔特译成一卷本，芝加哥出版，1921 年。布吕纳女儿和皮埃尔·德方丹合写的法文简要本出版于 1942 年，1947 年出版了第二版。

[1] 第一卷为《普通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1920 年出版；第二卷为《政治地理学和劳动地理学》，1926 年出版。第二卷与 P.德方丹合写。

情况下才去考虑它们。这些是地理研究的逻辑的领域——人类生活和组织的独特地区，但它们不在基本事实的范围以内。布吕纳断定，后者是地理学领域的特别“自治区”，前者是附加的和外围的领域，其他学者可能也会很好地去探讨它。显然这是一个予以强调的问题，而布吕纳对外围领域有着同样的兴趣。1925 年，C.瓦洛在《地理科学》（LesSciencesGéographi-ques）一文中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区域专论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坚持地理学的研究（当然还有地理学家的培养）应该集中在个别的区域上。这些区域要小和容易进得去到这样的程度：人们能够在野外、群众中间和档案馆的书架旁进行彻底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地球上的土地和居民归纳出准确有据的概括。这正是李特尔在《地球学》一书中的方法和目的。

“如果要想避免（一般化的）这个危险，人们就必须有补救的方法。我能够提出最好的忠告是，在一个仔细挑选的小区域内，切近地观察地理条件（原文如此）和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再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或者说写成专论文章。”[①]

必须指出这个基本事实：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所说的“区域”，并不是意味着作为地域描述的范围，一个在空间上有明确界线的地区。他说的是在一个地区内探究地域现象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这个地区则是在相似性或特殊性的广泛基础上选定的、便于进行研究的地域单元。在早年的区域论文中，地图是很粗劣的，它们的作者并不专心于确定作为起始的区域范围。他们关切的问题是去发现这类地域的结合并找出它们的原因。很多说英语的地理学家，对这一点是有误解的。

1918 年，阿尔贝·德芒戎在评价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时，这样写道：

“每一个区域（原文如此）都有它自己在土壤、大气、植物和人类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特特征。所有（地理的）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这些特征。描述的目的是综合这些特征，并揭示组成各个区域类型的所有现象的互相结合。”[②]

在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鼓励和督促下，出现了第一批这种新颖的研究著作，1902 年有德·马东男关于瓦拉奇亚的研究，1905 年有阿·德芒戎关于皮卡迪的研究，和 1906 年拉乌尔·布朗夏尔关于佛兰德的研究。紧接着出现的其他著作有：卡·瓦洛的《下布列塔尼》（LaBasseBretagne，1906），朱尔·西翁的《诺曼底东部的农民》（LesPaysansdelaNormandieOrientale，1908），J.勒旺维尔的《莫尔旺》（J.Levainville，LeMorvan，1909），瓦歇的《贝里》（A.Vacher，LeBerry，1908），巴塞拉的《普瓦图平原》（Passerat，LesPlainesdeLaPoitou，1909），马·索尔的《地中海畔的比利牛斯》（LesPyréneésMéditerranéennes，1913）和勒内·米塞的《下巴英内》（LeBasBaine，1917）。

在维达尔·德·拉·布拉什这位大师去世以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

[①] 《地理学年鉴》，11（1902），第 23 页。

[②] 阿·德芒戎：《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大学评论》，1918。

里，他的传统仍然被积极地继承下来，但有一些重大的改变。1938 年[1]，勒内·米塞写道：法国的地理学家按照维达尔的传统，一直特别致力于“区域的描述地理学”。勒内·米塞又说，“这些著作是法国学术上的丰碑，我这样讲并不是夸张的。也许还没有别的科学揭示出描述的重大意义”。但是，“区域地理”在它解释事实方面是与普通地理学的原理密切相关的。因为正如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所主张的，对一些具体地区的彻底研究必然成为站得住脚的一般概括的基础。区域地理学和普通地理学是相互依存的。

米塞说，所谓区域研究法是一种把科学和艺术融成一体的工作。因为一个区域有它地理的个性。“要通过辨认自然的影响、人类的活动、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所有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寻求这种独特的性质。”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出现了许多学术性区域专论。着重的方面取决于作者的目的和那个地区的性质。有一些区域专论局限在自然地理的范围内，如 P.比罗的关于比利牛斯东部的地形，G.夏博关于汝拉中部的高原，M.帕尔迪（Pardé）的罗纳河的水文变化，A.佩尔皮尤（A.Perpillou）的论利穆赞地区，E.贝内旺（E.Bénèvent）的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气候，以及亨利·博利希的论中央高原地形。另一些区域专论集中于人文地理学方面，例如，德方丹的加龙河中游各地的居民及其劳动状况（1932），T.勒费弗尔（T.Lefebvre）的大西洋比利牛斯半岛上的生活方式，P.马雷（P.Marres）的关于科斯地区的论文（1935），和 M.佩兰（M.Perrin）的圣艾蒂安的工业区（1937）。其他专论包括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全面研究。例如：安·肖莱的《萨瓦的阿尔卑斯山前麓》（ThePre-alps，1925），D.福歇的《罗纳河中游的平原和盆地》（ThePlainsandBasinsoftheMiddleRhone，1927），A.吉伯特的《布贡迪和阿尔萨斯的门户》（TheGateofBurgundyandAlsace，1930），A.阿利克斯的《瓦兹》（L’Oisans，1929），朱尔·布拉什的《格兰德—夏尔洛特和维科尔高原》（JuleBlache，MassifsoftheGrande-ChartreuseandVercors，1933），罗歇·迪翁的《卢瓦尔河流域》（TheLoireValley，1933），皮埃尔·乔治的《罗纳河下游区域》（TheRegionoftheBas-Rhone，1938）和 A.梅尼埃的《塞加拉，莱弗祖和夏塔内尔》（A.Meynier，Segalas，LevezouandChataigneraie，1931）。还有一批研究外国地区的专论，如夏尔·罗贝基的《清和》（LeThanHoa，1929）（在安南），P.古鲁的《东京三角洲的农民》（PeasantsoftheTonkinDelta，1936），R.图米的《叙利亚中部地区》（R.Thoumin，CentralSyria，1936），和 R.肖帕-雷伊的《萨尔》（R.Capot-Rey，Saar，1934）。列举的这些数目是不完全的，只限于我迄今读过的那部分著作。

从维达尔创立的理论体系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区域专论的研究方法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只要把发表于 1905 年德芒戎的关于皮卡迪地区的专论与发表于 1932 年德方丹的加龙河中游地区的专论，或者与发表于 1934 年罗歇·迪翁的卢瓦尔河中游谷地的专论作一比较，这种变化就显示出来了。对这三篇专论将在下面作一简单评述。但是要确切地评价这些专论的价值和目的，至少要费力地阅读其中的一篇，并且备有相应的大比例尺地图，最好还亲自去这个地区看看，耐心地观察地形的细节。这是我的长期经验，有时还需要作者陪同一齐去。我坚决认为，研究一篇区域专论（配合适当的地图，

---

[1] 勒内·米塞：《地理杂志》，44（1938）。

合乎理想的情况是接着就去进行实地观察），是培养每一个地理系大学生（单独地，最好是集体地）的一项基本方法。

德芒戎关于皮卡迪地区的专论，反映了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时代流行的地理学概念体系。在最初几页中，就说明区域是把该区域建成截然不同于周围地区的那些居民的历史结合。皮卡迪的最应强调的一点是它的范围与白垩土的地质基础的范围不一致，它是一个人文的实体。这篇专论接着依次论述（按每章的标题）：地形；土壤（白垩土、粘土——带有燧石和壤土，与景观和人类占有联系起来考察）；气候；水文，也是与人类占有联系起来考察（水系、水位等）；自然条件，垦荒，沿海沼泽地的农业占有；农业，包括森林开垦地的历史、农户拥有土地的面积、作物和牲畜；城市手工业（纺织业）的场所，农村手工业的起源、发展和分布；贸易的路线和经济交往；公共土地的起源和分布，土地所有制，个人所有的土地；聚落——农场建筑物（各座建筑物的排列）、村庄、小镇、市镇的配置、类型和分布；人口的分布、密度，人口的减少和流动；在皮卡迪地区内的地域分区，它们的位置和界限，以及决定性因素——历史的起源、自然条件和与城镇中心的关系。

德方丹的研究（1932）是关于加龙河中游地区人类占有土地的情况。自然地理专论开头部分作为认识环境的手段，只用几页的篇幅作了概括性的叙述，但是它被很巧妙地交织在对不断变化的人类占有的格局和形式所作的解释之内。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结构，通过历史提供了指导路线。研究从目前的状况开始，往上追溯，以中世纪早期的移民结束；在后一时期，目前文化的景观获得其最初的决定性的人类占有的印记。这是依据人类社会的不断变化的空间结构作用于景观的影响，对区域概念精炼的和充分的应用；是五十年以前，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获得的工作成果。

下面是各章的顺序：“人类工作的效果”包括各种居住地的类型（各个建筑物的类型）和群集的聚落，从小村到城镇及其地域性的结构（公社）。移民的各个阶段包括：（1）十九世纪的人口减少，（2）十八世纪的人口过剩，（3）十三、十四世纪对要塞（新设防的市镇）区的再移民，（4）十一、十二世纪大寺院在人口方面的作用。每个阶段都占一章或一章以上的篇幅。“各式劳动”（horizonsdetravail）是占支配地位的占有方式。农业占有部分以今天流行的各种耕作制度作为开始，然后回溯到十七、十八世纪的“小麦-玉米轮作”，和中世纪的耕作制度。制造业包括如下两章：它们目前的性质与分布，和十八世纪的性质与分布。对于商业，把它与那些大谷地中的运输干线，以及这些运输干线对于运输和贸易点位置的适应性（水文状况、泛滥平原、开垦和利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同时也把由河流和道路形成的交通网，以及与它们相关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考察。最后一章是叙述市场中心和它们在这个运输网中不断变化着的作用。

在迪翁于 1934 年发表的研究卢瓦尔河流域的专论中，显然使用了历史的方法。阿·德芒戎在《年鉴》（1934）上曾经对它作了如下评论：

“在这里，我们发现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紧密合作。法国的大多数区域专论，自从三十年前首次出现以来，通常包含有自然和人文两个部分。但是现在人们发现一种趋势（显然由于不同研究方法的结果），即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作为一个整体（一起）、但又独立地进行研究。这样，人们得到的是用一道狭窄的墙壁分隔开来的两个房间，除掉同一个房顶和建筑师以外，别无共通之处。但是在罗歇·迪翁的著作中，这两部分始终交织在一起，

因为每一条道路都通向人文方面。在关于气候、瓦尔（河床）的地形和河流的洪水等章，都是应用这种方法的例子。他总是把局部的条件和一般（较大范围）的条件联系起来。显然，这是在卢瓦尔地区把法国北部和南部两种农业制度结合在一起讨论的方法。”

这一巨著分成三册。第一册研究卢瓦尔河谷的自然特征——面积、气候、地形和河流，特别是河流平原和水文变化的特殊性质。第二册研究人类改造河流平原及其与变化无常的洪水作斗争的历史，因而对从中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中建设的控制河水的堤坝作了重点介绍。第三册通过古代农村传统、十九世纪的农业革命和今天的农业类型——特别是葡萄在经济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证明，来研究河谷地区的农村生活和组织。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里出齐的《世界地理》标志着区域研究的顶峰。这一巨著是由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创议的，各卷差不多都是由他的学生在吕西安·加鲁瓦担任编辑的情况下写成的。全书共二十三卷，其中最后三卷是埃·德·马东男写的一大卷法国《自然地理》和阿·德芒戎写的二大卷法国《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这些著作体现了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观念，和这一代作者的思想实质。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用下面这句话表达了编纂本书的主要目的：通过区域来说明人地之间的一般关系。

法国《自然地理》（于 1942 年出版）这一卷是由埃·德·马东男写的。第一部分介绍地形，以大区域为基本单元进行叙述，包括巴黎盆地、海西高原、阿尔穆里加、阿登、孚日、中央高原、阿尔卑斯山、汝拉山、索恩-鲁达尼亚走廊（包括科西嘉）、阿基坦盆地和各种海岸地形。第二部分包括气候、水文和植被。

阿·德芒戎写的二大卷（于 1946 年和 1948 年先后出版）是《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在第一卷中，先有简短的一节叙述法国的特性，然后分成四个部分，即：法国在欧洲和世界的位置，农业经济和农村生活，主要的农业区（西部、北部、中西部、中央高原、阿基坦盆地、地中海沿岸、阿尔卑斯山区、比利牛斯山地），运输（公路、铁路和水道的历史发展与分布）。

第二卷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城市聚落在它所在区域中的各种职能，其中包括对季节性城镇（lesvillessaisonnières）的研究。第二部分探讨人类与海洋有关的各种活动，也按照区域进行研究（北部、诺曼底、布列塔尼、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沿岸）。第三部分研究工业经济，再次按区域研究，分为北部、鲁昂复合区、东部、里昂复合区、中央区、南部和阿尔卑斯区。第四部分详细研究巴黎，包括它的形成、发展、人口、职业、市界和卫星城镇。第五部分把法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地理实体进行研究，解释它的成长经过，并研究它的分区。全书把法国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但是按照有关的区域来解释人文的各个方面。作者并不打算把人-地关系的所有各个方面强行纳入固定的“区域的”体系，而在别的著作中，这却是非常普通的。

近年来，人们发现法国地理学家在使用维达尔的传统这个名词，我们将在以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今天对来自这位奠基人坚强领导的动力有一种离心的现象。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关于本世纪头二十年，和维达尔·德·拉·布拉什逝世以后，从 1918—1938 年期间，由他的学生所发展的各种趋势。在这个问题上，暂时不表示我的意见，让我先引用让·戈特芒在 1967 年 1 月 15 日写给我个人信中的一段话：

“按照法国正式的解释，由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所创建的法国地理

学派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巴黎学派，在维达尔去世以后，包括以埃·德·马东男（维达尔的女婿，自然地理学家）和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家）为首的一批人。另一支是以拉乌尔·布朗夏尔为首的格勒诺布尔学派。在我看来，巴黎学派（我当然属于这一派）比较注意分析的和系统的研究，格勒诺布尔学派由于它的领导人的技艺，更多地是一个‘描述派’（portraitist）。值得注意的是：格勒诺布尔学派的发展非常快，1925—1955 年期间法国各省大学的地理系教师中，大部分属于这一派。布朗夏尔的学生中包括阿利克斯、福歇、阿尔博、朱布拉什和罗贝基等人。

“实际上巴黎学派的人数更多，但是德芒戎的一大批学生，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至少有一段时间完全脱离了法国大学的地理教学工作。这样，巴黎学派似乎只保持主要从德·马东男和他亲近的学生们（特别是肖莱，他继承德·马东男在索尔蓬担任教授的职务）那里所延续下来的传统，这种传统基本上植根于自然地理和描述的区域地理。现在法国许多专门研究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地理学家，他们起初都是着重研究自然地理的。

“现在我回过来谈一下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我并不认识他，但是在我的经历中，曾经有一些机会与他的主要学生一起工作（其中包括：德芒戎，他是我主要的老师；埃·德·马东男，亨利·博利希，朱尔·西翁，吕西安·加鲁瓦，E.F.戈蒂埃，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和保罗·芒图＜PaulMantou＞），当然，我还认识维达尔的其他许多学生。毫无疑问，维达尔在法国是以区域研究、也以自然地理开始他的伟大传统的。但是，正如你可能已经知道的那样，他由于所受的教育，和当初专门研究古代希腊的缘故，本来是一位古典学者。他到雅典的法国考古学校去准备博士论文。大约十年前，我在雅典的时候，在这所学校的档案里，发现他寄居该校的确切日期和他的论文题目。他在那里发现了托勒密和斯特拉波，写了一篇很有意义的关于托勒密的论文。这使他感到在现代大学中，也应当研究这种科学。但是我相信，除了这些古代地理学家以外，维达尔还受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哲学观念的影响。凡是研究过柏拉图的《对话》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人，就不可能象拉策尔等人那样容易接受环境决定论。另一方面，维达尔受到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一书中关于‘地方’(place) 和‘没有地方’(nowhere) 的诡辩的强烈影响，比他下一代的古典学者所受到的影响可能要大得多。

“我认为维达尔的传统既强调某些托勒密的因素，也强调某些柏拉图的因素。在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中间，许多人主要是走托勒密的路线，其他的人则更多地受到这位大师学说中的柏拉图、甚至可能是苏格拉底路线的影响。我想，当你询问西格弗里德、昂塞尔、罗贝基和古鲁的时候，你所选择的都是受到柏拉图关于资源和社会的思想影响的人。”

关于法国地理学在战后的趋势，即在德芒戎、布朗夏尔和德·马东男以后一代的情况，在 1966 年，安德烈·儒尔诺写了下面一段话：

“在法国，大多数研究工作是随着区域地理专论的发表而开始的。在这一批研究论文以后（这对了解全世界、首先是了解法国是必须的和重要的基础），人们就已对自然的或人文的主要现象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

“战后，论文包括更为广泛的主题，它们都与范围狭小的地区内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现象有关系。由于一直没有获得足够的材料来进行普遍的综合，他们就致力于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较深入地理解某种自然的、生物的和人文现象的分布，以及引起这种分布的原因。再次吸收这些一般研究的资料来进

行区域综合，将是下一代的事情了。”[1]

我将在以后（参看第 300—301 页）研究战后的趋势时再来谈这个问题。

[1] 安德烈·儒尔诺：《普通地理学导论》，《七巨头大百科全书》，巴黎，1966 年，第 6 页

第十八章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同时代人

埃利兹·邵可侣

埃利兹·邵可侣（1830—1905）[1]于 1849—1850 年在柏林听李特尔讲课，但是他的概念和著作远远超过了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他在 1851 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驱逐出法国以后，就在英国、美国和南美洲旅行和工作，到 1856 年才返回法国。显示李特尔的强烈影响的、他的两卷本著作《地球》（LaTerre），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但是直到 1868—1869 年才分别出版，英译本则在 1872 年出版。1871 年，邵可侣又一次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判在牢狱中服苦役，后来又改判为流放。在 1876—1894 年间，他出版了十九卷的《新世界地理》（NouvelleGéographieUniverselle）。晚年，他在爱丁堡和布鲁塞尔讲学，对比利时的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六卷本的《人类和地球》（L ’ hommeetlaTerre）发表于 1905 年，即他去世的一年。

《新世界地理》由英国的人类学家 A.H.基恩节译成英文，书名为《地球和它的居民》（EarthandItsInhabitants），1882—1895 年间在纽约出版。这是一部地理学的学术巨著。它内容丰富，附有三千幅地图。我不能不说，邵可侣在这本书中独立取得了李特尔没有取得的成就，他创造了以区域为基础的对地球的描述。

邵可侣所描述的题材是明白畅晓的、详细的、系统的和均衡的，而他的哲学方法也反映了他的时代特点。因此，所有的远古历史事实，都从它们发生的地理舞台的特性上予以解释。

“我们甚至有理由断定，人类发展的历史早就预先用庄严的大字写在全世界的平原、河谷和海岸上了。”[1]

然而，下面这些意见却弥补了上面这段信口开河的瞎话：“人类可以变更（他居住的地方）去适应他自己的目的；他好象可以征服自然，并把地球的活力转变为驯服的力量。”人们必须找出“地形的历史重要性的逐渐变化”；在空间研究中，“我们一定要考虑另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因素——时间。”[2]

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这一论题，在邵可侣的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在他以前的许多著作，都已约略地提到了。十八世纪，在比丰伯爵的著作里，第一次表明了这一思想。十九世纪中期，乔治·珀金斯·马什告诫人们：不要干预“有机界和非有机界的天然安排”。[3]十九世纪末，哈佛大学的地质学家纳撒尼尔·谢勒[4]和俄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沃埃科夫[5]都发展了这一思想。它渐渐地变成与人类行为的有害影响联系起来，特别是与以后由让·布吕纳发展的“毁灭性的开发”、或者如德国学者所称呼的“掠夺经济”（Raubwirtschaft）的思想联系起来。由于资源浪费、耗竭现象的日

---

[1] M.W.米克塞尔：《对于埃利兹·邵可侣的著作的评论》，《地理》，34（1959），第 221—226 页

[1] 《海洋》，第 435 页。从前引米克塞尔一书中转引，第 223 页。

[2] 埃利兹·邵可侣：《地球和它的居民》，E.G.雷文斯坦编，纽约，1882 年，第一卷，第 5 页。

[3] 乔·珀·马什：《人类和自然，或由人类行动导致改变的自然地理》，纽约，1871 年。参看戴维·洛温撒尔：《乔治·珀金斯·马什：多才多艺的佛蒙特人》，纽约，1958

[4] N.F.谢勒：《地球上的人》，纽约，1912

[5] 亚·沃埃科夫：《人类对于地球的影响》，《地理学年鉴》，10（1901），第 97—114 页和 193—215 页

益增加与扩展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就出现了保存自然资源的设想。[①]

邵可侣十分关心人类在破坏景观方面没有审美力。他关心自然美遭到毁灭，认为人类在开发资源和建设工厂中，应当使“风景优美和壮丽”。邵可侣说：但是由于滥用权力，“野蛮人留给他所住的地球的是一个粗野残忍的外貌”，到最后，“所有的美和诗都从景观中消失了，想象力丧失了，思想贫乏了，一种平凡和屈从的精神占据着灵魂。”说农村生活比城镇生活要好一点，正是基于这些理由。在这种来源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的看待世界的观点中，我们感到邵可侣在爱丁堡认识的帕特里克·格迪斯，在 1900 年前后有相同的精神。我们认为这与刘易斯·穆福特后期的观点也有共通之处。确实，邵可侣、格迪斯和穆福特这三个人，毫无疑问是与整个这个时期的主要趋势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做结论时，我们要注意到这些哲学观点（只要略读邵可侣的著作就会发现），对于这部十九卷的《新世界地理》在处理材料和叙述清楚的大量劳动方面没有任何影响。这部著作不愧是保罗·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世界地理》的先驱。

埃利兹·邵可侣的《新自然地理学》（NewPhysicalGeog-raphy）于 1890 年出版，共两卷。第一卷：《地球》（TheEarth）；第二卷：《海洋、大气和生命》（TheOcean，AtmosphereandLife）。书名的副题是《地球生命现象的描述史》[②]（ADescriptiveHistoryofthePhenomenaoftheLifeoftheGlobe）。这本书的要点仍然是把自然地理学归结为对于地球表面及其动植物和人类生命的描述。

“自然地理学就当前的情况说，只限于描述我们眼前的地球。它的目的并不象地质学那样雄心勃勃，地质学力图详细叙述我们星球连续着的长期历史；但是，仍然是由地理学来收集事实和进行分类；正是它发现了岩层的形成和破坏的规律。”邵可侣讨论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指的是勘查、灌溉、沼泽和湖泊的疏浚、堤坝的修建（特别在沿海地区）和各种交通线的增加。邵可侣指出，人类已经毁灭了天然植物和野生动物，而用栽培的作物和家畜来代替他们。人类破坏了“自然的协调”，从而也改变了自然的平衡，这种情况有时对人类是不利的。人类也扮演了“使地球面貌丑陋或容光焕发”的角色。目前“需要的是关于强有力地对待自然的教育……这将使我们对自然的真爱得到最宏伟的发展”。

邵可侣的区域描述方法，可以从他的《世界地理》（《地球和它的居民》）一书中欧洲部分看出来。我们应当把他的方法与五十年前马尔特-布伦（参见第 25 页）和五十年后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参看第 239 页）的方法进行比较。这一部分（整体地）研究边界、自然区划、高山、沿海地区、气候和居民。对于法国（具体的）研究，则包括以下内容[①]：位置、地质气候和河流、史前时代、居民（种族特征）。然后是对法国各部分如比利牛斯、朗德和加龙河流域等地的自然特征和居民的一般描述。接着是小区域地理，包括位置、资源和产品，以及对每个区中的城镇也都进行描述。最后两章是研究统计材

[①] C.J.格拉肯：《可居世界的变化着的观念》，列入 W.L.托马斯编的《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芝加哥，1956 年

[②] 本书的英译本是由考古学家 A.H.基恩翻译的，这一事实表明当时的人文学者（特别是基恩和英国的 A.C.哈登）对地理学的进步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①] 《地球和它的居民》，E.G.雷文斯坦编，《欧洲》，第二卷，《法国和瑞士》。

料和政府。前者包括人口（增长及分布）、农业（各县地图和等值线图）、采矿、制造业、商业和社会资料（包括一张按各县统计的识字人口分布图）。最后一章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各项详细事实、教育、财经和各个殖民地。

弗朗兹·施拉德

弗朗兹·施拉德（1844—1924）的生卒年代与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差不多，埃·德·马尔日里说他“可能是当代法国地理学家中最独特的一位”。他不是一位官员、工程师或大学生。他早年致力于勘察比利牛斯山区，经埃利兹·邵可侣和阿道夫·若阿瓦（AdolpheJoanne）（与默里＜Murray＞和贝德克＜Baedeker＞齐名的一位著名的旅行指南的编辑）的介绍，到阿歇特（Hachette）图书社工作。弗朗兹·施拉德是一位天才的野外考察人员、制图员和艺术家，绘制了一批比利牛斯的新地图，特别是它的中段。他成为阿歇特图书社的制图部主任，在合作者的协助下绘制了好几本地图集，如《现代地图集》（AtlasdeGéographieModerne，1889）、《历史地图集》（AtlasdeGéographiehistorique，1896）和《世界地图集》（AtlasUniverseldeGéographie，1889）。最后这一本是与维维安·德·圣马丁（ViviendeSaint-Martin）合作编绘的，在三十年中（1881—1911）分册出版，这是一本精确的地图集。《制图学年鉴》（AnnéeCartographique）也是由施拉德筹办的，第一期于 1891 年出版，第二十三期、也即最后一期，于 1913 年出版。《制图学年鉴》中有每年勘察进展的摘要，而且他早在 1899 年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制图联合会。

施拉德也为学校写了许多课本（由他的雇主阿歇特出版），他也以教授身份在巴黎的人类学学校讲课。《二十世纪地理学的基础》是他最后的演讲之一，这是在英国纪念 A.J.赫伯森集会上的第一篇演讲录，于 1919 年出版。这是我过去第一次读到的论述地理学意义的文章。施拉德在 1924 年逝世，葬在比利牛斯山中部佩尔都山麓，这是他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①]

吕西安·加鲁瓦

吕西安·加鲁瓦（1857—1941）出生于梅斯，在里昂求学。[②]他在 1881 年到巴黎进入高等师范学校念书，是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首批学生之一。当时，由于比维达尔先入索尔蓬的希姆莱的影响，历史的传统在法国是很强烈的。加鲁瓦在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历史传统这种偏见的影响。他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文艺复兴时代的德国地理学家》（LesGeéog-raphesAllemandsdelaRenaissance，1890），显示了他早年对历史的兴趣。这篇专论是对制图学历史的主要贡献。他的第二篇论文集中研究了同一时期德国数理-制图学家的工作（根据当时的惯例，此文用拉丁文写成）。他一生始终从事研究制图学和十六世纪的发现，并且作出了重大的贡

[①] 埃·德·马尔日里：《弗朗兹·施拉德的地理著作》，《在国际地理学会年会上的报告》，第二卷，1925，第 37—51 页

[②] 埃·德·马东男：《论吕西安·加鲁瓦》，《地理学年鉴》，50（1941），第 161—167 页。

献。

可是，加鲁瓦很早就转到研究近代地理学的种种问题上来，成为近代地理学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里昂大学度过四年（1889—1893），对周围地区开始最初的地理研究，这项成果在《地理学年鉴》上发表。他在 1893 年被聘请到索尔蓬，很快就成为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助手，参加《地理学年鉴》的编辑工作。在他 1898—1918 年担任编辑期间，为这份杂志写了许多文章。他作为研究者和教师，进行了长期的和积极的活动；在维达尔逝世以后，又担任了几年系主任。他在二十年代后期退休，转入新的工作。《世界地理》这部丛书是由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创议编纂的，但在他生前没有出过一卷。这部著名的丛书由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与吕西安·加鲁瓦联合署名编辑，但实际上，是由加鲁瓦一人负责这一丛书的编辑工作，直到他 1941 年逝世时为止。埃·德·马东男写道："加鲁瓦在法国地理学派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知道如何去对待新的情况和指导年轻一代。他的名字是不能与（维达尔——译者）这位大师分开的，他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进行大师所创始的工作。"

法国仍然一直是加鲁瓦的主要研究领域，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是在 1908 年出版的《自然区域与地区名称》(Régionsnaturellesetnomsdepays)。德·马东男评价这本书说："在历史和地图资料的精确、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结论的明确清楚等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加鲁瓦揭示了自然区域的概念在十八世纪末法国绘制第一批地质图时是怎样出现的，地质学家发现和使用了与地质单元相符合的通行的地区名称。加鲁瓦利用专门文献，对巴黎盆地作了进一步调查。例如，他指出博斯区是一个顶部覆盖着黄土的水平石灰岩台地区，它具有开阔的耕地和密集村落的独特景观，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和地图上都被名为博斯（Beauce）。现代的地图采用加后缀昂博斯（enBeauce）的作法来表示一些村庄，在十九世纪早期所以如此命名，是为了使它们与在新建立的卢瓦-埃谢县中博斯区的同名村庄有所区别。这些村庄位于有相同地层的地区的外缘，处在向另一个地质构造带过度的地带。加鲁瓦由此得出结论说："无论地区大小，只要它们都是属于自然形成的一类，我们就应给以自然区域的名称。在有人类干预（自然）活动的多种多样的和复杂的事实中，那些受到环境影响的，就形成人文地理学的特殊的领域。"这句名言对法国的下一代，在地理学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方面，都发生深刻的影响。

埃马纽埃尔·德·马尔日里

埃马纽埃尔·德·马尔日里（1862—1953）是近代法国自然科学界的伟人之一。[1]他既没有在大学中担任职务，也没有获得大学的学位。可是，他很快就成为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并且是一位终生的地理学提倡者。他热爱野外工作，由于劳累过度，身体虚弱，因而在工作上受到限制。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热情的藏书家、记录员和翻译家。他属于研究地形的先驱者的行列，他作为一位年轻的作者，与诺埃合作，写了著名的著作《地形》（FormesdeTerrains），在 1888 年出版。从 1894 年起，他和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一起主持《地理学年鉴》的工作，对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地形的新著，

[1] 埃·德·马东男：《论埃·德·马尔日里》，《地理学年鉴》，62（1953），第 389 页。

写了许多卓越的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一些德文的著作；这因为他精通德文。在这方面，他的主要业绩是把维也纳地质学家爱德华·休斯最初在 1883—1908 年之间出版的、附有长篇注释的经典著作《地球的面貌》译成法文。德·马尔日里的译本附有长篇的和非常宝贵的注解，由十七名合作者帮助注释。这一点，获得在柏林的李希霍芬高度重视，以致他把这个译本优先介绍给他的学生，然后再提及德文原本。德·马尔日里自己认为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对汝拉山地地质和地形的精密研究。此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在 1922 年出版，第二卷在 1936 年出版。他也编制了一批重要的地质图，并且和阿尔布雷希特·彭克一起，积极地在 1913 年的国际地理学大会上发起创立全世界的国际地图学会。

第十九章　第二代：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学生

在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逝世[1]以前的大约二十年内，出现一个在他直接指导下的地理学全盛时期。他的第一代后继者们，特别是埃·德·马东男，竭力发扬他建立起来的传统。这里不打算开列为数极多的学生的全部名单以及他们的学术著作，虽然其中许多人的名字将会在本书内出现。他们在知识发展上的重大贡献，得到法国所有各方面学者的普遍承认。本章将要介绍的是继承和发扬维达尔传统的最杰出和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他们是本世纪第二季纪内的第二代领导人。现在这些人都已逝世了。他们是：埃·德·马东男、阿尔贝·德芒戎、拉乌尔·布朗夏尔、马克西米利安·索尔和亨利·博利希。安德烈·西格弗里德也必须考虑列进去。虽然严格地说，他不是维达尔的学生，但他的政治地理著作表明他受到维达尔思想的影响。

埃马纽埃尔·德·马东男

埃马纽埃尔·德·马东男（1873—1955）[2]是维达尔的学生，并且与他的女儿结婚，被公认为从 1918 年到 1945 年的法国地理学界领袖。

德·马东男 1873 年出生于布列塔尼，1892 年进入高等师范学校，跟随维达尔学习地理学。他在 1895 年取得历史学和地理学教师的资格（德芒戎也在那年获得同样的资格），1902 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07 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1899 年他到雷恩大学任教，1905 年转到里昂大学，四年以后，他被聘到巴黎的索尔蓬去接任他岳父维达尔去世后空下的教授职务[1]。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 1944 年退休。他推进维达尔的各项计划（其中包括在 1923 年建成宏伟的地理系新楼），使法国地理学取得重大成就。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德·马东男是欧洲最有影响的地理学家。他先任国际地理学会的秘书，接着任该会的主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乱年代里，他继续保持这一职位，以后荣任国际地理学会的第一任名誉主席。他的继承人安·肖莱宣称，德·马东男无疑是“近代地理学界的伟大人物之一”。

德·马东男开始时专门研究自然地理学，他集中注意的特殊领域是中欧。与同时代的许多人相反（但是与维达尔的教导一致），德·马东男有着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扎实基础。他的第一本著作研究布列塔尼海滨地形，不久以后，就转而研究喀尔巴阡山的自然地理。他研究瓦拉奇亚的区域专论发表于 1902 年。从 1911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开始，德·马东男终生对阿尔卑斯山的冰川侵蚀保持兴趣，虽然拉乌尔·布朗夏尔对他的解释一直是有争议的（参看下文）。在德·马东男的主要著作中，应该特别提到他的《论自然地理学》（TraitédeGéographiePhysique）这本书。它的第一版在 1909 年出版，全一卷，共 190 页。以后在 1925—1927 年扩大成三卷分别出版。他

---

[1] 前面说维达尔于 1918 年逝世，这里说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1914 年）时去世，疑有误。——译者

[2] 安·肖莱写的《讣闻》见《地理学年鉴》、65（1956），第 1—14 页。还有让·戈特芒的短评，载《地理评论》，46（1956），第 277—279 页。

[1] 这里疑有误。维达尔于 1918 年去世，按此处所述，维达尔似在 1910 年以前去世。——译者

和他的学生们许多研究成果，最后总结在 1942 年出版的《世界地理》的《法国自然地理》（LaFrancePhysique）分册中。德·马东男与亨利·博利希一样（参看下文），虽然主要是一个自然地理学家，却想把自然和人文两方面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在《世界地理》关于中欧部分的两个分册中（在 1930 年和 1931 年分别出版），这一意图是很明显的。

德·马东男在 1904 年首次访问美国，参加第八次国际地理学会大会，当时，W.M.戴维斯的地形学著作给予他很深刻的印象。1912 年，他又到美国，参加由戴维斯组织的横贯大陆的旅行；1913 年，他接受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卡勒姆奖章。1949 年，他作为法国代表团的团长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保护和利用资源的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纽约。他是好几位美国地理学家的坚定的朋友和同事；在 1919 年巴黎和会期间，他与鲍曼在工作上紧密合作。戈特芒告诉我们：德·马东男是“戴维斯的一位热情追随者；他也高度赞扬约翰逊（Johnson）和阿德伍特（Atwood），这些名字在德·马东男学生的心目中是崇高的”。德·马东男编辑《地理学年鉴》和《法国地图集》（AtlasdeFrance），主持 1931 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地理学大会，1931—1938 年担任国际地理学会的秘书，1938—1949 年担任该会的主席。戈特芒总结说：“他一生献身于工作，并鼓舞了许多人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这就是这位地理学的创建者和领导人的真正贡献。

阿尔贝·德芒戎

阿尔贝·德芒戎（1872—1940）[1]的双亲原籍是孚日省，他在高等师范学校时，在维达尔指导下学习，于 1895 年取得历史学和地理学教师的资格。他和德·马东男是维达尔的同时期学生，是德·马东男的同事和朋友。起初，德芒戎在皮卡迪的几所高级中学教书。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总结在一篇论文中，于 1905 年出版，篇名为《皮卡迪及其周围区域》（LaPicardieetlesrégionsvoisines）。作为维达尔的一位年轻的学生，他在这本书中所取得的成就，正如德·马东男所说的，是“对法国一个区域的推理的描述，完整而且生动”，这一论文是这类研究的第一篇著作。由于这篇论文，他被聘请到里尔大学任教，直到 1911 年；然后又被聘请到巴黎的索尔蓬与德·马东男一起担任地理学教授。他在索尔蓬一直任职到 1940 年去世。

在里尔的时候，德芒戎开始研究利穆赞地区。这一研究工作虽然没有完成，但是已在《年鉴》上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其中一篇是论述人类对山区的利用；另一篇是关于地形及其发育。他认为发育是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侵蚀循环来进行的，而不是如 W.M.戴维斯假设的是一个连续的、不受扰动的过程。后来的事实是，戴维斯对这一问题发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以致他与德芒戎一起访问了这个地区——这是戴维斯观念对当时欧洲学者影响的另一次表现。

不过，德芒戎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文地理学的问题上。他对皮卡迪的研究，要求他熟悉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档案。这一问题是他附带写的另一篇论文的主题，也于 1905 年出版。他的这一工作得到历史学家和其他关心这种文献

---

[1] 德·马东男：《阿尔贝·德芒戎》，《地理学年鉴》，49（1940），第 161—169 页

工作的人的普遍赞扬。他也发展了发调查表的技术，他终生采用这种调查方法，许多人跟着他这样做。

德芒戎转到索尔蓬的时候，是三十九岁，他继续专门研究人文地理学。他一心想写一本人文地理学教程和一本法国经济地理。他在三十年中没有写成这样命名的两本书，但发表了许多别的论著。在第一批出版的《世界地理》各卷中，包括有德芒戎关于不列颠群岛（被译成英文）和荷兰、比利时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在二十年代中期出版。在 1923 年出版的一本论述英国“殖民地理”的书（它在 1925 年出版英译本，1926 年出版了德译本），显示出他对该国的兴趣。他的《欧洲的衰落》（Declindel’Europe）出版于 1920 年，这本书估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和以后恢复的可能性。

他把很多时间用在编辑《年鉴》上，他为这份杂志写了三十一篇论文和八十九条注释。其中包括一篇《法国的农村住宅》（HabitationruraleenFrance，发表于 1920 年），这篇论文研究了农村建筑物的区域变化，这是他终生研究的一个题目。另一篇是《农村聚落》（L’Habitatrurale，发表于 1927 年），它是研究全世界农村地区各种形态的中心聚落分布的先驱。德芒戎是在国际地理学会建立这个专题研究委员会的最初倡议人，从而在许多地区促进了这种研究。

德芒戎也注意研究运输地理，研究人口过剩地理和国际经济地理。在三十年代，他进一步研究制定一种关于农村建筑物、农业结构和在法国农业中外国人分布“等方面的调查方法”。这件工作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它以一种很详细的调查表为基础，把它们分发到整个法国农村许多村社的知识分子手中。他修正了他的农村建筑物的分类法，编制出一批杰出的农村建筑物分布图，并复制插入《世界地理》的法国分册中作为附图。这种调查研究法，一直被英、美地理学家看作是尝试性的（avantgarde），或者是靠不住的；但是它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在法国和德国得到了承认。德芒戎在 1911 年到达巴黎时所表示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实现，但他的题材和观念，却已经综合在《世界地理》的两卷关于法国的巨著中了。1940 年，他在刚刚看完这两卷著作的校样时突然去世。

德芒戎一直没有写出明确阐述他终生研究的人文地理学的论文，但是《人文地理学诸问题》（ProblemsofHumanGeography）这本纪念文集（在他死后出版，收有从 1902—1941 年发表的文章），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概念体系的实质。他把人文地理学看作是对人类集团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研究，这个地理环境并不是本世纪初一般所设想的抽象的“自然环境”，而是由人类创造的、并在其中劳动和生存的那种改变过的环境。因此，这个地理环境有四个研究领域：1.自然环境对于生活方式的影响——一世代以前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根本观念之一；2.在人类社会进步影响下这些生活方式的变化，或者换句话说，即人文环境的影响；3.作为自然环境和“文明程度”，或者如詹姆斯所说的作为人类集团的态度、目的和技术能力的结果引起的各个人类集团的分布；4.由于人类集团施加于土地的影响，而在景观中出现的建筑物（工厂），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由房屋、村庄、田界、道路，以及最复杂的组合如城市和国家所占据的地点。在这些研究领域中，德芒戎依靠三条指导性原理。第一条是维达尔的人类占有土地的“可能论”，而不是自然（地理）位置条件对人类占有的决定论。第二，从来不忽视区域的基础（土地），而且归纳总是在“区域基础”上进行的。第三，始终承认在解释目前人类占有

地球的各种方式时，历史眼光有极大的重要性。

德芒戎的最后一名助手让·戈特芒（从 1936—1940 年）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

“1932—1933 年冬季，即在我成为德芒戎直接指导下的研究生，并参加高等师范学校研究班第一年（在参加那一年研究班的师范生中有现任法国总理蓬皮杜[1]）的某一天，我与德芒戎作过一次关于我的未来研究方向的长时间交谈。这位老人对我说，他感到年轻一代的地理学家应该研究下面四个主要问题中的一个，他认为它们将来会显得特别重要。他自己的那一代人没有用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些问题。

“1.远东的拥挤的人群。他曾经安排他的一名优秀学生

埃蒂纳·当纳里（EtienneDennery）去研究这个方面，但此人后来转入外交工作（当纳里去年已辞去驻日大使的职务，现在是国立图书馆的馆长）。现在古鲁和罗贝基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2.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他曾经安排雅克·韦洛塞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韦洛塞后来转而研究中东，并且到大马士革工作。

“3.干旱地区国家的灌溉问题。有他的一批学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4.大城市的增长。

“德芒戎希望我专门研究巴黎的供应和市场问题（从奶制品开始）。我对此沉默无言，终于争取到一项富有异国情调的使命，到巴勒斯坦作了一次研究灌溉的旅行。1963 年，我想起了这位老人的预见性，因为当时我自豪地被市政当局敦请到巴黎去主持讨论关于‘勒阿勒’（LesHalles）[1]的未来问题。

“在我们这一行中，具有象德芒戎这样的眼光和远见的人不是很多的。他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但又很谦虚；如果不考虑他的作用，要去评价继承维达尔传统的法国学派的发展，将是很困难的。”

拉乌尔·布朗夏尔

拉乌尔·布朗夏尔（1877—1965）[2]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近代地理学创始人。“某些地理学家用毕生的精力去为地理学下定义。至于我自己，则是在创造地理学。”这些是由雷蒙特·克里斯特（RaymondE.Crist）报道的布朗夏尔自己讲的话。他在 1877 年出生于奥尔良。他于二十三岁（1900 年）在巴黎顺利通过可怕的教师资格检定考试，当时他在维达尔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

他先在杜埃和里尔度过几年岁月，1906 年他完成论述佛兰德的博士论文，并因此而被聘请到格勒诺布尔大学任地理学教授，他接受这一职务并在该地度过了约五十年。1908 年，他在格勒诺布尔的高山地理学系中创建了一个地理学派和一份杂志《高山地理评论》（RevuedeGéographieAlpine）。他在 1937 年六十岁的时候，开始写他的巨著《法国阿尔卑斯山区》

---

[1] 此指戈特芒写信时的情况。——译者

[1] 即巴黎的大菜场。——译者

[2] 让·德雷什和皮埃尔·乔治：《拉乌尔·布朗夏尔》，《地理学年鉴》，75（1966），第 1—5 页，参看 R.E.克里斯特的一个注释，《地理学评论》，55（1965），第 602—603 页

（FrenchAlps），并且一直继续工作到 1956 年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的出版。1917 年，他作为互访教授第一次到哈佛大学讲学；此后他写了不少关于北美大陆、特别是加拿大东部的著作。以后他访问了哥伦比亚（1922 年）、芝加哥（1927 年）、哈佛（1928—1936 年）、伯克利（1932 年）、蒙特利尔（1947 年）和拉瓦尔（1952 年）。1956 年他获得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查尔斯·戴利（CharlesP.Daly）奖章。1960 年，他获得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金质奖章；克里斯特告诉我们说，这等于是法国的诺贝尔奖金。布朗夏尔对他系里的许多学生给以鼓舞和亲切商谈；其他大学中的十多个系，都由他的学生担任主任。他在格勒诺布尔的那个系在许多方面都是独立于巴黎以外的一个研究和地理学术中心。布朗夏尔的观点和研究随着时代不断前进，但是他作为一个地理学家的基本口吻则是终生不变的，而且得到普遍的承认。“院士布朗夏尔教授的著作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克里斯特语）

布朗夏尔是维达尔的一位学生和追随者。他在 1906 年写了一篇关于佛兰德的区域专论：《佛兰德：关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佛兰德平原的地理研究》（LaFlandre：EtudeGéographiquedelaPlaineFlamandeenFrance，BelgiqueetHollande）。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论述法国北部的降雨量，在 1902 年的《地理学年鉴》上发表。在他到了格勒诺布尔的第四年，写了一本格勒诺布尔的地理（1910 年），它被认为是一部第一流的著作，已经多次修订；而且在增添新的论点以后，并入他的巨著《法国阿尔卑斯山区》。他还写了两本内容充实的关于加拿大东部的地理书，其中包含论述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的详尽的城市地理。

地理学家布朗夏尔研究的总目的是“描述人类及其活动的环境”。他的方法是根据个人观察、记录、访问和调查。所有这些，我可以举出 1937 年只有他这位高山地理学家和我一起在博日的两个星期的情况来作证明，当时他正在准备写《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第一卷中有关那个地区的部分。布朗夏尔与德芒戎一样，虽然工作的重点是在野外，但也利用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提供的资料。他还腾出时间写关于北美和欧洲的一般教科书。他也是 1927 年出版的《世界地理》中《西亚》卷的作者之一。然而，在他一生所写的全部著作中，特别重要的则是他对于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和加拿大东部的研究。

在布朗夏尔的个人研究成果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阿尔卑斯山区的地形问题和城市地理。他反对德·马东男关于阿尔卑斯山区地形循环的说法（这与戴维斯的观点十分接近），指出构造和岩石条件与冰川活动所起的作用。这一直是德·马东男与布朗夏尔之间争论的原因。在城市地理方面，布朗夏尔在 1910 年对格勒诺布尔的研究是一项杰出的贡献——是本世纪头十年内维达尔学派写出来的许多模范著作之一。布朗夏尔后来继续对昂内西、魁北克和蒙特利尔进行这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利用自己和别人的研究成果来探讨新的城市问题，即区域首府的作用和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问题。这类问题，在他最初研究格勒诺布尔时已经隐约地涉及了，但不能提出答案。在他《法国阿尔卑斯山区》一书中关于《格勒诺布尔》的部分，以及他在 1957 年对于昂内西和 1960 年对尼斯所作的最新研究中，这种情况也是很明显的。人们可以说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布朗夏尔的“格勒诺布尔学派”，而且他总是把它看作是与在巴黎的另一个主要中心相抗衡的一个中心。

布朗夏尔在格勒诺布尔创建了一个独立于巴黎的地理学派。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他的学生在法国全国许多地理系内工作，其中大多数人现在

仍然很活跃。下面是他的一部分（总数 15 人）著名的有博士学位的学生名单及其著作的篇名：E.贝内旺：《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气候》（LeClimatdesAlpesFrancaises），于 1926 年发表；朱尔·布拉什：《格兰德-夏尔洛特尔和维科尔高原》，于 1931 年发表；A.阿利克斯：《瓦兹》，于 1929 年发表；M.帕尔迪：《罗纳河的水文变化》（LeRégimeduRhone），于 1924 年发表；P.阿尔博：《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牧人生活》（LaViePastoraledanslesAlpesFrancaises），于 1922 年发表；H.翁德（Onde）：《莫里扬河与塔朗塔河》（LaMaurienneetlaTaren-taise），于 1931 年发表；C.罗贝基：《清和：安南一个省的地理研究》（LeThanhHoa：Etudegéographiqued’uneprovincean-namite），于 1929 年发表；C.P.佩吉（Peguy）：《上迪朗斯和乌拜伊》（HauteDuranceetUbaye），于 1947 年发表；G.韦雷-韦尼埃（Veyret-Vernier）：《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工业》（L’IndustriedesAlpesFrancaises），于 1948 年发表。

马克西米利安·索尔

马克西米利安·索尔（1880—1962）[1]以一名教员开始他的事业，1913 年，他在蒙彼利埃以这一资格完成他的论文。这篇论文是在植物地理学家夏尔·弗拉奥（CharlesFlahault）的赞助下写成的，不过他的关于地中海比利牛斯的论文，却是以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提出的生活方式的概念作为基础的。这种生物学（生态学）方法的研究倾向立即确立了索尔一生的工作基调。他在 1914 年从军，在 1915 年因重伤退役。他在波尔多重新从事“高等教育”，然后到斯特拉斯堡与亨利·博利希、吕西安·费弗尔（历史学家，1924 年出版的《历史学的地理导论》一书的作者）和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马克·布洛什一起从事教育工作。以后，他在里尔大学的文学院工作了九年。他日益陷入行政事务中，因为他在这方面有罕见的才能，于是他被任命为克莱蒙费朗大学的校长，1937 年改任阿克斯-马赛大学校长。1940 年，他接替阿尔贝·德芒戎在巴黎的地理学教授职位，一直到退休为止。

索尔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人文地理学。他的第一本小册子出版于 1904 年。他的代表著作是四卷本的《人文地理学基础》（LesFondementsdelaGéographieHumaine，1947—1952），这本著作最后对人文地理学所作的贡献，如同五十年前德·马东男对自然地理学所作的贡献一样。它将长期成为一部经典著作，把它全部译成英文是应该的。索尔的最后一部单卷本著作是《地球上的人：论人文地理学》（L’HommesurlaTerre：TraitédeGéographiehumaine），于 1961 年出版，它包含有新的观念，但基本上是四卷本的摘要和复述。这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彻底的生态学的方法，它向人们提供了这位地理学家的基本概念体系，而且对以后的研究有极大的激励作用。

对于马·索尔的基本著作《人文地理学基础》必须特别注意。第一卷研究供人类利用和在它上面生活的地球的生物基础。这一卷的内容包括对气候的适应；被驯化的动物的分布和扩展；人类营养的需要和人类食物的分布；与自然条件有关的病原综合体，根据它可以确定人类疾病分布的地点并解释

---

[1] P.乔治：《马·索尔的生活和著作》，《地理学年鉴》，71（1962），第 449—459 页，附有肖像和书目

其原因。第二卷研究人类占有土地的技术基础，交通的发展，并包括社会生活的技术（即家庭以外的组织）。社会技术包括语言、氏族和部族、地方的定居集团、民族、国家和帝国。经济技术包括能和生产，以及它们的地点，即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能源（包括人力）以及天然资源。交通的发展研究陆海空的交通和交通的地理影响，也即是人类运动和货物交换的格局与原因。第三卷研究生产的技术基础和原料的转化——动物资源的开发，林业，水的利用，土壤施肥，耕作和饲养家畜的制度，矿藏和原料。第四卷“包括人类的居住地”。索尔是从维达尔的生活方式的概念开始的，这个概念包括人类集团与环境有关的全部活动，而它的性质则取决于技术的特殊组合。农村居住地研究农业人口和为他们服务的人口的集团型式与分布；它不同于农村住宅，或象我们这里所称呼的农场建筑物或工作场所。城市居住地按照城市职能、形态、都市地位、自然结构、居民和城市中心对它周围农村的影响来进行研究。以上这些，不过是这一大部头著作的章节梗概。每一位地理学学生都需要精读其中有关部分的内容，以便开展自己的研究。

这些著作反映了索尔终生专心探讨医学和社会学这两个领域。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非常熟悉过去和当代德国地理学家的著作。对索尔来说，自然地理学是他研究人类集团的骨架，他只关心与人类占有有关的自然环境。

亨利·博利希

亨利·博利希（1877—1962）[1]起初是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学生，实际上，他做了一些时候维达尔的助手。在维达尔的建议下，他放弃这一工作岗位和考取教师资格的打算，并且在 1905 年动身去美国。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开始受到戴维斯的强烈影响，从此以后，他对地形学和美国地理有着强烈的学术兴趣。返回法国以后，他起初到索尔蓬，1913 年转到雷恩大学任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从军服兵役，以后转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一直到 1947 年退休。在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的研究，因为他的大学迁移到克莱蒙费朗去了。由于他积极参与推翻维希政权的活动，在 1944 年遭到逮捕。战后，他回到斯特拉斯堡，于 1947 年退休。以后十年中，他继续积极从事专门研究，于 1962 年八十五岁时去世。

亨利·博利希与德·马东男同享地形学研究领导人的声誉。他的第一部著作是研究中央高原的地形的。他以戴维斯的体系为跳板（他是戴维斯和约翰逊的密友），来研究地球的固体表面，换句话说，他力求确定涉及景观出现的各种过程，而不单是戴维斯在理论上孤立地进行探讨的那些过程。博利希力求说明地形的全部结构。

他在七十二岁的时候，把他的论文收集起来辑成一本《地形学论文集》（EssaisdeMorphologie，1950），几年以后，他在《地理学年鉴》上写了两篇长论文，那是对 P.比罗在其主要著作[1]中详细说明的法国新地形学的专门化方法、论点和趋势的评论。博利希拥有观察和解释自然地形的杰出才智，他的论述中央高原形成的海面升降作用的著作是极其著名的。但是他和他的同事德·马东男一样，总是按照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传统，保持地理

---

[1] 《关于亨利·博利希的讣告》，《地理学年鉴》，71（1962），第 561—566 页

[1] P.比罗：《地形学的方法》，巴黎，1955 年

学的观点。他在《世界地理》中的那本关于北美的书，可能是已出版的研究那个大陆的最优秀的地理著作，他获得美国地理学会为褒奖这一卓越文献而特地授予的戴利奖金。亨利·博利希在退休以后，仍然注意地理学这个一般的领域（以及地形学的问题），1960 年，他高兴地着手编制法国东部地图集。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1875—1959）[②]，就听课才算学生这一意义来说，他不是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真正的学生，但是他常常拜访维达尔，而且维达尔是他早年著作的鼓励者之一。西格弗里德从一开始就想把政治地理学加到维达尔的人文地理学里面去，这主要受到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传统的启发；西格弗里德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书名《论新西兰的民主》（LaDémocratieenNouvelleZélande，1904 年）就是明证。它显然是《论美国的民主》（LaDémocratieenAmerique）一书传统的复活；这本书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一直被忽视，而在美国则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在政治地理学中的一本重要著作，是对法国西部的政治态度的研究（1913 年）。在维达尔逝世以后，西格弗里德与德芒戎保持着密切联系；虽然西格弗里德在法国的生活与地位不同于平常的地理学家，但是他与德芒戎常常互相拜访。他出身于法国新教徒的一个高贵的家族，它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上流社会有许多家庭和实业上的联系。要理解他的教养，必须阅读他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写的关于他父亲朱尔·西格弗里德（JulesSiegfried）的一本小册子。朱尔是勒阿弗尔的经济和政治领袖，是阿拉伯罕·林肯和其他美国总统的私人朋友，几度在法国内阁任职，是棉纺工业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安德烈·西格弗里德是这么多的大银行家、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亲属，以致他的知识来源和他的读者都不同于其他的地理学家；他们显然对他感到不快。他们说他不是一位地理学家，只不过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混合物。但是西格弗里德总是认为他是一位地理学家。在青年时代，他曾经想进入政界，但是两次都没有被选入议会；于是在 1910 年以后，他想成为用地理学方法分析政治过程的专家。在巴黎的政治学校中（他父亲是创建人之一），他把他讲的课程叫做地理学，同时帮助年轻的地理学家（包括我[①]在内）去获得全体教师的承认。当他被选入法兰西学院以后，他决定把他的讲授叫做“经济和政治地理”讲座，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在他退休的时候，他努力使一位地理学家（皮埃尔·古鲁，在 1947 年）来接替他。西格弗里德一直是对特殊事例的使人惊叹的分析家和学者，然而无论在政治地理或人文地理方面，他都没有建立起一种总的理论体系。他培养了许多青年人，有地理学家，也有政治家，从许多方面来看，他建立了一个思想流派，虽然情况不能正式地这么说。

[②] 对西格弗里德的这些评论，是以让·戈特芒的一封信作为依据的。

[①] 此处的“我”，似指让·戈特芒。——译者

第二十章　第三代

在第三代的许多高级地理学家中，有五个人代表不同的思想流派，他们都是从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所奠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这些代表人物是：皮埃尔·德方丹、罗歇·迪翁、皮埃尔·乔治、让·戈特芒和安德烈·肖莱。

皮埃尔·德方丹

皮埃尔·德方丹（1894—）出生于利摩日城，1918 年在普瓦蒂埃大学先获得法律博士学位，然后到巴黎去攻读地理和历史的学士学位，1919 年得到了这个资格。他的第一批老师是德·马东男、德芒戎和加鲁瓦。1921 年他又得到高级研究员的学位证明书。当时德芒戎是答辩委员会的主席。这一学位的论文题目是《利穆赞的史前地理》（PrehistoricgeographyoftheLimousin）。正如德方丹在一封个人通信中所说的，在法国，这篇论文是这方面的第一次研究。

在热情地阅读了让·布吕纳的人文地理学著作以后，德方丹于 1918 年开始与这位学者往来。德方丹写道：他向布吕纳提交了一篇巴斯克郡住宅类型的论文。布吕纳对这篇论文发生了很大兴趣，而且要求德方丹与他合作写一本法国人文地理学的著作。他们共同编绘了一幅法国的屋顶类型图，这幅图现在大家都是熟悉的。德方丹写道：“布吕纳是一位惊人的学者，他不断提出新的观念，不断地发现新的研究领域。”

德方丹在 1922 年获得蒂埃尔基金会的奖金这件事上，让·布 吕纳是出了力的。他与同时获得这笔奖学金的另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罗歇·迪翁一样，都享受了三年。1922 年，德方丹通过考试获得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教师的资格。1932 年，他在索尔蓬完成和提出他的博士论文，主考是德芒戎，副主考是德·马东男和加鲁瓦。这篇论文于 1932 年发表，我们已在本书第十七章中讨论过了，它的题目是《加龙河中游谷地的居民和他们的劳动》（LesHommesetleursTravauxdanslespaysdelaMoyenneGaro-nne）。同时写成的还有一篇较小的文章，题目为《关于斯洛伐克森林中的生活》（LaVieforestièreenSlovaquie），由巴黎斯拉夫研究所于同年出版。前一本著作以它的概念和结构的首创性而著名，而且研究方法也与其他区域专论非常不同。德方丹在 1965 年 12 月 9 日的一封信中，曾用如下的话来描述这本书的独特性质。

“首先，我的关于加龙河中游这篇论文的首创性在于：它是卢瓦尔以南地区的第一篇论文。它首先确定方向，以便按照布吕纳的方法来揭示人口的密度是受工作门类（horizons detravail）的密度所支配的。人口的减少主要由于工作机会的减少。我是从现在去回顾历史的，因为我相信，地理学家只在他能说明‘现在’的前提下才对‘过去’关心。我研究的区域（原文如此）不是一个自然单元，恰恰相反，它位于来自周围地区各种影响的汇合点上。这篇论文的前面有一组照片，我对每张照片都作了很长的说明，它们起了在进行详细研究以前简介全区的作用。”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内，德方丹一直表现出对史前时期和人种学的强烈兴趣。1926 年，他担任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人类学大会的秘书。1934 年，他被

邀请到巴西的圣保罗大学，开设一个新的地理学讲座。不久以后，他被邀请到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从 1936—1938 年，他都在该校任教，并且在这个短短的时期里，建立了巴西全国地理学会和创办了定期的地理杂志。1939 年他离开巴西，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担任法国研究所所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南美洲作广泛的旅行；1946 年他获得里约热内卢的联邦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952 年，他被邀请到加拿大魁北克的拉瓦尔大学去筹建一个新的地理系，这里他又获得名誉博士的学位，1967 年夏天他又应邀回到该校。1965 年（他七十一岁）他应蒙彼利埃大学的聘请，任地理学教授，这是他在巴塞罗那住了二十五年以后的事情。

皮埃尔·德方丹的著作表明他继承了让·布吕纳的兴趣和方法。他在二十年代后期撰写博士论文时，腾出时间与布吕纳合作写出了《法国人文地理学》第二卷（六百页），于 1928 年出版。此书是加布里埃尔·阿诺瓦主编的丛书《法兰西民族史》（L ’HistoiredeLaNationFrancaise）中的一种（《法国人文地理学》第一卷是布吕纳写的）。德方丹编辑了一套《人文地理学》（GéographieHumaine）丛书，其中由他执笔的有《殖民地化》（Colonization）、《人和森林》（ManandtheForest）、《宗教地理》（theGeographyofReligions）和《人类与冬天（在加拿大）》（ManandtheWinter）等书。他还指导编写了三大卷著作《拉罗斯世界地理》（Géogra-phieUniverselleLarousse，1959—1960）和《七巨头大百科全书》中的《普通地理学导论》（1966），这项工作是与安德烈·儒尔诺和让·布吕纳·德拉马尔夫人（JeanBrunhesDelamarre）合作进行的。后面这位女士是让·布吕纳的女儿，他和德方丹一起修订了让·布吕纳的著作《人文地理学》，1934 年出版了新一版，1942 年出版了简要本，1947 年出版了简要本第二版。德方丹对人文地理学和人种学的浓厚兴趣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1948 年他创办的新杂志《人文地理和人种学》（GéographieHumaineetEthnologie）也是一个明证；遗憾的是，这一份杂志在出了四期以后就停刊了。德方丹是让·布吕纳的最有才华和最多产的学生。

罗歇·迪翁

罗歇·迪翁（1896—）在布卢瓦上学，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在军队中服役。战后，从 1919—1922 年，他在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21 年他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取得历史学和地理学教师的资格。与他的同代人一样，他的研究和他的考试是在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直接继承人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的。从 1922—1924 年，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研究，并象他的同学皮埃尔·德方丹一样，得到蒂埃尔基金会的资助。从 1924—1934 年，他为了取得文学博士的学位，一直在写他的论文《卢瓦尔流域》，关于这篇论文已经在第 250 页中讨论过了。从 1934—1945 年，他在里尔大学，起初担任讲师，以后担任教授；从 1945—1948 年，他在索尔蓬担任政治和经济地理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还在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法国人文地理学导论。1947 年，他在巴西的圣保罗大学担任了一学期的教授，这个学校与巴黎的地理学家有悠久的紧密联系。1948 年以后，即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一直是法兰西学院中法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教授。

他担任现在这个职务的时间如此之久，是对迪翁在这个学术领域里的杰

出成就的承认，虽然它也是各个领域中许多法国学者都关心的一个领域。这种专业化和它的卓越的标志显示在他的长篇论文《卢瓦尔流域》中。在他的著作中表现出他对解释文献记录的非凡才能（他的前辈阿·德芒戎对此曾提过严格的意见）；这些记录被用来解释人类在建立他们居住地的时候在土地上所做的工作。在这篇论文以后的下一部著作，是一篇关于法国农村景观形成的卓越论文（1934 年），它是对法国全国各地的文献记录进行研究后概括出来的。他探索了法国南北部农业制度的不同发展，以及它们在说明农田类型、道路网、农村建筑物和村落组合的出现和目前形态的差异方面所起的作用。从那以后，他花了许多年时间来研究法国的葡萄种植地理，1959 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将近八百页的著作，就这个主题进行了研究，从最早的年代起一直到十九世纪为止。在 1961 年出版的一本著作是关于卢瓦尔河的堤岸（le-vées）史（共三百十二页），这部著作显然是从他早年博士论文的题目派生出来的。近一个时期来，他还对古代的道路和城镇位置进行研究。最近（在六十年代），他转到对古典的和罗马时期一些题目的研究，特别是古希腊人的航海和确定罗马的道路。作为一个地理学家，迪翁表明了他具备足够的历史方法方面的才能，这对理解无论农村或城镇的起源都是重要的。他的学术上的深度和耐力，反映在他把一生都献给研究他的祖国上。他体现了法国地理学领域中历史传统的连续性。

皮埃尔·乔治

皮埃尔·乔治（1909—）从 1948 年以后，一直担任索尔蓬的地理学教授，是地理学家中最多产的专著和“科普”作家之一。他写作和编辑了许多卷供公众阅读的《我知道什么？》（Quesais-je？）和《麦哲伦》（Magellan）丛书，供学生用的各种教科书，以及一些仅供一小部分专家阅读的其他著作。这些专业著作包括介绍各个城市和农村的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农村地理学，它们都在最近十年中出版。乔治还写了重要的研究著作，我们将在下面作简略介绍。

迪翁的著作与乔治的著作有明显的不同。迪翁关心过去的事情，他的著作基本上保持秘传的意味，只在同行专家的小圈子中流传。从他的出版物来判断，他对一般读者毫不关心。乔治则截然相反，除掉他的专门研究以外，不但十分关心在学者中间提高地理学的地位，而且在尽可能多的公众之间传播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著作。

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他受的教育以及他在书中表示的感谢来看，乔治是依靠他的两位老师阿尔贝·德芒戎和马克西米利安·索尔的概念体系的。换句话说，他在方法上是生态学的方法，而且他着重强调作为空间综合体的村镇的特性、行动和组织机构的诱因（motifs）。我猜想他同索尔和勒·拉努（LeLannou）一样，要从地理学上删去“人文”（human）这个形容词，并想借此消除把地理学的“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方面隔开来的日益增大的鸿沟。

从 1926—1930 年，皮埃尔·乔治在索尔蓬学习，他在文学院取得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学士学位，在科学院取得地质学、矿物学和植物学的学士学位。他在 1930 年取得历史学和地理学教师的资格，1935 年以主要论文《罗纳河下游：区域地理研究》（LarégionduBas-Rh ■ ne：

Etudedegéographierégionale）和次要论文《贝塞的森林》（Laf■retdeBercée，发表于1936年）而获得博士学位。他继续进行研究工作，于1938年发表了《下郎格多克的地理研究》（EtudesgéographiquessurleBas-Languedoc）这篇论文。他起初是一名教师，从1946—1948年担任里尔大学的教授，于1948年被任命为索尔蓬的教授，以后就一直在那里。

在一本新写的小册子《社会学和地理学》（SociologieetGéog-raphie，1966）中，乔治写道：法国的地理学家时常要议论地理学的统一性（unity）“以便于心无愧”，但是，他问道，在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学术后代所钻研的地理学中真的存在着这种统一性吗？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问道，在实验室或野外对自然过程进行熟练的分析，对了解作为人文科学的地理学有什么关系？他明确地说，那是法国的传统的态度。乔治继续说：解释自然现象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这已是，例如为苏联各大学地理学院（注意：它比一个“系”或一个研究所大得多）所承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同样是在苏联，经济科学则致力于研究人类行动对于地方（景观）所提供的各种条件的适应；景观是各种自然科学部门研究的综合。这恰好也是最近出版的《普通地理学》一书中全部的论述方法（据安·儒尔诺，见前面第253页）。

乔治还说，地理学关心的中心问题是研究人类社会；他断言：这是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制定的法国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实质。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它的目的是“研究整个地球及其各个部分中制约着（组成全球人口的）人类各种集体以及与其有联系的一切事物”。勒·拉努在1949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人文地理》（LaGé-ographieHumaine）中，同样地谈到居住的人（homme-habitant）这个名词。他使用这个名词是为了分清楚人的空间环境包括两个方面，即抽象的自然环境和继承的文化环境，两者在空间上都是变化的，地理学者的特殊任务就是去揭示这些环境的特性并予以估价（参看博贝克对于文化环境的类似强调，和他的这类环境类型的地图——翻印在马文和米克塞尔的《文化地理文选》中〈MarvinandMikesell，ReadingsintheCulturalGeography〉）。乔治在评论勒·拉努时，喜欢使用“生产者的人”（homme-producteur）这个名词来代替居住的人；他甚至加上一句，使用“消费者的人”（homme-consumateur）这个名词更好些。乔治强调与人类有关的那一部分地球上人类活动的经济基础和结构。当然，这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和哲学，而且基本上涉及到国家的政策。乔治断定：作为一门科学研究，地理学的任务涉及到他所说的横的（horizon-tal）综合，而不是纵的（vertical）分析。因此，地理学关心的基本问题是确定和估量地球表面空间排列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各种类型。

让·戈特芒

让·戈特芒（1915—）虽然仍然相当年轻，但已被公认为是法国的一位第一流学者，而且由于他有英文的著作，在美国也很出名。他是索尔蓬的高级研究所和巴黎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1967年，他被聘为英国牛津大学的地理学教授。戈特芒生于俄国，以后到巴黎读中学，又到索尔蓬学习。从1936—1940年，他是德芒戎的助手。1941年以后，他在法国和美国两地进行研究工作。他说，“从广义上”讲，他的老师有德芒戎、德·马东男、E.戈蒂埃、朱尔·西翁、安德烈·西格弗里德，以及美国高级研究机构中的学者，其中

特别是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Oppenheimer）。戈特芒作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一名成员，曾多次应邀访问美国（最近一次在 1965 年）。他也曾作为客座教授在美国各个大学、特别是普林斯顿、约翰·霍普金斯、哥伦比亚、匹兹堡、南伊利诺斯和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等校讲学。他也到过英国和加拿大各大学去讲学。

他起初专门研究法国人文地理学和地中海地区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转而研究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的一般理论。这些研究，对于“先进文明”各国，或者如他所说的在北美、西欧“过度发达的各国”特别具有参考价值。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迅速城市化，已经使城市问题在这些国家显得特别严重，所以戈特芒从 1950 年以后，把他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放在城市增长和区域管理等方面问题。

从 1940 年以后,戈特芒一直是法国和美国各个经济和计划机构在各种特殊事件方面的顾问。从 1946—1947 年，他指导纽约联合国秘书处的研究工作。从 1949—1952 年，他是国际工会区域规划委员会的主席，1965 年成为法国科学院资源和人的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参加许多学术团体，得到巴黎地理学会和美国地理学会的高等奖。

他发表的作品包括十多本大部头著作和一百多篇研究论文。这里所说的只限于书籍部分。第一本是论述法国的商业关系（1942 年出版），一本用法文写的关于美国的教科书出版于 1949 年；另一本用英文写的欧洲地理，1950 年于纽约出版（1962 年出版第二版）。一本关于《美国政治地理》（LaPolitiquedes■tatsetleurGéographie）的书于 1952 年出版。1952 年，他与另一些人为国际地理学会合写了一本关于区域规划的书。戈特芒的两部重要著作都是由美国约稿并在美国出版的。这两本书是《本世纪中的弗吉尼亚》（Virginiaatmid-century，1955）和《梅格洛波利斯》（Megalopolis，1961）。最近，在 1966 年，他把过去发表的“关于居住空间规划”的一系列论文（Essaissurl’amènagementdel’espacehabité）汇编成书出版。同年还出版了一本平装的书籍《在移动着的大都市》（MetropolisontheMove），包含有论城市迅速增长问题的一些文章,它们是在 1963 年南伊利诺斯大学向戈特芒表示敬意的讨论会上的讲稿。

让·戈特芒的名字在美国是很熟悉的，他在那里无疑被认为是当代世界上第一流的地理学家之一。美国不要一位美国学者，而偏要邀请戈特芒来从事重要的编写任务，这一事实是对他和法国地理学传统的赞赏。这里不是研究他的著作的场合，但是他的观念及其研究方法，对于本书的主题非常切合，因为它们已经得到广泛的反响，而且向说英语的读者显示了欧洲大陆地理学家的研究方法。我要特别指出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主要著作。《欧洲地理》（GeographyofEurope）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著作，我多次把它用作教科书，因为它向美国的学生和学者显示了法国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现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对所谓“区域研究方法”表示讨厌。戈特芒又被敦请用与这本教科书的同样方法来写一本《弗吉尼亚州》，其结果是很象按照法国传统写的一本“区域专论”。第三本主要著作写的是大西洋沿岸的都市化地区，戈特芒称它为《梅格洛波利斯》，这本书是应纽约的二十世纪基金会的请求并且得到它的支持写成的。这个基金会的方针是出版既有权威性的、也是通俗易读的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研究著作。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法国人竟能这样出色地掌握英文这一事实。这部关于《梅格洛波利斯》的著作所显示的

观点和程序，表明作者在研究东北部沿海地带的城市化对空间、人的生活条件及交通问题的影响时，所运用的显然都是地理学的方法和专门知识。这本书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以平装书出版（1964），这一事实证明对本书的需要和它的声望。

收入德方丹和儒尔诺于 1966 年编辑、出版的《普通地理学》一书中的一篇关于政治地理的短文，显示了戈特芒的哲学方法。他把政治地理的基本内容简洁地描述为“共居”（cohabitation，即在各个聚落点上一些互相依赖的单元的聚集）、“分布”（répartition，即为聚集所必须的分布方法和方式）和“运输网”（réseaudesaccès，由过去和现在的聚集和分布方式所产生的运输网）。这就概括了戈特芒试图在他发表的、一些论述人的空间占有和组织的重要著作中应用的各个要素。他写道：“人民、货物和思想的流通”，改变了人类的聚落，而且使它们活跃起来；而某一个地方的价值则取决于它对所在的空间体系的接近的程度。他说：对流通的控制始终是一个政治权威的首要目标，而这个权威采取行动的心情则被描述为“集团的成规”（iconographyofthegroup），或者换句话说，是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哲学和行动。“流通和信念，在公共权威的形成和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是始终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当政治地理学被认为是政治行动对人类集团的空间组织所施加的影响时，则它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可以说是“共居”（cohabitation）、“分布”（répartition）、“运输网”（réseaudesacces）、“流通”（circulation）和“成规学”（iconographie）。在英文中对等的名词将是“职能的结构”（functionalstructure）、“分布”（distribution）、“运输网”（transportnetwork）、“流通”（circulation）和“集团政策”（grouppolicy）。这一研究程序要求对各项政策和立法作彻底的评价。再有，戈特芒说，只有方法还是不够的，必须经常要有一个研究目的（unbutderecherche）。他断定，这只有在通过地理空间组织的合作和公正而体现出来的、最好的政治机构中才能做到。我在整个三十年代力图在各项研究中发展和应用这一概念体系，它与当时美国流行的思想十分切合；但是令人惊异的是，这一概念体系却竟然产生这种不同的结果，因为戈特芒所发展的这种所谓区域研究法，在美国同行中的声名是不好的。十分明显，区域概念的意义和含意，在美国还需要重新评价。

安德烈·肖莱

安德烈·肖莱（1886—）长期以来是法国的一位第一流地理学家，从 1944 年起到 1956 年他退休时止，一直是巴黎大学的地理系主任。下面这些意见是以他于 1967 年 3 月 8 日给笔者的一封长信为根据的，当时他是八十一岁。

肖莱出生于 1886 年，1897—1903 年上中学，然后前往里昂大学念书。1906 年，他获得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学士学位，1910 年取得教师资格。1912 年，他在安讷西的国立中学担任教师而开始了职业生涯，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在军中服役；战后，他到里昂重新担任中学教师，一直到 1923 年。同年，他以一篇题目为《萨瓦的阿尔卑斯山前麓（布日和日内瓦）：区域地理研究》（LesPréalpesdeSavoie〈BaugesetGenevois〉：■tudedegéographierégionale）的地形学论文，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于 1925 年出版。1923 年他进入里昂大学地理系，在文学院当讲师，1927

年他转到巴黎的索尔蓬。他后半生的生涯都是在这里度过的。1944 年，他继德·马东男而任地理系主任；同年，担任法国地理学会主席。目前他仍然担任这一职务。这样，从年代上说，肖莱是法国的第二代地理学家，但是他踏入地理学界相当晚，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十年，才达到他事业的顶峰，因此把他列入第三代比较合适。通过肖莱的经历和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国地理学发展的过程和今后的趋势。

肖莱写道，他是在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所教导的区域地理研究真正繁荣的时期，被培养成为一名地理学家的；但是在决定他的发展方面影响最大的老师，（他说）是德·马东男。他是德·马东男在里昂的最早的学生之一；以后在巴黎的年代里，成为德·马东男的助手。肖莱写道：德·马东男在他六十年前出版的论述自然地理的经典著作中，通过揭示合理的地形学（unemorphologierationnelle），而使区域地理学前进了一大步。德·马东男鼓励肖莱放弃在里昂的职位，去接替巴黎的吕西安·加鲁瓦的职务。肖莱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巴黎的地理学学生数目最多时也只有五十名。1930 年增加到一百名（在他到达巴黎以后不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的 1950 年，增加到二百五十名。战后，不但学生的数目显著增加，而且研究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在三十年代，地理学的研究，在自然方面正转向更多的定量分析，因此，教学工作不得不进行修改来适应学生数量增加和地理学研究进展的情况。这一调整工作是由德·马东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但是进展缓慢。

肖莱在 1927 年到巴黎以后,就把他用于研究阿尔卑斯山前麓的地形学专业知识，转用于研究法国北部地区。他企图按照侵蚀面与同一时代海浸形成的平原的对比所显示的情况，来确定演化的各个阶段。从对巴黎盆地的许多研究中，他发现一系列的准平原面，它们在中新世末期构成了影响整个巴黎盆地一致性的一种“多成因的面”（polygenicsurface）。经过上新世构造运动以后，形成目前地表形态的主要因素不是这类范围很广的构造和侵蚀面，而是带有第四纪气候变动印记的坡地（pentes）——河谷坡和构造岩屑坡。他的学生博热（Beaujeu）、特里卡尔（Tricart）、潘什梅尔、德·普朗博尔（DePlanbol）和 M.比罗继续进行这一研究，并把研究成果综合在 1946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现在正在写一本巴黎盆地区域地理。

肖莱接着又说，在巴黎教书和在法国别的地方教书一样，包括两个目的：培训未来的中学教师和指导研究。这一点由于人员缺乏一直处于困境。1956 年，地理系有四名教授和一名助教。现在有十五名教授和三十五名助教。肖莱一直很关心地理教学工作，1942 年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地理教学指南》（Guidedel’Etudi-antenGéographie）。

法国地理学的真正复兴是在两次大战的间隔期间发生的。它的主要动向是日益着重对现象的定量解释（原因和效果），这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方面都存在的一种趋势。“例如，在地形学中，它要求对沉积物和土壤进行分析；对人文和区域地理来说，它要求使用统计材料和组织人员进行抽样调查。”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生前计划兴建的地理系新大楼在 1923 年落成以后，地理系的组织工作落在德·马东男的肩上；不过由于缺乏经费，他的工作遭到严重阻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有所改善，而地理系的扩展任务就由肖莱来承担了。肖莱说，这一任务的主要成就是在全国科学研究中心

（C.N.R.S.）的财政帮助下，组织了一个制图学和地理学资料中心。在肖莱担任系主任期间，地理系开始出版各种新的出版物：《资料中心的备忘录和文献资料》（MémoiresetDocumentsduCentredeDocumentation，1946）、《地理情报》（InformationGéographique，1936）、《阿尔芒·科兰丛书》（CollectionArmandColin）（最初由阿·德芒戎指导），和《世界丛书》（CollectionOrbis），这是关于全世界主要地区的一套丛书。

肖莱提出了关于法国地理学当前趋势的一些意见。各个地理系在配备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研究工作也经历了一个新的跃进。自从德·马东男在自然地理领域建立地形学和植物地理学以来，定量方法就传播开来了。在战后的年代里，在人文地理领域有着类似的发展，不过因为缺乏地方的数据而受到阻碍。然而，这种趋势却带来种种困难和危险。在统计领域或统计形式方面的数据（对于各行政单元来说，常常是过时的，而且常常要求订正；或者采用耗费时间的个人调查），是不容易获得的。即使在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帮助下，也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有可能把它们凑到一起。这样，按照维达尔的定义，对一个地区的所有方面进行地理研究，就变得很困难了。人们需要更加明确地确定问题的内容、方法和实际可能性。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发现面临的是对一个地区及其生活结构的个别要素（都市化、农业结构和人口流动等）进行片断的研究。肖莱在他个人的报告中作了如下的结论，现在把他的话全部引录如下：

“简单说来，区域综合的思想在一种片断研究的面前消失了，这种片断的研究在当前状况下似将导致一无所得。但是随着范围的不断缩小，这种只对特殊地区进行的研究，允许我们能够认识大陆的各个地带、文明的各个领域或生活方式，以及达到对地球的合理描述，这是地理学的真正目标和目的。这种片断的深刻的分析，只有当它在第二阶段让位于区域综合的情况下，在地理学上才是有用的。这正是布朗夏尔在他研究阿尔卑斯山脉的著作中运用的分析和综合的过程。各个地理系必须从地方到全世界的范围内促进实现这些分析和综合的目标。区域地理必须恢复它的权利和使命，把适用于全世界的普通地理学的资料结合起来。”

第二十一章　战后的趋向

概述

马·索尔在1957年写道，战后的年代已显露出对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传统的态度有了改变，人们已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所有的国家都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有所“变化”。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正在适应已经变化的时代，但它们仍然扎根在上一代的研究方法之中；分析的方法正在更广泛地得到应用。由于某些历史学家的推动，这种趋向早在战前就已经在农业地理领域中显露出来了，但是在战后，它扩大到了整个地理学领域。其原因，毫无疑问，就是对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的要求增长了，同时亦与技术（统计的和工具的两方面）的发展及精益求精有关，这是科学工作总的趋向的一部分。

这种趋向导致自然和人类这两方面的边缘研究领域之间的更密切联系。这种情况，反映在邻近的学科采用地理学的方法，和一些受到地理学促进的学科侵夺了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因此地理学家必须努力使自己能够更刻苦地对人类知识作出独特的贡献。索尔主张，这个独一无二的贡献存在于综合的观念、“在一定地区分布的整体”的观念、互相依存的观念以及这些复合体内部紧密结合的观念之中。这个目标就是上一代伟大的地理学家的中心目标。

索尔认为，由于进行分析而失去区域综合这一目标的危险，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他又写道，在更年轻的一代人中，仍然存在着那些被分析的现象位于何处这一中心问题。再有，人们发现与地理学有联系的学科，诸如气候学、植物学以及社会学等，正在越来越多地承认地理学的整体的概念。空间现象并不是象维达尔·德·拉·布拉什阐述过的那样，可以简单地用它与其他空间现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这些现象必须作为地理学整体的一部分来加以阐明。继续进行地理学探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的保证也正在于此。

地形学

雅·博热-加尼埃夫人写道，地形学在过去二十年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早年的假设已经转为用定量的分析，这首先是在实验室内进行分析，而且过程是可以模拟的，根据野外零星观察而提出的假设，能够用实验来证明其正确性。《动力地形学》（RevuedeGeomorphologieDynamique）杂志可以说就是发表这些研究的官方刊物。人们已经采用“动力地形学”的新技术，来解决新的问题。在实验室中对沙子、砾石、粘土等进行研究，可以使人们得出有关搬运及剥蚀方式和沉积物形成的气候条件等方面的结论。岩石崩解（机械的和化学的）的方式问题，使人们注意到气候条件对石灰岩及结晶岩蚀变的影响，以及寒冷的气候对岩溶作用发育的影响。气候地形学就这样地取得了发展。从目前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地形学综合动力论”的总概念。地球运动是永恒的、缓慢的，在侵蚀与堆积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这些过程是同时进行的。由于构造上以及气候上的原因，这个或那个过程可以起支配作用，或者总的演变趋势可能会中断。在不同时期开始的各种循环同时在进

行（多循环地形）。撒哈拉地区的荒漠侵蚀过程，已经被人们乘坐吉普车、飞机进行观察，并在实验室进行模拟而研究清楚了。

气候学

C.P.佩吉说，自从 1926 年以来，并没有作出什么杰出的工作。在 1926 年出现了贝内旺研究法国阿尔卑斯山气候的论文和德·马东男干旱指数的重要概念。自此以后，气候学的研究工作就沿着更专门化的路线发展。

大气层研究的革命，导致了动力气象学的发展。在法国，雨量站的数目不断地减少。《中心气象局年刊》（AnnaleduBurcaucentralmétéorologique）列出的雨量站数，在 1890 年有 930 个，至 1930 年已减为 365 个。“气象学家决心走物理学的道路，他们和地学的关系越来越少”；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与地理学家之间极少协作。

在三十年代出现一种相反的趋势，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德·马东男的地带性观念，对气候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人们的注意力已转向气候与地形形成的关系；现在，比罗和特里卡尔这些人已经提出与“构造地形学”相对立的“气候地形学”这一名称。植被生态学中类似的研究，改变了气候学的方向，并促进其发展。水电事业的发展也促使建立更多的气象观测台站。

在三十年代中，气象学的新概念和新资料被用来解释气候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趋势更得到了加强。而农业气象学工作中揭示出来的情况，使气象学家日益感到气候现象关系甚大。医疗气象学及气候疗法，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战后已发表了两篇关于区域气候学的博士论文，一篇研究中央高原，另一篇研究巴黎盆地。

土壤

L.加雄（L.Gachon）写道：“土壤学同地理学一样，也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在法国，由于自然差异的多种多样，和影响土壤发育的各种过程（包括人为的）的不同的结合，这种趋势大大加强了。俄国学者提出气候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的说法被驳斥了，而且也不可能简单地用基岩的衍生作用来解释土壤的起源。人们已经发现，缓坡及平原地区土壤的发生和发育，涉及到水的渗透、泥流、土爬、冲积层及崩积层的形成、毛细管作用、蒸发、蒸腾、地表淋溶层以及土壤深处的淀积层的生成等各种自然过程。当然土壤也由于人类活动而大为改观：一方面是上述这些过程受到干扰，另一方面是耕作而引起土壤的变化。

可是，加雄注意到了一种动向，即科学家们只把土壤看作是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的物质，而不知土壤既是物质又是生命。他提出在淋溶层和淀积层的分异作用中有两个因素占支配地位：年龄及土壤内水的活动状况。举例来说，黄土很肥沃，因为这是年轻的土壤，含硅、粘土以及钙的成分比较合适，然而这些成分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气候条件所造成的水的作用的影响、受到土壤中水本身流动的影响（夏天以向上运动为主，冬天则缓慢下渗），以及在这两个季节中温度及湿度的变化的影响。黑钙土及黄土的肥力就是这样得来的；从花岗岩衍生的土壤的肥力也这样地日益提高，例如在中央高原上，中等高度缓坡上的土壤已经用于耕作。因此，土壤的最佳状态是水能自由地作

垂直或水平运动。

此外，法国土壤学家考虑到了人类改造土壤的情况，亦即对土壤的保护与改造的历史研究。尽管受到人类破坏，土壤仍具有明显的再生能力这一事实，使得人们有必要不是从地质时期、而是从几百年的时间（如佛兰德和弗里斯兰的情形）上来考虑土壤问题。可是，它当然会由于人类要养活自己而受到更迅速的破坏。

植物地理学

夏尔·弗拉奥（1937 年）在地中海地区继续进行十九世纪先辈的研究工作。他按照外表形态画了植被图，他的研究方法本质上是生态学的。高森（Gaussen）在其小比例尺的法国地图（《年鉴》，1938 年）和一些选定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图（1：200，000）上继承了这个方法。

第二个，也就是新近采用的方法，就是植物社会学的方法。这就是对构成那些画在大比例尺地图（即 1：10，000）上不同等级的群丛的种群，加以详细的统计分析。当前的问题是综合这两种探讨方法；第一种是生态学的，而且是比较概括的；第二种是统计的和极其精细地进行的。

现在已经出版了许多按照这些研究方法写成的、详尽的专题论文，其中包括高森对东比利牛斯山的研究（1934 年），以及关于法属北非[①]的种种专题研究。后者被综合在奥布雷维尔（Aubreville）关于热带非洲的气候、森林及荒漠这一主要著作之内（1949 年）。

水文学和海洋学

格勒诺布尔的地理学教授 M.帕尔迪，在法国的水文学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近二十五年来，由于有了与解释河流水文变化规律有关的水文及气象的观察资料，使水文学研究得到了发展。

地理学家 C.P.佩吉主张在水文气象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并且在他研究迪朗斯河和乌拜伊河的博士论文和第二篇著作关于自然地理学统计法导论中采用了这些方法。这是高度专门化的领域，它越来越和统计技术及作为地球物理学分支的气象学密切地联系起来。

二十年前，海洋学的研究已退到很低的水平，可是在战后的年代里，随同海岸地形学、水文学一起，主要是在政府各个部门之中，这个领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A.吉尔谢尔（A.Guilcher）在报告这一事实时，费了很大的力气来描述地理学家能对海洋学这个领域作出什么贡献，他还强调海洋学的资料必须根据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实地观察。在海洋学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中，处处都存在地理学的影响，但它用数学的方法来进行解释，这就超出了地理学家一般的工作能力，因此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海洋学自成一个研究领域。一般地说，专业地理学家感兴趣的不是海洋学的本身，而是它与人类的关系；虽然从理论上说，地理学家的研究内容包括海洋、海水和深海，而且毫无疑问，对于海底、海水内的物质及海水运动的研究总是地理学家所乐于接受的。这个理论的领域太广，实质性的内容必须让给专门家去进行研

[①] 原法属北非的国家，现已独立。——译者

究。

在法国，有几个大学的地理系开设关于海洋的专门课程，例如南锡大学的吉尔谢尔讲授的课程。地理学家过去在海洋学的发展中是起了作用的，但是那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领域现在已列为地球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人文地理学：农业景观

在人文地理学的一般领域里，崇高的地位必须给予前面第十九章内已经提到的、已故的马克西米利安·索尔的著作。

农业景观，已由E.朱利亚尔在关于下阿尔萨斯这本非凡的著作中作了调查研究。他指出，农村在法国的地理研究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农业耕作的技术和经济问题，以及农村空间的组织问题；战后这些趋向还在继续发展。不过，现在人们正在寻求新的观念，而且对一些特殊情况进行的详细分析，揭示了农业景观及其形成力量的复杂性。档案资料、地籍图以及成批的照片，都为这些进展提供方便；它们还得到植物社会学、土壤学、地名学、人种志及人口统计学发展的帮助。历史学家正在开始重建过去的景观；这些历史学家可算作“地理历史学家”（geo-historian）。

战后，地理学家关于农村景观的著作有三种趋向。一些人可以致力于研究过去的某一时期，如迪翁研究中世纪，或如尚皮埃尔（Champier）的研究史前时期；有些人可以致力于研究耕作技术和农民的精神状态（如福歇和加雄），还有一些人则应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有几种趋向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德芒戎战前对农村建筑物的研究，现在由于受到房屋结构发展方面资料分析的推动而正在向前发展。农业形态形成的多样性已经被揭示出来了，但是我们还远远不能得出比较的结论；而且，尽管对农村整体的论述得到了援助，但仍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景观是不能简单地按照自然环境和人的因素去作解释的。“人类以特殊文明为媒介来利用环境”（古鲁语）。如果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之下，由一个文明社会代替了另一个的话，则人文地理也将会不相同。“文明”这个词（或者叫文化）在这儿是指利用土地和组织空间的技术。这个观念已经成为新近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这在D.福歇战前写的农业地理，以及战后（1954年）写的《农民和机器》（PeasantandMachine）两书的探讨方法中是很明显的。在近来出版的区域专论中它也有所反映；这些专论包括R.迪翁的关于法国葡萄栽培业（1959年）、P.菲尔波诺（P.Philiponneau）的关于巴黎的农村郊区（1955年）和E.朱利亚尔的阿尔萨斯（1953年）。

在上述这些探讨中，有两种一般的观念得到了发展。第一，环境的自然要素受到先后相继的人类集团的改造；热带稀树干草原和大草原大多是由人类行为导致的；格拉德曼提出的著名的草原荒野植被，可能就是人类干预导致的一种植物群系；由于滥用土地，土壤受到破坏，人们就被迫改变经济方式，或者抛弃村庄出走。第二，尽管农业制度常常被看作是固定的，远古以来便是如此的，现在人们却认为把它看作是人类占有方式的不断改变的表现更为符合现实。人们所调查研究的，不管是开阔的还是封闭的田地，分散的还是聚居的农庄，或者是共同使用的方法（布洛什和迪翁），它们都要用土

地所有权、耕作技术以及相继的农作制度的改变来解释。

人口和生产

人口地理学研究的是特定区域内的人口特征，它的近代源流是 A.苏维（A.Sauvy）、A.郎德利（A.Landry）等人口学家的著作。在涉及世界范围的地理学著作中，特别应该注意皮埃尔·乔治所作的概念上的探讨，以及雅·博热-加尼埃的大量研究工作（两卷本）。人们也应该提到当地的人口学的研究趋向，以及在法国某些地区经过调查的人口流动现象。在这一方面，特别重要的是 G.韦雷-韦尼埃及其妻子，以及他们的学校（格勒诺布尔）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所作的研究；在中央高原也已进行了同样的研究。

近些年来，城市地理学是由 G.夏博领导进行的，这方面的证明是他（与博热-加尼埃合作）的新著《城市地理通论》（TraitédeGéographieUrbaine，1963，493 页），它的基础是 1910 年布朗夏尔对格勒诺布尔的杰出的研究。除去对各别城市，如巴黎、圣艾蒂安和图卢兹地理研究方面的许多贡献以外，人们应该特别注意 P.乔治和 G.夏博的全面论述城市地理学的著作，以及 J.拉巴斯对里昂在其周围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所作的卓越的调查研究。更近的一些年内，某些学者已转而研究法国城市中心的等级划分（如潘什梅尔、科波拉尼〈Coppolani〉、罗舍福尔特〈Rochefort〉和迪格朗〈Dugrand〉）；他们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城镇对其附属地区生活和组织的影响。J.F.格拉维埃（J.F.Gravier）对“巴黎和法国沙漠”的看法，对于理解法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很大帮助，并且引起人们对农村中城市配置服务这类问题的注意。

P.德·鲁西耶尔（P.deRousiers）的著作是对法国工业地理学的第一个重大贡献，这是一部五卷本的著作，于 1927—1928 年问世，不过这一方面的地理著作多见于区域专论之中。后来 J.夏尔多内（J.Chardonnet）的关于大型综合工业区的著作（1962—1965）以及 R.冈达尔姆（R.Gendarme）的法国北部工业化地区的经济研究（1954），特别值得注意。许多重要的地理著作讨论法国的特殊活动，或对某些工业的地理位置作系统的分析；而且有许多著作是专门论述后一题目的。我要提到的是：P.乔治关于能源地理的研究（1950），和 A.阿里克斯的纺织地理学（1957）。地理学的专门知识被运用到一些实际问题上去的有：J.F.格拉维埃的畅销书《巴黎和法国沙漠》（ParisandtheFrenchdesert，1947 年）以及《分散和技术进展》（DecentralizationandTechnicalProgress，1954 年）就是这方面的证明。

交通地理学早就受到法国地理学家的特别关注。R.肖帕-雷伊的《大陆交通地理学》（Géographiedelacirculationsurlescontinents，1946）是一部权威性的著作。马·索尔在其论述人类对空间的征服的那部巨著《人文地理学基础》一书中，对这一领域作了甚至更充分的说明（第二卷，1948）。许多研究都论述了道路的作用，论述了象火车站这样一些地点的空间影响，如 R.克罗齐埃的《北方站》（R.Clozier，LaGaredeNord，1940）。三卷本的著作《交通地理学》（GéographiedelaCirculation）现在已经出版。

区域专论

1938 年，勒内·米塞在《地理杂志》中写道，区域专论这种研究，意味着人们要掌握多种过程，以便了解整体的统一性，它可能大大超过了一个人的能力；而且由于每个区域都有其独特性，它就要求有因研究方法、特别是因地区而异的一种描述手法，明确的步骤，探讨主要问题的计划。这是传统的目的，但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内，这类研究的内容、意图及方法都已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战后的专著论文，还有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例如德方丹和迪翁所写的那些专著，表现出一种从所谓“全面研究”转向重点研究的趋势。前者大概要包括地理学的所有方面；后者只研究一个观点、一个目标及由此而产生的为研究工作提供中心、方向和计划的一系列问题等。这样一个地区的外部特征，只能得到部分的描述。那么目的又是什么呢？

“看来，普通地理学的发展正在导致对某一特定地区作更多方面的（即系统的）研究，这对公认的传统观念中的区域地理学领域，不是没有损害的。”（勒内·米塞）

不过，许多战后的专题论文，还是对传统的“区域分析”作了尝试。戈蒂埃对布列塔尼中部的研究（1947）就是一个例子。全面的研究包括 R.布朗夏尔的论述法国阿尔卑斯山的十一卷不朽著作（1937—1954），和勒·拉努的论述布列塔尼的两卷著作（1950—1952）在内。

地形学方面的问题受到特别注意。雅·博热-加尼埃（1951）揭示了莫尔旺地区的形成要比五十多年前戴维斯所假定的要复杂得多；佩吉应用统计方法，分析了上杜朗斯河流水侵蚀的过程（1947）；特里卡尔论述了巴黎盆地部分地区的地形发育（1952），潘什梅尔论述了巴黎盆地和英格兰东南部之间的关系（1952）。更近一些的专题论文是论述马达加斯加、加利西亚以及智利中部的安第斯山的。

受到特别注意的人文地理学问题是农村组织和农业生活的问题。这里只提两项主要的研究：M.德路的《奥弗涅与波旁的大利马尼》（LaGrandeLimagneauvergnateetbourbonnaise，1949），与 E.朱利亚尔的《下阿尔萨斯：下阿尔萨斯平原农村的生活——社会地理学的尝试》（BasseAlsace：LaVieruraledanslaplainedeBasse—Alsace：EssaideGéographieSociale，1952）。韦雷-韦尼埃论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工业的著作（1948），以及安·儒尔诺论下诺曼底的电力的著作（1955），都着重于经济。法国阿尔卑斯山北部房屋类型的发展，是 1939 年 J.罗伯特（J.Robert）著作的课题。R.迪格朗德论述了下郎格多克的城市中心（1963），R.罗舍福尔特论述了阿尔萨斯的城市地理（1960）。

有一个与小区域地理研究有关的基本问题。各别的事实——农田、工厂厂址或者是社会的态度，必须通过它们的空间类型和结合，也就是它们的范围和地区来研究。否则，人们就要陷入琐碎的细节而无法摆脱。如果没有发现存在着这样的关系或类型，他们就应该被扔出地理学的范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近期的论著中可以找到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论题和严格的选择，象马·德路论述《大利马尼》（克莱蒙费朗市周围及北部地区，1949）的著作就是这样。它的主要内容是地形类型以及强加在它们上面的聚落类型，还有在历史上这些不同的人类占有类型是怎样强加在各种局部地形上的。

R.迪翁在《年鉴》中评论马·德路的论文时说：“任何一个希望对法国地理学研究中最近和最明确的成就有明确了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马·德路

的书。这是目前应当推荐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在同一篇评论中继续说：“这一研究的目的，是要用一幅出色的现存田地类型图来解释地面上的人文的烙印。”R.迪翁写道，直到1930年，人们还一直普遍地认为，从一个群集的村落地区到一个分散的农庄地区，必然要有一条自然的分界线。这一简单的解释在马克·布洛什1931年论法国乡村史这部名著中被推倒了，该书阐明了景观取决于不断变化的农业结构，这在地籍图及一系列照片中的“小块田地上”看得很清楚。农业结构和自然区划这两种分布类型，是根本不同的。上面提到的马·德路的地图就揭示了这一事实，而且他著作中大部分都是用来解释这一事实的。

近些年来，许多论述世界上某些特定区域的大部头地理书已经出版或正在出版。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例如论述法国的一部八卷本著作，书名叫《明日之法国》（FrancedeDemain），这部著作自1960年以来已经问世；还有《世界》（Orbis）丛书，它包括论述欧洲的主要几卷（如中欧、北欧和西北欧、地中海地区），其他各卷正准备出版。

对目前趋向的评价

最后，我们引用较年轻一代的菲力普·潘什梅尔评论战后法国趋向的几段话，他不久以前是利耶大学地理学教授，现在是索尔蓬的教授。潘什梅尔特别适合作这种评论，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地形学的，而近些年来，他又转而研究人文地理学问题，特别是他在研究法国城市聚落的职能问题时运用了统计方法。笔者在前面各章中所作的评价，完全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写的，因此，人们必然对潘什梅尔和我的这两种评价的异同之处特别感兴趣。现将潘什梅尔所写的意见照译如下：

要着重指出的第一个特点是，法国地理学的成果异常丰硕。这可用许多新设的地理学教师职位与出版物及论文的数量，出国访问以及参加国际大会的次数日益增多这些事实来证明这一点。这一种增长是以悠久的、根深蒂固的、各级的教学为坚实基础的。在从五岁到十七、十八岁学生的学习课程中，地理学是唯一的一门人文科学。它同历史学一起，为学生们打开了认识当代世界的大门。地理学教授的任命，是为了满足更高级教育的基本要求。法国地理学家把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综合与描述工作，他们的工作成果，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内容精采的普通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读物。

不过，这门学科虽然在蓬勃地发展，但人们对它的前景却不是都有把握的。危机一词，在某些地理学家的笔下一再地重复出现。除了这种悲观的态度以外，还有来自外界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某些地理学家的。一些专家们指责他们干预了许多领域，而又不是具备必要的能力或者专门知识。很明显，和其他的科学或学科相比，地理学的处境既和它在大学里的地位不相称，也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因此，它的地位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必须强调指出法国地理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在1945—1950年以前，一直处在辉煌的孤立状态，并且由于自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及其杰出的学生，如埃·德·马东男、阿·德芒戎和拉·布朗夏尔以来，地理学界英才辈出，而确保了它的优势。因此，法国地理学家的思想就不能够与其他国家的地理学家同时并进。

这种在教学与研究之间、发展与变化不定之间的双重矛盾，是地理学向

各个方面扩张并且必然带来专业化的结果的反映。地理学探索范围的扩大是毫无疑问的。世界上地理学家描述的世界现象已经越来越多。银行、投资、第四纪地形学、生物地理学、土壤学、冰川学以及岩溶学，都是地理学家论述的比较新的课题。传统的论题，在目的和方法上都已变得更加明确。举例来说，在农业地理学中，对农村景观（农业制度、土地所有权、圈地）的分析，已经成为许多调查的课题。在城市地理学中，在论述城市的同时，地理学家已经发表了对区域或全国交通网的研究。

这些年来，法国地理学家在格陵兰、斯匹次卑尔根、日本、阿富汗、土耳其、印度、澳大利亚以及非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里进行了研究工作。在高纬度地区、岩溶地区、近东与远东地区都曾进行过地理探险。

在目前的区域研究中，已经比较少地采用描述和描述分析的方法，更多地用发生学的观点来作解释。例如，现在引起人们重视的是小树林（bocage）的起源，而不是它的类型。人文地理学的这种趋势，获得学院中历史系的赞成，加强了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的联系。

在自然地理学中，对地形及气候的研究，使得许多人去理解和解释侵蚀的过程及其类型和重建地形发育的阶段。地表沉积物，如果不比地表形态更重要的话，至少和它一样重要。在气候学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人们强调对大气循环的了解，不重视对地方或区域的气候要素作详细的分析。在水文学、生物地理学及土壤学中也可明显地看到这样的发展。所有这些研究工作及其先进的技术，都涉及到高度专门化的问题。在自然地理学中，对沉积物、砾石、砂子和粘土的分析，促使形态观察以及粒度测量实验室的建立。这一类的实验中心，已在南锡、巴黎和卡昂等地建立起来。在格勒诺布尔，气候学实验室正在建造中，土壤研究中心也已有了设想。地理学家还致力于风化过程的研究。

在人文地理学中，重点放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因素、经济的系统及法则、影响的范围、经济区划，和对货流的分析等方面，而对它们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则注意较少。

这一研究和专门化的主要后果，是削弱了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相互联系。上面提到的每一个领域，都逐渐地各自向独立自治的方向发展，很少考虑为其他分支学科提供解释或联系的根据，它们从地理学研究中抽去了直到目前似乎是统一性的那个东西。

这样，随着专门化程度的增强，地理学家也就越来越向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分道扬镳：自然地理学家走向自然科学及物理、化学的领域，而人文地理学家则走向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范畴。绝大多数人很少关心他们研究领域的确切定义这一问题。他们把地理学看作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种研究目的（就象 H.博利希几年前说的那样：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种目的）。

为了表明这种趋向，人们应该说“地理学的各门学科”，而不是象少数人那样称它为一门“地理科学”。这些重要的少数派地理学家们奋力保卫空间组织或景观的单一的地理科学的观点，他们遵循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和马·索尔所创建的传统。农业地理学的专业地理学家，就属于认为地理学可按单项目标而下定义的那一派。

区域地理学遭到（目前）这种专门化的损害，它很少被看作真正的科学研究的范畴。它继续在为“有知识的外行人”做普及工作。不过，区域地理

学所失去的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多。仍然有一些人确信对区域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独特性。区域地理学的这种研究法，从与其他领域如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竞争中得到好处；因为这些学科考虑生态学方面的问题，也需要精确地重新规定它们的目标和研究领域。

对于百科全书式的、注意研究地区范围内存在的一切现象这种区域地理学概念来说，现在已经出现一个更为有限的目标。现在区域地理学更关心的是描述和解释空间组织的复杂性。区域地理学为达到这一目标，获得两方面的助力：首先是详尽的地图，特别是航空相片的使用；其次是重视政治和经济规划。

如果说，区域地理学的应用并不比普通地理学的应用更为重要的话，那么至少也是相等的。我们所说的地理学，无论是哪一种，自然地理学也好，人文地理学也好，它们的方法已经变得越来越科学了，统计学的方法正在缓慢地、审慎地、不可改变地渗透到这两者中去。

1964 年法国地理学的观点比三十年前有了很大程度的不同。当时，它的声望依托在少数几位教授身上，他们怀着相同的兴趣出版自己的著作：《世界地理》及《法国地图集》。巴黎和格勒诺布尔曾是法国地理学的两个中心。今天由于人员、装备、运用和活动能力等各种因素，巴黎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但是今天地理学的中心将无疑地更加分散了。各省大学的地理系都有它自己的研究人员、专业化的实验室，以及研究中心和自己出版的刊物。战后已出版了五种新的外省的区域地理学期刊。

参考资料

本章主要依据《二十世纪中叶的法国地理学》，载于《地理学报》，巴黎，1957 年（LaGéographieFrancaiseauMilieuduXXeSiècle，L’InformationGéographique，Paris，1957）。这期学报包括著名权威写的几篇文章，内容涉及到地理学的每一个特定的领域。菲力普·潘什梅尔教授欣然写了一篇评价当前状况的文章。论述按照维达尔传统的地理学的目的和趋势的一篇简明而又非常中肯的文章，是乔治·夏博的《法国地理科学的观念》，载《挪威地理学杂志》，12（1950），第 309—321 页（LesConceptionsFrancai-sesdelaScienceGéographique，NorskGeografiskTidskrift，12〈1950〉，pp.309—321）。

第二十二章　地理学的发展

过去一百多年来地理学的发展，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对地理学的贡献，已由它在大学中所处的地位（全世界各大学里地理教授和学生的数量大大增加），和促进它发展的各个国内和国际组织显示出来了。本书已对法国和德国大学的成就作了介绍，另有几篇调查研究也已经出版[①]，最近一篇用德文写的是 W.哈特克在 1960 年写的文章[②]。人们对学会的增长也作了调查。[③]国际地理学会的历史业已出版，不过其发行量极其有限。[④]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谈谈第二及第三项内容，然后再作几点一般性的结论。

第一个学会是 1821 年建立的巴黎地理学会，接着在 1828 年卡尔·李特尔建立了柏林地理学会。两年以后，伦敦成立了皇家地理学会（1830 年）。紧接着，其他学会也相继迅速成立，有：1833 年墨西哥地理和统计学会，1836 年弗兰克福地理和统计学会，1838 年巴西地理学会，1845 年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1852 年纽约的美国地理学会（它的名称是美国地理和统计学会）。1866 年全世界已有十八个地理学会，其中有十一个是在欧洲。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学会主要是同该世纪大陆及海洋探险的伟大时代密切相关，也与大量收集各种统计材料的活动有联系。

自从 1866 年以来，随着地理学发展成为大学的一门科学研究领域，学会的数目也迅速增加。1901 年，欧洲已有八十九个地理学会，会员达六万人之多；另外，亚洲有六个，北美洲有八个，南美洲有五个，非洲有三个，而大洋洲有四个，总共为一百十五个。刊物超过一百五十种。1930 年，全世界共有一百三十七个学会，用四十种不同的文字出版期刊。1960 年，有五十一个国家出版地理期刊，其中出版十种以上的有十二个国家。在这方面占据首位的是德国，有五十种期刊；其次是苏联，有四十三种；美国有三十七种，英国有二十七种，法国则为二十三种。当时共有一百十种英文期刊，而德文期刊为五十九种，俄文期刊为三十五种。

由于国际代表大会清楚地显示出地理学的创建人在将近一百年内设想与组织这门学科的方式与方法，所以回顾一下它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国际代表大会一共开了二十次，第一次是 1871 年在比利时举行的，最近的一次于 1968 年 12 月在德里举行。

第一届代表大会是为了向制图学家墨卡托（Mercator）和奥特利埃（Ortelius）致敬，而在比利时召集所有对“地球科学”感兴趣的那些专家而举行的大会。出席这届大会的有：德国的制图学家奥古斯特·彼德曼（AugustPetermann）、法国人种地理学家阿尔芒德·德·卡特尔法热

---

① W.L.G.乔尔格：《近年来欧洲的地理学》，《地理评论》，12（1922），第 431—484 页。亦可参看 J.S.凯尔蒂：《英国大学中地理学的地位》，《美国地理学会研究丛刊》，第四期，1921 年，同上丛刊，第四期 A，1924 年。亦可参看赖特和普拉特的《地理研究指导》，《美国地理学会年刊》，1947 年，第 106—108 页

② W.哈特克：《简说地理学的地位》，《德国研究年刊》，威斯巴登，1960 年。

③ 关于学会及其刊物的增长情况，可参看下列各书：C.D.哈里斯和 J.费尔曼：《地理期刊联合目录》；T.W.弗里曼：《地理学的一百年》第三章，第 49—68 页；J.K.赖特：《正在形成中的地理学，1851—1951 年》

④ 该学会史是根据国际地理学会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两篇文章写成的，并译载在《世界地理》上，1960 年，第 61—97 页。

（ArmanddeQuatrefages）、因开凿苏伊士运河而出名的费迪南·德·莱塞帕（FerdinanddeLesseps）、当时少数专业地理学家之一的埃利兹·邵可侣，以及法国的制图学家维维安·德·圣马丁等人。议程包括二十六个地理学问题，二十二个宇宙学问题，三十六个航海、气象、商业和统计学问题，以及三个人种地理学问题。测量和地图投影、地名的拼法和极地考察，是地理学部分的主要问题。

第二届代表大会于 1875 年在巴黎举行。它的工作包括以下各个学科：数理地理学、水文学、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地理教学和探险等。经大会通过的地理学定义如下：

“地理学的对象是双重的：第一是作为目的本身的有关地表自然面貌的知识（自然地理学）；第二是对地球与其居民的关系的研究（政治地理学、人种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出席会议的有德国的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柏林地理学会会长）、尤利乌斯·佩尔特斯（JuliusPerthes）和奥古斯特·彼德曼，亨利·罗林逊（HenryRawlinson）爵士（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会长），法国的费迪南·德·莱塞帕、埃利·德·博蒙和维维安·德·圣马丁。

第三届代表大会于 1881 年在威尼斯举行。这届代表大会议程（宣读论文）共分八个部分；它们也是以后几次大会划分门类的基础。它们的名称是：数理地理学、水文学、自然地理学、人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地理教学和探险等。

第四届代表大会于 1889 年再次在巴黎召开，世界博览会也是在这一年举行的。这次大会的主席是巴黎地理学会会长费迪南·德·莱塞帕。论文分为七组：数理地理学，包括大地测量学、水文学、地形学和制图学；自然地理学，包括气象学和气候学、地质学、植物地理学和动物地理学以及医学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包括商业地理学和统计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地理教学；探险航海；人种地理学以及人类地理学。

伯尔尼是 1891 年第五届代表大会的会址。就是在这儿开始了近代制图学上的一个伟大的事业。阿尔布雷希特·彭克提议依照 1：1，000，000 的标准比例尺来绘制世界地图。出席大会的有阿尔布雷希特·彭克、爱德华·布吕克纳、约瑟夫·帕奇和托马斯·霍尔德里希（ThomasHoldrich）。

第六届代表大会于 1895 年在伦敦举行，由皇家地理学会会长克莱门茨·马卡姆（ClementsMarkham）爵士担任主席。它分为八个组：数理地理学（包括大地测量学）；自然地理学（包括海洋学、气候学以及地理分布）；制图学和地形学；探险；描述地理学（第一次出现）和地名拼法；地理学史；应用地理学（特别是历史、商业和殖民）（后一项第一次出现）；以及地理教学。中学和大学的地理教学工作受到特别注意，因为这些年来，地理学正在力求克服学者们普遍不愿意承认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倾向。这次大会成立了一些委员会，去调查出版地理学文献目录以及推动极地考察的情况。

1899 年，在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的主持下，在柏林召开了有一百人参加的第七届代表大会。在讨论中，科学研究工作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提交论文的有胡格·罗伯特·米尔、J.斯科特·凯尔蒂、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保罗·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以及埃里希·冯·德里加尔斯基。

第八届代表大会是第一次不在西欧而在美国举行的大会。这是一次流动进行的代表大会，因为会议先后在华盛顿、费城、纽约、芝加哥和圣路易斯

举行，会议主席是北极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彭克百万分之一地图的工作，由于大家一致同意委托美国绘制南美洲的地图而前进了一大步——这个工作后来由美国地理学会承担，艾赛亚·鲍曼是主要负责人。大会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尚未进行人口普查的国家的统计资料问题。

第九届代表大会于 1908 年在日内瓦召开，由日内瓦地理学会会长主持。大会讨论了十四个方面的问题，它们是：数理地理学和制图学；普通自然地理学；火山学和地震学；冰川学；水文学（河流学和湖沼学）；海洋学；气象学、气候学与地磁学；生物地理学（植物地理学和动物地理学）；人类地理学和人种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探险；地理教学；历史地理学；还有各类规章及命名法等。这次代表大会上比较重要的决议有对极地探险、冰川学、海洋学和地形学研究等工作的鼓励。国际地图得到进一步的讨论，由彭克（德国）和甘内特（Gannett）（美国）提出的一个方案获得大会的一致赞同。

这一届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地理学领域的一个动议，它的内容如下：

“作为一门讲授学科的地理学，其目的就是通过物质的和有生命的各个要素来描述由这些要素的组合及互相依存决定着的现存地球外貌。在中小学里的这种教学，应该以阅读地图为基础，尤其要采用综合的方法。在描述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时候，地理学应该阐明无机世界和有生命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地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这些早期大会的第十届，于 1913 年在罗马举行，大会活动分为八个组：数理地理学；自然地理学；生物地理学（生物地理学——biogeography 一词，第一次在专业词汇中出现）；人类地理学和人种地理学（拉策尔提出的这个名词已经扎下根，不过当时它与人种学家的工作有密切联系）；经济地理学；地方地理学（第一次以一个专题组的名称出现；虽然在德文著作中早就有了，但它以前从未这样出现过）；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方法论及教学法（后者是第一次出现）。在日内瓦任命的委员会向代表大会作了汇报。国际地图委员会决定于 1913 年 12 月在巴黎召开一次会议。地形委员会取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并对推动北大西洋的海洋学研究给予鼓励。组织一个地理学会国际协会的动议，由于 1914 年秋季爆发战争而推迟了。

1922 年，在布鲁塞尔的国际研究会议的大会上，重建了一个国际组织国际地理学会。这个学会是要承担三项任务的专业化组织：促进地理学问题的研究；倡导并协调需要国际合作的研究，并为它们提供讨论和出版的方便；组织国际代表大会以及研究委员会。

新建的地理学会的第一次会议，也是国际代表大会的第十一届会议，于 1925 年在开罗举行。它的工作分为六个方面：数理地理学；大地测量学及制图学；自然地理学；生物地理学及人文地理学；人类地理学及人种地理学；地理学史及历史地理。先前的代表大会是由地理学会召集并组织的，而新的国际地理学会则是建立在每一个成员国的全国性委员会的基础之上的。开罗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一个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过渡型会议。大会决议其工作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国际地理学文献目录，一个是加速进行国际地图的编绘工作。会议还决定建立一个研究农村居住地的委员会，和继续进行出版地形地图集的工作（在日内瓦会议上创议的）。

1928 年在剑桥举行的会议由查尔斯·克洛斯（CharlesClose）任主席。会议分为六组：数理地理学、自然地理学、生物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历史

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取代了“ 地方地理学 ”）组和人文地理学组都是第一次出现。各委员会作了关于农村居住地、国际地图、上新世和更新世阶地的报告。建立了另外几个委员会去研究气候变化、人口、1：1，000，000 的古罗马帝国地图的绘制以及古地图目录编制问题。

1931 年在巴黎举行的代表大会是杰出的，因为它成为以后各届大会的范例。准备工作由法国全国委员会秘书埃马纽埃尔·德·马东男担任。大会工作分成六组进行：地形测量学及制图学、自然地理学、生物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及文献目录和地理教学等。

自然地理组转向研究地方气候、冰蚀作用、欧洲第三纪准平原面，河流袭夺、岩溶侵蚀作用、热带地区的侵蚀作用及大陆沙丘等。人文地理组研究工业的地理位置、城市群、热带地区聚落的分布、降雨量不可靠地区的人口移动、在地图上表示人口的方法等问题。历史地理组（定义仍然不能令人满意）转向研究现代制图学的起源，即主要是研究地图史。人们特别重视到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游览。四十二个国家的到会者达九百人，其中法国为三百五十人。成员国的数字达到二十七个。大会批准成立了几个新的委员会，它们是：航空摄影委员会、人口过剩委员会、地表侵蚀制图委员会；并重新批准了已有的各委员会。这九个委员会一直积极工作到 1934 年在华沙举行的下届代表大会举行时为止。

华沙代表大会大体按巴黎代表大会的方式进行。分为下列各组：制图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史前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地理景观、教学法和方法论等。1938 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代表大会，继续了巴黎大会开创的组织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国际地理学会的会议。战后，执行委员会恢复组织，以德·马东男为会长，并决定下届代表大会在里斯本召开。会议分为七组。两个委员会（气候变化委员会以及航空摄影委员会）被取消，但又成立了航空摄影、区域规划、土壤侵蚀以及冰缘地形等新的委员会。德·马东男因对学会作出巨大贡献，被选为终身名誉会长。

这一届在里斯本召开的代表大会，是战后的第一次大会，标志着学会历史的一个阶段的结束。在两次大战间隔期间，欧洲的影响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一再感觉到德·马东男科学研究的影响。现在重点已移向美国。

在华盛顿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活动，分为十二个组：生物地理学、制图学、气候学、人口学、地形学、水文学、历史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区域地理学、资源、地理教学、商业和运输、农村和城市聚落。大会批准医学地理学、冰缘地形学、古地图以及世界土地利用调查等委员会继续工作。选举产生了干旱地区、岩溶现象、斜坡发育、大西洋沿岸侵蚀面、海滨沉积、中小学地理教学以及地理文献分类法等新的委员会。

下一届代表大会是 1956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论文分为十二个组：制图学和摄影测量学、地形学（最活跃的一组，特别是在计量方法方面）、气候学、生物地理学、水文学、人文地理学、人口与聚落、农业地理学、医学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还有区域地理学。原有的各委员会都获得重新任命，另外又新增了研究国家地图集、应用地形学、世界人口地图以及湿润热带等委员会。在本届主要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区域代表大会，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在乌干达的坎帕拉（1955）、日本（1957）、马来亚（1962）和墨西哥城（1966）都举行过这类的会议。各委员会的会期

都长达一个星期或更多一些时间。

我们还要谈谈 1960 年在斯德哥尔摩和 1964 年在伦敦召开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我们看到学会的真正的国际性，它的活动反映了全世界数百名学者研究的范围之广和质量之高。在斯德哥尔摩的会议上，卡尔·特罗尔当选为以后四年的会长，并且主持了 1964 年在伦敦召开的会议。在伦敦会议上决定下届代表大会于 1968 年在新德里举行。

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有一千六百七十人，他们代表六十四个国家（出席里约热内卢会议的有一千人，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为一千三百人）伦敦会议的参加者超过两千人，他们来自六十七个国家（七百人来自联合王国，三百零七人来自美国）。

斯德哥尔摩大会的活动分成十个组：地理制图学和摄影地理学、极地和亚极地地理学、气候学和水文学、海洋学和冰川学、地形学、生物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方法论及文献目录、应用地理学等。十五个委员会汇报了他们的工作，并且在今后四年内继续工作；此外又增设了制图学和经济区划等一些新的委员会。在三至十天的专题讨论会上，人们还讨论了下列题目：农业地理学的历史发展和现代特征、海岸地形学、土地利用、聚落、工业中心、灌溉、海岸及群岛（在赫尔辛基开会）、挪威的农村聚落，挪威西部峡湾的自然及文化、挪威北部的自然及经济、河流地形学、定居地区的扩展与缩小、高山地区、芬兰湖泊高原、城市地理学中的中心地区及其作用。

经伦敦会议摘要刊印的论文将近一千篇。会前会后共有四十次游览，并在伦敦举行了十一次展览。在伦敦会议上，有五个委员会（古地图、图书分类、岩溶现象、制图学和环绕大西洋的侵蚀面）结束了活动，另外又新成立了五个委员会：农业类型、航空摄影、应用地理学、国际水文学十年和计量方法，以及世界人口。世界土地利用调查（1949）、干旱地带（1952）、地理教学（1952）、国家地图集（1956）、湿润热带（1956）、医学地理学（1949）、冰缘地形学（1949）、坡地发育（1952）、应用地形学（1956），以及经济区划（1960）等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

伦敦大会之前，在英国召开了十次不同内容的专题讨论会，大会后又召开了四次。这些讨论会的题目十分广泛，有：地形学（三次）、城市地理学（两次）、农村聚落（两次）、制图学（两次）、热带地理、移民活动、农业地理学、地理教学、政治地理学与工业地理学等。一共分为九个组：人口和聚落、经济地理学、气候学和水文学、海洋学和冰川学、生物地理学、地形学、历史地理学、应用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制图学。

应当特别提一下国际地理学会的文献目录工作。从 1891 年开始的国际地理文献目录是《地理学年鉴》。国际地理学会主编的第一卷已于 1949 年出版，现在已出版了近七十卷。第一卷国际制图学文献目录于 1946—1947 年问世。它同样是在法国开始的，至今已出版了十八卷（至 1967 年）。国际制图学会于 1964 年加入设在伦敦的国际地理学会，成为它的一个分支机构。

从这一百年来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评论：

1. 自 1871 年开始的头五十年，主要是由欧洲的地理学会占据统治地位。这些学会主要掌握在“受过教育的外行人”、勘测专家和制图专家的手中，他们建立了学会和国际代表大会，并把它们组织成讨论他们工作的最好的论坛。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后五十年中，代表大会已掌握在专业地理学

家的手中，并被作为一个专业组织而严格地组织起来。战前代表大会上少数专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已逐渐受到重视。在两次大战的间隔期内，他们的观点已变得极其重要，特别是由于法国地理学家、主要是德·马东男的影响，更得以具体化和付诸实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正如 1964 年伦敦大会（英女王亲自参加在皇家艾伯特大厅举行的开幕式）所反映出来的那样，地理学的实力已大大增强，但出现一种把研究引向一些特定领域的倾向。

其次，人们也看到地理学领域的范围和深度已经发生变化。在头五十年内，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样，地理学探索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但那些主要来自中欧的很小一部分专业地理学家力图给地理学规定一个更明确的范围。事实上，代表大会就是一个多种多样领域研究的国际论坛，在当时，其他可供选择的出路是没有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他领域的国际大会已经陆续建立：诸如大地测量学、摄影测量学、制图学、科学史、土壤科学、人口等等。另外，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倾向，那就是研究的领域转移并集中到某些问题上面去。人们应该注意到某些领域的学者，仍然可在地理学中找到同情它们的环境。摄影测量学就是一个例子。人们也注意到“自然地理学”，特别是命名不久的地形学，从开始到后五十年中长期坚持而且获得更加勤奋的探讨；它的目的也明确了。研究上新世和更新世阶地的委员会，在两次大战间隔期内坚持工作了许多年；地形学的各高度专门化的委员会，在今天还是非常活跃的。

第三点是越来越重视与地理科学有关的技术和目录学的发展。这在 1964 年通过建立的各委员会（计量方法、照片判读、农业类型和世界土地调查）中是很明显的。关于聚落的研究（建筑物的空间排列、农庄和田野）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两次大战的间隔期间，在法国和德国尤为突出。

第四点，要特别强调一下学术研究兴趣的一般趋向。一百年来，自然地理学的各个方面一直是全世界地理学家关切的基本问题。自然地理学的内容及目的，已在德·马东男二十世纪初的先驱性的著作中说得很清楚了。在两次大战的间隔期间召开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过去二十年内提出的论文中，属于自然地理学领域（主要是地形学、气候学、海洋学和水文学）的比率很高，而且不断增长。这样热情强烈的活动，在某些委员会连续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也是很明显的；专业化的这种优势和这样高的程度，是追随彭克、李希霍芬、德·马东男和博利希这些人所建立的不间断的欧洲传统而出现的。赫特纳开始时也是一位地形学家。这些人在美国的同时代人是 W.M·戴维斯、J.W.鲍威尔、G.K.吉尔伯特和 D.W.约翰逊。不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美国人已经放弃了这些领域，明显的一个例外是伯克利（Berkeley）这个堡垒了；其结果是美国地理学家对他们的同行献身于自然地理学问题这一事实感到很惊奇，并且有点烦躁。

还应该注意到地理学中的人文方面，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取得了正在增长的重要性。虽然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很多，但没有令人激动的研究或讨论。早先叫做“人种学”或“人类学”的组已经消失。但“历史地理学”从“地理学史”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独特的研究领域，则是新近才出现的事情，而且它们的成长似乎已经由于与制图学史及古地图目录学相混淆而受到了（至少是部分地）妨碍。没有一次代表大会建立过一个世界主要地区的组，因此论文投稿人常常感到难以决定把他的论文提交给哪组最合适，而“区域地理”组也常收到可以送到其他组的论文。因此，指出（在各委员会里或在专题讨

论会上）正在被探讨的新的观念是很有意思的，它们是关于聚落的历史发展、城市化的地域影响（虽然有许多由于分类的关系而成为目的的本身），和新技术的应用，特别是相片判读、计量技术和农业分类学等。

结论

我们从近代地理学创建者那儿学到的主要的东西，可以再作概述如下：

第一，很明显，地理学与其他学科是有交错重叠现象的。这决不是这门学科的特殊性或缺点，因为各门学科的互相依存，乃是当代知识发展中的主要倾向。确实，对各门学科研究部门的组织，主要是根据传统上的方便，这样的一种观点是有好多话可说的。当然，按照研究的水平，在共同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改组或增设新的部门，可能会更好些。对大学教学的一大挑战是，要寻找真正能够打破各个学科界限的方式方法。在教学和研究中，我们需要有更广泛的研究计划和进行有效的学科间合作的新途径。而通过对各个大文化区域（如西欧、苏联、中国）或城市化、国际关系这样广大的领域进行全面的研究，就能够找到这类的计划和途径。不管进行哪一种研究，地理学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正如一百年前卡尔·李特尔指出的那样，尽管地理学与别的科学有着共同的领域，它却必须始终有自己的明确目标。最近三十年内，地理学探讨的对象和方法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因而概念也需要重新审查，重新加以系统地阐述。这一学科的历史，揭示出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地球上各现象的地域结合，而不是传统的环境关系意义上的那种唯一的人地关系的结合。地理学基本上是地球表面的区域或生物分布的科学。

第三，作为生物分布科学的广义的地理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各种内容，对于为数不多的学者来说，需要进行有效的研究的项目是太多太难了。如果地理学只限于通过人为关系的重复重现的型式来研究“人类之家”的地球或“地球上的人类”的话，那就必需按照同人类的关系来评价自然环境。许多事实和现象，都具有专业地理学家认为已超出他研究范围的一种地域的分布的性质。地形学领域可以看作与地质学有密切联系的一门单独的学科；气候学与气象学的联系很密切，而后者现在已有单独设立的讲座。就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海洋学来说，虽然地理学家对它有普遍的兴趣，却早就自愿放弃它了。植物地理学，在植物生态学的名称下得到许多植物学家勤奋地探索。很少一部分地理学家从事动物地理学的研究，但是“土地”在虫类、鸟类和兽类“生存股份”（living-share）中的作用，已经取得很突出的地位。国际地理学会的历史以及目前的趋向，显示了地理学对这一类高度专门化的领域，如湖沼学、孢粉学、地质年代学等学科的关切。在人文地理方面，大陆学者（特别是在德国）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现象分布中的经济因素和经济组合的地理结构。经济的知识受到长期的研究和推敲，最近在 A.勒施（A.L■sch）以及战后年代的学者，主要是美国（伊沙尔德〈Isard〉、加里森〈Garrison〉及瓦恩茨〈Warntz〉）和法国经济学家（邦沙尔〈Ponsard〉）的著作中又获得进一步的阐发。经过二十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人类生态学家及其继承人阐发的社会集团地理分布问题，已经导致了大量的实际和理论工作。追随瑞典人 R.切伦（R.Kjellen）的地缘政治学的政治科学家们，也对作为一种地理现象的国家感兴趣，虽然这方面的兴趣不如其他两个领域的

那么大。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人类生态学、城市与区域计划学这类名词。定量分析的方法现在也很流行。这些都是与地球有关的那些现象的“系统的”或“一般的”方面，而且正在变为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知识领域。那么，对于地理学家来说，他的专业知识的独特核心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各种地表现象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从而形成它们特有的地域结合（特有的自然环境或空间综合体）的方式，这就是地理学的精髓，它是区域的概念。区域概念关切的中心是地域分析的问题；它的目标正如我尊敬的美国朋友、同事P.E.詹姆斯所指出的那样，可以是描述性的、发生学的和补救性的。描述性的研究是搜集一个地区的分布和地域共存的资料，而不必去探求它们的原因；发生学的研究是关心与地表上空间变化因子的发展有关的过程，不管它们是公路、草地还是农庄；补救性的研究则是试图探究社会地理学类型的空间变化和失调情况，不管它们是地方行政区划，还是国际边境问题。研究所有这些问题，都要使用同样的基本方法，即对现象的地域结合的精确的描述分析，但各有不同的目标。

现在人们已经厌烦“描述”这个词了，就反对老方法这方面来看，这种态度是对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是不幸的，因为对广大区域的土地、居民和资源的描述性研究，与对各别方面的更加专门化的发生学研究一样，都是迫切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以分布事实的共同变化为明确目标的“解释性的描述”。在英国培养地理学家时，所使用的“自然基础”这个名词，是陈旧的环境观点的残余。它应该被丢掉，除非改变它的含义，并且如同汉斯·博贝克设想的那样把它和“人文基础”放在一起，因为地理学研究一直是在力图确定并解释地球表面土地和居民的地域差异。地球的性质应该通过它们和人类使用的关系来进行评价。作为地理学一个概念的地理学整体论，如果不与严格的尺度结合起来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地球表面的各项空间研究是如此的互不相关，以致不得不从完全不同的过程来进行考虑的话，那么作为单一学科的地理学，就要分裂成两个甚至好几个部分了。专业地理学家需要一个单一的中心。它只能是：地理位置明确，而起源、结构和分布又得到解释的那些地表现象的地域结合的方式。

第四，关于英国和美国还有两点要谈谈。需要更多地集中于系统的领域，和在对特定区域的现象进行综合研究时限定其目标。这种趋向在法国和德国的研究论著中是很明显的。还有一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就是每一个专业地理学家都应该专门研究世界上一个主要地区，并且潜心学习该区居民的语言和文化。已经掌握适当的语言（不管是俄语、阿拉伯语，还是汉语）和在遥远地区艰苦地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征服了该地区的区域专家，实在太少了。在国内研究和到国外工作，长久以来就是德国和法国地理学的传统。英国和美国研究苏联、拉丁美洲、中国，甚至西欧的专家在哪里呢？

另一方面，使人惊奇的是有关系统地理学或者专题地理学理323论发展的英文文献是这么少。[1]这也能够用缺少到国外研究，从而缺少资料、经验、看法的理由来作解释。不过，在战后的德国和法国，这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趋势。在欧洲，国内外区域的专论是可以和人口、农业制度、工业、能源、宗教和交通等这类专题研究相匹敌的。英国和美国的那些不能令人满意的、莫明其妙的地理学家，认为“区域综合”的意思是研究区域内并列的现象，而

[1] 幸而在英国和美国的新出版物已显示这种情况有了转变。

不是它们的空间结合的过程，这就不足为奇了。在英语世界中被广泛接受的“区域概念”，是已经过时的一代以前的概念。系统的领域必须发展，它们的专门知识必须运用到各别的地区。换句话说，对象必须是有限的，并且必须严格地按照地理学的概念加以详细论述。人们必须在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地域关系的范围内，从相互作用上来研究系统的领域。

地理学专业面临着教育和研究两方面的挑战。乔治·夏博曾写道，地理学正在“冲破一切藩篱”，促进并寻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新的重要的研究领域。从出版物的情况来看，许多地理学家似乎觉得他们的工作与边缘学科更为协调。这就更能说明，为什么地理学要有一个更为简明的定义和核心的研究内容。它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由失败主义产生的忧郁；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失败主义是绝对没有理由的。从本书看到的近代地理学的显著进展，为这一判断提供了证据；但是地理学的目的和概念以及从事地理学工作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目标，都需要明确而大胆地说出来。

三个新的路标

今日法国地理学的领域，已在《七巨头大百科全书》内的一大卷《普通地理学导论》中作了介绍，此书于 1966 年出版，是由安德烈·儒尔诺、皮埃尔·德方丹以及米里厄·让-布吕纳·德拉马尔编纂的。各章由约三十名青年地理学家（第四代）编写，他们是这一代地理学家中最活跃的分子。第一编自然地理学，力图阐明造成自然景观的自然过程。对全世界（在一般的基础上）的这些景观的描述，需要对气候、土壤、生物和地形的要素进行综合。因此，气候学及气候带、河流水文学、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机械和化学侵蚀、地形的构造基础等，是自然地理部分头几章的标题。这一部分以对自然景观的描绘作为结束。它们是被放在主要气候带——温带（选择这个名词是不幸的，因为它无确切的定义）、冰川和冰缘带、热带和荒漠带、滨海带，还有洋底的范围内来研究的。据说，这些“自然区域”是留有人类痕迹的幕布。最后一章是论述自然地理在规划问题中的应用。

该书的后半部分论述人文地理。请注意用来表明目标的措词：lagéographiedel’oeuvrepaysageistedeshommessurlaterre，意思就是人类对自然景观或区域的影响。这一编由四个部分组成：“人类的有生力量”（Leseffectifshumains）——这个名词系德方丹在 1932 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自然资源的发展；运输地理；以及文化地理。

文化地理包括识字、文学地理、悠闲地理、宗教地理、法律地理和政治地理各章。戈特芒报告说，最后一章的概述在第 248 页。关于人类有生力量的各章，包括史前史、人口、开拓的边疆、城市、夜和睡眠（由德方丹撰写）、饥饿、卫生和疾病等。关于资源的开发组织各章，包括采集、狩猎和捕鱼的社会、热带地区的干草原和沙漠，美洲北极地区、农业和畜牧业的目标、森林、采矿、工业、盐和能量地理，以及陆、海、空运输及电信地理。这里只不过是列举了各章的标题，但是也肯定表明了今日地理学的领域及研究前景。这种研究法显示了布吕纳、勒·普拉、维达尔以及索尔等人的色彩。这也反映了法国地理学界强有力的人文主义传统。

潘什梅尔指出（本书第 307 页），某些地理学家担心地理学的分裂，力图加强地理学是有科学基础的单一中心的学科这一主流。两篇新的重要论文

中就包含着这一目的：一篇是让·拉巴斯：《空间的组织，意愿地理学的要素》（L’Organisationdel’Es-Pace；■lémentsdeGéographievolontaire，1966）；第二篇是保尔·克拉瓦尔：《区域，国家，巨大的空间》（PaulClaval，Régions，Nations，GrandsEspaces，1968）。拉巴斯的阐述集中在“空间的组织”上，或者说他特别着重地论述国内的战线，即“环境规划”。读者一定能回忆得起来，这些名词在前面提到的目前的思想动向中已多次出现过。拉巴斯不仅力图阐明他研究的范围和目的，而且也力图用它来解决人类空间组织的实际问题。克拉瓦尔著作的重点放在对经济现象的地域分布和结合的定量分析上。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推动力得自三十年代的德国学者，主要是A.勒施和W.克里斯塔勒，他们的主要著作已译成了英语（在美国出版）。他们的观念在三十年代对本书作者有强烈的影响。美国和英国的地理学家，还有希腊雅典的康斯坦丁·多克锡阿迪斯（ConstantinDoxiadis）（此人于几年前在《纽约人报》〈NewYorker〉的《人物简介栏》中终于承认，他的城市与区域计划学或对聚落的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从克里斯塔勒的著作中引申出来的）那样的规划家，和美国的W.伊沙尔德那样的“区域科学家”，他们在战后的年代里，已经认识到把这类研究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的重要性，而且时机也已经成熟了。不过应该明确地宣布，他们这些人实际上都是继承了三十多年前两位德国学者的衣钵。不幸的是，有些人则热衷于宣传他们是“新地理学”的倡导者；他们声称这个新地理学远不是人们常说的那个“传统地理学”。读者在读完本书以后，就能判断出这种态度是不是正确的。拉巴斯和克拉瓦尔系统地阐述了在传统范围内的地区经济分析的目的和原则，并且应用它们来对地球上各现象的区域结合作更有力的说明——克拉瓦尔把这些结合叫做“区域、国家和主要的世界区域”。正如我在这几页中试图介绍的那样，这两个人都采用了定量的区域分析的技术（拉巴斯已在他另一篇关于里昂城区的论文中极好地应用了这个技术），来帮助推进地理学所继承下来的那一股主流。